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全集

13

河北教育出版社

61 Голядкина

— Г. Голядки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Голядкин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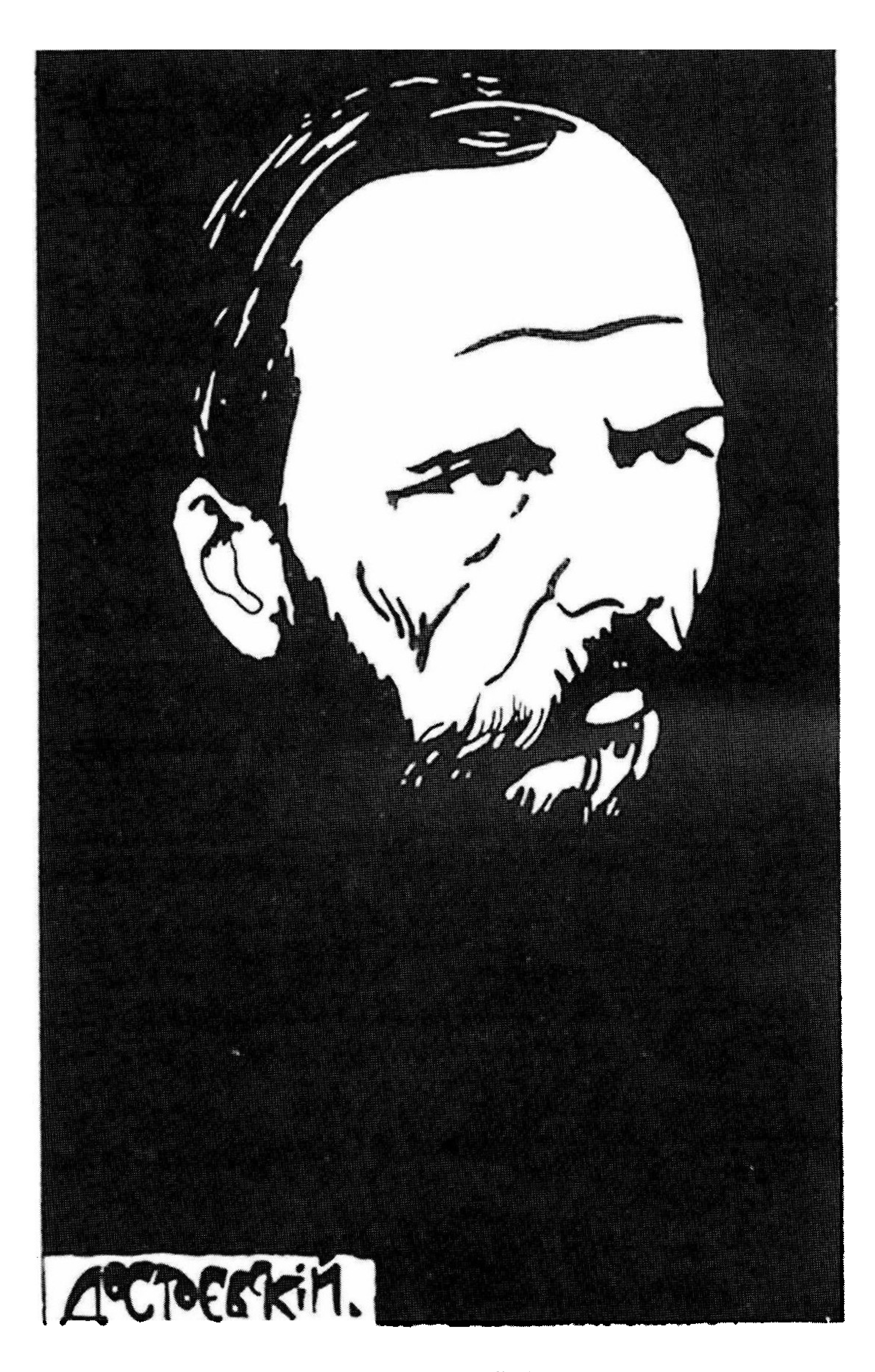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十三卷

少年（上）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陆肇明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

（Ф.瓦罗东据1876年Н.多索拍摄照片作　1876）



阿尔卡季奔跑在夜幕笼罩下的城市

(《少年》插图 M.罗伊特尔作 1947)



阿尔卡季在茶馆里

(《少年》插图 M.罗伊特尔作 1947)

主要人物和常见人物表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多尔戈鲁基（爱称：阿尔卡沙、阿尔卡申卡、阿尔卡什卡）——本书中的“少年”，马卡尔法律上的儿子，实为韦尔西洛夫与索菲娅所生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韦尔西洛夫——没落的贵族地主，本书主人公“少年”的生父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韦尔西洛夫家的农奴，获得自由民身份之后，成为朝圣者

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爱称：索尼娅）——韦尔西洛夫家的农奴，马卡尔的合法妻子，后与韦尔西洛夫同居

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爱称：丽莎）——韦尔西洛夫与索菲娅所生之女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韦尔西洛夫——宫廷侍从，韦尔西洛夫与亡妻法纳里奥托娃所生之子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韦尔西洛娃——韦尔西洛夫与亡妻法纳里奥托娃所生之女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索科利斯基——富有的老公爵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阿赫马科娃——老公爵之女，阿赫马科夫将军的遗孀

比奥林格——男爵，一度成为卡捷琳娜的未婚夫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索科利斯基（爱称：谢廖扎）——近卫军中尉，与老公爵同姓不同宗。丽莎的情人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韦尔西洛夫家的老相识，兼管韦尔西洛夫的田庄和家务

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安德罗尼科夫——律师，管理过韦尔西洛夫的事务

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安德罗尼科夫的侄女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玛丽亚的丈夫。阿尔卡季在莫斯科念书时，曾寄养在他们家

兰伯特——阿尔卡季儿时的同学

阿尔福西娜——兰伯特的情妇

安德烈耶夫——兰伯特的同伙

特里沙托夫——兰伯特的同伙

瓦辛——阿尔卡季的朋友

斯捷别利科夫——瓦辛的继父，放高利贷者

奥莉娅——求职的女教师，后自杀

达里娅·奥尼西莫芙娜（可能因作者记忆之误，在第3部中改称为：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奥莉娅的母亲

目　录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我沉不住气，要坐下来记述我初涉人世的这段经历，虽说不这么做本来也行。但我确知：往后我再也不会坐下来写我自身的经历，哪怕我活到百岁。只有自恋到过于下贱的人，才会恬不知耻地写他自己。唯一能替自己辩解的是，我写作的目的不同于他人，即不是为了博取读者的赞扬。如果说我忽然想到要把我去年以来的一切遭遇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那么这种想法是出自内心的渴望：发生的一切太让我震惊了。我只记录事情，尽量避免不相干的东西，主要是避免文学上的文采。文学家可以写上三十年而最终全然不知他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年。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想当文学家，而且还认为，把我的内心世界以及感情的生动描写扛到他们的文学市场上去，这是不光彩的下贱作为。不过我已懊丧地预感到，似乎又无法完全不描写感情，不流露内心的想法（也许甚至是平庸的想法）；可见任何文学写作，哪怕是仅仅为自己的写作，对人的腐蚀作用有多

深。我的想法甚至可能很平庸，因为你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很可能分文不值。不过这些都是题外话，但也不妨算作开场白；以后再也不会有诸如此类的话了。现在言归正传，虽说某事的开头——也许甚至是万事的开头，都是最难不过的。

二

我开始写札记——我是说，我想从去年 9 月 19 日写起，也就是恰恰在那天，我第一次遇见了……

但是，在大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先交代我遇见了谁，这是老一套，很俗气，我想，甚至连这种调子也是很俗气的：我自己许诺过要避免文学上的文采，可我刚开头就在陷进这种文采。此外，要想写得有条有理，看来光有愿望还不够。我还得指出，用任何一种欧洲语言写作，似乎都比不上用俄语写作那么难。此刻，我把刚才写下的文字重读了一遍，发现我远比写下的东西要聪明。聪明人的口中之言会比他的心中之意蠢笨得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最近这厄运当头的整整一年里，在我与人们的语言交往中，我也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有这种情况，为此我非常苦恼。

尽管我将从 9 月 19 日写起，但还得插上几句，交代我是什么人，9 月 19 日以前在什么地方，因而在那天早晨我可能会有些什么想法——哪怕是想法的一部分吧，这样可以让读者更清楚些，或许会让我自己也更清楚些。

三

我是个中学毕业生，今年虚岁二十一了。我姓多尔戈鲁基，马卡尔·伊万诺夫[①]·多尔戈鲁基——韦尔西洛夫老爷家以前的家奴——是我的法定父亲。这样一来，我就是合法所生的了，可实际上我却是个私生子，而且，我的出身毋庸置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二十二年前，地主韦尔西洛夫（这个人才是我父亲），当时二十五岁，来到了自己在图拉省的庄园。我推想，当时他的个性还没有完全定型。奇怪的是，这个人从我童年起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我整个心灵的气质发生过巨大影响，甚至也许还会对我的整个未来起长远的影响；然而直到现在，这个人的许多方面对我还完全是个谜。不过，说真的，这留待下文来说，一言难尽。即使不说这些，这个人还会在我的整个札记本中随处出现的。

他那时，也就是快满二十五岁时，正好丧偶。他当初娶的是位上流社会的闺秀，但她不很富有，姓法纳里奥托娃，给他留下了一儿一女。有关这位过早离他而去的夫人的情况，我所知甚少，在我占有的资料中也很少见到。何况韦尔西洛夫私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是避开我的，他在我面前总是显得那么傲慢、自大、深藏不露而又不大客气，虽说，偶尔似乎也会对我和气得出奇。不过，为了预先做个交代，我得提一提，他有生以来已挥霍掉了三份产业，而且是很大的产业，总价值四十多

① 本书对马卡尔使用两种父称，大致是：作为农奴时，用“伊万诺夫”（半父称），作为自由民时，用“伊万诺维奇”（父称）。

万卢布,或许更多。现在,他当然是身无分文了……①

当初他到乡下来,“天知道是为了什么”,至少后来他自己是这么对我说的。他两个年幼的孩子通常不在他身边,而是寄养在亲戚家: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的,不管是婚生的还是私生的全一样。这座庄园里的家奴相当多,园丁马卡尔·伊万诺夫·多尔戈鲁基就是其中之一。我在这儿要插叙一下,以便从此撇开不提:很少有人会像我这么痛恨自己的姓,而且痛恨一辈子。这当然愚蠢,但却是实情。每逢我进什么学校,或者碰见那些论年龄我必须向他们说清情况的人,总之,每一个教书匠、家庭教师、学监、教士——无论谁问起我的姓,听到我姓多尔戈鲁基以后,不知为什么总认为有必要追问一句:

“多尔戈鲁基公爵?”②

而我每次都必须跟所有这些无聊的人解释:

“不,平民多尔戈鲁基。”

这平民渐渐把我逼到了简直要发疯的地步。作为一种现象,在这儿我得指出,我不记得有任何例外:大家都这么问。对有些人来说,这显然毫无必要,而且我也不知道,究竟什么人会有这种见鬼的必要。但大家都这么问,无一例外。一听说我是平民多尔戈鲁基,问话的人通常会用呆板、笨拙而冷漠的眼神打量我,这种眼神证明他自己也不知道干吗要问,然后就掉头而去。学校里的同学问得比谁都令人屈辱。老生通常是如何来盘问新生的呢?一个孤单而羞怯的新生第一天到校(不管

---

① 韦尔西洛夫的生平,在许多方面像俄国思想家彼得·雅科夫列维奇·恰达耶夫(1794—1856)。特别是,恰达耶夫也挥霍了三份富有的遗产,到晚年差不多陷入贫困的境地。——俄编注

② 15—20世纪俄国有一个著名的公爵世族,也姓多尔戈鲁基。

是什么学校），便是大家的俎上肉：对他发号施令，戏弄他，把他当奴仆看待。有个健壮的胖小子冷不丁站到自己猎物的面前，用严厉而傲慢的目光一眼不眨地盯了他片刻。新生站在他面前一声不吭，假如不是胆小鬼，就会侧目而视，等待下一步的动静。

“你姓什么？”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

“不，平民多尔戈鲁基。”

“啊，平民！蠢货。”

他说得对：既然不是公爵却要姓多尔戈鲁基，再没有比这更蠢的了。背这口蠢锅不是我的错。后来我开始很生气，面对“你是公爵吗？”这个问题，总是回答说：

“不，我是仆人的儿子，父亲当过农奴。”

再后来，我光火到了极点，一听到问“你是公爵吗？”我就斩钉截铁地一口气答道：

“不，我是平民多尔戈鲁基，过去的老爷韦尔西洛夫先生的私生子。”

我想出这种回答的方法已经是在中学六年级了，尽管我很快就确信自己很蠢，但还是没有立即停止说这种蠢话。记得有位教师——不过，也就他一个——认为，我“充满了复仇的和公民的思想”。通常，人们听了我这个出格的回答，都会露出某种令我难堪的沉思表情。终于有个同学，一个尖酸刻薄的小子，我跟他一年内总共才说过一次话，他满脸正经，但目光稍稍避着我，对我说：

“这种情绪，当然啰，会给您带来声誉，而且毫无疑问您有您自豪的理由。不过要是换了我，毕竟不会过于庆贺自己是

个私生子……而您却像在过命名日似的！”

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夸耀我是私生子了。

我再说一遍，用俄语写作很难：瞧我写满了整整三页纸，讲我这辈子如何恨自己的姓，可读者却想必已经断定，我恨的恰恰是因为我不是公爵，而是平民多尔戈鲁基。然而对我来说，要再做表白、再做辩解就会有失尊严了。

四

且说在这群为数众多的家奴中，除了马卡尔·伊万诺夫以外还有一位姑娘，她已经十八岁，这时，五十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突然表示要娶她为妻。众所周知，在农奴制时代，家奴的婚姻须得到主人的许可，有时就直接由主人包办。当时，庄园邻近住着一位姑姑，她并不真是我的姑姑，而是一个女地主。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都一直管她叫姑姑，不仅是我的姑姑，而且是大家的姑姑，连韦尔西洛夫家里也管她叫姑姑，虽说实际上她跟这家几乎不沾亲带故。她就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那时她在同省同县蓄有三十五名农奴。韦尔西洛夫庄园（蓄有五百名农奴）并非由她管理，只是由她就近监管而已，但我听说这种监管却抵得上任何一位内行的管家。不过，她的才干与我毫不相干，我没有任何阿谀奉承的意思，只想补充一句：这位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是位高尚的人，甚至是个奇特的人物。

正是她，不但不阻止忧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择偶的意向（据说他当时很忧郁），恰恰相反，出于某种原因却竭力鼓励他们。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这位十八岁的女仆就是我母

亲）是个孤儿，父母双亡已经好几年了。她的亡父也是家奴，非常敬重马卡尔·多尔戈鲁基，而且还受过后者的恩惠，六年前临死的时候，他把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唤到跟前，当着众家奴的面，还有神父在场，指着女儿坚定而出声地嘱咐他："你把她带大，娶了她。"这是弥留之际的遗言，甚至有人说是在断气之前一刻钟说的，因此如有必要也可以把它当做是昏迷中的胡话；即使不当做胡话，作为一个农奴，法律上他也无权这么做。他这句话是大家都听见的。至于马卡尔·伊万诺夫，我不知道他后来娶她是出于何种考虑，就是说，他很乐意呢，还是仅仅为了履行义务。十之八九，他会显出一副完全冷漠的样子。这个人当时就已经能做到"与众不同"了。他不是个熟谙经书[1] 或者识字的人（虽说他知道教堂的全套祈祷仪式，特别是某些圣徒的传记，但多半是听来的），也不像所谓的快嘴家奴，只不过脾气固执，有时甚至会越出规矩而已。他说话很自负，从不改变自己的看法，末了，用他自己的古怪说法，他是"恭恭敬敬过日子"。瞧，他那时就是这个样。当然，他博得大家的敬重，但据说大家又觉得他难以相处。他不当家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人们提起他，完全就像提起某个圣徒和受苦受难的人一样。我知道这是实情。

下面说说我母亲的性格。虽然管家坚持要送她去莫斯科学艺，但在十八岁以前，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却一直把她留在身边，并使她受到了一点儿教育，也就是教她学会了缝纫、裁剪、姑娘家走路的姿态，甚至还让她稍稍读点儿书。至于写字，我母亲从来不曾学得像样。在她心目中，跟马卡尔·伊万诺夫结婚是早已决定的事，而且她认为当时她的一切际遇都是

① 这里"经书"指宗教书籍。

好的，最好不过的。她去举行婚礼的时候，神态极其平静，这在这种场合是绝无仅有的，难怪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当时曾亲口说她是个木头人。关于我母亲当时性格的这些情况，我都是直接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儿听来的。正好在这场婚礼的半年之后，韦尔西洛夫来到乡下。

五

我只想说，我始终无法了解到或满意地猜度出，他跟我母亲之间的事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我十分愿意相信去年他亲口说的那一番要我相信的话，尽管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的神态十分自然而又“俏皮”，但还是红着脸担保说，根本没有什么谈情说爱，一切就那样发生了。我相信事情是那样发生的，俄语中“那样”这个字眼真是妙不可言。但我还是老想知道，他俩之间的事究竟为什么会发生。我自己，过去和现在，一辈子都憎恶所有这类丑事。当然，就我而言，我想知道这事的底细，绝非仅仅出于可耻的好奇心。我得指出，直到去年以前，我还几乎完全不认识我的母亲；为了韦尔西洛夫生活得舒适，我从小就被送到了别人家里，这事且待下文再说；但正因为这缘故，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她当时的容貌。要是她长得根本不漂亮，那么当年像韦尔西洛夫这样的人，会迷上她什么呢？这个问题对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显现出此人极不寻常的一面。这就是我之所以要打听的原因，而不是出于龌龊的心理。这个阴郁而内向的人，露出一副可爱的天真无邪的模样（每当他认为有必要，这种天真无邪的模样鬼知道就会从哪儿冒出来，就像事先装在衣袋里似的），亲口跟我说，当初他完全是

只“年轻的笨小狗”，倒不是多情善感，而是那样，刚刚读完《苦命人安东》和《波琳卡·萨克斯》——这两部文学作品，①对我国当时成长的一代曾产生过广泛的启蒙影响。他还补充说，他当初下乡来，也许就是因为读了《苦命人安东》，而且这话他说得异常认真。这只“笨小狗”跟我母亲之间的事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开始的呢？写到这里，我已经想象到，即使我哪怕只有一个读者，他也会哈哈大笑地讥嘲我，就像讥嘲一个极可笑的少年；这少年自己愚蠢地保持着童贞，却硬要去议论和解决一窍不通的事情。是的，这种事情我确实还一窍不通，不过我承认这点绝非出于骄傲，因为我知道，一个二十岁的大高个子居然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是极为愚蠢的。但我要跟这位先生说，他自己也未必了了，我这就来证明。诚然，我跟女人不曾有过任何性关系，而且也不想有，因为我将一辈子唾弃这种事，我发过誓。但我确实知道，有一种女人以自己的美色或者什么别的东西，能够刹那间把人迷住。但对于另一种女人，却必须细细琢磨上半年，才能懂得她的心，要看清并爱上这种女人，单靠观察和甘心付出一切代价是不够的，还得有某种天赋。哪怕我幼稚无知，对这一点却深信不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得把全体女人一下子贬低到普通家畜的水平，并仅

① 《苦命人安东》是俄国作家德·瓦·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的中篇小说，1847 年发表于《现代人》杂志，描写农奴的艰苦生活；中篇小说《波琳卡·萨克斯》系俄国作家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2）所作，充满了乔治·桑的人道主义思想，提出了妇女权利的问题。两部作品对当时俄国进步人士产生重大影响，均得到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根据本书作者的意图，韦尔西洛夫在年轻时是个自由主义贵族，属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西欧派”，跟他的同代人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别林斯基思想的熏陶。

以这种待遇把她们豢养在自己身边；没准想这样做的还大有人在呢。

虽说我母亲当年的肖像在某处还保存着，我可没有见过，[1] 但从几个侧面我已确知她并不是个美女。所以，对她一见钟情是不可能的事。韦尔西洛夫要是单纯为了“寻欢作乐”，他可以挑选另一个女人，此人就在庄园里，而且还没有出嫁，那就是安菲萨·康斯坦丁诺芙娜·萨波日科娃，一名婢女。再说，倚仗地主的权力去破坏一门神圣的婚姻，哪怕是家奴的婚姻，作为一个因读了《苦命人安东》才下乡来的人，是会耻于面对自己的，因为，我再强调一遍，就在几个月以前，即事隔二十年之后，他还异常认真地提到过《苦命人安东》。要知道安东被夺走的只是一匹马，而这里夺走的却是妻子！可见一定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所以 mademoiselle[2] 萨波日科娃才没有被选中（依我看，这是她命好）。去年，趁我跟他谈得上话的时候（因为不是时时都能跟他谈上话的），我曾经好几次用所有这些问题去纠缠他，我发现，他已顾不上文雅的风度，也不管事情隔了二十年之久，居然一反寻常地扭捏作态。可我坚持追问。记得至少有那么一次，他带着那种对我多次流露过的上流人士的厌烦神气，有点儿古怪地吞吞吐吐说：我母亲是个无力自卫的女人，倒不是说你会爱上她，——恰恰相反，你根本不会爱上她，——可你会突然莫名其妙地怜惜她，不过，怜惜她什么呢？因为她柔顺？——这永远无人知晓，但你会长久地怜惜她，由怜惜而生出依恋……“总之，我亲爱的，有时就

---

① 参阅本书（第3部，第7章，第1节）：阿尔卡季在韦尔西洛夫书房里见过母亲年轻时在国外照的肖像。

② 法文：小姐。

让你撇不开了。”这就是他告诉我的，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不得不认为，他当时绝对不是只笨小狗，尽管他在提及往事时这样自认过。这一点正是我想知道的。

不过，他同时还要我相信，我母亲爱上他是出于“奴性”：他居然想得出根子在农奴制！这是为了面子在撒谎，昧着良心、不顾名誉、不顾贵族身份在撒谎！

当然，我讲了这么一大通话，似乎是在赞扬我母亲，尽管我早已说过，关于她当年的事我一无所知。除此之外，我清楚地知道谁都难以超越那个环境和可悲的观念，正是在这种环境和观念之中，她生活了一辈子，并且从小就变得麻木不仁。尽管如此，不幸还是发生了。我得顺便纠正一下：由于我联想太远，竟忘记了摆事实，而事实恰恰应该首先摆出来，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事是直接从糟糕的事开始的。（我希望读者不至于那么装腔作势，竟不能一下子明白我想说的意思。）总之，他们之间的事恰恰是按地主的方式开的头，虽说 mademoiselle 萨波日科娃得以幸免。但我得在这儿替自己辩解一下，预先声明我的话前后绝不矛盾。因为在那个时代，像韦尔西洛夫这样的人，即使在意乱情迷的场合，他能和我母亲这样的女人谈论什么呢？上帝啊，能谈论什么呢？我听那些好色之徒说过，男人跟女人苟合的时候，男人多半一声不吭就开始干那事，不待说，这太可怕、太恶心了。然而，就算韦尔西洛夫愿意，看来他也不可能跟我母亲有别样的开头。莫非要他跟她以讲解《波琳卡·萨克斯》开始？何况那时他俩也根本顾不上俄国文学，恰恰相反，据他所说（有一回他说漏了嘴），他俩往往躲在屋角里，在楼梯上等待对方，要是有人打旁边经过，就会双双红着脸像皮球似的跳开，而那位“地主暴君”竟然害怕撞见一个最卑贱的擦地板女佣，已经顾不上自己农奴主的身份了。即使

是按地主的方式开的头，但结果却似是而非，实际上依然什么也说不清。甚至更为扑朔迷离。单就他们偷情发展的程度，即是个谜，因为像韦尔西洛夫这类人的前提，是一旦达到目的，立刻就会抛弃。但结果并非如此。一条好色的“小狗仔”（他们全都好色，概无例外，——无论是进步人士还是守旧派）跟一个俊俏而轻浮的女仆发生奸情（而我母亲并不轻浮），这不仅可能，而且也难以避免，特别再添上他那年轻鳏夫的浪漫处境以及他的游手好闲。但要爱上一辈子——那太过分了。我不能担保他爱过她，但他一辈子都把她带在自己身边却是事实。

问题我提了一大串，但我要指出，尽管去年我跟我母亲相处亲近，而且我像一条粗鲁而忘恩负义的小狗，认为他们对不起它，以至我跟她完全不拘礼节，然而还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却没勇气直接问我的母亲，这就是：当时她本人已结婚半年，而且还深受婚姻必须合法这类观念的压制，被压制得像一只微弱的苍蝇，对自己的马卡尔·伊万诺夫几乎敬若天神，可她怎么会、怎么会在短短两个星期之内，犯下这样的罪过呢？难道我母亲是个荡妇吗？事实正好相反，我现在就提前交代：简直很难想象会有比她更纯洁的灵魂，而且一辈子都那么纯洁。因此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她犯事时是不能控制自己，这不是当今律师们替凶犯和窃贼所做的辩护词，① 而是指她当时慑于一种强烈的印象，这种印象加上受害人相当天真，便在劫难逃，悲剧性地控制了她。谁知道呢，也许她痴迷地爱上了……他的衣着款式、巴黎发型、法国口音——正是她毫无所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写过（譬如，在 1873 年的《作家日记》里），有陪审员的法庭对一些明显的罪犯做无罪判决。他认为大部分责任在于律师，他们与其说关心弄清事实，还不如说关心保持自己的声誉。

知的法国口音，还有他在钢琴前所唱的抒情歌曲，她爱上了某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而他长得又十分英俊），连同衣着的款式和那些抒情歌曲，她真的同时爱上了他的全部，简直爱得精疲力竭。我听说，在农奴制时代，这种事在婢女身上时有发生，哪怕是最老实的婢女。我理解这种现象，谁把这仅仅解释为农奴主的权利和“奴性”的产物，谁就是浑蛋！总之，这么说来，这个年轻人果真自身具有足够的最直接的魅力，能把一贯贞洁的女人，特别是一个与他完全不同的、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天地的女人，引向如此明显的毁灭的境地？这是在走向毁灭——我想连我母亲都是始终清楚的，只是在她走向毁灭之路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毁灭；这些“无力自卫”的人就是这样：明知是毁灭，还要往里钻。

他们私通后马上就悔罪了。他曾巧妙地告诉我，为这事他特意把马卡尔·伊万诺夫唤进书房，伏在后者的肩膀上痛哭了一场，而她——她当时躺在自己那间仆人下房里的什么地方，失去了知觉……

六

不过，问题和丑事的细节已经说够了。韦尔西洛夫从马卡尔·伊万诺夫那儿赎出了我的母亲，很快便走了，打这以后，正如我前面所记，几乎处处都把她带在身边，除非他独身长期出门；这时他多半把她托付给姑姑，也就是托付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照看，遇到这种场合，后者总会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他俩在莫斯科待过，也去过其他一些庄园和城市，甚至还到过国外，最后在彼得堡住了下来。凡此种种

以后再提，或许也不值一提。我只想说，母亲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分居后过了一年，我就出世了，再过一年便是我妹妹；在十年或十一年之后吧——母亲又生下了一个病孩，我的弟弟，但几个月后就夭折了。这孩子的难产毁了她的姿色，至少我听人说，她开始很快变得又老又憔悴。

但是，他们跟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联系却从未中断过。不论韦尔西洛夫一家待在哪儿，在某地一住几年呢还是不停地搬迁，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定会将自己的情况告知“家人”。这就形成了某种奇特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郑重的，几乎是认真的。我知道，在地主生活中这种关系难免会掺进一点儿笑料，但这儿没有。一年来信两次，不多也不少，而且这封信跟那封信都异常相似。我见过这些信，其中很少涉及私事，恰恰相反，尽量庄重地只谈些最一般的事情和最一般的情感（如果可以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情感的话）：先是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然后就是祝愿、庄重的问候和祝福——仅此而已。看来，正是这种十分一般、毫无特色的信，在这个圈子里被视为举止得体和交往中的最高准则。“谨向我们可爱可敬的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夫人致以最恭顺的问候……”“向我们可爱的孩子们致以父亲的最永恒的祝福”。所有孩子的名字都一一写到，有一个添一个，我当然在内。我得顺便指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十分巧妙，他从不把最最高贵和尊敬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老爷写作自己的“恩人”，尽管他在每封信里次次附笔向他致以最恭顺的问候，请他关照，祈求上帝赐福于他。我母亲很快给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回信，信的内容写得总是似乎跟他一样。韦尔西洛夫当然没参与通信。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信写自俄国各地，来自不同的城市和修道院，有时他在修道院里待得很久。他成了一个所谓的朝圣者。他从不提任何要求，但每隔两

三年必定来家小住一次，就直接住在母亲处，而我母亲根据需要总有一套自己单独的寓所，与韦尔西洛夫的寓所分开。这情形待我以后再做交代，这里我只想指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并没有放任而随便地睡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而是谦卑地歇息在隔开的什么地方。他住的时间不长，约莫五天、一个星期。

我忘了交代，他对自己的姓氏“多尔戈鲁基”是极其喜爱并看重的。当然，这既可笑又愚蠢。最愚蠢的是他喜爱他的姓，恰恰是因为有一个姓多尔戈鲁基的公爵世族。真是个奇怪的思路，完全颠了个个儿！

假如我说过全家人经常团聚之类的话，那么，我当然并不在内。我就像一个弃儿，几乎一出生就被安置在别人家里。但其中并不存在任何特别的用意，而只是稀里糊涂就做了这种安排。母亲生下我之后依然年轻好看，所以他需要她，而一个爱哭爱闹的小孩儿当然碍事，特别是在旅途中。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在二十岁以前几乎没有见过我母亲，除了两三次匆匆的会面。这事不取决于母亲的感情，而是由于韦尔西洛夫对人十分傲慢。

七

现在记的完全是另一件事。

一个月前，也即 9 月 19 日之前的一个月内，我在莫斯科决定跟他们所有人都断绝关系，彻底专心致志于自己的思想。我之所以写下“专心致志于自己的思想”这句话，是因为这样的措辞几乎可以表达我整个的主要想法——我在这世界上的生存目的。至于什么是“自己的思想”，以后要谈的太多了。在

我多年的莫斯科生活中，在充满了幻想的离群索居的日子里，自中学六年级起我就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从此之后，也许我一刻也不曾抛弃过。这一思想占据了我的整个生活。在这以前我也生活在幻想中，从儿时起就生活在有某种特色的幻想王国里，但是随着这一首要的、占据我整个心灵的思想的出现，我的种种幻想便凝聚起来，一下子表现为某种形式：种种愚蠢的幻想都变得明智了。中学学习没有妨碍幻想，也没有妨碍我的思想。但我得补充说明，虽说在七年级以前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在毕业的最后一年却很差，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思想，在于我从中得出的也许是不正确的推论。这样说来，不是中学学习妨碍我的思想，而是思想妨碍了中学学习，还妨碍了我上大学。中学毕业以后，我就立即打算不但跟所有家人彻底断绝往来，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跟整个世界断绝来往，尽管当时我才虚岁二十。我给一个合适的人写了封信，通过他转告彼得堡叫他们完全不要来打扰我，再也不必给我寄生活费，如果可能，就彻底把我忘了（当然，这是指如果他们还多少记得我的话），末了，我说我“无论如何”决不上大学。当时我面临的两难选择是无法回避的：要不就得上大学继续深造，把准备立即付之实施的“思想”推迟四年。我毫不动摇地选择了我的思想，因为我有充分根据对它深信不疑。我的父亲韦尔西洛夫，有生以来我只见过一次，而且仅是匆匆一面，当年我才十岁（但就是这匆匆一面，他已经给了我强烈的印象），韦尔西洛夫作为对我那封信的答复（其实，这是封并非寄给他的信），竟亲笔写信召我去彼得堡，答应安插我去私家当差。这个冷漠而高傲的人，对我一贯趾高气扬、满不在乎，自我出生之后直到今天，一直把我搁在别人家里，不仅根本不认识我，甚至对此从未有过悔意（谁知道呢，也许连我是否存在他都模糊不清

呢，因为事后发现，给我支付莫斯科生活费的竟不是他，而是别人)，但是我仍要说，正是这个人突然记起了我，还劳他亲笔写信召我回去，——这次召唤诱惑了我，决定了我的命运。顺便说一句，说来也怪，在这封短短的信里（只有小开张的一页纸)，我竟然很高兴他只字不提上大学的事，也不要求我改变决定，更没有责备我不想念书，——总之，他没有写一句父母们通常都会写的诸如此类的废话，不过，这也正是他坏的一面：更有力地表明他对我满不在乎。我下决心回去，还因为这完全不妨碍我的重要理想。“且看看会发生什么，”我暗自思忖，“不管怎么说，我跟他们交往只是临时的，或许是极其短暂的。一旦我发现这一步，哪怕是有条件的小小一步，仍然会使我远离主要目的，那我就立即跟他们断绝来往，抛开一切并躲进自己的壳里。”恰恰是躲进壳里！“像乌龟一般躲进壳里”，这比喻我十分喜欢。“我不再孤单，”我继续掂量着，最近这些日子我发疯似的在莫斯科游荡，“现在我已经再也不会孤单了，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些可怕的岁月里那样了：我的思想与我相随，我永不背弃它，哪怕我在那里对他们所有人产生了好感，他们给我幸福，我跟他们住上十年，我也永不背弃它！”我预先交代，正是这种想法，正是我的计划与目的的这种两重性，早在莫斯科就已形成，并且在彼得堡时片刻也不曾离开我（因为我在彼得堡没有一天不想走掉，我把每一天都预先定为是我跟他们断绝来往并远走高飞的最后期限)，我还要说，这种两重性似乎就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促使我在一年之中犯下许多过失，做出许多肮脏的、甚至卑鄙的勾当，不用说，还有许多蠢事。

毫无疑问，我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父亲，一个早先从未有过的父亲。这念头使我陶醉，无论是在莫斯科收拾行装之时，

还是在旅途的车厢之中。单是一个父亲——这还不算什么，而且我也不喜欢温情脉脉，但这个人以前并不想认识我，不把我放在眼里，尽管这些年来我始终对他抱有深深的幻想（如果可以这样形容幻想的话）。我的每一个幻想，打从儿时开始，都有他的影子：环绕着他飞翔，最终归结到他身上。我不知道我对他是恨还是爱，但他却填满了我的整个未来以及我对生活的一切打算，——而且这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并伴随我一天天长大的。

促使我离开莫斯科的，还有一个重大情况，这是个诱惑。早在启程以前三个月（就是说，当时根本想不到有彼得堡之行），我就已被这诱惑扰得心潮澎湃！另外，我被吸引到这片茫茫人海之中还有一个原因，即我能在其中直接主宰与支配别人的命运，甚至还是何等人的命运啊！不过在我胸中激荡的感情是宽容厚道，而非独断专行，这一点我得预先申明，以免对我的话产生误解。再说，韦尔西洛夫可能会想（如果他肯赏脸想起我的话），来人只是个小男孩儿，从中学出来的半大小伙子，完全不谙世事。可是我却已经知道了他的全部底细，而且手头还有一份极重要的文件，要是那时我向他披露秘密，他准会舍弃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文件（现在我对此已确知无疑）。话又说回来，我发觉我已设置了不少谜团。而没有事实是无法描写感情的。好在所有这些事在该写的地方都会写个够，我就是为此而动笔的。可现在这么个写法，就很像是在说胡话或者如堕五里雾中。

八

最后，为了彻底地转到 19 日那一天，我且扼要地说说，亦即所谓一笔带过：我见到他们所有人，即韦尔西洛夫、母亲和我妹妹（后者我平生头一回见到）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处境艰难，几乎一贫如洗或快要一贫如洗了。这一点我在莫斯科时已经知道，但所见的情形依然超出我的意料。我从儿时起就惯于把这个人，把“我未来的父亲”想象成几乎闪烁着某种光辉、处处高人一等的样子，我无法想象不是这样。韦尔西洛夫从不跟我母亲合住一套寓所，总是替她另租一套：不用说，这么做是为了维护他们那种极其可恶的“面子”。可如今，全家却合住一所木结构的侧屋，位于谢苗诺夫团驻地的一条胡同里①。所有东西都已经典当出去，因此我瞒着韦尔西洛夫甚至把我六十卢布的私房钱都给了母亲。说是私房钱，是因为这是靠每月付给我的五卢布零花钱积蓄起来的，积蓄了两年，这一积蓄始于我确立“思想”的第一天，所以这笔钱不该让韦尔西洛夫知道分毫。我怕他知道。

其实这点儿帮助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母亲在干活，妹妹也在揽些缝纫活做，韦尔西洛夫却游手好闲，百般挑剔，继续按照早先许多奢侈的习惯过日子。他大发牢骚，特别是在饭桌上，而作风又十分专横。而母亲、妹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

① 这儿提到的是旧时彼得堡的一个区，离这条胡同不远，驻扎着谢苗诺夫团，该区正好位于富人街区与贫民街区的接壤处。——俄编注

娜以及已故安德罗尼科夫[1] 留下的一大家子女人，却对他敬若神灵。这情形我无法想象。我得指出，九年前他还优雅无比。我已说过，在我的幻想中他始终闪烁着某种光辉，因此我无法想象，在那以后的短短九年中，他怎么会变得如此苍老和黯淡无光：我顿时感到悲哀、怜悯和羞愧。粗粗见他一眼的观感，是我初来乍到时首先获得的最沉重的印象之一。不过话说回来，他还根本算不上是个老头儿，他才四十五岁，后来我再仔细地打量他，发现在他清秀的脸上蕴涵着某种神态，甚至比保留在我记忆中的更扣人心弦。少了些昔日的丰采，也没有过去那么漂亮，甚至没有那么优雅了，但生活似乎在这张脸上刻下了某种远比往日更为令人好奇的痕迹。

然而在他经受的挫折中，贫穷只不过占一成或二成，这点我太清楚了。除了贫穷之外，他还面临某种严重无比的情况，——且不算那场还有希望打赢的遗产官司。这场官司韦尔西洛夫跟索科利斯基公爵家已经打了一年，韦尔西洛夫有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一座庄园，价值七万或者更多。上文我已说过，这个韦尔西洛夫有生以来已挥霍掉了三份遗产，这一回又有遗产来搭救他了！案子在最近期间将由法庭做出判决。我就是为此事而来的。当然，单凭这个希望谁也不会给他钱，举债无门，于是他们只好暂且熬着。

但韦尔西洛夫也没有去任何人家走动，虽说有时他整天出门在外。一年多以前，他就被逐出了社交界。尽管我在彼得堡生活了整整一个月，尽管我做了一切努力，但这件事的主要责任我还是没有弄清楚。韦尔西洛夫是否有错——这对我很重

① 某部门的长官并因此兼管韦尔西洛夫的事务，大约三个月前去世。

要，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据说一年多以前，他在德国有过一桩极其卑鄙的行为，而且当众出了丑——这在“上流社会”看来是最糟的，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挨了人家一记耳光，居然没有要求对方决斗，而打他的人恰恰是索科利斯基公爵家的一员。由于这些传闻，大家都不再理睬他，其中还包括他这辈子特别善于结交的所有达官贵人。就连他的两个孩子（合法婚姻所生的）——儿子与女儿，也都不理他，不跟他住在一起。诚然，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照常出入于社交界的最上层，那是通过了法纳里奥托夫一家及索科利斯基老公爵的关系（后者过去是韦尔西洛夫的朋友）。不过我观察了韦尔西洛夫整整一个月，发现这个傲慢的人与其说是被社交界逐出了圈子，还不如说是他自己从身边赶走了社交界：他看上去是那么孤高！但他有没有理由摆出这副神气呢——这正是我忧心的问题！我一定要在最近期间内了解全部真相，因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识别他的为人。我对他还隐瞒我自己的能耐，但我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承认他，要么完全把他踢开。而后一种选择对我来说将会十分艰难，为此我很苦恼。最后，我得彻底坦白：我珍视这个人！

可暂时我还跟他们共住一间屋，我去当差，并勉强克制不对他无礼。但快克制不住了。我已经住了一个月，却与日俱增地更加坚信：无论如何我都没法要求他做出明确的解释。这个高傲的人在我面前显得高深莫测，使我深感侮辱。他对我倒很亲切，还开些玩笑，但我宁可他跟我吵架，也不要这样的玩笑。我跟他之间的所有谈话，总是显得有点儿语意双关，这是指来自他那方面的简直有点儿奇怪的嘲讽口吻。我从莫斯科来到这儿，一开头他对我的态度就不太严肃。我说什么也弄不懂，他干吗要这样做。固然，他做到了在我面前继续保持高深莫测的样子，但我自己却决不会不要脸地乞求他严肃地对待

我。再说，他还摆出了某种令人惊异和倾倒的派头，使我不知道如何对付。简单地说，他对待我就如同对待一个毫无阅历的少年，尽管我早知道会这样，但依然无法忍受。由于这个缘故，我自己也不再认真说话，我只是等着；甚至几乎根本不讲话了。我在等一个人，这个人一到彼得堡我就能彻底知道真相，这是我最后的希望。至少我已做好了跟韦尔西洛夫彻底决裂的准备，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我舍不得母亲，但是……“要么他，要么我”——这就是我打算给她和我妹妹提出的抉择。甚至日子我也已经定下，而暂时我还是去当差。

第二章

一

19日那一天，也是我该领取第一笔薪水的日子，我在彼得堡“私家”当差的第一个月已满。关于这个差事，他们根本没跟我商量，似乎就在我到达的第一天，就把我往那儿一送了之。这样做很不尊重人，我几乎是应该提出抗议的。这个差事就是在索科利斯基老公爵家里工作。不过当时要是提出抗议，就意味着立即跟他们决裂，虽说我根本不怕，但会不利于我的主要目的，所以我暂且一声不吭地接受了，用沉默来维护我的尊严。我得首先说明，这位有钱的三品文官索科利斯基公爵，跟莫斯科那个索科利斯基公爵世族毫无亲戚关系（后者一连好几代都已沦为微不足道的穷人，韦尔西洛夫就是在跟他们打官司）。老公爵与他们只是同姓而已。然而他很关心他们，特别喜欢这些公爵中的一位年轻军官，这军官在族里该算是个长辈。还在不久以前，韦尔西洛夫对老公爵的事务起过巨大影响，曾是他的朋友，可却是一个奇怪的朋友，因为我发现，这

个可怜的老公爵非常怕他，不单在我当差期间，而且在那一场友谊中也似乎始终如此。其实他俩早已不再见面：韦尔西洛夫遭受指责的那桩不光彩行为，恰恰与老公爵家有关。但这时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出现了，我就是通过她的周旋才被安插到老人身边的，这老人希望自己书房里有个“年轻人”。同时，实际上他也很想做件讨好韦尔西洛夫的事，所谓先向对方跨出一步，而韦尔西洛夫允许了。老公爵趁自己女儿（一位将军的遗孀）不在时就这么办了，要不，这位将军的遗孀是肯定不允许他走这一步的。这是后话，但我得指出，正是这种对韦尔西洛夫的奇怪态度，使我在吃惊之余偏向于我父亲。我意识到，既然对一个蒙受侮辱的家庭的家长韦尔西洛夫依旧怀有敬意，可见有关韦尔西洛夫卑鄙行径的种种传闻是荒谬的，或者至少是有异议的。正是这一点，多少也迫使我对当差一事不提抗议：我去当差就是希望核实这一切。

在彼得堡我碰见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时候，她正在扮演一个奇怪的角色。我几乎已经完全忘了她，说什么也没料到她竟有那么大的作用。早先我在莫斯科生活时，她来找过我三四次，天知道她从哪儿来，受了谁的托付，但每次都恰逢要把我安顿在某处的时候：把我送到那所可恶的图沙尔寄宿学校，或者在两年半之后，把我转到走读的中学去，安排我住在难忘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寓所里。她一出现，当天就一直伴着我，检查我的内外衣服，带我进城去库兹涅茨桥，替我采办必需的物品，总之，一切生活用品，直到小箱子和铅笔刀，她都给我料理妥帖。同时她又不停地呵斥我，数落我，责骂我，查问我，胡编乱造些别的男孩子，她朋友家的啦，亲戚家的啦，要我以他们为榜样，似乎他们都比我强。说实话，她甚至还拧我，好几次还真的捶过我，捶得好痛。等到把我妥善料理、安

置停当之后，她就消失了，好几年都不见踪影。正是她，在我刚到彼得堡之际，又冒出来安置我了。这是个精瘦的小个子女人，鹰钩鼻，一对小眼睛也锐利如鹰。她像女奴一般替韦尔西洛夫效劳，把他奉若教皇，但这是出自信念。不过我很快就吃惊地发现，她处处受人尊敬，而主要是，无论在哪儿，人人都认识她。索科利斯基老公爵对她敬重非凡，他的家人也一样，连韦尔西洛夫那对傲慢的儿女、甚至法纳里奥托夫全家也都如此，然而她靠做针线和洗涤某种花边度日，从铺子里揽些活计。我跟她二话没说就吵了一架，因为她竟然又想跟六年前那样呵斥我。打这以后我们每天都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有时聊天。我得承认，不到一个月，我就开始喜欢她了，我想，是因为她那种独立不羁的性格吧。不过，这一点我可没有告诉她。

我很快就明白，把我安插到这病老头儿身边当差，仅仅是为了替他“解闷”，这就是我的全部差使。不用说，这是在贬低我，我本该立即采取措施，但没过多久，这个怪老头儿却意外地使我产生了某种类似怜悯的感受，而且一个月不到，我竟莫名其妙地对他有了几分依恋，至少放弃了冒犯他的想法。其实他的年龄还不到六十。但出过一件大事。大约在一年半以前，他突然犯病：当时他正出发去某地，途中却发起疯来，结果闹出了某种丑事，弄得彼得堡议论纷纷。就像这类场合该办的那样，他立即被送到了国外，可是大约五个月之后他又突然露面了，虽说辞去了职务，身体却非常健康。韦尔西洛夫严肃地（而且明显激动地）断言，他根本不是发疯，而只是神经有点儿失常而已。韦尔西洛夫的这种激动，我立即就注意到了。不过我要说，我自己也差不多赞同他的看法。老头儿只不过有时显得太轻浮，与他的年岁不怎么相称，据说，这情形先前是根本没有的。据说，先前他在某处当过什么顾问，说他有一回

还顶呱呱地完成过一项给他的委托呢。可我认识他整整一个月了，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有当顾问的特殊才干。人们察觉（我可没察觉到），他犯过那场病之后似乎特别想赶快续弦，据说，一年半内这念头他已经动过好几回。这事似乎已在上流社会里传开，引起了有关人士的兴趣。但由于这个意图对公爵周围的某些人十分不利，所以老头儿受到方方面面的监视。他自己家里人口很少：鳏居已经二十年，只有一个独生女——就是那将军遗孀，眼下大家天天都在等她从莫斯科回来，这个年轻女人的脾气无疑使他害怕。尽管家里人少，但他却有一大帮子形形色色的远亲，多半是亡妻方面的，而且都穷得跟要饭的一般。除了远亲以外，他还有一大群各色各样的养子和备受他恩泽的养女，这些人全都指望在他的遗嘱里分到一小笔遗产，所以个个出力帮着将军夫人监视这老人。此外，他还有个怪癖，是从年轻时起就养成的，只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取笑：这就是承揽穷姑娘的出嫁之事。二十五年以来，他接二连三把她们嫁出去，一会儿是远亲的女儿，一会儿是他妻子的堂兄弟的什么继女，一会儿是教女，甚至连看门人的女儿也由他包办出嫁。他在她们还是小女孩儿的时候，先把她们收养在自己家里，由家庭女教师和法国女人把她们带大，然后送进最好的学校去念书，最后，置备嫁妆将她们嫁出去。这些事总是层出不穷。养女们出嫁后，自然又会生出一群小女孩儿，生下的小女孩儿又个个争当他的养女，于是他得去各处给她们行洗礼，她们又全都来祝贺他过命名日，而所有这些事都让他异常开心。①

① 据说，老公爵这些作为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姑丈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库马宁，后者是家族中许多人的恩人，所有侄女都得到他赠给的嫁妆。——俄编注

我给他当差以后，马上就察觉到老头儿心里抱有一个苦恼的看法（这一点不可能不让人察觉）：他认为，在上流社会里，大家投向他的目光开始有点儿异样，似乎再不像从前那样，把他看做健康的人了，即使在社交界最开心的聚会上，他也摆脱不了这种印象。老头儿变得多疑起来，开始对每个人察颜观色。大家还在怀疑他是疯子，——这想法显然使他十分苦恼。即使对我，他有时也会用不信任的眼光细加观察。要是他知道有什么人在散布或肯定有关他的这种流言，那么，这个极其宽厚的老人看来准会与对方永世为敌。正是这一状况，我要提请读者注意。我还要补充一句，也正是这种状况，从第一天起就促使我不去冒犯他。要是偶尔有机会能逗他开心或替他解闷，我甚至还很乐意呢。我想，这一自白不会有辱于我的尊严。

他的大部分钱都用于周转。他以股东的身份加入了一家规模挺大、十分可靠的股份公司，这已是生病以后的事了。虽说公司业务由别人经管，但他也十分关心，经常出席股东大会，并当选为董事。他定期参加董事会议，作长篇发言，又是辩驳又是吵闹的，显然干得十分愉快。他很喜欢发言：至少可以让大家看出他有头脑。即使是在大家看不到的个人生活中，通常他也极其喜欢在谈吐中插入一点儿意味特别深长的内容或俏皮话，我对这一点是太理解了。他家的楼下安排了个房间，类似家庭账房，有个办事员在那里办事、算账和记账，同时管理家务。这个办事员此外还兼了一份公家差事，本来有他一人已经绰绰有余了，可是按照公爵本人的意愿，再增添了我，说是去给办事员当助手，却又立即把我调进了书房。可我往往无事可做，连摆在面前装装样子的文件和簿册都没有。

现在我写这些时，对往事早已醒悟，在许多方面几乎已经成了旁观者，可我该如何来写当时郁积在我心中的忧愁（这忧

愁，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特别是该如何来写我当时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呢？这种不安曾经使我处于急躁混乱的状态，甚至害得我彻夜难眠：全是因为我没有耐心，因为我自己给自己出了那么多谜。

二

要钱，哪怕是要薪水，是件十分讨厌的事：如果在你良心的每个角落里觉得，这笔钱自己不完全应得的话。可前天母亲在跟我妹妹悄悄商量，声音低得不让韦尔西洛夫听见（“免得让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不痛快”），说她打算把神龛里的一帧圣像拿去典当，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它十分值钱。我当差的月薪是五十卢布，但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领这笔钱，我被安插到这儿来的时候，没有人跟我提过一个字。大约三天以前，我在楼下碰见那个办事员，我向他打听：这儿该找谁领薪水？他露出一脸惊奇，笑嘻嘻地瞧着我（他不喜欢我）：

“您领薪水？”

我原想，在我回答之后他还会追问：

“凭什么呢，先生？”

可他只是冷冷地答了一句“一无所知”，便埋头在他那本细格子账簿里，只管把单据上的什么账目往里填。

其实，他并非不知道我也是干了些事的。两周前，他自己就转交给我一项工作，让我伏案做了整整四天：誊抄一份草稿，可结果几乎等于重写。这是公爵的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意见”，他准备提交给股东委员会，必须把这些意见组织成文，还得模仿合适的文体。后来我跟公爵把这个文件研究了一整

天，他跟我争论得很激烈，但最终表示了满意，只是我不知道这文件他提交了没有。他还请我写过两三封信，也是商务方面的，对此我就不提了。

讨薪水使我烦恼，还因为我已经决定辞职不干了，由于不可避免的情势，我预感到自己将不得不离开此地。那天早晨我醒来，在楼上斗室里穿衣的时候，就感到心跳得厉害，尽管我发了狠，但一踏进公爵家，我又感到了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因为那个人，那个女人，会在当天上午到达此地，我一直在盼望她的到来能澄清折磨我的种种问题！这个人就是公爵的女儿，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我已经提到过这个年轻寡妇，她跟韦尔西洛夫有切骨的冤仇。我终于写出了这个名字！当然，我从未见过她，也无法想象怎么跟她说话，会不会跟她说话，但我总觉得（也许有充分的理由），她的到来可以解开我心目中有关韦尔西洛夫的谜团。我不能始终镇定自若：我十分烦恼，刚走第一步就那么胆怯、那么笨拙，可又好奇得要命；主要的是，我感到厌恶，——这就是我当时所有的三种感受。那天的一切，我都记忆犹新！

我的公爵还丝毫不知道女儿会于当天到家，以为她也许要在一周以后才能从莫斯科归来。我是前天很偶然地得知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收到了将军夫人一封信，她跟我母亲谈话时泄漏了这个消息，当时我正好在场。尽管她俩是在悄悄说话，而且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我还是猜到了。当然，我不想偷听，只是因为不能不听，当时我发现母亲一听到那女人要来的消息，突然显得非常激动。韦尔西洛夫那会儿不在家。

我不想把这消息告诉老人，因为在整个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我不能不注意到他非常害怕她回来。大约三天前，尽管他吞吞吐吐、转弯抹角，但还是泄露了出来：他怕她回来是因为

我的缘故，就是说，他会因为我而遭罪。不过，我应该补充说明，他在家庭关系上还保持着独立自主和家长的权威，特别在支配钱财方面。我起初判定他是个十足的懦夫，但后来我不得不稍稍改变看法：即使他是个懦夫，但骨子里有时还保留着——如果不说是几分刚强，至少也是几分倔强。曾经有过一些时刻，这个看似懦弱、事事容让的人，却倔强得叫人几乎无法对付。这情形韦尔西洛夫后来给我做过较详细的解释。现在想来也真奇怪，我跟公爵几乎从来不曾谈论过将军夫人，就是说，似乎在回避这个话题：尤其是我在回避它，而他，则回避谈论韦尔西洛夫。我甚至可以料到，如果在我极为关心的微妙问题中挑出一个去问他，他是决不会回答的。

如果有人想知道，这整整一个月里我跟他谈些什么，那我会回答说，其实天南海北什么都谈，不过总是谈些奇怪的话题。我很喜欢他对我的那种异常天真的态度。有时我会百思不解地端详这个人，暗暗自问："他哪儿像个经常出席会议的人？恰恰该把他送进我们中学里，而且还只能安插在四年级，他准会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同学。"就连他那张脸，也不止一次地令我惊奇。表面看去这是张异常正经、瘦削的脸（几乎可算漂亮）；一头浓密的花白鬈发，一双目光坦诚的眼睛；而且整个人显得清瘦，身材也好。可是他的脸却有一个令人不快、几乎有失体面的特点：它会冷不丁从一本正经变得十分轻薄，这是初次见面的人说什么也料不到的。我向韦尔西洛夫谈起过这一点，他好奇地听我说完，似乎没想到我竟会有这样的洞察力，但他只是含糊其辞地指出，公爵出现这种情形已经是在犯病之后了，说不定还是最近才变成这样呢。

我跟公爵多半谈论两个抽象的题目：一是关于上帝及其存在，也就是到底有没有上帝，其次就是谈女人。公爵笃信上

帝，多情善感。他书房里挂着一个大神龛，点着长明灯。但他突然中邪似的，开始对上帝的存在产生了怀疑，发表了不少奇谈怪论，显然是想引我回答。一般说来，我对这个题目兴趣不大，但我俩还是谈得津津有味，而且彼此总是直言不讳。总而言之，所有这些谈话，即使现在回忆起来，也很愉快。但他最喜欢聊的是女人，由于我不爱谈这个题目，不能做他的好谈伴，因此他有时甚至感到不痛快。那天早晨我刚进书房，他开口谈起的恰恰就是这类话题。我发现他情绪轻松，而昨天我离开他时，他却不知为什么异常闷闷不乐。然而我一定要赶在当天，赶在某些人到来之前，解决薪水问题。我预计今天我们一定会遭人离间（难怪我心跳得厉害），到那时，也许我就没有勇气提钱的事了。但此刻我又一直开不了口，我当然气自己愚笨。现在我还记得，当时他提了个笑掉大牙的什么问题，让我烦透了，于是我便把我对女人的看法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而且说得慷慨激昂。结果他更缠住我不放，就差没搂我脖子了。

三

“……我不喜欢女人，因为她们蛮横无礼，因为她们呆头呆脑，因为她们不独立自主，还因为穿着有伤风化！”我断断续续结束了自己的长篇大论。

“亲爱的，你就饶了我吧！”他大声嚷道，简直乐疯了。这更让我恼火。

在小事上我可以忍让，可以满不在乎，而在重大问题上我则从不退缩。在小事上，在任何社交界的应酬中，天知道我会怎样任人摆布，我总是诅咒这个弱点。有时往往会这样：上流

社会里任何一个纨裤子弟，只消用他的殷勤迷住我，我就会由于某种迂腐的好心肠，甚至心甘情愿地对他唯唯诺诺，或者被他拖进一场跟傻瓜的争论，后一种情况是最不可饶恕的。这全是因为我缺乏自制力，因为我是在偏僻地方长大的。每次临走时我都恨自己，发誓明天我决不会这样，可到了第二天，我还是老样子。正因为如此，有时人家差点儿没把我当做十六岁的孩子。但至今我也没有去培养自制力，反而宁肯更深地封闭在自己的角落里，虽说采取的是厌世的方式："就算我又笨又拙，可别来烦我！"这话我是认真说的，而且决不收回。不过，我写这些完全与公爵无关，甚至与当时的谈话也无关。

"我说这些，决不是给您逗乐子，"我冲着他几乎叫了起来，"我只是说出我自己的看法。"

"但女人怎么蛮横无礼、怎么穿着有伤风化啦？真新鲜。"

"女人就是蛮横无礼。您上剧院去看看，您上散步的地方去瞧瞧。每个男人都知道靠右边走，两人迎面相遇就各自让道，他靠右边走，我也靠右边走。可要是迎面走来个女人，一位太太，——我说的就是这些太太们，她就会径直朝您撞过来，简直不把您放在眼里，好像您一定得闪开，您有义务给她让路似的，我是愿意让路的，因为女人是弱者，但为什么这成了一种权利，为什么她如此肯定我有这个义务呢，——这真欺人！所以我碰见女人总要啐唾沫。于是她们就大声叫屈，说我小看她们，她们要求平等。可这儿哪来什么平等呢，是她们把我踩在脚下，或者灌我满嘴的沙土！"

"灌您沙土！"

"是的，因为她们穿着有伤风化，只有色鬼才看不出来。既然伤风败俗的案子法庭都要关门审理，那又为什么允许有伤风化的穿着出现在大街上，出现在人更多的地方？她们明目张

胆地在裙子里边，在后腰以下的部位垫上棉花，以显示体态丰满，走路时还故意让裙子窸窣作响，就为了表明自己是个骚货，而且明目张胆![1] 这一点我不可能看不出来，小伙子也看得出，连小孩子，刚懂事的小男孩儿，也都会看出来，这太下流了。让那些老色鬼去欣赏、去吐着舌头追逐她们吧，但还有纯洁的青年，应该加以保护。我只好啐唾沫。女人在林阴道上走，身后的拖裙足足有一俄尺[2] 半长，弄得沙土滚滚，在后边的人该怎么办：要么跑步赶过她，要么跳到一边去，否则她就满嘴满鼻子地灌你五俄磅[3] 的沙土。再说，这可是丝绸裙子呢，仅仅为了赶时髦，她可以将它在沙石地上拖曳三俄里[4]，而她丈夫在参政院里的年俸才五百卢布：这就是行贿受贿之源！所以我总是啐唾沫，大声地啐，还骂人。”

尽管我把这番话写得有点儿诙谐，而且写的是当时的口气，但这些看法我至今未变。

“你居然能脱身?”公爵好奇地问。

“我啐过之后就离开。当然，女人能感觉得到，但却装作若无其事，继续走她的路，连头都不回。只有一次，我在林阴道上对两个女人，一对拖着尾巴的女人，认真骂了一回，当然，没用下流话骂，我只是大声说这尾巴太欺人了。”

“真是这么说的?”

“当然。第一，她们违背社会准则；第二嘛，她们弄得尘土飞扬。可林阴道是大家的林阴道：我走，别人也要走，不管叫费奥多尔还是叫伊万，大家都要走。我就这么说了。总之，

---

① 本句系依据俄编注所做的解释性翻译。

② 一俄尺等于零点七一米。

③ 一俄磅等于四百零九点五克。

④ 一俄里等于一点零六千米。

想叫我从后面看女人走路的姿势，我可不喜欢。这话我也说了，不过用的是暗示。”

“我的朋友，你这样是会闹出大事来的：她们会不会拖你去见治安法官?”

“根本不会。她们没有什么可以控告的：只不过有个人在旁边走着，自言自语而已。任何人都有权对空气发表自己的见解吧。我说话又没有点明指谁，没有冲着她们。倒是她们缠住我不放——开始破口大骂，骂得比我难听多了：什么乳臭未干啦，该饿他几顿啦，是个虚无主义者啦，该扭交警察啦，说我纠缠她们是因为她们势单力薄，只是两个弱女子，要是她们身边有个男人，我准会马上夹紧自己的尾巴。我冷静地正告她们：请她们别再纠缠我，我将走在林阴道的另一边。为了向她们证明，我不怕她们的男人，而且准备接受决斗，我将保持二十步的距离，一直跟着她们走到她们的家，然后我会守在门口，等她们的男人出来。我就这么做了。”

“真的?”

“当然，这很蠢，但当时我太冲动了。她们顶着大热天，费劲地带我走了三公里多，一直带到贵族女子中学区，她们走进一所木结构的平房里，我该承认，房子相当不错，透过窗户可以望见里面养了许多花，还有两只金丝雀、三条杂种狗和几幅镶框的版画。我在房子前面的街道上足足站了将近半小时，她们朝外面偷偷张望了两三次，随后就把所有的窗幔全放了下来。终于，从篱笆小门里走出来一个文官，已经上了年纪，看样子刚才还在睡觉，是被人特意弄醒的，身上穿的不像是考究的睡袍，而是十分随便的家常衣衫。他停在小门前，倒背起双手开始瞪着我看，我也瞪着他看。后来他把目光移开了，过一会儿又朝我瞪着眼，突然，对我露出了微笑。我便转身走了。”

“我的朋友，这可真有点儿像席勒作品里的情节呢！我一直在纳闷：你满面红光，气色健康，居然会对女人，可以说是厌恶透顶！在你这样的年纪，怎么可能见了女人毫不动心呢？至于我，mon cher①，还在十一岁的时候，家庭教师就指责我，说我对夏花园② 里的裸体雕像看得太出神了。”

“您是满心指望我去泡一个本地的卖笑女郎，然后回来给您汇报吧。这可用不着，我还在十三岁时就亲眼见过女人的裸体，赤条条一丝不挂，打这以后我就厌恶。”

“真会这样？可是，cher enfant③，一个娇嫩的美丽女人，像苹果一样香气扑鼻，怎么会叫你厌恶呢！”

“还在进中学之前，在早先那所图沙尔开办的可恶的寄宿学校里，我有一个同学叫兰伯特。④他老是揍我，就因为他比我大三岁，而我呢，总是侍候他，给他脱靴子。有一回，他刚刚行过坚振礼⑤，修道院院长里戈就专程赶来，祝贺他第一次领受圣餐。两个人互相扑向对方，搂住脖子热泪盈眶，里戈院长还不停地变换动作，把他紧紧贴在胸前。我也感动得哭了，而且非常羡慕。后来，他在父亲死后就退了学，有两年时间我没有见过他，可两年之后我在街上遇到了他。他说他会来找我

① 法文：我亲爱的。

② 在彼得堡，建立于1704年，园中有彼得一世的夏宫。园中有大理石雕塑。

③ 法文：亲爱的孩子。

④ 这里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传成分。他自己幼年曾在法国人舒沙尔在莫斯科开办的寄宿学校学习过，舒沙尔取的俄国名字叫Н. И. 德拉舒索夫。作家在未写成的长篇小说《大罪人传》里也曾写到自己生平的这段经历。兰伯特也曾出现于《大罪人传》中，是小说中主人公儿时的一个坏同学。——俄编注

⑤ 指第一次领受圣餐，是吸收青年男女加入天主教教会或新教教会的一种仪式。

的。当时我已进了中学，住在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家里。有一天大清早他来了，掏出五百卢布给我看，叫我跟他走。虽说两年前他经常揍我，可又总是需要我，不单是给他脱靴子，样样事情他都需要我当听众。这回他告诉我说，这些钱是他偷配了一把钥匙，今天从母亲首饰匣里偷来的，因为按照法律，父亲留下的钱都应该归他所有，她没有权利不给，又说昨天里戈院长跑来劝导他，一进门就对着他又哭又诉，把双臂伸向空中，开始描绘有罪者下地狱的恐怖景象。‘我呢，却拔出刀子对他说，我要裁（宰①）了他。’我跟兰伯特一起坐车去库兹涅茨大街。一路上他告诉我说，他母亲跟里戈院长私通，给他发现了，他现在唾弃一切，他们关于圣餐的那番祝福，全都是鬼话。当时他还说了许多，让我听了害怕。在库兹涅茨大街他买了支双筒枪、一只狩猎袋、几发子弹和一根马鞭，后来又买了一磅糖果。我们出发去郊外打枪，途中碰见了一个捕鸟的小贩，提着几只鸟笼子。兰伯特从他手里买下了一只金丝雀。雀儿在笼子里关久了飞不远，所以他在小树林里先把它放出来，随后朝它开枪，但没有打中。他这是平生头一回开枪，买枪是他的夙愿，还在图沙尔寄宿学校的时候，我们早就幻想有支枪了。此刻他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头发漆黑，白净的脸蛋两颊绯红，就像假面具上涂抹的颜色，长鼻子，隆鼻梁——跟法国人似的，露出雪白的牙齿，睁大乌溜溜的眼睛。他用细线把金丝雀拴在树枝上，端起双筒枪，直抵雀儿四五厘米近，砰砰连发两枪，打得它血羽横飞。然后我们就回城，顺道进了一家旅馆，开了个房间，又吃东西又喝香槟。这时，房间里进来了一个女人……记得当时我还十分吃惊：她的穿着那么华丽，

① 他把‘宰’字念成了‘裁’。

绿色连衣裙是丝绸的。就在那儿，我看见了一切……我刚才跟您提到的那个……他俩事毕之后，我们又喝起酒来，这时他开始捉弄她、骂她，她光着身子坐在那儿，衣服给他夺走了，等到她开口对骂、要讨回衣服穿的时候，他开始抡起马鞭子，朝她赤裸的肩膀死命抽打。我起身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手脚利索地一下子将他摔倒在地。他便抓起餐叉刺进我的大腿。这时，人们听见喊声冲了进来，我及时逃走了。从此我一想起裸体女人就恶心，说真的，那还是个漂亮女人呢。”

公爵听着听着，轻薄的脸色渐渐变得十分忧伤。

“Mon pauvre enfant![1] 我以前就一直深信，你小时候有过许多不幸的日子。”

“请您别为我担心。”

“可你那时很孤单哪，这是你亲口跟我说的，尽管有这个Lambert[2]。你把他描述得很生动：金丝雀啦，坚振礼啦，他含泪扑到修道院院长的怀里啦，还有，若干年后他谈起他母亲跟院长……哦，mon cher，儿童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太可怕了：童年之初，这些满头金色鬈发的小脑瓜子，一片天真烂漫，在你面前跑来跑去，睁着明亮的小眼睛望着你，发出清脆的笑声，就像一群上帝的天使或者可爱的小鸟。可是后来……后来发生的变化让人觉得，他们还是根本不要长大的好！”

“Tiens![3]” 刹那间他脸上的整个表情变了样，“正好有位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就在前天，嘿嘿！——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西尼茨卡雅，三星期前你似乎该在这儿见过

① 法文：我可怜的孩子！
② 法文：兰伯特。
③ 法文：巧啦！

她的，就是她，前天突然对我说了一番你想不到的话。当时我寻开心地说，要是我现在结婚，至少我可以放心不会有孩子了，谁知她突然十分刻薄地对我说：‘恰恰相反，您会有的，像您这样的人肯定会有，甚至头一年就会有，您等着瞧吧。’嘿嘿！不知为什么，大家都以为我很快就会结婚，话虽说得刻薄，但你该承认，还挺俏皮。”

“俏皮，但是气人。”

“算了，cher enfant，不必对每个人都生气。我最器重人家的俏皮劲，这种本领显然正在消失，至于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会说些什么，难道应该重视吗？”

“您是怎么，怎么说的？”我抓住了他那句话，“不必对每个人……真应该如此！不是每个人都值得我们重视的，这是条绝妙的原则！我正需要这样的原则。我会把它记下来的。公爵，您有时候真会语出惊人。”

他眉飞色舞了。

“N'est-ce pas?① Cher enfant，真正说俏皮话的本领现在正在消失，俏皮话是愈来愈少了。Eh, mais… C'est moi qui connaît les femmes!② 请相信我，任何一个女人，不管她鼓吹什么，她的一生就是不断在寻求一个可以顺从的人……可以说，这是一种顺从欲。请注意：无一例外。”

“完全正确，说得太好了！”我赞赏地叫道。要是换在别的时候，我们准会从哲学角度，立即就这个题目高谈阔论起来，谈上整整一个小时，但此刻仿佛有什么东西突然刺了我一下，弄得我面红耳赤。我似乎觉得，我夸他说话机智，有可能是要

① 法文：真是这样？

② 法文：不过……我很了解女人！

钱之前的一种拍马手段，等我开口要钱的时候，他准会这么想。所以我故意把钱的事立即提出来。

“公爵，我恳请您马上把本月欠我的五十卢布付给我。”我一口气说完，激动得顾不上失礼了。

我记得（因为那天早晨的一切细节我都记得），当时我跟他之间发生的那场戏，在现实生活中是最糟糕不过的了。起初他没有听懂，久久地望着我，不明白我指的是什么钱。不用说，他连想都没想到我还领薪水，——凭什么要领呢？当然，过了一会儿他便连连声称是他忘了，等到猜出我的意思之后，他就迅速掏出了五十卢布，但神情慌乱，甚至脸都红了。我看出了个中情由，便站起来生硬地说，这些钱我现在不能收了，领薪水之类的话显然是人家传错了，或者是他们在骗我，好让我别拒绝这个差使。现在我十分明白，我没有理由领薪水，因为我什么事都没干。公爵吓坏了，一个劲地要我相信，说我已经干了许多许多事，我还将干更多的事，又说五十卢布实在太少，相反，他还将给我加薪，因为这是他应该做的，是他亲自跟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商定的，只是他自己“不可饶恕地把一切都给忘了”。我涨红了脸，斩钉截铁地说，就凭我讲了几件丑事，讲我如何把两个拖尾巴的女人送到贵族女子中学区，就凭这点而领薪水，我觉得太卑鄙，我受雇来这儿不是替他解闷的，而是来干事的，既然无事可干，那就应该结束云云。我简直想不到，他听了我这番话后竟会如此害怕。当然，这场戏的结局是，我不再反对，他就那么把五十卢布塞给了我：至今想起来我还脸红，我居然收下了这笔钱！世事往往都是以卑鄙的结局而告终，而最最糟糕的是，当时他几乎能千方百计向我证明，这笔钱我收得理所当然，而我竟然也愚蠢地相信了，而且好像不收下是万万不该似的。

“Cher, cher enfant！”他激动地叫着，吻我，拥抱我（我承认，鬼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也差点儿哭起来，但很快就忍住了，即使现在我提笔记下这事的时候，我也脸红）。“亲爱的朋友，现在你就像我的亲人，这个月以来你成了我的一块心头肉！‘社交界’里只有‘社交’，仅此而已。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他的女儿）是个出色的女人，我引以为豪，可她经常，我亲爱的，经常大大地惹我生气……至于那些小女孩儿（elles sont charmantes①）和她们的母亲，跑来祝贺我过命名日时，也只是带来些自己绣花的十字布，说话却说不出个道道来。她们那些绣花十字布我已经积了许多，足够做六十个枕头的，绣的全是狗和鹿。我很喜欢她们，可我跟你相处几乎就跟亲人一样，不是跟儿子，而是跟兄弟相处，我尤其喜欢你反驳我，你有文才，读过书，你善于欣赏……”

“我没读过什么书，而且毫无文才。以前我只随手读过几本，可最近两年我什么书也不读了，今后也不会再读。”

“为什么今后不再读了呢？”

“我另有目标。”

“Cher...要是你到了垂暮之年，像我一样对自己说：je sais tout, mais je ne sais rien de bon,② 那就太遗憾了。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这世上活到现在是为了什么！可是……我非常感激你……我甚至想……”

不知怎么的，他突然一下子不说话了，变得无精打采，陷入了沉思。在极度亢奋之后（天知道为什么，他随时随刻都可能出现这种亢奋），他通常会有一段时间仿佛失去了正常的思

① 法文：她们真迷人。
② 法文：我经受过一切，就是没有感受过任何美好的东西。

考力，不能自持，但很快又会恢复过来，所以不大碍事。我们坐了片刻。只见他那片厚厚的下嘴唇垂了下来……但我最吃惊的是他刚才居然提起了自己的女儿，而且还说得如此坦率。当然，我认为这是他心神不宁的缘故。

“Cher enfant，你不会因为我对你称你而生气吧，① 是不是？”他突然冲口问道。

“一点儿也不。我承认，起初，开头几次，我是有点儿生气，我甚至也想用你来称呼您本人，可我发现这样做太蠢，因为您对我称你，并不是为了贬低我吧？”

可是他已经不在听我说话，也忘了自己刚才的问题。

“跟我说说，父亲怎么样了？”他突然抬起沉思的目光望着我。

我猝然一震。第一，他把韦尔西洛夫称作我父亲，而早先他当着我的面是决不肯如此称呼的；第二，他提起了韦尔西洛夫，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事。

“没钱闲着，郁郁不乐。”我回答得很简短，可自己却好奇得要命。

“是啊，跟钱有关。今天地方法院将开庭判决他们那桩案子，所以我在等谢廖扎公爵，他会捎来点儿消息。他答应从法院直接上我这儿来的。这案子将决定他们整个命运：牵涉到六万或八万呢。当然，即使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即韦尔西洛夫），我也总希望他有个好结果，看来他会胜诉的，而公爵家将一无所获。这是法律！”

“今天开庭判决？”我吃惊地叫了起来。

---

① 俄语中对对方称“你”，既可以表示不客气，又可以表示关系亲昵。

一想到韦尔西洛夫连这样的事也不屑告诉我，我感到异常震惊。“看来他也不会告诉母亲，也许他没告诉过任何人，”我马上联想道，“他就是这种性格！”

“莫非索科利斯基公爵在彼得堡？”突然我又被另一个念头惊住了。

“他昨天刚到。直接从柏林来的，特意要赶上这一天。”

这个消息对我也非常重要：“他今天也会来这儿，这个打过他耳光的人！”

“那有什么关系呢，”公爵突然整个脸都变了，“还不是照样宣传上帝，同时，同时……大概又会去追女孩子，追那些未成年的女孩子吧！嘿嘿！在这方面，现在就有一个滑稽透顶的笑话呢……嘿嘿！”

“谁宣传上帝？谁追女孩子？”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信不信由你，他当初就像片树叶似的粘住我们大家：我们吃些什么？他问，我们在想些什么？——差不多老是说这类话。他还吓唬我们，开导我们：‘既然你信教，那你干吗不去当修士？’差不多就是这种要求。Mais quelle idée![1] 就算这要求正确，不也太高了吗？他特别喜欢用最后审判[2] 来吓唬我，吓唬得比对谁都厉害。”

“我跟他已经住了一个月，这一点倒毫无察觉。”我答道，并且不耐烦地听着。他还没有恢复常态，说话慢吞吞的，前言不搭后语，让我懊恼死了。

“这些话他只是现在不说罢了，可请你相信，事实就是这

① 法文：可是这算什么主意！

② 基督教教义之一，认为有一日现世将最后终结，所有世人都将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得到救赎者升天堂永享幸福，不得救赎者下地狱永受刑罚。

样。他很机智，毫无疑问，也挺有学问，可他的头脑是否正常呢？这种情形是他在国外待了三年之后发生的。我得承认，他使我非常震惊……也使大家感到震惊……Cher enfant，j'aime le bon Dieu...[①]我信仰上帝，竭力信仰上帝，但当时我真的光起火来。就算我采用的方式考虑欠周，那也是我故意这么做的，是因为气恼。何况我的反驳意见的实质是严肃的，从创世以来就是严肃的。'如果说真有一个高级的生物，'我对他说，'而且作为一个有形体之物而存在，——不会是作为液体而存在吧（因为这更难理解），而不是生来就作为无处不在的某种神灵而存在，那么，他到底居住在何处呢？'我的朋友，毫无疑问，c'était bête,[②] 但是一切反驳都归结到这一点。Un domicile[③] ——这是关键。他生气极了。他在国外时改信了天主教。"

"我也听说过他有改信天主教的想法，大概是胡编的。"

"我以一切神圣的名义向你担保，这是真的。请你仔细瞧瞧他……不过你刚才说过他变了。想当初他可把我们大家折腾得好苦！信不信由你，他的言行举止俨然像个圣徒，他的圣尸[④] 显灵了。他居然要求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向他做出解释，我敢起誓，这是真的！圣尸！En voila une autre![⑤] 如果是个修士或者苦行僧那倒也罢了，可他明明是个穿燕尾服的人，而且什么都不在乎……突然追求出现圣尸的神迹！对于上流社会

① 法文：亲爱的孩子，我爱上帝……
② 法文：这是愚蠢的。
③ 法文：居住地。
④ 或译干尸，指自然木乃伊化的人的遗骸，往往被僧侣们宣布为"神迹"和"不朽"。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均崇拜圣尸。
⑤ 法文：这是他的又一个想法！

人士来说，这是一种古怪的愿望，老实说，也是一种古怪的爱好。有关圣尸我无话可说：当然，这属于神迹，一切都可能发生……再说，这又 de l'inconnu,[①] 但对于一位上流社会人士而言，这简直是有失体统的。比方说，不管我遭遇过什么事，也不管别人怎么劝，我敢起誓，我就决不会这么做。我总不能今天在俱乐部里吃饭，过后就突然（作为圣尸）去显圣吧！我会让人耻笑的！这些话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他还戴过苦行僧禁欲用的铁镣呢。"

我气红了脸。

"您亲眼见过铁镣了吗？"

"我没有亲见，但……"

"那我就开诚布公地告诉您，所有这一切全是谎言，是一连串卑鄙的阴谋诡计，是仇人对他的诽谤，其实也只是某一个仇人，某一个灭绝人性的头号仇人对他的诽谤，因为他只有一个仇人，那就是——您的女儿！"

这回轮到公爵脸红了。

"Mon cher，我请你，我坚决要求你，从今以后在我的面前，再也不许把我女儿的名字跟这件丑事连在一起。"

我欠起身子。他有点儿失常了：下巴在哆嗦。

"Cette histoire infâme! ...[②]我不信，我说什么也不愿相信，可是……人家跟我说：你该相信，你该相信，我……"

这时，突然有仆人进来禀报说有客来访，我重又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

① 法文：属于不可知的领域。

② 法文：这件可恶的事！……

四

进来的是两位女客——一对姑娘，其中一个是公爵亡妻的某个堂兄弟的继女或诸如此类的亲戚，是公爵的养女。他已经置了一份嫁妆给她，而她自己也有钱（这个交代留待后用）；另一个就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韦尔西洛娃，韦尔西洛夫的女儿，比我大三岁，她跟她哥哥住在法纳里奥托娃家，在这以前我总共才见过她一次，而且仅是在街上匆匆一面，我跟她哥哥虽说也只是在莫斯科匆匆见过一面，但已经和他发生了冲突（很可能我在后文将提及这次冲突，但这要看是否腾得出篇幅，因为此事其实不值得提及）。这位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自小就深得公爵的特别宠爱（韦尔西洛夫跟公爵的交情很早就开始了）。此刻我正为刚才发生的事情窘困不已，所以她俩进来时尽管公爵已起身相迎，我却甚至没有起身，后来一想，此时再站起来已经不好意思了，只好坐在原处不动。主要是因为三分钟前公爵冲着我那么大叫大嚷，弄得我心慌意乱，至此还不知道我该不该离开。但我的老头儿却已经把刚才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见了姑娘们便照例高兴得浑身是劲。他顿时换了一副面孔，神秘兮兮地朝我眨眨眼睛，甚至赶在她俩进门前，还小声、急促地对我说：

“你仔细瞧那个奥林皮阿达，瞧仔细点，再仔细点……待会儿我告诉你……”

我相当仔细地瞧了她，却没有发现任何特别之处：这是个身材不太高的姑娘，胖乎乎的，面颊红润得出奇。不过，脸蛋儿相当可爱，属于很招实用主义者喜欢的那一种。也许这是因

为一脸善相，但其中也有几分气质。看不出她特别聪明，但这是从最高意义上说的，因为她的眼神里流露出狡黠。年纪不大于十九。总之，毫无出众之处。在我们中学里会管这种姑娘叫做“枕头”。①（如果说我描写得如此详尽，那仅仅是为了后面有用处。）

话得说回来，到现在为止我所描述的一切，表面看来，这么详细是不必要的，但所有这些详情细节却与后文有关，到时有用。这些描述在合适的地方将一一得到呼应；我无法避而不谈，要是读者觉得枯燥，你们不读也罢。

韦尔西洛夫的女儿则完全是另一种女人。高挑个子，略显瘦削；一张鹅蛋脸明显苍白，但头发乌黑而蓬松；一对深色的大眼睛，目光深邃；小嘴巴，两片红唇鲜嫩欲滴。走路姿态不让我厌恶的女人，她是第一个；不过她身子单薄，显得消瘦。脸相不十分和善，但很端庄。她今年二十二岁。五官长得几乎没一点儿跟韦尔西洛夫相像，然而脸部神态却跟他极其相似，这真是个奇迹。我说不上她是否算漂亮，这看各人的爱好而定。两位姑娘穿得都很简朴，所以不值得我描写。当时我料定，韦尔西洛娃马上会用某种目光或手势来侮辱我，而且我已做好了应付的准备，她哥哥在莫斯科时就侮辱过我，那还是我们平生第一次相遇呢。她不可能当面认出我，但是，当然早已听说我在公爵身边当差了。因为凡是公爵打算做或已经做了的事情，都会立刻引起那一群亲戚和“等待分遗产的人”的关注，成为大事，更何况公爵又出人意料地对我偏心。我确切知道，公爵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未来十分关心，还在替她物

---

① 在本书中，关于这个叫做“枕头”的姑娘的这条线索没有进一步发展。

色未婚夫。但是，比起那些在十字布上绣花的姑娘来，想给韦尔西洛娃找到未婚夫要困难得多。

跟我的一切预料相反，韦尔西洛娃在与公爵握过手、交换了几句愉快的客套话之后，竟十分好奇地瞧着我，待到发现我也在瞧她时，突然朝我微笑着点头致意。诚然，她是刚进门的客人，点头致意很平常，但她的微笑充满了那么多善意，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记得我当时的感受十分愉快。

“这一位是……这一位是我可爱的年轻朋友阿尔卡季·安德烈耶维奇·多尔……”公爵发现她向我点头致意，可我还坐着不动，便嘟嘟囔囔地说，但又突然一下子打住了：也许他羞于启齿把我介绍给她（实际上，这是在把弟弟介绍给姐姐）。此时，“枕头”也朝我点头致意，但我突然愚蠢透顶地发作起来，霍地从座位上站起：充分表现出那种毫无意义的、故意装出来的傲慢态度，——这全是自尊心在作怪。

“对不起，公爵，我不是阿尔卡季·安德烈耶维奇，而是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生硬地断然反驳道，完全忘了本该对两位小姐点头回礼。就让这片刻的失礼见鬼去吧！

“Mais...tiens![①]”公爵用指头敲敲脑门，他的惊叹声话音未落。

“您在哪儿念的书哇？”突然我的耳边响起了这句拖腔拖调的愚蠢问话。“枕头”径直走到了我的跟前。

“在莫斯科，小姐，在一所中学里。”

“唔！我听说过。那儿的教员教得好吗？”

“很好。”

我一直站着，说话跟列兵回答长官的提问似的。

---

① 法文：哎呀……是啊！

毫无疑问，这姑娘的问话并不机智，但她却成功地借此掩饰了我的愚蠢举动，也缓解了公爵的窘态，此时公爵已经满面春风，听着韦尔西洛娃凑在耳边说什么开心话了，——显然谈论的不是我。但问题是，这位姑娘与我素不相识，为什么要设法掩饰我的愚蠢举动及其种种呢？再说，想来她也决不可能只是随便问问的，其中必有用意。她十分好奇地望着我，似乎巴望我也尽可能注意她。这一切我后来都明白了，——我没有弄错。

“怎么，难道就是今天？”公爵突然嚷道，猛地从座位上站起。

“这么说，您还不知道？”韦尔西洛娃吃了一惊，“Olympe![1] 公爵居然不知道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今天回家。我们就是来找她的，我们以为既然她搭的是早班列车，早该在家了。刚才我们还在大门口遇见了呢：她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叫我们先进来见您，她随后就进来……瞧，她来了！”

只见边门打开，——那个女人露面了！

我根据挂在公爵书房里的那幅惊人的肖像，早已认出了她的脸：这幅肖像我整整琢磨了一个月。她进房之后，我在书房里总共只待了三分钟，我的目光却一秒钟也没有离开过她的脸。要是我早先没见过这幅肖像，在过了这三分钟之后有人问我：“她长相如何？”我会一时间什么也答不上来，因为我已经心醉神迷了。

这三分钟里我只记得，公爵吻了某一个确实漂亮的女子，替她画十字祝福，而她，可以说刚一进门，就立即出人意料地开始打量我。我清楚地听见，公爵明显地指指我，对她咕哝了

① 法文：奥林皮阿达（爱称）！

几句什么，还发出短促的笑声，提到新用的秘书，还说出我的姓氏。她微微昂起脸，厌恶地盯了我一眼，笑笑。我猛然跨出一步，走到公爵跟前，浑身哆嗦着喃喃地开了腔，但似乎牙齿打战，一句话都没说完：

“从今以后我……现在我得干自己的事……我走了。”

于是我转身走了出去。谁也没对我说一句话，连公爵也没开口，大家只是眼睁睁瞧着。事后公爵告诉我，说我当时的脸色那么惨白，把他“简直吓坏了”。不过，这算不了什么！

第 三 章

一

的确算不了什么：谋大事者不计较小事，而实力感又弥补了我的一切。我怀着几分兴高采烈的心情走了出来。一到街上，我真想欢唱起来。凑巧这是个美妙的早晨，阳光，路人，熙熙攘攘，车流，人群，喜气洋洋。怎么回事呢，我刚才不是受了那女人的侮辱吗？我怎么会忍受她那种目光、那种轻慢的笑容，而不马上表示抗议呢？（即使这抗议显得极其愚蠢，我也并不在乎。）请注意，尽管她与我从未谋面，却刚一来到就急于侮辱我，因为在她眼里我是“韦尔西洛夫派来的暗探”，而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相信，韦尔西洛夫掌握着她的整个命运，只要他乐意，就有办法借助于一个文件立即毁了她，至少她是这么怀疑的。这儿涉及的是生死搏斗。所以——我没有受辱！侮辱是存在的，但我没有受辱的感觉！哪儿谈得上这种感觉！我甚至还很高兴呢：我原为恨她而来，结果却开始爱上了她。“我不知道，蜘蛛是否会恨它看中

要捕猎的苍蝇呢？一只可爱的小苍蝇！我认为猎物是招人喜爱的，至少是可以爱的。我就爱我的仇敌：比方说，我很欣赏她长得如此美貌。我很欣赏，夫人，您如此傲慢和端庄：要是您略显柔顺，我反而没了这份乐趣。您唾弃我，可我很得意，即使您真的唾我一脸口水，说实话，或许我也不会生气，因为您——是我的猎物，是我的，而不是他的。这种想法真令人陶醉！不，暗中意识到自己的实力，远比公开的主宰要愉快得多。如果我是个亿万富豪，我会穿一身破衣烂衫，让别人把我当做最卑微的人物、当做濒于乞讨的穷人，推搡我，鄙弃我，而我或许恰恰会在其中找到乐趣，因为对我来说，只要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就足够了。”

瞧，以上就是我对当时的想法、我的喜悦以及我的许多感受的诠释。唯一要补充的是，刚才写下的这段诠释显得较为肤浅，实际上我要深沉得多，也羞怯得多。也许即便是现在，我的内心也远比我的言行要羞怯：愿上帝保佑！

也许我干了件最糟糕的事：坐下来写这札记，因为人们的内心远比表达出来的言辞丰富得多。您的想法，哪怕是坏的想法，寓于心中时总比较深刻，一旦见于言辞，就会显得可笑可耻了。韦尔西洛夫跟我说过，只有坏人才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形。他们只是漫天扯谎，因此毫不费劲，然而我却力求写出全部真实：这就十分困难了！

二

在 19 日那天，我还迈出了另外“一步”。

上文已经提过，我把两年中积蓄的六十卢布都交给了母

亲，因此这天是我来彼得堡后头一回口袋里有钱，但早在几天前我就做了决定，在领薪那天做一次我梦寐以求的“试验”。昨天我从报上剪下了一份材料——由“圣彼得堡调解会审法庭民事执行官”发布的公告，说到“定于9月19日上午十二时，在喀山区某段某某处某号住宅内将拍卖列勃列赫特夫人的动产”，“清单、底价单以及出售的财物均可在拍卖之日观看”云云。

一点钟刚过，我就按地址急急忙忙步行赶去。我已经有两年多不雇马车了：我发过誓不雇马车（要不我也积攒不到六十卢布）。我从未去过拍卖场所，我还不允许自己这么做，虽说我现在走的这“一步”仅是演习性的，但早先我已决定，即使走这演习性的一步，也该在我中学毕业之后，在我跟所有人断绝来往、躲进自己的壳里并彻底自由之后。但是，我目前还远没有躲进“壳里”，远没有获得自由，因此我打算仅以试验的形式走这一步，也就是说，仅仅去察看一下，几乎等于想象一下，然后，也许在很长时间内不再涉足，直到认真开始之日才去参与。对旁人而言，这仅是一次小规模的无聊拍卖，可对我来说，这却是建造航船的第一根圆木，哥伦布正是驾驶这艘航船去发现美洲的。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我来到现场，穿过公告中标明的那幢房子深深的院落，走进列勃列赫特夫人的住宅。住宅有一个前室和四间不大不高的房间。穿过前室，在第一间房间里，站着一群人，甚至有三十来个，其中一半是来竞买的，另一些人从模样看来，或是出于好奇，或是出于爱好，或是列勃列赫特夫人的手下。无论是商人还是守财奴都垂涎那些金器，有几个人穿着“整洁”。其中某些先生的表情甚至令我铭记难忘。右首那个房间的门敞开着，两扇门之间正好摆着张桌子，挡住人们进去：登记拍卖的

物品就放在里边。左首还有一个房间，房门虚掩着，但时不时会打开一条门缝，可以望见里面有人在探头窥视——想必是列勃列赫特夫人那一大家子中的成员，这当儿她本人一定感到无地自容。就在堵住门口的那张桌子后边，佩戴证章的民事执行官先生面朝众人坐在椅子上，主持拍卖物品。我赶到那儿时拍卖差不多已进行了一半，我一进屋就挤到桌子跟前。正在拍卖铜烛台。我开始观看。

我一边观看一边迅速盘算：我在这儿到底能买些什么？这铜烛台我现在能派什么用场？能否达到目的？该不该这么做？我的打算能不能成功？这种打算是不是幼稚？我就这么思考着、犹豫着。当时的感觉就像面对的是牌桌，您走近它是想赌牌，但还没有赌："我想赌就赌，想离开就离开——全凭我自主。"此刻我的心还没有怦怦直跳，但似乎已在微微收紧、打颤了——一种不无快意的感觉。但这种犹豫不决很快就开始困扰您，您会莫名其妙地盲目起来：您伸出手去取牌，但这是无意识的动作，几乎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就像您的手被别人操纵似的，最后您下定决心把牌打了出去——此时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同，变得强烈无比了。我写的并不是拍卖场上人们的感受，写的只是我自己：除我以外，谁会在拍卖场上怦怦心跳呢？

有些人心情焦急，有些人在默默等待，有些人买下了货又后悔。有位先生没有听清，错把德国银的牛奶壶当做真正的银器买下了，两卢布的东西他花了五卢布，我对他简直没有丝毫同情，甚至还感到很开心。民事执行官不断变换着拍卖的品种：卖了烛台卖耳环，卖了耳环卖山羊皮的绣花靠垫，接着又拿出首饰匣，——大概是为了花样翻新，或者照顾竞买人的不同需求。我连十分钟都熬不住，先是凑近去看靠垫，后来又想买下首饰匣，但每一次都在关键时刻刹了车：我觉得这些东西

完全不合适。末了，执行官手里出现了一本纪念册。

“家庭纪念册一本，红色山羊皮封面，已用过，配有水彩画和水墨画，象牙雕刻的封套，银扣环——底价两个卢布！”

我凑近前去：纪念册的外壳很精雅，但饰有象牙雕刻的地方有一处已经损坏。当时只有我一人前去观看，其余人都默不作声：没有竞争者。我本可以打开扣环，把纪念册从封套里抽出来仔细看看，但我没有使用我的权利，只是挥了挥发抖的手，意思是：“我不在乎。”

“两卢布五戈比。”我说，觉得牙齿又在打战。

东西归我所有了。我立即掏钱付款，一把抓起纪念册，退到房间的一角，我在那儿把它从封套里抽出来，心情激动、急急忙忙地仔细观看：撇开封套不算，这是世上最没用的一件东西。纪念册的开本只有小号信纸那么大，而且很薄，烫金的边缘已经磨损，活脱儿就像贵族女子中学刚毕业的那些少女们怀旧保存的留念簿。用水墨或颜料画的无非是山上的教堂啦、爱神啦、天鹅戏水的池塘啦，还配有一首蹩脚诗：

我将踏上遥远的旅程，
久久地把莫斯科抛开，
久久地离别亲爱的人，
骑驿马向克里木飞来。

(这首诗居然还完整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断定我这回是“失算”了：如果有什么谁也不要的东西，那就是这本纪念册。

“没关系，”我暗自下了决断，“第一次赌牌肯定会输，甚至是个好兆头呢。”

我真的好开心。

“哎呀，我来迟了。归您所有啦？您买下啦？”我的旁边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是位穿蓝大衣的先生，仪表堂堂，衣着考究。他来迟了。

“我来迟了。唉，真是可惜！多少钱买的？”

“两卢布五戈比。”

“唉，真是可惜！您能让给我吗？”

“咱们出去谈。”我悄声对他说，心都揪紧了。

我们走出房间，来到楼梯口。

“十个卢布我让给您。”我说，觉得背上发冷。

“十个卢布！饶了我吧，您哪！”

“买不买随您。”

他瞪大眼睛瞧我：我穿得挺体面，根本不像个贪财鬼或者二道贩子。

“哪能这样呢，这不过是本没用的旧纪念册，谁会要它？那封套其实也值不了什么钱，您卖给谁谁都不会要的。”

“您不就是想买嘛。”

“我是因为情况特殊，昨天刚知道拍卖的消息：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只有我一个！得了吧，您这是乱开价！”

“我本该开价二十五卢布，但毕竟把握不大，您也许会不买，所以我公平交易，只要十个卢布。一个戈比也不让。”

我掉头便走。

“您就收四卢布吧，”我已经到了院子里，他追上了我，“那么，五卢布。”

我一声不吭，大步向前。

“给您，拿去吧！”他掏出十卢布，我把纪念册给了他。

“可您该承认，这很不公道！两卢布买进，十卢布卖出——嗯？”

“有什么不公道？市场嘛！”

“这算哪门子的市场？”（他生气了）

“哪儿有需求，哪儿就有市场。要不是您有这种需求，四个戈比我也卖不出去。”

尽管我一脸正经，没有哈哈大笑，但心底里却在大笑不已，倒不是因为开心，而是自己也不知为什么，竟有点儿喘不过气来了。

“听我说，”我终于情不自禁地嘟囔道，但态度友善，对他有了十二分的好感。“您听我说：巴黎有个叫詹姆斯·罗特希尔德的，故世后留下了十七亿法郎（他点点头），此人还在年轻时，偶尔得知了贝里公爵遇害的消息，他只比别人早知道几个小时，就尽快把这消息捅给了有关人士，仅仅这么一件小事，转眼之间他就赚了几百万。[①] 瞧，人家就是这么干的！”

“那您就是罗特希尔德啦？”他冲着我，就像冲着傻瓜一样，愤愤地叫喊道。

我很快走出了这幢房子。仅仅一步——就赚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我承认，这是于事无补的一步，儿戏而已，但它毕竟合乎我的思想，因此不能不使我激动万分……不过，没必要描写感情。一张十卢布钞票已经落在我的背心口袋里，我伸进两个指头去摸它，结果就这样走着，没有把手抽出来。我沿街走

---

① 詹姆斯·罗特希尔德（1792—1868）：巴黎的银行家，是由其父亲法国人迈耶·阿姆谢尔·罗特希尔德所创始的欧洲著名银行世家的成员之一。他在路易·菲利普执政时期曾垄断国债，成为法国仅次于国王的第二大富豪。贝里公爵（1778—1820），查理十世的次子，法国王位继承人，1820 年 2 月 13 日在剧院门口遭工人暗杀。但他的遇害对詹姆斯·罗特希尔德的金融生涯并无影响，实际上詹姆斯的致富是因为及时得到了拿破仑一世在滑铁卢战败（1815）的消息。

到百来步之外，掏出钞票想看看，刚瞧上一眼就想去亲它。突然，一幢房子的门前响起了辚辚的马车声，只见看门人打开了大门，房子里走出一位年轻美貌的阔太太，雍容华贵，穿的是绸缎丝绒，拖着两俄尺长的尾巴，她坐进马车时，手里一只漂亮的小皮包突然飞落到地上，她已经上了车，就由仆人弯腰去捡，可我抢步上前，迅速捡起皮包递给了太太，还抬了抬帽子。（这是顶高筒礼帽，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穿得不赖。）那位太太虽然拘谨，却带着十分招人喜欢的微笑对我说："Merci[①]，先生。"马车辚辚而去。我亲了亲那张十卢布钞票。

三

在这同一天里，我该去见一个过去的中学同学，叶菲姆·兹韦列夫。他没念完中学就转学进了彼得堡的一所高等专科学校，他本人不值得描写，而且说实在的，我跟他没有深交。但我在彼得堡还是设法找到了他，因为我急于要见一个叫克拉夫特的人，而他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这同样不值一提）一俟克拉夫特从维尔诺归来，立即将其落脚的地址告诉我。前天兹韦列夫通知我说，他预计克拉夫特今明两天到达。此时我得徒步走到彼得堡区，但并不觉得累。

兹韦列夫（他也是十九岁）临时住在他姑姑家，我在她家院子里碰到他。他刚刚吃过饭，正在院子里像踩高跷似的直着腿走来走去。他马上告诉我说，克拉夫特昨天就到了，住在原先那套寓所里，也在这彼得堡区，又说克拉夫特本人希望尽快

① 法文：谢谢。

见到我，有要紧的话必须立即跟我说。

“他还得动身去别的什么地方呢。”叶菲姆添补了一句。

由于在目前的情况下，跟克拉夫特会面对我来说极其重要，所以我请叶菲姆马上带我到他的寓所去，那寓所其实就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但兹韦列夫声言，一小时前他碰见过克拉夫特，后者到杰尔加乔夫①那儿去了。

“那我们就上杰尔加乔夫那儿去吧，平时你总是推三阻四的，你是胆小？”

确实，克拉夫特可能会在杰尔加乔夫那儿待上很久，那我在什么地方等他呢？我并不害怕去杰尔加乔夫那里，而是不愿去，尽管叶菲姆已经是第三次拉我去了。而他每次说“你是胆小”的时候，总是露出一副令我厌恶的笑脸。我预先申明，这不是胆小，如果说我害怕的话，怕的也完全是别的东西。这一次我下决心去了，地方也很近。路上我问叶菲姆，他还打算跑到美国去吗？②

“也许吧，我还要等一等。”他答道，轻轻一笑。

我不怎么喜欢他，甚至根本不喜欢。他头发的颜色很淡，一张胖脸过于白净，甚至白得不成样子，像娃娃似的，而个儿甚至比我还高，可只能把他当做十七岁的人看待。我跟他找不

① 杰尔加乔夫的原型是亚·瓦·多尔古申（1848—1885），革命民粹派分子，“多尔古申派”的组织者和领导人，革命传单的起草者。1874年被判处十年苦役，1884年改判十五年苦役，死于施吕瑟尔堡要塞。该组织约二十人，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活动，同意巴枯宁派的观点；在农民中进行宣传。——俄编注

② 19世纪60—70年代，移民去美国是俄国青年中流行的一种追求，这种追求往往跟行行色色激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有关。这一题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到话题。

“那边怎么样？真的总是有一帮人在那儿？”为了心中有个底，我向他打听。

“你老是这么胆小干吗呢？”他又笑了起来。

“见你的鬼去。”我生气了。

“压根儿谈不上一帮人。来的全是熟人，都是自己人，你放心。”

“是不是自己人关我屁事！难道我在那儿也算自己人？他们怎么能相信我？”

“是我把你带去的，这就足够了。他们甚至对你已略有所闻呢。克拉夫特还可以介绍你的情况。”

“告诉我，瓦辛在不在那儿？”

“我不知道。”

“要是在的话，我们一进门你就捅我一下，把瓦辛指给我看，一进门就指给我看，听见啦？”

有关瓦辛的传闻，我已经听过许多，早就对他发生了兴趣。

杰尔加乔夫住的是一所小侧屋，坐落在一个商人妻子的木房子的院子里，但整个侧屋全归他使用。总共有三间整洁的房间。四扇窗户全都放下窗帘。① 他是个技师，在彼得堡做事。② 我偶尔听说，他在省里谋得了一个私人的肥缺，不日就将启程。

---

① 据杰尔加乔夫原型多尔古申案件的侦查记录称，多尔古申小组秘密印刷传单的住宅里，除了厨房以外，所有的窗户经常放下窗帘。——俄编注

② 杰尔加乔夫的原型多尔古申曾主管过一家白铁制品作坊。——俄编注

我们刚走进小小的前室，就听见七嘴八舌的声音，好像在激烈争论，有人嚷嚷道："Quae medicamenta non sanant——ferrum sanant，quae ferrum non sanat——ignis sanat！"①

我确实感到了某种不安。当然，我不习惯于社交，甚至包括任何社交。在中学时尽管我跟同学以"你"相称，但几乎没有跟谁交上朋友。我给自己营造了一个角落，就在这角落里生活。不过，此时令我不安的并不是因为我不善交际。为了保险起见，我发誓决不卷入眼前的这场争论，我只说最必要的话，好让他们摸不清我的底细，重要的是：不参与争论。

房间不大，甚至太小了点儿，里面有七个人，加上女的则可算十人。杰尔加乔夫二十五岁，已经成家。②妻子有个妹妹，还有个女亲戚，她们也都住在杰尔加乔夫处。房间的陈设很马虎，但家具已够用，甚至还挺干净。墙上挂着一幅石印肖像画，是个廉价品，角落里供的圣像没有金属衣饰，但长明灯却燃着。杰尔加乔夫走到我跟前，与我握了握手，请我坐下。

"请坐，这儿都是自己人。"

"请多多赏光。"一位少妇当即补充道，她长得楚楚动人，穿着很朴素，对我微微点了点头就走了出去。这是他的妻子，看样子似乎也加入了争论，这当儿出去是给孩子喂奶。房间里还剩下两个女人：一个身材矮小，二十来岁，穿一身黑色衣

---

① 拉丁文："药不能治者——铁能治之，铁不能治者——火能治之！"这是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56；一说为约公元前406—约前370）的一句名言。德国诗人、剧作家弗·席勒就曾引用这句名言作为自己剧本《强盗》的题词。据侦查记录称，在多尔古申房间的墙上，就写有这句名言。——俄编注

② 杰尔加乔夫的原型在受审时也是二十五岁，也已成家。——俄编注

裙，长相也不差；另一个三十岁上下，瘦瘦削削，目光机灵。[1] 她俩只是坐在那儿仔细听，不介入谈话。

至于那些男人，个个都站着，除我以外只有克拉夫特和瓦辛坐在那儿，叶菲姆立即把这两个人都指给我看了，因为即使是克拉夫特，这回我也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我起身离座，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克拉夫特那张脸我永远忘不了：谈不上特别英俊，但似乎有某种过于善良和斯文的气度，尽管眉宇之间处处透露出自尊感。他二十六岁，相当清瘦，个子中等偏高，浅色头发，神态严肃而温存，整个性情显得十分平和。不过，要是您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脸，也许甚至是极其平庸的脸，换成他那张我觉得十分招人爱的脸，我还是会回答说不愿意。他脸上那种神情是我所不愿看的：那种精神上的过分冷静，那种类似于不自觉的深含不露的傲气。不过话得说回来，当时我也许无法判断得如此真切，我只是现在觉得当时是这样判断的，也就是说，已经在出事之后。

“您来了，我很高兴，”克拉夫特说，“我那儿有封信，跟您有关。我们先在这儿坐一会儿，然后一起去我家。”

杰尔加乔夫中等身材，宽肩膀，大胡子，黑头发，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他目光中透出机灵，整个人显得老成持重，总是小心谨慎。虽然他很少开口，但显然是他在左右着大家的谈话。我早就听说瓦辛绝顶聪明，可他的长相依我看来，并不特别出众：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配上一对浅灰色的大眼睛，脸十分开朗，同时又带着过分坚强的神情，让人觉得不易相处，但目光却显得很聪明，比杰尔加乔夫的目光更聪明、更深沉，比

---

① 多尔古申案中除了他妻子外，还有两个妇女，一个曾是打扫房间的女工，另一个则是外省的教师。——俄编注

房间里的所有人也都聪明，——不过，这可能是我现在夸大其辞，因为青年人之中，至今我只记得两位：一位是皮肤黝黑的高个子，蓄着黑黑的络腮胡，二十七岁模样，说话滔滔不绝，像是个教员之类的人物；另一个小伙子年纪跟我相仿，身穿俄式紧腰长外衣，脸上有皱纹，沉默寡言，属于认真的听众之一。事后才得知他是农民出身。①

“不，这个问题不该这么看，”蓄黑色络腮胡的教员开口说，显然他想继续刚才的争论，他比谁都慷慨激昂，“我对数学证明不发表任何意见，但即使没有数学证明，我也准备相信这一观点……”

“请等一下，季霍米罗夫，”杰尔加乔夫大声打断了他，“刚进来的人是听不明白的。瞧，事情是这样，”他突然转过头来对我一个人说（我得承认，如果他打算考考我这个新人或者促我开口，那么从他来说，这是一种极巧妙的手段：我马上感觉到了，而且做好了准备），“事情是这样，瞧这位克拉夫特先生，我们大家都熟知他很有个性，发表的见解很有分量。他根据极寻常的事实引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结论，使大家感到震惊。他的推论是：俄罗斯民族是二等民族……”②

“三等民族。”不知什么人在叫喊。

“……二等民族，它的使命仅仅是给更卓越的民族当材料用，而在人类的命运中，它本身不是独立的角色。克拉夫特先生根据自己这种也许有道理的推论，得出一个结论：今后每个

① 多尔古申案中确实有一位农村教师，三十六岁；一位农民出身的工人，十八岁。——俄编注

② 持这种观点的有克拉夫特的原型之一——民事法官克拉默，他后来也自杀。不过，这也反映了俄国宗教思想家彼·雅·恰达耶夫（1794—1856）在《哲学通讯》中的观点。——俄编注

俄罗斯人的一切活动会因这一观点而陷于瘫痪，可以说，人人必将无所作为，并且……”

“请原谅，杰尔加乔夫，问题不该这么看，”季霍米罗夫再次迫不及待地接过话茬（杰尔加乔夫立即让他发言）。“鉴于克拉夫特已做了认真的研究，根据生理学推导出一个自认为有数据做后盾的结论，也许他苦苦花了两年工夫才得出自己的观点（这观点我本可以心平气和地、a priori[①] 接受），鉴于这一点，即鉴于克拉夫特的忧患情绪和认真态度，这问题应该作为稀有现象来看待。由上述种种引出了问题，但克拉夫特却无法理解应该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即研究克拉夫特的不理解之处，因为这是稀有现象。必须解决的是，这一现象是属于临床学上的个别病例，还是在其他场合下也会正常地重复出现的一种属性？为了共同的事业，这一点值得注意。克拉夫特对俄罗斯的观点我可以相信，甚至我要说，或许还感到高兴：这个观点一旦为所有人掌握，它就会让人们放手去行动，使许多人摆脱爱国主义偏见……”

“我的出发点不是爱国主义。”克拉夫特说，仿佛费了很大劲似的。所有这些辩论似乎令他不快。

“是不是爱国主义，这可以撇开不谈。”瓦辛低声插了一句，在这之前他一直没有吭声。

“可是，请告诉我，克拉夫特的结论怎么会削弱对全人类事业的追求呢？”教员嚷嚷道（只有他一个人在大声嚷嚷，其余人发言都是轻声轻气的），“就算俄罗斯注定沦为二等，但也可以不单单为俄罗斯而行动啊。此外，既然克拉夫特对俄罗斯失去了信心，那他怎么还可能是个爱国主义者呢？”

---

① 拉丁文：先验地。

“何况他是德国人。”刚才那个叫喊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我是俄国人。”克拉夫特说。

“这个问题跟事情没有直接关系。”杰尔加乔夫向插话人指出。

“你们应该走出狭隘的思路，”季霍米罗夫对别人的插话都置若罔闻，“如果说俄罗斯民族只能做更卓越的民族的材料，那它干吗不去充当这样的材料呢？这也是一个挺体面的角色。鉴于使命正在扩大，干吗不能满足于这种观点呢？人类正处于自身大变革的前夜，这种变革已经开始了。只有瞎子才会否认面临的使命。如果你们对俄罗斯民族失去了信心，那就撇开它，为未来而行动吧——为那些未来的民众而行动，尽管目前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民众，但他们将不分种族，由全人类组成。即使不这样，俄罗斯民族有朝一日也会衰亡：任何民族，哪怕是最有才智的民族，其活力也只能保持一千五百年，至多两千年，而保持两千年或保持二百年还不是一码事？罗马人作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没有超过一千五百年，后来也变成了材料。他们早就不存在了，但却留下了思想，这思想已成为今后人类命运的组成部分。怎么能对人说无事可干了呢？我无法想象有一天会出现无所作为的局面！为人类而工作吧，其余的一切不用操心。只要认真环顾一下四周，要干的事情太多了，毕一生的精力也还不够。”

“应该按照大自然和真理的法则生活。”[1]杰尔加乔娃太太隔着房门说。门微微打开一条缝，可以望见她正站在里边，虚掩着胸脯给孩子喂奶，但她听得仔细而热心。

---

① 这句话是多尔古申小组印刷的秘密传单的一个标题，本书作者借用时稍做更动。——俄编注

克拉夫特一直微微含笑听着，最后，似乎露出了几分倦意，但十分真诚地说：

“我不明白，既然一个人的心智受其指导思想的支配，既然他处于主导思想的影响之下，那他怎么还可能靠这思想之外的东西生存呢？”

“可是，如果有人从逻辑上、从数学上向您证明：您的结论是错的，整个思路是错的，您没有丝毫权利仅仅因为俄罗斯注定会沦为二等，就把自己排斥在共同的有益工作之外，如果有人向您证明，只要抛弃狭隘的视角，您面前就会展现无限广阔的天地，只要抛弃爱国主义的狭隘观念……”

“唉！”克拉夫特轻轻摆了摆手说，“我不是已经对您说过，这跟爱国主义无关。”

“这里显然有一个误会，”瓦辛突然插嘴说，“错误在于克拉夫特的结论不纯粹是个逻辑结论，可以这么说，这结论已转化为感情。人的天性并非个个相同：在许多人那里，逻辑结论有时会转化为极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会控制他们的整个身心，很难将其驱走或改造。为了救治这种人，必须在此情况下改变这种感情，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用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感情去替代它。通常这事很难，多半是办不到的。”

“错啦！”那个好争论的人又叫喊起来，“逻辑结论本身就已经消解了偏见。理性的观念会产生相应的感情。思想可以摆脱感情，但在人的心里扎根时，反过来又会形成新的感情！”

“人是极其多种多样的：有些人能轻易改变感情，另一些人则很难。”瓦辛答道，似乎不想继续争论下去。可我却十分赞赏他的思想。

“事情正像您说的那样！”我猛然把脸转向他，为了打破僵局而突然开了腔，“一种感情确实应该用另一种感情去替代。

四年前，莫斯科有一位将军……听我说，诸位，我并不认识他，可是……说实话，他本人或许就不值得尊敬……再说事情本身也可能显得荒唐，不过……不过，听我说，他死了孩子，就是说，实际上接连死了两个小女孩，死于猩红热……于是，他突然万念俱灰，总是伤心不已，那伤心的样子叫人惨不忍睹，结果不出半年就死了。他是因伤心而死的，这是事实！那么，当初该用什么才能使他获得新生呢？答案是：用同样强烈的感情！应该替他把那两个小女孩从坟墓里找出来，交还给他——这才完事，我是说，该用诸如此类的办法。可是他死了。不过，当初也可以向他提供绝妙的论断：人生苦短啦，自古谁无死啦，还可以提供统计表上的数字，有多少孩子死于猩红热……当时将军已经退役……”

我打住话头，惴惴不安地环顾众人。

“这完全文不对题。”有人咕哝了一句。

“您举的事例虽然是另一类问题，但还是有相似性，可以说明问题。”瓦辛对我说。

四

我在这儿应该供认，为什么我赞赏瓦辛关于“思想—感情”的论证，同时还该承认令我十分羞愧的事。是的，我不敢去杰尔加乔夫家，虽说并非由于叶菲姆推测的那种原因。我之所以不敢去，是因为我早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害怕他们。当时我就知道，他们（是实指他们，还是指他们这类人——反正都一样）都是些雄辩家，弄不好会粉碎“我的思想”。我深信自己决不会向他们泄露我的思想，我也决不会说出口，然而即使我

秘而不宣，他们（同样指他们或他们这类人）也有可能主动给我说些什么，弄得我自己对我的思想失去了信心。“我的思想”还存在一些我尚未解决的问题，可是除我以外，我不希望由别人来解决。最近两年，我甚至不再看书，生怕碰到不利于我“思想”的什么论述，从而使我产生根本性的动摇。可瓦辛突然一下子解决了我的忧虑，让我彻底安下心来。说真的，我到底怕什么呢？不管他们采取什么雄辩术，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也许那儿只有我一个人，悟出了瓦辛关于“思想与感情的关系”那番话的真谛！驳倒某个美好的思想还不够，必须用同等美好的东西去替代它。否则，我就无论如何不愿舍弃我的感情，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会在心里驳倒不利于我“思想”的观点，哪怕强词夺理也好。再说，他们又能给我什么替代呢？所以我尽可以大胆些，我务必勇敢些。但我在赞赏瓦辛的那番话的同时，又感到羞愧，觉得自己是个不中用的小孩儿！

这里还有一件可耻的事。我在他们那儿打破僵局并发表看法的动机，不只是卑劣地想卖弄聪明，而且还有“博取欢心”的愿望。我想博取欢心，是为了让人家承认我是好样的，开始对我搂搂拍拍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总之，恶劣透顶），现在想来，这是我所有可耻的事中最为卑劣的，我很久以前就猜想自己心中怀有博取别人欢心的愿望，这就是我躲在角落里那么多年的缘故，——虽说我对此至今不悔。我早就知道，我应该在别人面前显得阴郁些。而且每次这样出丑之后，唯一能引以自慰的是，我的“思想”仍然一如既往地秘藏在我心中，我没有泄露给任何人。有时我会心惊胆战地想到，万一我把我的思想告诉了别人，那我就立即一无所有了，我会变得跟所有人一样，或许连思想也会抛弃掉，因此我才珍惜它，爱护它，害怕失言。可这一回，在杰尔加乔夫家里，我几乎第一次跟他们接

触就不能自我克制：当然，我什么也没有泄露，但不可饶恕地失言了：结果出了丑。回想起来真令我难堪！不，我不该与人交往，即使现在我也这么想，我这话还将管用四十年。因为我的思想——需要一个角落。

五

瓦辛刚一夸我，我就立即迫不及待地想往下说。

“依我看，任何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感情……如果这感情来自信念的话……但愿谁也不为此而责备他。”我面对瓦辛说。可是就算我这回说得流利，也不像是我自己在说，似乎嘴巴里转动的是别人的舌头。

“真——是——吗，先生？”马上有个声音接了上来，拖腔拖调的，充满了讥讽。正是这个声音，刚才打断过杰尔加乔夫，还对克拉夫特叫嚷说他是个德国人。

我认为此人十足是个渺小人物，所以把脸转向教员，仿佛刚才冲我叫喊的是他。

“我的信念是：我无权评判任何人。”我哆嗦着说，已经知道我要栽跟头了。

“干吗如此讳莫如深？”①又响起了那渺小人物的声

① 这句话以及下文的“那您的呢”，均引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3场，第3幕)，在该剧中，这两句话都是恰茨基对莫尔恰林的反问。莫尔恰林说：“我不敢说出自己的见解。”恰茨基反问他：“您干吗如此讳莫如深？”而剧本中另一段对话也与这里相似：莫尔恰林说：“……不，每人各有自己的才能。”恰茨基问：“那您的呢？”莫尔恰林回答说：“有两种：仔细认真，谨慎安分。”此处这个人的问话是暗示阿尔卡季与莫尔恰林相似。

音。

“各人有各人的思想。”我直视着教员说。可教员却相反，一声不吭，只是在含笑打量我。

“那您的呢?”那渺小人物又叫了一声。

“说来话长……我的部分思想就是：不希望别人来搅乱我的安宁。只要我手头还有两个卢布，我就想独自生活，不依靠任何人（别急，我知道你们会反驳的），而且什么事也不干，——哪怕是为了那个伟大的、未来的人类，刚才就有人请克拉夫特先生为这个人类工作呢。人身自由，就是说我个人的自由，是首位的，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管。”

错就错在我光火了。

“这就是说，您在宣传饱食终日的奶牛式的安宁?”

“就算是吧。奶牛不会欺侮人。我谁也不欠什么，我用交纳国库税的方式向社会付钱，为的就是不被盗窃、不挨打和不被杀，谁也无权向我提出其他任何要求。我个人也许还有别的思想，如果我想服务于人类，那我就去服务，说不定我干的工作等于所有宣传家的十倍呢，但我只希望：谁也无权要求我这么干，无权像逼克拉夫特先生那样逼我去干。即使我一个指头也不想动，那也完全是我的自由。出于爱人类而四处奔波、八面讨好，还感动得挥洒热泪——这只是一种时髦。再说，我又干吗非得爱我的邻人，或者爱你们那个未来的人类呢？我永远见不到这个人类，他们也不会知道我，他们照样会化为灰烬，不留下任何痕迹和记忆（时间在这儿毫无意义）。即使是地球，照样会变成冰石，伴随着数不胜数的同样的冰石，在没有大气

的空间飞行。[1] 我是说，简直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没意思的事了！而这，就是你们的学说！试问，我干吗非得做一个高尚的人呢？何况，既然一切都只是瞬息即逝。”

“乖——乖！”那个声音又惊叫起来。

我挣脱了种种束缚，冲动地、发狠地放了这一炮。我知道我会栽跟头出丑，但由于害怕反驳，我急不择言。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我说话就跟竹桶倒豆子似的，没有条理，前后跳跃，但我急于要说服他们、抢先击倒他们。这对我太重要了！为此我准备了三年！但奇怪的是，他们突然不吭声了，一句话也不说，大家只是听着。我继续朝着教员往下说：

“事情正是这样，先生。顺便提一下，有位很聪明的人曾经说过，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干吗非得做个高尚的人？’[2]要知道，世上的坏蛋有三种：一种是无知的坏蛋，就是说，他们自信干的坏事绝顶高尚；第二种是知道羞耻的坏蛋，就是说，他们对自己干的坏事感到羞愧，但由于决心已定，还是继续干到底；最后一种则是地道的坏蛋，真正的坏蛋。诸位，请让我来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同学叫兰伯特，还在十六岁时就跟我说，一旦他发了财，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当穷人的孩子快饿死的时候，他用面包和肉去喂狗；当这些孩子没有柴火取暖的时候，他去买来整整一棚子木柴，堆在野地里烧荒；而对穷人，他一块木柴也不给。这就是他的感情！试问，面对这

① “少年”的这种想法跟19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所谓“热死说”有关。“热死说”将热力学第二定律应用于宇宙，得出了整个宇宙必将毁灭的结论，这对同时代人产生了强烈印象。

② 这里可能是指韦尔西洛夫所说的话。在本书草稿中，韦尔西洛夫在跟“少年”的一次交谈中，曾说过类似的话，但作者最后定稿时删去了。——俄编注

个真正的坏蛋，我该怎么回答他：'干吗他非得做个高尚的人呢？'特别是在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已经给你们弄得不像样子了，因为比现在更糟的时代，——从来没有过。我们的社会完全混淆了是非，诸位。你们既然否定上帝，否定英雄行为，那么还有哪一种因循守旧的思想，哪一种毫无生气的、盲目而愚蠢的思想，能逼使我按你们的方式去行事，而不让我干于我较有利的事呢？你们会说：'合理地对待人类于我也有利。'但是如果我认为所有的这些合理，所有这些兵营式的组织，这些'法朗吉'，都是不合理的呢？① 既然我在这世上只能活一回，什么'法朗吉'，什么未来，关我屁事！就让我自己来关心我的利益吧：这会开心些。我干吗要去关心一千年以后你们那个人类会怎么样？因为按照你们的准则，我为此既得不到爱，又过不上未来的生活，甚至我的英雄行为也得不到承认！不，诸位，既然事情是这样，那我就要毫不客气地为自己而活，哪怕以后大家全都完蛋！"

"想得美！"

"不过我随时准备跟大家一起完蛋。"我补充说。

"更妙了！"（插话的还是那个声音。）

其余的人都继续保持沉默，大家望着我，打量我，但渐渐地从房间的不同角落开始传来讥笑声，尽管笑声很低，但大家都在当面讥笑我。只有瓦辛和克拉夫特没笑。连那位蓄络腮胡

① "少年"在这儿反对的是傅立叶主义，该主义的信奉者为劳动群众设计了一种未来的合理生活，即在"法朗吉"（或译"法伦斯泰尔"，一种社会生产消费的联合组织）里的生活，按照傅立叶（1772—1837）的学说，"法朗吉"应该是新型社会结构的细胞。阿尔卡季在这里的立场部分地与《地下室手记》中主人公的立场相近似。

的教员也在窃笑：他可是一直盯着我、听我说话的。

“诸位，”我全身哆嗦，“我决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告诉你们，恰恰相反，我倒想从你们的立场来质问你们，——别以为我是从自己的立场，因为我爱人类，也许要胜过你们全体总和的千倍！请问，——你们现在非得回答，你们有义务回答，因为你们在讥笑我，——请问：你们能用什么来吸引我，使我跟你们走？请问，你们能用什么来向我证明，你们的目标会更好？在你们兵营式的组织里，你们如何来处置我个人的反抗？先生们，我早就希望跟你们交锋了！你们将来会有兵营式的组织，公共住宅，stricte nécessaire，[①] 无神论和不生育孩子的公共妻子——这就是你们的结局，我很清楚呢，先生们。可是为了换取这一切，为了换取你们的合理制度能担保给我的这点儿蝇头小利，为了换取温饱，你们却要剥夺我全部的个性！请问：要是在那儿有人把我的妻子勾引走，你们会不会压制我的个性，不让我去打破情敌的脑袋呢？你们会说，到那时我自己也会明白事理的，但是，如果这个妻子多少还有点儿自尊的话，她会对如此明白事理的丈夫怎么看？要知道这是不正常的，你们该感到羞耻！”

“您在女人方面——是专家吗？”响起了那个渺小人物幸灾乐祸的声音。

刹那间我真想扑过去用拳头揍他一顿。这人个子不高，棕红色头发，雀斑脸……不过，真见鬼，何必去描写他的长相！

“您放心，我还从来不曾跟女人发生过关系。”我断然回答，第一次把脸转向他。

“这可是重要报道，但当着女士的面，不妨措辞文雅些！”

---

① 法文：最低水准的必需品。

突然，大家纷纷活动起来，开始挑拣自己的帽子，打算走了，——当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而是时间已到，但他们那种不理睬我的态度却使我无地自容。我也迅速站起来。

“对不起，您一直望着我，可以知道您姓什么吗?”教员突然走到我跟前，面带可恶的笑容问道。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

“不，平民多尔戈鲁基，早先的农奴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的儿子，我早先的主人韦尔西洛夫先生的私生子。请放心，先生们：我这么说绝不是希望一下子博得你们的欢心，也不希望我们一块儿感动得像牛犊似的哞哞叫!”

顿时爆发出一阵极不礼貌的大声哄笑，以致隔房睡着的孩子都被吵醒，哇哇啼哭起来。我怒不可遏，直打哆嗦。他们一个个跟杰尔加乔夫握手，走了出去，对我不屑一顾。

“我们走吧。”克拉夫特捅捅我说。

我走到杰尔加乔夫跟前，使劲握住他的手，又使劲地摇了好几下。

“库德留莫夫（指那个棕红头发的人）老惹您生气，请您原谅。”杰尔加乔夫对我说。

我跟着克拉夫特走了出来。我毫不知耻。

六

当然，现在的我和那时的我有天壤之别。

我继续“毫不知耻”，还在楼梯上就追上了瓦辛，而把克拉夫特当做次要人物撇开，让他独自走在前头。我装出一副极

其自然的模样，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开口问瓦辛：

“您也许了解家父吧？我是指韦尔西洛夫。”

“说实话，我跟他并不相识，”瓦辛立即答道（谦谦君子在跟刚才出了丑的人说话时，都会精心装出一种令人难堪的客套，瓦辛却丝毫没有这种客套），“只是对他略有所知：我见过他，听他说过话。”

“既然您听他说过话，那么，不用说，您一定了解他，因为您——那么聪明！您对他怎么看？请原谅我问得冒昧，但我需要知道。您会对他怎么看，我必须知道您本人的意见。”

“您对我的期望太大了。我觉得，这个人对自己要求很高，而且也许能够做到，但他对谁都不做解释。”

“说得对，说得很对，这是个很骄傲的人！但他为人清白吗？告诉我，您对他皈依天主教一事怎么看？不过，我忘了，您也许还不知道呢……”

要不是我如此激动的话，我当然不会对一个我只闻其名、却从未交谈过的人，这样没来由地、连珠炮似的发问。令我吃惊的是，瓦辛似乎并不在意我的荒唐！

“这件事我也略有所闻，但我不知道有几分可信。”他依然心平气和地回答。

“一分也没有！关于他的这种话是不真实的！难道您以为他能信上帝吗？”

“正如您自己刚才所说，这是个很骄傲的人，但许多很骄傲的人都喜欢信仰上帝，特别是那些有点儿鄙薄世人的人。许多强者似乎都有某种自然的需求：找一个人或者一件东西来崇拜。强者有时很难承受自己的力量。”

“听我说，这话想必是千真万确的！”我又叫了起来，“只是我想弄明白……”

“这里的原因很明显：他们选择上帝，是为了不崇拜世人，当然，他们自己并不清楚这样做的内在动机：崇拜上帝不那么辱没自己。他们之中往往会出现一批狂热的信徒，确切地说，是一批渴望信仰的人，然而他们把渴望当做了信仰本身。到头来，这样的人十之八九会变得大失所望。至于韦尔西洛夫先生，我认为他还具有异常真诚的性格特点。总而言之，我对他很感兴趣。”

“瓦辛！”我叫了起来，“您让我有多高兴！我感到惊奇的不是您的才智，我感到惊奇的是，您，一个如此纯洁、远远比我高明的人，居然能够……居然能够跟我走在一起，还那么朴实、那么谦恭地跟我谈话，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瓦辛微微一笑。

“您过奖了，刚才发生的事仅仅是您太喜欢抽象的谈话罢了。看来在这之前您已沉默了很久。”

“我沉默了三年，三年来我一直在为谈话做准备……尽管我的表现愚蠢之极，但您不会把我看做是傻瓜，因为您本人有很高的智慧，可您会把我看做是无赖！”

“无赖？”

“是的，您准会这么看！告诉我，我刚才说我是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还扬扬自夸是农奴的儿子，您不因此而暗暗鄙视我吗？”

“您这是在过分地折磨自己。要是您认为自己说错了话，下次不说就是了，您前头还有五十年的路程呢。”

“哦，我知道在人们面前我该少开口。最卑劣的一个坏毛病——就是去博取别人的欢心！但两者之间有区别，有吗？要是您明白这种区别，要是您能明白的话，我一定感谢这个时刻！”

瓦辛又微微一笑。

“以后您愿意的话，可以来我家谈谈，”他说，“现在我有工作，很忙，但如果您肯来，我会感到高兴的。”

“我刚才从您的面容就推断出，您刚强有余，却有点儿孤僻。”

“很可能是这样。我见过您的妹妹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那是在去年，在卢加……瞧，克拉夫特在前面停下来了，好像在等您：他得拐弯了。”

我紧紧握了握瓦辛的手，就跑去追上了克拉夫特，我跟瓦辛交谈的当口，他一直走在前头。我们默默地走到他的住所：我还不想、而且也不能跟他说什么。克拉夫特性格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态度温和。

第 四 章

一

早先，克拉夫特在某处供过职，同时还帮助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处理一些私人事务（为了从他那儿获取报酬），这些私人事务都是安德罗尼科夫经常在本职工作以外承接的。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是：由于克拉夫特跟安德罗尼科夫特别接近，他也许知道许多我很关心的事情。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在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家里寄住多年，而他的妻子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正巧是安德罗尼科夫的亲侄女，由他抚养成人，是他的掌上明珠，我就是从她那儿得知，克拉夫特甚至“受托”要转交我一件东西。我已经等他等了整整一个月了。

他的住所很小，只有两个房间，完全是独自一人过活，眼下刚从外地归来，甚至连仆人也没有。箱子虽已打开，却没有收拾，东西胡乱堆在几张椅子上，而在长沙发前的桌上，摊放着手提包、旅行用的小箱子、手枪等物件。克拉夫特进屋时正一门心思在思考什么，仿佛完全把我忘了，也许他根本没注意

到一路上我没有跟他说话。随即他开始寻找起什么来，但顺便瞧了一眼镜子就站住了，仔细端详自己的脸足足有一分钟之久。我至少是注意到了这个动作有点儿特别（可事后却历历在目），但我当时正在发愁，又觉得处境十分尴尬。我没法聚精会神。有过那么一刹那，我突然想一走了之，从此把所有的事永远撇开。再说，所有这些事其实又是什么呢？不就是自找麻烦吗？我十分苦恼，因为也许我仅仅由于容易动感情，正在把我的精力浪费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可我自己却面临着需要全力以赴的使命。然而从杰尔加乔夫那儿发生的事来看，又显然表明我没有能力去干大事。

“克拉夫特，您还会去他们那儿吗？”我突然问他。他向我徐徐转过脸来，似乎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您宽恕他们吧！”克拉夫特冷不防说。

当然，我以为这是嘲笑，但我凝神瞧了瞧他，发现他脸上有一种奇怪的、甚至惊人的朴实，以至于连我自己都纳闷起来：他怎么会如此认真地请我“宽恕”他们。他挪近一张椅子，在我身边坐下。

“我自己也知道，或许我全是自尊心在作怪，仅此而已，”我开口说，“可我不想请求原谅。”

“而且也毫无这种必要。”他严肃地轻声说。他说话总是轻声轻气，慢吞吞的。

“就算我归罪于自己……我喜欢归罪于自己……对不起，克拉夫特，我在您这儿胡扯了。告诉我，莫非您也是这个小组里的人？这就是我想问您的。”

“他们不比别人笨，也不比别人聪明，他们像大家一样是疯子。”

“难道大家都是疯子?”我转脸问他，不由得充满了好奇。

“现在优秀一点儿的人全是疯子。只有中庸之道的人和无能的人才寻欢作乐……不过，这些都不值一谈。”

他一边说话一边不知怎的老望着空中，刚开头讲了两句，又突然刹住。他的话音中充满了某种忧伤，令我格外震惊。

“难道瓦辛也是跟他们一伙的？可瓦辛是有头脑的人，他有道德观念哪!”我嚷道。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道德观念了，突然之间全没了，而且最主要的是，装出一副样子，就跟从来不曾有过似的。”

“从来不曾有过?”

“我们最好不谈这个吧。”他说，声音显得十分疲乏。

他那种又苦恼又认真的神情打动了我。我为自己的自私而羞愧，就开始说些他中听的话。

“当今这个时代，”他沉默了两三分钟，自己又开口说，眼睛还是莫名其妙地望着空中。“当今这个时代——是中庸之道和感情冷漠的黄金时代，人们爱好的是不学无术，懒懒散散，既没有行动能力又想坐享其成。谁也不在思考，很少有人能挤出自己的思想。”

他又刹住了，沉默了片刻。我想听下去。

“眼下正在大肆砍伐俄国森林，从而使沃土变得贫瘠，变成荒原，只好供卡尔梅克人用做牧地。要是冒出一个有理想的人来种树，大家就会取笑他：‘难道你能活到树下乘凉的那一天?’另一方面，那些期待幸福的人却在大谈千年以后的事。贴近现实的思想完全不见了。大家就像住在客栈里，打算明天离开俄国，大家都得过且过……”

“对不起，克拉夫特，刚才您说，人们关怀千年以后的事。可您这种绝望……对俄国命运的绝望……不也同样是一种关怀

吗？”

“这……才是唯一最迫切的问题！”他气愤地说，迅速从座位上站起。

“哎，对啦！我竟忘记了！”他突然困惑地望着我，用完全不同的语气说，“我请您来是因为有事，结果却……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原谅。”

他就像突然从某个梦里醒来似的，几乎很不好意思，从桌上的皮包里取出一封信递给我。

“这就是我应该转交给您的。这个文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他开始说，神情专注，完全是一副办事的模样。

事发以后很久，每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总会震惊于他的这种自制力（对他来说，这是怎样的时刻啊！），居然还能如此真诚地关心别人的事情，如此沉着镇定地讲述别人的事情。

“这是斯托尔别耶夫所写的一封信，正是由于这个人死后留下的遗嘱，才引发了韦尔西洛夫跟索科利斯基家的那场官司。现在这件案子正在法庭审理，看来判决会对韦尔西洛夫有利，因为法律支持他。可是在这封两年前写的私人信件里，立遗嘱人却亲笔表述了自己真正的意愿，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自己的希望，这种表述与其说有利于韦尔西洛夫，倒不如说更有利于公爵家。至少索科利斯基公爵家对遗嘱提出异议时所依据的那几条理由，在这封信里都可找到有利的支持。韦尔西洛夫的对手们为了搞到这个文件想必会出高价呢，虽说它在法律上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承办韦尔西洛夫事务的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即安德罗尼科夫）始终把这封信捏在自己手里，直到去世前不久，才把它转交给我，委托我‘保管’：可能他已预感到自己快死了，为自己的文件担忧。现在我不想判断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在这件事上的意图，我得承认，他去世

后我就感到有点儿难办，无法决定我该怎样来处理这封信，特别是法庭对这案子快要做出判决了。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生前似乎很信任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正是她使我摆脱了困境：三星期前，她给我写了封信，坚决要我把文件交给您本人，而且说，这样做大概（她的措词）也符合安德罗尼科夫的本意。事情就是这样，瞧，这就是文件，我很高兴终于能转交出去了。”

“告诉我，”我说，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新文件弄得不知所措。“现在我将怎么处理这封信？我该怎么办？”

“这就由您自己决定了。”

“不行，您该承认，我根本不能自由地处理此事！韦尔西洛夫是那么渴望得到这笔遗产……您知道，他要是没有这笔遗产的支撑就会完蛋，——谁知还存在这么个文件！”

“它只存在在这儿，在房间里。”

“真是这样吗？”我认真地望着他。

“要是在这件事上您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又能给您出什么主意呢？”

“可是我也不能把信交给索科利斯基公爵，否则我就会毁掉韦尔西洛夫的一切希望，此外，我还会成为背叛他的人……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是我把信交给韦尔西洛夫，我就会让无辜的人陷于贫困，依然是把韦尔西洛夫推入两难的境地：他要么放弃遗产，要么沦为窃贼。”

“您把事情说得太严重了。”

“请告诉我一点：这个文件能起决定性的终局的作用吗？”

“不，起不了。我对法律所知有限。对方的律师当然会知道该怎样利用这个文件，从中找出一切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但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曾经肯定地认为，这封信即使呈交法

院，在法律上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韦尔西洛夫照样可能打赢这场官司。倒不如说，这个文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良心问题……”

“正是这一点最为重要，”我打断他说，“正是因为良心问题，韦尔西洛夫必将陷于两难境地。”

“不过，他也可能销毁文件，那就正好相反，他可以彻底摆脱危险。”

“克拉夫特，您有没有特别的根据，认为他会这么做？我就是想知道这一点，我就是为此来找您的！”

“我想，任何人处在他的位子上都会这么做的。”

“您自己也会这么做？”

“我没有获得遗产，所以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

“那好吧，”我说，把信塞进口袋。“这事就暂告一个段落。克拉夫特，请听我说。我向您担保，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已经向我披露过许多事情，她对我说，您，也只有您，才能把一年半以前韦尔西洛夫跟阿赫马科夫夫妇在埃姆斯①发生的事情真相告诉我。我盼望您就像盼阳光一样，希望您能驱散我心中的迷雾。您还不了解我的处境，克拉夫特。我求您把全部真相告诉我。我就是想知道他为人如何，特别是现在，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知道！”

“我感到奇怪，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干吗自己不把一切告诉您呢。事情的全部经过她可以从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那儿听到，不用说，她听说过，也许知道得比我多。”

“这件事安德罗尼科夫自己都搞不清楚，玛丽亚·伊万诺芙

① 德国的一个疗养地。187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疗养，并且开始紧张地写作《少年》。——俄编注

娜就是这么说的。看来，没有人能搞清楚这件事。在这里，连魔鬼都会感到棘手！我知道，当时您自己就在埃姆斯……”

“我没有碰上事情的全过程，好吧，我愿意把我所了解的告诉您，只是不知道能不能让您满意。”

二

我不准备原封不动地转述他讲的话，只想扼要地谈一下实质性的内容。

一年半之前，韦尔西洛夫通过索科利斯基老公爵的介绍，成了阿赫马科夫家的朋友（当时他们全都在国外，在埃姆斯）。他先是给阿赫马科夫本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位将军年纪还不老，但在跟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结婚后的三年中，却因赌牌输光了妻子丰厚的陪嫁，而且由于放纵的生活已经中过一次风。他神志清醒以后就去国外疗养，至于住在埃姆斯，则是为了前妻所生的女儿。这位姑娘约莫十七岁，有病，害的是肺结核，据说她长得非常美丽，同时又喜爱幻想。她没有嫁妆，他们照例把希望寄托在老公爵身上。据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是个好心肠的后娘。但不知为什么那姑娘却特别依恋韦尔西洛夫。当时他还在宣传“某种狂热的思想”（克拉夫特语），某种新的生活，“怀有一种崇高意义的宗教情绪”——这个奇怪的，也许是嘲笑的说法出自安德罗尼科夫之口，我是听别人转述的。但奇怪的是，他很快就遭到了大家的嫌弃。将军甚至很怕他。克拉夫特不完全否定这样一种传闻：韦尔西洛夫成功地使这位有病的丈夫确信，他的妻子对年轻的索科利斯基公爵怀有好感（当时后者已离开埃姆斯去了巴黎）。韦尔西洛

夫并没有直说，而是“按自己惯用的方式”，即采用了诽谤、暗示，以及种种迂回曲折的办法，克拉夫特说“他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总而言之，克拉夫特认为，或者倾向于认为他是个骗子、天生的阴谋家，而不愿认为此人真的具有什么崇高的、哪怕是独特的思想。我在听克拉夫特介绍之前就已经知道，韦尔西洛夫起初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有过极大影响，但后来却渐渐跟她闹翻了。这场把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从克拉夫特那儿也得不到答案，但他俩反目成仇是在相互有了交情之后，这却是众口一词的。接着就发生了一桩奇怪的事：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那个有病的继女显然爱上了韦尔西洛夫，或是因为迷上了他身上的什么惊人之处，或是被他滔滔的言论燃起了激情，或是出于我不理解的原因，但人人都知道，有一段时间韦尔西洛夫几乎天天都跟这姑娘形影不离。结果是：姑娘突然向父亲宣布，她要嫁给韦尔西洛夫为妻。大家都肯定说这确有其事：包括克拉夫特、安德罗尼科夫和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甚至还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有一次她当着我的面无意中谈起过这事。他们还肯定说，韦尔西洛夫本人不但表示愿意，甚至还坚决要求跟这姑娘结婚，因此这两个一老一少相差悬殊的人是两相情愿、私订终身。可这个想法却把当父亲的吓坏了：自从他对早先深深爱过的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渐渐感到厌恶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女儿宠爱得几乎无以复加，特别是在中风之后。可是，最激烈反对这门婚事的却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本人。于是发生了无数次秘密的极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又是争吵、又是哭闹的，总之，发生了种种丑事。父亲看到被韦尔西洛夫“弄得神魂颠倒”（克拉夫特语）的热恋中的女儿不屈不挠，终于开始让步了。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却仇恨难消，继续反对。正是这一点开始把人们引入迷

津，谁也弄不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下便是克拉夫特直接依据得到的材料所做的猜测，但毕竟也只是猜测而已。

韦尔西洛夫似乎按自己的方式，巧妙而无法反驳地使那位年轻姑娘相信，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之所以不同意这门婚事，是因为她自己爱上了他，而且早就醋劲大发地折磨他，盯紧他的一举一动，暗中捣鬼。她已经向他表白过爱情，现在却因为他爱上了别人而恨不得吃了他。总之，是诸如此类的意思。而最糟糕的是，似乎他还把这情形对姑娘的父亲，那位“不忠实”的妻子的丈夫，“做过暗示”，还说她对年轻公爵有意思只不过是消遣解闷而已。当然，这个家里就此闹了个天翻地覆。但也有不同的说法，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非常爱自己的继女，如今在继女的事情上受到了中伤诽谤，因此陷入了绝望，更不用说她跟患病丈夫的关系了。不过，同时还有另一种说法，令我痛心的是，不但克拉夫特对这种说法完全相信，连我自己也相信（这种说法我已经听说过）。有人肯定地说（据说，安德罗尼科夫是听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亲口讲的），情况恰恰相反，韦尔西洛夫在早先，即在年轻的姑娘开始倾心于他以前，就已经向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表白过爱情，而她呢，尽管曾经是他的朋友，甚至一度狂热地迷上他，却又经常不信任他，与他顶嘴，这回对待他的爱情表白却采取了异常憎恶的态度，而且还恶毒地嘲笑了他。待到他预计她丈夫不久将再次中风，公然求她做他的妻子时，她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从身边撵走了。因此，当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后来看见他居然公开向她继女求婚时，她必然恨之入骨了。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在莫斯科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她既相信前一种说法，也相信后一种说法，就是说她相信合二为一的说法：她确

信这两种情况可能兼而有之，真所谓 la haine dans I'amour,[①]双方恋爱中的自尊心受到了挫伤云云。总而言之，有点儿像某种极微妙的爱情瓜葛，与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正派人物是不相称的，更何况其间还夹杂着卑劣的行径。不过，尽管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心地善良，但她自己头脑里却从小就塞满了各种描写阴谋与爱情的小说，她日日夜夜读个不停。结果她心目中浮现出了韦尔西洛夫明显的卑劣行径、谎话诡计以及某种丑恶的阴暗心理，更何况事情的结局真的很惨：那个可怜的热情似火的姑娘服毒自杀了，据说是吞了含磷的火柴，不过我直到现在还不能确定这最后的传闻是否可信，至少他们都在竭力掩盖此事。姑娘只病了两个星期就死了，因此吞火柴之事值得怀疑，但克拉夫特对此却十分相信。接着不久，姑娘的父亲也死了，据说是因为伤心引发了第二次中风，不过这至少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在姑娘的葬礼之后，年轻的索科利斯基公爵从巴黎赶回埃姆斯，曾在花园里当众打了韦尔西洛夫一记耳光，但后者没有提出决斗，相反却在第二天若无其事地出现在散步的地方。从此大家都不再理睬他，到彼得堡后也是如此。韦尔西洛夫虽然还保持与某些熟人来往，但他们已完全属于另一个圈子。他那些上流社会的熟人，个个都谴责他，虽说很少有人了解全部底细，只知道少女的殉情以及打耳光之类的事。可能充分了解情况的只有两三个人，而知道最多的得数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他早就跟阿赫马科夫家有事务上的联系，特别是为了办某件事跟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接触更多。但所有这些秘密他甚至都瞒着家人，只对克拉夫特和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透露些许，而且那还是出于必要。

---

① 法文：爱中之恨。

“关键是现在有一个文件，”克拉夫特推断道，“阿赫马科娃夫人对它怕得要命。”

以下就是他关于这个文件所讲的情况。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犯了一个过失，当老公爵，即她的父亲，发病后在国外已开始康复时，她却极其秘密地给安德罗尼科夫（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十分信任他）写了一封于她名声很不利的信。据说，当时病情渐有好转的公爵确实出现了一种乱花钱的癖好，几乎是恣意挥霍自己的钱财：他在国外开始购买毫无需要、但却昂贵的物品，如绘画、花瓶之类；还赠送或捐助天知道多大数额的巨款，甚至捐给当地的各种机构；他背着大家，差点儿以重金从一个俄国上流社会的阔佬那儿买下一座破旧不堪、讼争不断的庄园；此外，似乎还真的开始有了续弦的念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在父亲患病期间一直守在他的身边，正是由于上述情况，她给法律顾问兼“老朋友”安德罗尼科夫寄去了一封信，咨询：“依照法律，是否可以宣布公爵应受人监护，或者属于民法上无权处理家务的人，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怎样才能做得合适些，避免出丑，既不让任何人指责，又能顾全父亲的感情等等，等等。”据说，安德罗尼科夫当即就开导她，劝她放弃这个主意，后来公爵已完全康复，这个主意已经无法再提了，但那封信却留在安德罗尼科夫那儿。如今他已经死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立刻想起了这封信：万一它在死者的文件里被人发现，落到了老公爵手里，那么老公爵肯定会把她永远逐出家门，取消她的遗产继承权，生前不给她一文钱，一想到亲生女儿不相信他理智健全，甚至打算宣布他为疯子，这个温顺似羔羊的人肯定会变得像野兽一般凶狠。而她由于嗜赌丈夫干的好事，守寡以后落入了无钱无财的境地，只能指望父亲了：她满心希望从他那儿得

到一份嫁妆，跟第一份一样丰厚呢！

关于这封信的下落，克拉夫特所知甚少，但他指出，安德罗尼科夫“从不撕毁有用的文件”，此外，这人虽然足智多谋，但也“心慈手软”。（尽管克拉夫特那么敬爱安德罗尼科夫，但对他仍保留自己完全独立的看法，这简直让我吃惊。）不过克拉夫特还是相信，这封有损名誉的信件似乎落到了韦尔西洛夫手里，因为后者跟安德罗尼科夫的遗孀及女儿们过从甚密，而且已经确知，她们曾热心地马上把死者留下的所有文件让韦尔西洛夫过目。克拉夫特还知道，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已经听说信在韦尔西洛夫手里，而她怕的就是这一点，认为韦尔西洛夫很快会带着信去见老公爵，所以她从国外回来后，就已在彼得堡找过这封信，去过安德罗尼科夫家里，现在仍在继续寻找，因为她毕竟还心存希望，也许信并不在韦尔西洛夫处。最后，她还去了一趟莫斯科，也纯粹是为了这个目的，在那儿她恳求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在她保管的那些文件里找一找这封信。至于有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这么个人，以及她跟已故安德罗尼科夫之间的关系，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是不久前才打听到的，已经是回到彼得堡之后的事了。

“您认为她在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那儿没有找到？”我问道，我有自己的用意。

“既然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就是对您也没有明白地说出什么，那么，也许不在她那儿。”

“就是说，您估计文件是在韦尔西洛夫手里？”

“十之八九是这样。不过，我不知道，各种可能性都有吧。”他低声说，显得十分疲乏。

我不再盘根问底，再说又有什么必要呢？尽管整个事情既不光彩又扑朔迷离，但对我来说，关键的问题已经清楚：我所

担心的一切得到了证实。

“一切就像做了场梦，荒唐透了。”我很伤心地说，起身去拿帽子。

“您很珍爱这个人吧?”克拉夫特问。就在那一刻，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明显的深深的同情。

“我本来就有一种预感，”我说，“从您这儿还是无法彻底弄清他的为人。剩下的一个希望就是阿赫马科娃了。对她我也曾指望过。也许我会去找她，但也许不会。”

他有点儿困惑地瞧了我一眼。

“再见，克拉夫特！既然人家不想要您，何必还要挤进他们堆里去呢？断绝一切关系岂不更好——不是吗?”

“那么此后又能去哪里呢?”他望着地面，有点儿阴郁地问。

“去自己的天地，自己的天地！断绝一切关系，躲进自己的天地!”

“去美国?”

“去美国也行！躲进自己的天地，纯粹属于自己的天地！这就是整个‘我的思想’的精义，克拉夫特!”我激昂地说。

他有点儿好奇地望着我。

“可您有‘属于自己的’天地吗?”

“有。再见了，克拉夫特，我很抱歉打搅您这么久，谢谢您！要是我换了您，要是我自己对俄国持您这样的看法，那我就会打发所有的人见鬼去，我会说：滚开，搞你们的阴谋诡计去，暗地里斗来斗去吧——关我什么事!”

“请您再坐一会儿吧。”他突然说。这时他已经把我送到了门口。

我有点儿奇怪，便转身回去，又坐了下来。克拉夫特在我

对面坐下。不知怎的，我们相视而笑了，这情形我还历历在目。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对他的举止有些纳闷。

“我羡慕您，克拉夫特，您总是那么彬彬有礼。”我突然说。

“是吗?”

“这是因为我虽然也想礼貌待人，但自己却很少能够做到……不过也没什么，受别人侮辱也许更好：至少可以使我摆脱爱别人这种不幸。”

“您最喜欢一天之中的哪个时分?”他问，显然并不在听我说话。

“哪个时分？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落日时分。”

“是吗?”他说，露出某种特别好奇的神情，但随即又陷入了沉思。

“您又要去什么地方吗?”

“是的……我要走了。”

“很快?”

“很快。”

“难道去维尔诺还要用手枪?”我问，完全不是别有用意，甚至连用意也没有！我这样问是因为瞥见了手枪，而且当时正愁找不到话题。

他转过脸去，直勾勾地盯了一眼手枪。

“不，这没有什么，我只是出于习惯。”

“要是我有手枪的话，我会把它藏在什么地方锁起来。您知道，手枪是个诱惑，真的！也许我并不相信自杀是一种流行病，但如果这玩意儿老是触目地放在眼皮子底下，说真的，总会有那么一刻使人生出邪念。”

“请您别谈这种事。”他说，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不是讲我自己，”我补充道，也站了起来。“我决不会用枪自杀。哪怕给我三倍的寿命，我也活不够呢。”

“那您就多活几年吧。”[①] 他似乎是脱口说出了这么一句。

他神思恍惚地笑了笑，真是出人意料，居然径直朝前室走去，好像在主动逐客，要领我出去似的，当然，他并没有察觉自己在做什么。

“祝您事事如意，克拉夫特。”我说，已经下到了楼梯上。

“有这可能。”他坚定地说。

“再见！”

“这也有可能。”

我至今还记得他投向我的最后目光。

三

如此看来，我为之心跳多年的那个人，就是这副德性！可我本来期待从克拉夫特那儿听到什么呢？难道是这些新闻吗？

我从克拉夫特家里出来时饥肠辘辘，已是黄昏时分了，但我还没有吃午饭。我当即走进彼得堡区“大马路”上的一家小饭馆，打算花掉二十戈比，至多不超过二十五戈比吃些东西——比这再多，当时我是无论如何不允许自己的。我要了一份菜汤，记得喝完之后就坐在那儿眺望窗外。店堂里人很多，弥漫着油腻腻的烟焦气味、饭馆餐巾以及烟草的气味，难闻极了。我的头顶上方挂着个鸟笼，一只鸣声难听的夜莺用嘴啄着

① 此语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笔记”，是当时老百姓的哲理性的看法。

笼底，一副阴郁、沉思的样子。隔壁的台球房里人声喧哗，但我却坐在那儿冥思苦想。落日（我不喜欢落日，克拉夫特干吗对此感到奇怪呢?）勾起了我某种陌生的、突如其来的心绪，根本不合适于我的那种心绪。我眼前老是恍惚地看到母亲那温顺的目光、那一双可爱的眼睛，这双眼睛总是在怯生生地观察我，已经有整整一个月了。最近我在家里态度很粗暴，多半是针对她。我本想冲撞的是韦尔西洛夫，但我不敢，于是按照自己卑劣的习惯，我只好去折磨她。她甚至完全给我吓坏了：往往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一进门，她就用充满哀求的目光望着我，生怕我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十分奇怪的是，此时此刻，在饭馆里，我第一次认真思索为什么韦尔西洛夫对我称你，而她却对我称您。早先我就对这一点感到吃惊，而且得出了于她不利的看法，但此刻不知为什么我想得特别深——于是各种奇思怪想接二连三地涌进了我的脑海。我久久地坐在那儿，直到暮色沉沉。我还想到了妹妹……

对我来说，这是关键的时刻。无论如何我必须做出判断！难道我没有能力做判断吗？既然他们自己都鄙弃我，那么跟他们决裂又有何难？母亲和妹妹怎么办？不管事情发生什么变化，我可决不会撇开她俩不管的。

这是事实：这个人在我生活中的出现，就是说，还在我幼年时的匆匆一现，成了我命中注定的推动力，我的意识就是由此开始的。要是当初我没有碰见他，也许我的才智、我的思维方式以及我的际遇都会是另一个样子，——哪怕命运注定了我的性格，哪怕我终究避免不了这种性格。

但结果却发现，这个人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幻想而已，童年时代开始的幻想。是我自己凭空把他想象成这个样子，实际上他是另一种人，远比我想象中的低下。我是来找一个纯洁的

人，而不是这种人。当我还是小孩儿的时候，在我见到他的那短短的瞬间，凭什么我会永永远远地爱上他？这个“永远”理该消失。什么时候篇幅允许的话，我会把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形写出来：这件事无聊透了，一点儿意思也没有。可我却由此砌造了整整一座金字塔。还在小时候，我就在被窝里臆造这座金字塔，睡意蒙眬之中，我可以哭泣，可以幻想——哭什么？想什么？——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因为我遭人抛弃？是因为正在受人折磨？但我受折磨的时间并不长，总共只有两年，那是在图沙尔的寄宿学校里，当时他把我往那儿一塞就永远离开了。在这之后没有谁来折磨我，恰恰相反，我自己却傲视我的同学。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能容忍那种抱怨自己孤单的人！再没有比扮演这样的角色更丑恶了：孤儿啦，私生子啦，所有那些被遗弃的人，总之，所有那些我毫不同情的窝囊废，突然郑重其事地站到公众面前，如怨如诉、又不无告诫地开始哀号：“你们瞧瞧，人家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啊！”我真想把这些孤儿痛揍一顿。在这群呆板而下贱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懂得，要是他一声不吭，既不哀号，也不自轻自贱地诉苦，他的身价反倒会提高十倍。既然你已经开始自轻自贱，那么你，一个私生子，就活该如此。这就是我的看法！

但可笑的并不是我早先“在被窝里”的梦想，可笑的是我跑到这儿来正是为了他，依然是为了这个臆想出来的人，而几乎忘记了我的主要抱负。我是来帮他戳穿谣言、击溃仇敌的。克拉夫特提到过一个文件，就是那女人写给安德罗尼科夫的信，她对这封信怕得要命，因为它可以毁掉她的好运、使她陷于贫困，她推测这封信在韦尔西洛夫手里，——其实信并不在他那儿，而是落到了我手中，就缝在我侧面的衣服口袋里！是我亲手缝的，全世界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保管”这个文件

的小说迷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认为有必要把它交给我而不交给别人，那全是她的看法和她的主意，我没有义务加以解释，——也许什么时候我会顺便讲讲，但我得到了如此意外的武器，就身不由己地想来彼得堡了。当然，我只打算私下帮助这个人，不露声色，镇定自若，我并不指望他的夸奖和拥抱。而且我也永远不屑于埋怨他什么！何况我爱上他、把他臆想成一个虚幻的理想人物，难道是他的错吗？说不定我爱的根本就不是他！他那独特的才智，令人感兴趣的性格，他那些恋情和冒险，还有我母亲与他形影相随，——所有这一切，似乎已经无法阻止我行动了。我幻想中的偶像已经打碎，或许我已经再也无法爱他，这就足够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在阻止我，是什么束缚了我呢？——这是一个问题。结果表明：蠢的只是我自己，再没有别的人了。

既然我要求别人诚实，我自己也得诚实：我应该承认，缝在我口袋里的那封信，在我心中激起的并不只是急于去帮助韦尔西洛夫的热望。这一点，现在对我是太清楚了，虽然当初我就为这别有所图而脸红过。我想象自己会跟一个女人劈面相遇，一个上流社会的高傲女人，她会瞧不起我，把我当做小耗子似的来嘲笑，却根本没想到我竟是她命运的主宰。这个念头在我还没有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就使我陶醉了，在我来这儿的列车车厢里更是如此，这一点我在上文已做了坦白。是的，我恨这个女人，但又像爱自己的猎物那样爱她，这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是事实。不过这太孩子气了，简直想不到像我这样的人会如此幼稚。我现在写的是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当我坐在小饭馆里的夜莺底下、认定当天晚上势必与他们决裂的时候，我头脑里在想些什么。一想到早晨跟这女人见面的情形，我就顿时羞愧得满脸通红。这次见面让我丢人显眼！给对方留下了不光

彩的愚蠢印象，而主要的是，最有力地证明了我办事无能！当时我想，这足以证明我连最愚蠢的诱惑都抵挡不住，亏我刚才还亲口对克拉夫特说，什么我有“自己的天地”、有自己的事业啦，哪怕给我三倍的寿命，我也活不够啦。而且还说得挺自豪。我抛开了“我的思想”，陷入了韦尔西洛夫的私事，这多少还可以原谅。可是我像受惊的兔子那样从这边窜到那边，连种种无聊的事情都要插手，不消说，那就只能怪我愚蠢了。我明明早就知道，任何事情我都不会表述得清清楚楚、有条有理，默不作声对我最有利，可我中了哪门子邪，竟会跑到杰尔加乔夫那里，插嘴说上一大通蠢话？引得那个叫瓦辛的来开导我，说我“前头还有五十年的路程，所以不必后悔”。他这句话说得好，我同意，能给他那样的人所公认的智慧增光，此话好就好在这是个最简单的道理，而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通常只有在历尽较为复杂或较为愚蠢的事情后才能领悟。可是这话在瓦辛出口之前，我自己也早已知道，三年多以前，我对这个想法就有了深深的感悟，甚至不止于感悟，“我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正蕴涵在其中呢。以上就是我当时在小饭馆里的思考。

当我被步行和思考弄得又累又倦，好不容易走到谢苗诺夫团的驻地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我的心绪极坏。天色已经完全转暗，天气也变了，干燥的日子却刮起了彼得堡那种讨厌的风，凌厉而令人难受，直透我的脊梁，四周扬起一片灰沙。有多少脸色阴沉的平民百姓，办完事或干完活后正匆匆赶回自己的角落！各人的脸上都写着各自的忧虑，在这群人中间恐怕根本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促使大家联合的思想！克拉夫特说得对：大家是一片散沙。我遇见了一个小男孩儿，年纪那么小，不由叫人奇怪：这么晚了，他怎么会孤零零地出现在街头，看

来他是迷路了，有个农妇停下来听他说了一会儿话，但什么也听不明白，她无奈地两手一摊，继续赶路，把他孤零零地撇在昏暗中。我想朝他走去，可不知为什么他见了我突然害怕起来，往前跑了。我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下了决心，我决不再去找瓦辛。在我登楼梯的时候，我十分希望碰见家人——除韦尔西洛夫外——全在家，这样我就可以赶在他回来之前，对母亲或者我那可爱的妹妹说几句亲切的话，整整一个月以来，我还几乎没有跟妹妹说过一句特别的话呢。正好如我所愿：他不在家……

四

顺便说说：我要让这个“新人物”（我是指韦尔西洛夫）在“札记”里登场，就先得扼要介绍一下他的履历，虽说这履历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这是为了让读者更明白些，还因为我无法预见在下文的叙述中，该把这份履历插在什么地方。

他在大学里念过书，却进了近卫军的骑兵团。娶了法纳里奥托娃之后就退役了。去了一趟国外，回国后在莫斯科过了一段吃喝玩乐的日子。妻子一死就去了乡下，在那儿跟我母亲发生了那件事。之后在南方某地住了很久。欧洲战争时期又去军队供职，但没有到达克里木，始终没有参加过战事①。战争结束后，他退役去了国外，甚至还带着我的母亲，可是却把她撇

① 指俄国与英、法、土耳其、撒丁王国组成的联盟之间进行的克里木战争（1853—1856），战争的起因是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与俄国发生冲突。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是这场战争的中心事件。

在了柯尼斯堡①。可怜的母亲有时摇着头提起这段日子时，总显得有点儿后怕：她在那儿足足待了半年，孤苦伶仃，还拖着个幼小的女儿。由于语言不通，就如坠入了五里雾中，最后连钱都没有。这时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跑来找她，把她接回到下哥罗德省的某个地方。后来韦尔西洛夫当上了首批调停官②，据说十分尽职，但很快就弃官不做，开始在彼得堡承办各种私人的民事诉讼。安德罗尼科夫对他的才干一向评价很高，非常敬重他，只是说摸不透他的性格。再后来，韦尔西洛夫连承办诉讼的事也不干了，又跑到了国外，这一次住了很长时间，有好几个年头。接着就开始跟索科利斯基老公爵来往特别密切。整个这段时期内他的经济状况急剧变化了两三回：忽儿一贫如洗，忽儿又突然暴富、振兴起来。

不过既然我的札记已写到了这里，我也就决定现在来谈谈“我的思想”。自从它诞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将它形之于笔墨。我决定所谓公诸于读者，也就是为了以下行文清楚起见。再说，如果我不说清是什么在推动我、鞭策我采取一步步的行动，那么不单是读者，就连笔者我自己也会难于解释这些行

① 波罗的海港口，与波兰接近。13世纪中叶至1946年属于德国，1946年后归苏联，改称加里宁格勒。现属俄罗斯。

② 是俄国在实施1861年的农民改革时设立的，旨在调停地主与农民在改革中的纠纷。它由贵族充任。首批调停官（1861—1863）的主要工作是划分土地和制订“法定文书”（规定农民的经济结构以及在赎买之前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很多方面批评政府的改革，力求根据更为民主的原则对改革的办法进行修改。特维尔省的十三个调停官为此遭到逮捕。后来，调停官对农民的生活已经不起多少作用，因为这个职务开始由讨好政府的地主及官员来充当了。

为。本人无能，这种“含蓄暗示法”[①] 又使我落入了小说家的“文采”俗套，而这正是我在上文中自己所嘲笑过的。在开始记述我在彼得堡的故事、包括我的全部丑事时，我就认为有必要预先交代“我的思想”。但并非因追求“文采”诱使我沉默至今，实在是碍于事情本身，即做起来太难了。即使是现在，一切已经过去了，我仍感到要表述这个“想法”有无法克服的困难。除此之外，无疑我还得以当时的形式来叙述它，就是说，应该叙述它当时——而不是现在——在我头脑中是怎么形成和呈现的，而这又平添了一层困难。有些东西几乎是无法言传的。那些最简单、最清楚的思想，恰恰也就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思想。要是哥伦布在发现美洲之前就开始向别人叙述自己的思想，我深信，人们会在很长时间内都理解不了他，而且也不会想着去理解。我说这话，绝对没有把我比作哥伦布的意思，要是有人这么推想，那他只能感到惭愧。

① 一种修辞格，或译“省略暗示法”、“省略加强法”，也就是在表现某种思想时，言不尽意，限于暗示。此处指前文老提到“我的思想”，可又始终未曾阐明。

第 五 章

一

我的思想——就是成为罗特希尔德。我请读者保持安静，认真听我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的思想——就是成为罗特希尔德，成为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富豪；不是普通的富豪，而恰恰是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富豪。为什么要这样，出于什么原因，我到底追求什么目的，这些留待以后再说。首先我只想证明，我的目的确实能够达到。

事情很简单，秘诀全在于两个字眼：顽强不屈和锲而不舍。

“我们早听说过了，”有人会对我说，“这并不新鲜。在德国，每一个‘当老子①的’都在这样反复教导自己的孩子，可

① 此词原文为 фамер，系德语 vater（父亲）的音译，此处是指“庸人”。——俄编注

您的罗特希尔德（即巴黎已故的詹姆斯·罗特希尔德，我指的就是他）总共才出现了一个，而当老子的庸人却有几百万呢。”

我会回答说：“你们硬说自己听说过了，可你们却什么也没听出来。不错，有一点你们是对的：如果我说这事‘很简单’，那就是忘了补充说这也是最难的事。世界上一切宗教和道义都归结为一句话：‘应该从善戒恶。’似乎没有比这更简单了吧？好啊，你们不妨去试试看，去做成一桩善事，去戒掉哪怕自己的一个恶习，——难不难？事情就是这样。”

无数个世纪以来，那些无数的庸人可以翻来覆去念叨这两个体现全部秘诀的神奇字眼，可最终只出现了一个罗特希尔德，个中原因就在于此。这就是说，情况似是而非，那些庸人反复念叨的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毫无疑问，他们也听说过顽强不屈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但是要达到我的目的，所需要的并不是庸人的顽强不屈和庸人的锲而不舍。

就凭他是个当老子的庸人（我指的不单是德国人），就凭他拖着个家庭，跟大家过一样的日子、跟大家花一样的开销、跟大家负一样的责任，他就成不了罗特希尔德，只能成为一个中不溜儿的人。我十分清楚地懂得，要成为罗特希尔德或者只是有成为罗特希尔德的愿望——但不是庸人式的，而是严肃认真的愿望，这本身就已经表明我同时在超越社会。

几年前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有个乞丐死在伏尔加河上的一艘船上，当地人都知道，他身穿破衣烂衫，到处行乞。但他死后，人们却发现在他的破衣裳里缝着三千卢布的钞票。前几天我又读到一则乞丐的新闻，此人贵族出身，经常出没于小饭馆伸手乞讨。后来他被捕了，在他身上搜出的钱竟有五千卢布之多。由此可以直接引出两个结论：第一，要顽强不屈地积

累，哪怕是一个小钱一个小钱地积攒，最终会取得巨大成果(时间在这儿无关紧要)；第二，即使是一种最简单的挣钱方法，但只要锲而不舍，就能确保成功。

然而，或许也有相当多既有头脑、又有自制力的可敬人物，尽管他们很想拥有三千或五千卢布，但他们（不管他们如何努力）却达不到目的。这是为什么？答案很清楚：因为尽管他们有这种愿望，但毕竟没有一个人的愿望会如此强烈，以至于，比方说，在确实找不到其他挣钱方法的情况下，甘愿去当一个乞丐。他们也没有如此顽强：哪怕当了乞丐，也决不把讨来的第一笔小钱给自己或家人多买一片面包。然而用这种积累的方法，即用行乞的方法要积攒那么多钱，就只能仅以面包和盐充饥，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上面提到的那两个乞丐大概也是这样做的，也就是仅仅靠面包维持生命，而且几乎还得露宿街头。毫无疑问，他们并不打算成为罗特希尔德；不过是些十足的阿尔巴贡或普柳什金[①] 而已。但是，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有意识地积攒钱财，而且旨在成为罗特希尔德，——那就要有不亚于两个乞丐的强烈愿望和意志力。庸人是显示不出这种力量的。在世界上力量是多种多样的，意志和愿望的力量尤其如此。有的温度只能把水煮沸，有的温度则能把铁烧红。

这就跟修道院的生活一样，跟苦行僧的忘我行为一样，起作用的是感情，而不是思想。怎么会这样？什么原因？身边揣着一大笔钱，却一辈子穿粗布衣裳、吃黑面包，这合乎道德吗？不是变态吗？这些问题以后再说，现在只谈达到目的的可

① 阿尔巴贡，法国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的《吝啬鬼》中的主人公（据李健吾译本）；普柳什金，俄国作家果戈理(1809—1852）的《死魂灵》中的人物，也是一个吝啬鬼。

行性。

在我发明了“我的思想”之后（当初它已到了赤热的程度），我就开始试验自己：我能不能过修道院的生活并遵守苦行戒律？怀着这个目的，我整整第一个月只吃面包和水，每天食用黑面包不超过两磅半。为了做到这点，我必须瞒过聪明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和善待我的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我坚持要把饭菜送到我的房间里，这使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感到伤心，又让最讲究礼貌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觉得蹊跷。我在房间里简直把饭菜糟蹋殆尽：汤——我泼在窗外的荨麻丛中或是别的地方；牛肉——或者扔到窗外喂狗，或者用纸包起来放进衣袋，然后带出去扔掉。总之，做了诸如此类的处理。由于送进来的三餐面包远远不足两磅半，我就偷偷为自己添购了一些。这一个月我坚持下来了，也许只引起了一些肠胃失调。但从第二个月起，我除了吃面包还增加了喝汤，而且早晚还喝一杯茶。请相信我，我就这样度过了一年，身体完全健康，没有营养不足，而且精神饱满，暗暗欢喜不止。我不仅不怜惜扔掉的食物，反而扔得非常开心。这一年结束，我深信不管怎样节食我都能够忍受，于是才开始吃他们一样的伙食，跟他们同桌用餐了。我并不满足于这个试验，我还做了第二个试验：除了付给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生活费以外，我每月还可得五卢布的零用钱。我决定只花去其中的一半。这是个很艰难的考验，但两年多以后，当我来彼得堡时，我口袋里除了其他钱以外居然还揣着七十卢布，这完全是从零用钱里积攒起来的。这两种试验结果对我意义重大：我确认了我的愿望可以达到很高的强度，足以让我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再重复一遍，整个“我的思想”也就蕴涵于此，其余的全都是些小事。

二

不过，即使是小事，我们也不妨研究一下。

我描述了我的两个试验，读者已经知道，我在彼得堡还做了第三个试验：去了一趟拍卖场，锤声一落，我就赚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当然，还算不上真正的试验，不过是逢场做戏而已：我只想提前干一点点儿未来要干的事，试试自己会如何去行动。一般来说，起初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决意推迟真正着手干事的时间，——推迟到我完全自由之后，我十分明白，比方说，至少得等我先读完了中学（读者已经知道，我放弃了上大学）。不用说，我来彼得堡的途中心里暗暗光火：刚刚读完中学，第一次成了自由人，可又突然发现，韦尔西洛夫的事又会把我的事业推迟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始！但我尽管光火，一路上还是毫不担心自己最终能达到目的。

诚然，我还没有实践过，但我一连三年都在周密思考，不可能有什么迟疑。我上千次地想象过我将怎样开头：我仿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我国两个京都[①] 之一（为开创事业，我选择了我国的京都，出于某种考虑，我更看中的恰恰是彼得堡），我就这样从天而降，但完全是个自由人，不受任何人左右，健健康康，衣袋里藏着一百卢布作为最初的流动资金。没有这一百卢布是无法启动的，否则连取得最最初步的成就也将是遥遥无期。除了一百卢布以外，读者已经知道，我还有勇气，顽强不屈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完全离群索居，并且严守秘

① 指莫斯科和彼得堡。

密。离群索居很重要：我至死也绝不喜欢与人们有任何私交或结盟，总而言之，我决定单枪匹马去实现“思想”，这是 sin qua。[1] 我难以跟人相处，我会感到精神不安，而不安将有害于我的目的。一般地说，有生以来到现在，我对自己该如何待人有过种种设想，总是设想得很聪明，但一接触到实际，总是做得很愚蠢。我恼恨自己，但我得老实承认这一点，我一开口就会暴露自己，而且说话心急慌忙。正因为这样，我才决心少跟人接触，从而赢得了独立自主，心境平静，目的明确。

尽管彼得堡的物价高得吓人，可我还是做了永不更改的决定：花在吃方面的钱不得超过十五戈比，而且我知道自己会信守这个诺言。关于吃的问题我考虑了好久，而且想得很周到：比方说，我打算有时接连两天只吃面包和盐，但第三天就把前两天省下的钱全花光，我觉得比起天天吃最起码的十五戈比的伙食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健康。其次是住，我需要有一个角落，一个名副其实的角落，只要夜里能睡上一觉或者能在阴雨天躲躲就行。我打算住在街头，必要时去那种专为穷人开设的小客栈过夜，那儿除了寄宿以外，还供应一块面包和一杯茶。啊，我会把钱藏得好好的，决不会在角落里或小客栈里被人偷掉，我敢担保，别人根本看不出我有钱！“担心别人偷我东西？我自个儿都担心会去偷别人呢。”——有一回我在街头听见一个痞子说了这句开心话。当然，我只是以他的谨慎和机灵自比，我不打算偷窃。不仅如此，早在莫斯科时，也许从我“思想”诞生的第一天起，我就决定连开典当或放高利贷的事我也不干：这种事有犹太佬以及那些既没头脑、又没毅力的俄国人在干。开典当和放高利贷这种事太一般了。

---

① 拉丁文：必须的条件。

至于说到穿，我打算拥有两套行头：一套普通的，一套讲究的。一旦添置后，我相信我能穿得很久。我花了两年半时间专门研究过穿衣的学问，甚至还发现了一个秘诀：要使衣服保持常新不坏，必须用刷子勤刷衣，一天刷上五六回。我可以有根据地说，呢子衣服不怕刷子，只怕灰沙和秽土。如果放在显微镜底下观察，灰沙无异于石子，刷子不管如何硬，终究还是软毛。我还同样研究出了穿靴子的学问：诀窍在于走路时必须小心下脚，使靴底一下子全部着地，尽可能不要踩歪。这种走法花两星期就能学会，以后就习惯成自然了。这样做，可以使一双靴子平均多穿三分之一的时间。这是两年来的经验。

接下来开始研究行动本身。

我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有一百卢布。彼得堡有那么多大拍卖、大甩卖的机会，旧货市场里有那么多小铺子，而且需求者大有人在，花点儿钱买进一件东西，略为抬价后不可能卖不出去。我就花了两卢布五戈比的本钱买进一本纪念册，结果获利七卢布九十五戈比。获取这么大的利润却不担风险：从买主的眼神我就看出他不会不买。当然，我十分清楚这只是一个机遇，但我寻找的就是这种机遇，为此我才决定住在街头。好吧，就算这样的机遇难得，那也无所谓，我主要的原则是不担风险，其次是：每天所挣的钱，非得多少超过我最起码的开销，以便能做到积蓄天天不断。

有人会对我说：这一切都是空想，您不了解市俗阶层，刚起步就会受骗上当。可是我有意志力和刚毅的性格，街头的学问跟任何学问一样，只要顽强不屈，狠下功夫，只要有才干就能掌握。我在中学时直到七年级都是名列前茅，数学成绩更为优异。怎么能对经验和街头学问崇拜到那种地步，预言我必定失败呢！只有那些从来不曾做过任何试验、没有任何生活经

历、吃现成饭混日子的人才会这么说。“一个人撞破了鼻子，另一个人也必然撞破鼻子。”不，我不会撞破鼻子。我性格刚毅，只要下功夫什么都能学会。如果您顽强不息，始终保持敏锐的眼光，不断地掂量和计算，广泛地行动和奔走，最后居然还是不懂得每天该如何去多挣二十戈比，——这难道能想象吗？关键是我决定绝不去追求高额利润，而始终保持心境平和。等我以后攒到了一两千卢布，我当然会自动放弃掮客和街头转卖的营生。不用说，我对交易所、股票、银行业务等等目前还知之甚少。但有一点我却知道，而且就像知道我一手有五个指头那么清楚：到适当的时候，我会跟别人一样熟悉并精通所有这些交易所和银行业务，这门学问很简单，只要实际去做就能学会。难道这种事也需要很多智慧吗？根本用不着所罗门[1]的大智大慧！只要有刚毅的性格就行：技能、熟巧和知识就会自然而来。只是千万不能让“愿望”中断。

关键是不冒险，而这一点恰恰只有性格刚毅的人才能做到。不久前在彼得堡（当时我已经来到这里），有一次铁路股票上市，那些认股的人都赚了很多钱。股票在一段时间内直线上涨。假设突然冒出一个没有及时认股的人或者一个贪心人，他看见我手里有股票，就劝我按高出市价几个点卖给他。行，我是一定会马上卖给他的。当然，有人会笑话我，说什么您如果再等一等，就可以多赚十倍的钱。话是不错，可是我赚到的几个点更可靠，钱已经到了口袋里，而你们赚的钱还在空中飞呢。有人会说，这种做法赚不到大钱，对不起，你们错了，我

① 所罗门（公元前965—前928），以色列王，大卫之子，据圣经记载，他智慧超群。

国所有的科科列夫、波利亚科夫、古博宁[1] 之流都错了。请你们认清一条真理：在赚钱、特别是积钱方面，锲而不舍和顽强不屈远胜于猎取暴利，即使是百分之百的暴利！

法国革命之前不久，有个姓洛伊的人来到了巴黎，搞了一个可以说是天才的计划（后来这计划在实践中惨遭失败）。[2]整个巴黎骚动起来，人们抢购洛伊的股票到了拥挤不堪的地步。金钱从巴黎的四面八方，就像从麻袋里倒出来似的，倒进了那所办理认购手续的房子。但最后连房子也容不下那么多人，于是人们就挤在街上，各种身份、地位和年龄的人都有：无论是资产者、贵族及其子女，还是伯爵夫人、侯爵夫人和娼妓——全都像遭了疯狗咬似的，挤成了穷凶极恶、疯疯癫癫的一群，什么官衔、门第偏见和自尊，甚至连名誉和声望统统给踩了个稀巴烂。为了弄到几张股票，他们（哪怕是女人）不惜牺牲一切。最后，认购手续改在街上办理，但是没有填写单子的地方。这时有人建议一个驼子暂时出让自己的驼背，权当桌子在上面填写认购单。驼子一口答应了：出价多高可想而知！过了一段（很短）时间，整个计划破产了，一切成了泡影，设想全都告吹，于是股票变得一文不值。谁赚了钱？只有驼子，恰恰是因为他得到的不是股票，而是用金路易付的现钱。听着，我就是这样的一个驼子！我有足够的毅力可以饿肚子，可以一戈比一戈比地积攒起七十二卢布，这种毅力足以使我在大

---

① 这三个人都是俄国19世纪资本家，出身于社会“底层”，成了俄国第一代富豪。

② 约翰·洛伊（1671—1729），一个逃亡到巴黎的英国人，1716年由法国政府批准，他在巴黎创办了一家银行，发行无担保的银行证券，1720年洛伊的银行破产，他自己则逃之夭夭。由于洛伊已将银行转让给国家，所以银行破产实际上成了国家破产，从而引起了社会丑闻。

家卷进热潮的时候能够挺住，宁肯赚可靠的钱，不想赚大钱。我只在小事情上斤斤计较，但在大事上就不这样。我的毅力往往不足以使我忍受小小的不适，即使在产生了“思想”之后也是如此，但用来忍受大苦，却总是绰绰有余。早晨在我上班之前，如果母亲给我端来的咖啡已经发凉，我就会生气，跟她发脾气，然而就是我这个人，却可以整整一个月只靠面包和水过活。

总之，不赚钱，不学会怎样赚钱——这不正常。但同样不正常的是：如果不断稳步地攒钱，始终留意观察、保持头脑清醒和克己节俭，不断狠下功夫，而到头来还是成不了百万富豪，我再重复一遍，这同样不正常。乞丐如果不靠执著的性格和顽强不屈，又能靠什么来赚钱？难道我不如乞丐吗？“说到底，哪怕我达不到目的，哪怕我打算得不对，哪怕我失败、完蛋，——反正我还是要干。我干，是因为我有干的愿望。”这话我在莫斯科时就说过。

有人会对我说，这里没有什么“思想”，完全没有任何新意。可我要说，而且是最后一次说，这里有无穷无尽的思想，无穷无尽的新意。

哦，我早就预感到所有的异议会多么平庸，我自己也会把“思想”表达得多么平庸。我究竟说了些什么呢？我连百分之一都没有表达出来：我觉得我表达得琐碎、拙劣而又肤浅，甚至对我的年龄来说也显得太幼稚了。

三

剩下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了什么目的”、“出于何种原因”、

“是否合乎道德”等等等等，我答应过我要回答的。

我担心我会马上使读者扫兴，但担心的同时我又感到高兴。就让读者们知道吧：我的“思想”所追求的目的，其中根本没有任何“复仇”情绪，没有一点儿拜伦式的东西——既没有弃儿的诅咒和哀怨，也没有私生子的眼泪，没有，丝毫没有。总之，要是我的札记落到了喜欢浪漫主义的女士手里，她准会大失所望。我的“思想”所追求的整个目的——就是离群索居。

“可是要达到离群索居这一目的，根本不必拼命去当罗特希尔德，这跟当罗特希尔德有什么关系?”

“关系就在于我除了离群索居以外，还需要拥有实力。”

我得先说明一下：读者也许会被我这赤裸裸的自白吓一跳，他会憨厚地问自己：作者怎么不感到脸红？我的回答是，我写作并不是为了出版，大概至少要过十年之后才会有读者，到那时一切都已清楚，一切已经过去并得到证实，以至于没什么可脸红了。如果说我在札记里有时对读者说话，那不过是一种手法罢了。我的读者是子虚乌有的人物。

不，我的“思想”并不是起因于我私生子的身份——尽管我的这种身份曾在图沙尔学校里大遭奚落，也不是起因于悲惨的童年，不是复仇心理，不是抗议的权利，——这一切的起因全在于我的性格。现在想起来，我从十二岁起，也即差不多从刚刚明白事理开始，我就不喜欢别人。也说不上不喜欢，而是不知怎的开始感到与他们难以相处。在我独处静思的时刻，有时我自己会感到十分忧伤，因为我就是对亲近的人也根本不能倾诉自己的全部想法，就是说我能这么做，但我不愿意，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总是克制自己，不说出来；我忧伤，还因为我不信任人，闷闷不乐，不善于交际。另外，几乎从儿时起，我

早就发现自己有个特点：动不动就数落人家的不是，过于喜欢责难别人，但在责难别人之后十之八九立即会冒出另一个念头，一个令我十分苦恼的念头："说不定他们没错，错的是我自己?"我经常会这样不必要地责难自己！不用说，我力求离群索居，为的就是避免解答这类问题。再说，不管我如何努力，而且我也确实努力过，但我在跟人交往中却得不到任何教益：我发现，至少我所有的同龄人、我所有的同窗，每个人的思想境界都比我低，我记不得有任何例外。

是的，我忧伤，我经常闭户独处。我常常希望避开交际。也许我能为人们做点儿好事，但我往往看不到要为他们做好事的一丁点儿理由。人们根本没有那么美好，值得我如此去关怀他们。为什么他们不坦率地主动来接近我，为什么非得我自己先去缠他们呢?——我经常这样问自己。我是个以德报德的人，这一点可以用我已经做过的一百件傻事来证明。我对坦率的人会立即报以坦率，而且会马上开始喜欢他。我就是这么做的，可是所有这些人紧接着就欺骗我，带着嘲笑躲开我。这些人里边最坦率的，得数那个儿时痛揍过我的兰伯特，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坦率的坏蛋和暴徒，而且他的坦率仅仅是因为他愚蠢。这些就是我来到彼得堡时的想法。

那天从杰尔加乔夫家里出来（天知道是什么风硬把我刮到了那儿），我走到瓦辛跟前，由于一时兴奋便大大夸奖了他。结果呢?就在当天晚上我已经觉得，我不再那么喜欢他了。为什么?就因为我一夸奖他，同时也就是在他面前贬低了自己。然而，情况似乎应该是相反的：一个人能如此公正和大度，以至于不惜损害自己去夸奖别人，这样的人就其人格而言，几乎是高出于任何人的。但这又有何用——尽管我明白这一点，然而还是不太喜欢瓦辛，甚至极其不喜欢他了，我特意举这个例

子，是因为读者已经知晓。我甚至一想起克拉夫特像逐客似的，主动把我引到前室，心里也会有一股酸溜溜的痛苦感觉，这种感觉直到第二天才消失，因为这时克拉夫特的事情已经水落石出，我是不该对他生气的。打从中学低年级起，同学中只要有人在功课成绩、答题机智或体力方面超过我，我就会马上跟他断绝来往，不理他。倒不是我恨他或者巴望他失败，我只是避开他，因为我生就这样的性格。

是的，我这辈子渴望拥有实力，拥有实力加上离群索居。我甚至在小小年纪就有了这种幻想，当初要是有人弄清了我脑瓜子里在想什么，准会当面笑话我。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喜欢保守秘密的原因。是的，我深深沉湎于幻想，以至于没有工夫谈话，人们从这一点推断出我很孤僻，又从我的神思恍惚推断出对我更为糟糕的结论，可是我白里透红的脸颊却证明我心智健康。

每当我入睡前躺在被窝里幻想时，我就感到特别幸福：这时周围没有人走动，没有一丝儿旁人弄出的声响，我完全处于孤独之中，于是独自开始想象按另外的样子改造生活。这种幻想的狂热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发明了“思想”为止，于是一切幻想顿时从愚蠢变成合理，从小说的幻想形式变为现实的理性形式了。

一切汇合成一个目的。不过，这些幻想早先也并非那么愚蠢，虽说它们有许许多多，千千万万。可其中有我喜爱的……但这里就不列举了吧。

拥有实力！我深信有许多许多人，要是知道我这么个“废物”却追求实力，定会觉得十分可笑。可是我还会使他们更为吃惊：因为或许从我最早的那些幻想开始，也就是几乎从刚省事开始，我就一直想象自己出人头地，永远高人一等，在人生

的各个阶段都是如此。我再补充一句奇怪的自白：我这种想法也许迄今未改呢。而且我还要说，我并不请求谅解。

我的“思想”及其力量就在于：金钱是唯一的手段，它甚至可以使微不足道的人成为高人一等的人物。我也许并非微不足道，可是我，比方说，一照镜子就知道我的外表不利于我，因为我的脸长得太平常。然而假若我像罗特希尔德那样富有，谁会来计较我的脸相？只要我吹一声口哨，还不是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千娇百媚地竞相投入我的怀抱？我甚至相信，到头来她们自个儿都会打心底里把我看做是个美男子。我也许还挺聪明。可是即使我聪明十分，社会上也总会找到聪明十二分的人——于是我就完了。然而假若我成了罗特希尔德，有我在，这个十二分聪明的人难道还能起什么作用吗？有我在，人家根本不会让他开口！我也许很机智，可是如果同时有塔列兰、皮龙[1] 在，——我就会黯然失色，然而假若我是罗特希尔德，哪儿还有皮龙，或者甚至塔列兰的一席之地？当然，金钱是一种专横的威力，但同时也是最高的平等，它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此。金钱能使一切不平等变为平等。这一切我早在莫斯科时就已十分明白了。

当然，你们在这种想法中只会看到无耻和暴力，看到渺小的人胜过才智之士。我承认这种想法肆无忌惮（所以才甜蜜诱人）。但即便如此，你们就以为我追求拥有实力，准是为了去欺压人、报复人吧？问题是普通人一定都会这么干的。不仅是普通人，我相信有成千上万个自负不凡的才子和聪明人，一旦

① 塔列兰（1754—1838），法国著名外交家，精于外交手腕，权诈多变、毫无原则的政客；阿·皮龙（1689—1773），法国诗人、剧作家，有许多趣闻说他善于挖苦讽刺，他以此享有盛誉。

拥有了罗特希尔德的几百万财富，就会无法克制自己，干出最庸俗的普通人所干的事来，他们欺压人会比谁都凶狠。我的思想却不是这样。我不害怕金钱。金钱压不倒我，也不能驱使我去欺压别人。

我不要金钱，或许最好说我要的不是金钱，甚至也不是实力，我要的只是靠实力才能得到、没有实力就根本得不到的东西：一种独来独往而又心平气和的力量意识！这就是自由的最完备的定义，世人为之绞尽脑汁的定义！自由！我终于写出了这个伟大的字眼……是的，独来独往的力量意识既迷人又美好。我有力量，但我平和。朱庇特[①]掌握霹雷，那又怎样？他很平和；难道能常常听见他打雷吗？傻瓜才以为他在睡大觉。要是让什么文学家或者乡下的傻婆娘去取代朱庇特，那准会没完没了地打雷！

只要我一旦拥有实力，我想我就会根本不要它：请相信，到那时我自己就会自觉自愿地处处退居末位。一旦我成了罗特希尔德，我就穿上旧大衣、带着把雨伞步行。即使我在街上被人挤，为了不给马车轧死，我得在泥泞中东跳西躲，——那也没关系。在这种时刻，只要意识到我自己是罗特希尔德，我甚至倒会很开心。我知道我可以享用别人享用不到的山珍海味，我有世界第一的名厨，我只消知道这一点就够了。我吃完一片面包和一片火腿，然后就由我这种意识来填饱。我甚至现在也这么想。

不是我往贵族阶层里钻，而是他们来攀附我；不是我去追女人，而是她们潮涌而来，献给我女人所能献出的一切。“庸俗的”女人跑来是为了钱财，而聪明的女人是出于好奇心的驱

① 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使，她们想了解我这个高傲、内向、对一切都很冷漠的怪人。我对这两种女人都会亲切相待，也许还会给她们钱，但自己却什么也不向她们索取。好奇心会引起爱情，也许我就是在煽情。但我向你们担保，她们离开时除了只得到礼品，肯定一无所获。在她们眼里，我只会变得双倍地新奇有趣。

……有了这种意识
我就够了。①

奇怪的是，我早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迷恋上这种情景了（不过，是真实的情景）。

我不想、也不会去欺压和折磨任何人，但我知道，一旦我要去毁掉某个人，毁掉我的仇敌，那就谁也阻止不了我，反而他们都会来帮我，——有这种意识，也就够了。我甚至不会去报复任何人。我始终感到奇怪，詹姆斯·罗特希尔德居然会答应接受男爵这个封号②！既然他没有这个封号就已经高出于一切世人，那又干吗要这封号？要它何用？“啊，假如让那个蛮横的将军跟我同时在驿站上等候换马，他要欺负我就随他欺负好了，因为一旦他知道了我是谁，他准会亲自跑来给我套好马，再跳过来把我扶进那辆简陋的马车里！据报纸报道，在维也纳的某个火车站上，就有一名外国伯爵或男爵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一位当地的银行家穿鞋，而那位银行家居然不动声色地接受了。③啊，假如让那个令人生畏的美女（真的令人生畏，

① 引自普希金的《吝啬骑士》（1830）中男爵的一句独白。
② 詹姆斯·罗特希尔德于 1822 年获男爵封号。
③ 俄国政论家弗·彼·梅谢尔斯基（1839—1914）在一篇特写中，说自己目睹近似的情况。——俄编注

这样的美女是有的!)——就是那位雍容华贵的贵夫人的女儿,——在轮船上或别的什么地方跟我邂逅,她会翘起鼻子,对我侧目而视,带着一副夷然不屑的神情暗暗纳闷:瞧这么个卑微、难看的小人物,怎么敢跑进头等舱来跟她并排而坐,而且若无其事地捧着本书或者报纸?由她去吧,我不在乎。因为一旦她知道身旁坐的是谁(她会知道的,一定会知道的),她就会主动靠到我身边,显得温顺、胆怯而亲热。她会盼望我的一瞥,见到我微笑就欢喜不已……”我故意插叙我早年的这些幻想情景,是为了更鲜明地表述我的想法,但这些情景很苍白,也许还平淡无奇。只有现实才能证明我想法正确。

有人会说这样过日子很愚蠢:干吗不买幢大宅,广迎宾客?干吗不召集社会贤达,呼风唤雨?干吗不结婚娶妻?可是这样一来,罗特希尔德会变成什么呢?他会变得跟大家一样。而“我的思想”的全部魅力,它的全部精神力量,也就会消失殆尽。我还在儿时就背熟了普希金笔下那位“吝啬骑士”的独白,就思想而言,比这句独白更高明的话,普希金再也没有写出过!我到现在还坚持这种想法。

“可是您的理想太卑劣了,”有人会不屑地说,“金钱,财富!怎能跟造福于社会、跟慈善业绩相比?”

然而我会如何使用我的财富,这一点旁人哪能知晓?这几百万钱财从众多贪婪、肮脏的坏人手里,汇集到我这个清醒而刚毅、洞明世事的苦行者手里,这有什么不道德、有什么卑劣可言呢?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关于未来的幻想、这些猜测——所有这一切,现在还只像一部虚构的小说,也许我没有必要记录下来:最好还是让它们留在脑瓜儿里。我还知道,也许谁也不会读到这些文字,即使有人读到了,那他会不会相信,我或许也会承受不住罗特希尔德的几百万钱财呢?倒不是说我会拜

倒在这些钱财的脚下，而是指另一意义上的，完全相反意义上的承受不住。在我的种种幻想里，我已经不止一次捕捉到未来的这样一幕：我的意识已经使我十分满足，但实力似乎还远远不够。于是——不是出于无聊、不是出于无端的烦恼，而是因为我无限制地追求更大的实力，——我会把我的几百万钱财统统交给他人，就让一群人去瓜分我的全部财富吧，而我——我又重新混迹于渺小的人物之中！说不定甚至会变成那个死在轮船上的乞丐，区别只在于我的破衣裳里找不到缝着的钱。我手里曾有过几百万，是我把它白白扔掉了，——单单这个意识，就会如乌鸦一般供养我在荒漠里过活。① 我至今还乐于这样想。是的，我的“思想”是一座城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随时可以躲进城堡里避开一切人，哪怕沦为一个死在轮船上的乞丐。这就是我的史诗！你们应该知道，我需要的恰恰是我的完整的邪道的意志——仅仅为了向我自己证明，我有力量放弃这种意志。

毫无疑问，有人会反驳说，这只是诗般的幻想，如果我有几百万在手，是绝不会白白扔掉的，也绝不会沦为萨拉托夫市的那个乞丐。也许我真的不会白白扔掉，我只是描述了我最高的理想境界而已。但我还是要郑重地补充说，要是我积攒的财富达到了罗特希尔德拥有的数目，最后我真的会把这些财富献给社会（不过在达到罗特希尔德的数目以前，我很难这么办）。我不会献出一半，因为这样做只能显出平庸：我不过穷了一半，如此而已。我恰恰会全部献出去，一个子儿也不剩，因为一旦沦为乞丐，我就会比罗特希尔德富有一倍！要是有人不明

① 典出《旧约全书·列王纪上》（第 17 章，第 5 节）：时逢多年大旱之际，先知以利亚奉耶和华之命住在约旦河边，有乌鸦每天叼给他饼和肉。

白这个道理，那不能怪我，我决不会再做解释！

“这是苦行主义，是出于渺小和无能的幻想！”有人会断言说，“这是才华匮乏和中庸之道的胜利。”是的，我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才华匮乏和中庸之道的胜利，但未必是软弱无能的胜利。我极喜欢想象有这么一个人，他恰恰是无能和平庸之辈，他面对世人含笑说：你们是伽利略和哥白尼，查理大帝①和拿破仑，你们是普希金和莎士比亚，你们是元帅和宫廷事务大臣，而我则是庸才和私生子，但我毕竟还是胜似你们，因为你们是自愿地对此屈服。我承认，我把这种幻想推到了极致，甚至抹杀了教养的作用。当时我觉得，要是一个人没有教养、甚至品行卑劣，事情才更妙呢。这种夸张过火的幻想当时甚至影响了我在中学七年级的成绩，我不再学习了，正是因为我狂热地相信：没有学识仿佛能使理想平添光彩。现在我已改变了这一信念，因为学识并无碍于理想。

先生们，难道独立思考，哪怕一丁点儿的独立思考精神，对你们都有如难堪的重负吗？谁要是有美好的理想，即使是错误的理想，谁就幸福！但我深信自己的理想正确。我只是表述得不怎么好，太笨拙，太幼稚。当然，十年之后我会表述得好一些。但我将把这种表述保存下来，留作纪念。

四

我的“思想”写完了。如果写得平庸和浅薄，那么错在

---

① 查理大帝（742—814），768 年起为法兰克国王，800 年起为加洛林王朝皇帝。

我，而不在“思想”。我已经提醒过，最简单的思想最难以理解，现在再补充一点：也最难以表述，何况我还要把“思想”描述成早先原有的样子呢。对于思想来说，还有一条相反的规律：平庸的思想，仓促形成的思想会被理解得异常快，一定会被芸芸众生、一定会被整个市俗阶层所理解，不仅如此，还会被看做是最伟大、最天才的思想，——不过也只是在思想出现的当天而已。便宜货不耐用。很快被人理解的东西只能表明它平庸。俾斯麦的思想[①] 眨眼间成了天才思想，而俾斯麦本人也摇身一变成了天才，可是这么快的速度恰恰值得怀疑：我不妨等俾斯麦十年，到时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思想还剩下什么，或许连这位首相大人自己还会剩下什么。我在这里插进这么一大段毫不相干的题外话，当然不是为了做两种思想的比较，而同样是为了留作纪念（纪念我如何为太粗心的读者做解释）。

现在我要讲两件荒唐事，以此彻底结束有关“思想”的表述，免得它再来打乱我的记叙。

夏天的7月里，距我来彼得堡之前两个月，当时我已经完全无拘无束了，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请我到三一镇去跑一趟，找某个迁居那儿的老处女办点儿事——这件事太没意思，不值得细说。就在当天回来的途中，我在车厢里看到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衣着不坏，但不整洁，晒黑的脸上长了许多粉刺，总之，是个有点儿邋遢的黑发小伙子。他很引人注目，因为每到一个大站或者小站，他都一定下车去喝伏特加。快到终点站的时候，他身边居然聚集了一帮子快活的伙伴，不过，全是些

① 俾斯麦（1815—1898），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1862年9月当上了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以实现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为己任，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口号：“解决伟大的时代问题，不是靠言辞，不是靠表决的多数，而是靠铁和血。”

乌七八糟的人。其中有个也喝得微醉的商人，特别赞赏年轻人连续喝酒而不醉的本事。还有一个小伙子对他也很有好感，此人极笨，喋喋不休，德国人打扮，身上有股子难闻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是个听差。他甚至跟那个酗酒的年轻人打得火热，火车每到一站，他就邀请年轻人："现在该喝酒去啦。"——于是双双勾肩搭背地下了车。酗酒的年轻人几乎没有说上一句话，但坐到他身边来的谈伴却愈来愈多，他只是听着，不断地嘻嘻笑着，直笑得口水四溅，而且还时不时——但总是出人意外地——发出一种像"哎——唷——唷！"之类的声音，这时他还会莫名其妙地用拇指按住鼻子，显得十分滑稽。这可把商人、听差和大伙儿全给逗乐了，于是大家放肆地高声大笑。有时人们在笑什么是弄不清楚的。我也走了过去，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对这个年轻人似乎也产生了好感，也许是因为他公然打破了死板的常规礼节吧，——总之，我不认为他是个傻瓜。不管怎么说，我跟他马上热乎得以你相称了，下车的时候我听他说，晚上八点多他会去特维尔林阴道。原来他以前还是个大学生呢。我也去了林阴道，瞧，他教会了我怎么恶作剧：我们俩在林阴道上兜来转去，等到天色稍黑，我们就去瞄上一位过路的正派女人，但这时附近周围必须没有旁人，于是我们立刻缠住她同行。[①]我们并不跟她说一句话，他走在她这边，我走在她那边，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根本没有瞧见她似的，我们俩就开始了极不体面的对话。我们不加掩饰地说着下流话，而且说得心安理得，好像应该如此似的，在

① 在《俄罗斯世界》（1874 年 7 月 12 日）曾发表过类似这个插曲的一则札记。其作者说自己前天傍晚在彼得堡目睹一个醉汉在恶作剧，这醉汉据说是一个大学生。——俄编注

讲起各种丑闻和桃色事件时，我们大肆渲染那些具体细节，连最淫荡的色鬼靠最下流的想象也诌不出来。（当然，所有这些知识我还在学校里，甚至进中学之前就了解了，只不过是听来的，没有亲身体验。）那女人害怕极了，加快脚步想脱身，但我们也加快了脚步，一边继续我们的恶作剧。不用说，受害人无计可施，她即使叫喊也没用，因为没有目击者，再说要去控告吧，这会显得有点儿怪。我们这样寻开心持续了八天，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喜欢上这种把戏，也说不上喜欢，就是这么干了。起初我只是有种新奇感，似乎超越了陈腐的常规，何况我对女人本来就有反感。有一回我告诉那个大学生，让·雅克·卢梭在他那本《忏悔录》里就承认过，说他年轻时喜欢偷偷躲在角落里，露出身体上通常遮盖的部分，就以这副模样等着过路的女人。[①] 大学生发出“哎——唷——唷”的声音算是回答。我发现他极端无知，感兴趣的东西少得出奇。我本来指望他有深藏不露的思想，但什么也没有。我找不到他有任何独特之处，有的只是令人压抑的单调。我愈来愈不喜欢他了。最后的结局完全出人意料：有一回，天已经完全转黑，我们在林阴道上缠住了一个怯生生匆匆走路的姑娘。她非常年轻，也许只有十六岁，甚至更小，穿得十分整洁朴素，说不定还靠自己的劳动谋生，这会儿正下班回家，而家里的老母亲是个拖儿带女的可怜寡妇。不过，又何必对她心慈手软呢。有那么一阵子，那丫头听见我们说下流话，脚步愈走愈快，低着头，蒙着面纱，害怕得瑟瑟发抖，但突然间她站定了，撩开面纱，露出一张长得挺不差的（据我现在的记忆）、但瘦瘦削削的脸，她目光炯炯地冲我们喊：

① 卢梭讲述的这种情形，见其《忏悔录》，第 1 部，第 3 章。

“嗬，你们真下流！”

我猜想她也许会哭，可事情正好相反：只见她细瘦的手臂一扬，就扇了大学生一记耳光，扇得那么干脆利落，就那么啪的一声！他骂着想扑过去，但被我拦住了，那丫头也就趁机逃走。剩下的我们俩立即吵了起来：我把这段时间郁积在心头的不满全都说了出来，我对他说，他不过是个可怜的笨蛋、庸人，头脑空空地压根儿没有半点思想。他大骂我……（有一回我跟他说过我是私生子的事，）于是我们吵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当天晚上我很懊丧，第二天好了一点儿，到第三天时我就把这事全忘了。好吧，就算我后来有时会想起这个丫头，但也只是偶尔想起，一闪即逝。只是在我来到彼得堡之后，过了两个星期，我才突然回忆起那件事的整个场景——回忆得清清楚楚，于是我顿时觉得羞愧难当，确实羞得眼泪直淌。我不安了整整一个晚上，整整一夜，直到现在我还有点儿惴惴不安。起初我弄不明白，当时我怎么会堕落到如此无耻下流的地步，特别是会把这件事忘掉，既不觉得羞愧，也不感到后悔。现在我才明白根子在哪里：应该归咎于“思想”。简短地说，我直接得出一个结论：你的头脑里一旦占满了某种静止的、永恒的强烈“思想”，你就仿佛远离了整个人世，隐居在荒漠里，这时外部发生的一切都会变得无关紧要，从这主要的思想旁边匆匆而过。甚至留下的印象也是不正确的。此外，关键是你始终有了借口。这段时间里不管我如何折磨我母亲，如何可耻地冷落我妹妹，我似乎总会这样开脱自己：“唉，我有‘思想’，这些全是小节。”当我自己受到了侮辱，深深的侮辱，我会在忍辱离开之后，突然开解自己：“唉，我是卑贱，但我毕竟有‘思想’，而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思想”能使我忘掉我的受辱和卑贱，但它似乎也能掩盖我的一切丑行，可以

说，它既淡化了一切，又模糊了我眼前的一切，但是对事物的理解如此分不清是非，当然，这甚至会有损于“思想”本身，更不要说其他了。

现在讲另一件荒唐事。

去年4月1日，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过命名日。晚上来了几位客人，不很多。突然阿格拉费娜气喘吁吁地走进来说，厨房前边的过道里有个弃婴在啼哭，她不知该怎么办。这消息使大家激动起来，大家走出去，看见了一只柳条筐，筐里有个生下才三四周的女孩儿在哇哇地哭。我把筐子端进厨房里，马上就发现了一张叠好的字条：“亲爱的恩人们，请你们发发慈悲，帮帮这个受过洗礼的女孩儿阿林娜吧，我们俩永远会用泪水祈求上帝赐福给你们，祝您命名日快乐。两个你们不认识的人。”我一向十分尊敬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可这一回他却令我大为痛心：他露出一种十分严肃的表情，决定将女孩儿立刻送到育婴堂去。我感到很悲哀。他们的日子过得挺俭朴，可是没有儿女，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却总是喜爱这样的生活。我小心翼翼地把阿里诺奇卡[①] 从柳条筐里抱出来，托着她两个小胳肢窝稍稍举起，筐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酸味，那是吃奶的孩子久不洗澡后常有的气味。我跟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争吵了一番之后，就突然向他宣布，我决定自己出钱收养这个女孩儿。别看他平时挺温和，这时却有点儿严厉地驳斥我，尽管最后他以说笑收场，但送育婴堂的主意却绝不放弃。不过事情还是照我的意思办了：我们同一个院子里，不过在另一间侧屋里，住着个很穷的木匠，已经上了年纪，而且爱喝酒，可他的妻子却一点儿也不老，非常健康，她刚刚死了一个吃奶的婴儿，而且还是她结

① 阿林娜的爱称。

婚八年不育后生下的唯一孩子，也是个女孩儿，真是奇怪的巧合，也叫阿里诺奇卡。我说这是巧合，因为当我们在厨房里争吵的时候，这个女人听到了发生的事，便跑过来想瞧瞧，等知道这女孩儿也叫阿里诺奇卡时，她就起了怜悯之心。她还有奶水，于是解开胸前的衣襟，搂起孩子喂奶。我相中了她，请求她把孩子抱回家去照料，我会按月付钱给她。她担心丈夫不同意，可还是把孩子抱回去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她丈夫表态同意，开价每月八个卢布，我当场就把第一个月的钱预付给他，但这笔钱马上给他喝酒喝光了。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微笑着答应替我向木匠作保（那笑容依然显得怪怪的），每月八卢布将由我如数付给，决不拖欠。为了让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放心，我打算把我的六十卢布交给他托管，可是他不收，其实他知道了我有钱，也就相信了我。他这么一客气，我们之间那场短暂的争吵也就抹平了。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什么也没说，只是奇怪我干吗要操这份心。我特别珍重他们夫妇俩能礼貌待人，他们不允许自己有一点儿笑话我的表示，相反地开始以应有的严肃态度看待这件事了。我每天往达里娅·罗季沃诺芙娜那儿跑，一天跑三趟。一个礼拜后，我背着她丈夫直接送给她三个卢布。我还另外花了三卢布添置了小被子和婴儿包布。但是十天过后，里诺奇卡[1] 突然病了。我立即请来一位医生，他开了张什么处方，我们便用他这种歪药去折磨小生命，整整忙了一夜，可次日医生却说，我们请他请迟了，面对我的请求（其实似乎更像责怪），他体面地推脱说："我不是上帝。"小女孩儿的唇舌和整个口腔都蒙上一层白色的小斑疹，傍晚她便死了，瞪着一双黑色的小眼睛盯住我，仿佛她已经懂得是怎么回事

① 即阿里诺奇卡。

了。我至今不明白，当时我怎么会想不到给她、给这个死孩子照张相。也许人们难以相信，当天晚上我不是伤心流泪，而简直是号啕大哭了一场，早先我是从来不允许自己这样的。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不得不来劝慰我，无论是她还是她丈夫，依然没有一点儿笑话我的表示。那个木匠做了口小棺材，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给棺材镶上褶边，还放进一个漂亮的小枕头，而我买了些鲜花，撒满婴孩的身上：就这样送走了我这棵可怜的小草，信不信由你，我至今还无法忘掉她。然而过了些时日，这件几乎是意外发生的事却迫使我思考了许多。当然，里诺奇卡没有花掉我很多钱：棺材、埋葬、请医生、买鲜花、再加上付给达里娅·罗季沃诺芙娜的钱——总共才三十卢布。在我动身去彼得堡的时候，韦尔西洛夫寄给我四十卢布做路费，我又在临行前卖掉了一点儿东西，这样，我就把这笔钱给补上了，因此我的全部“资本”依然原封不动。“可是，”我暗自思忖，“要是我今后再这么偏离自己的路，我必定会走得不远。”从大学生那件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思想”能把人迷得模糊是非，能引导人超越日常的现实。从里诺奇卡那件事却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任何“思想”都不能把人（至少把我）迷失到这样的地步，使我面对某种令我压抑的事件而不肯毅然偏离自己的路，不肯为之一下子放弃我花了多年心血为“思想”所做的一切。两个结论同样都对。

第六章

一

事情并非完全如愿，我碰到的不光是母亲和妹妹两人：虽然韦尔西洛夫不在家，但母亲的身边坐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她毕竟是个外人。我那种出于宽容的好心情顿时消失了一半。说来也怪，碰到类似的场合我的心境怎么会瞬息万变：掺一粒沙子或伤一根毫发，就足以冲散我的好心情，代之以坏心情。遗憾的是，留给我的坏印象却不会很快被冲散，虽说我并不记仇。我一进门就依稀觉得，母亲立即中断了跟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谈话的话题，而本来她似乎谈得挺起劲。妹妹下班回家只比我先到一步，还没有从她的斗室里出来。

这套寓所有三个房间。中央一间是大家通常待着的地方，或称客厅，是我们家挺大的一个房间，布置得还算体面。里面毕竟有几张柔软的红色长沙发，不过已经磨破了好几处（韦尔西洛夫不喜欢用沙发套），地上铺上了几块地毯，还有几张桌子和没用的茶几。客厅右边是韦尔西洛夫的房间，又小又窄，

只有一扇窗。房里摆着一张破旧书桌，桌上胡乱堆放着一些不用的书和纸，书桌前那张软圈椅同样破旧，而且弹簧已断，有个尖角朝上突起，往往会顶得韦尔西洛夫哼哼叫疼，咒骂不已。这间书房里还摆着一张柔软的、同样磨破了的长沙发，上面铺有被褥供他睡觉。他厌恶自己的这间书房，看来他在里边什么事也不干，宁肯整小时整小时地闲坐在客厅里。客厅左边有一个似乎同样的小房间，母亲和妹妹就睡在里边。客厅的入口连着过道，过道的尽头通向厨房，厨娘卢克里娅住在里面，当她烧菜的时候，整个寓所便强烈地散发着烤焦了的油烟气味。就因为这厨房的油烟，韦尔西洛夫有时会大声诅咒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单就这事来说，我完全同情他，因为我也讨厌这种气味，虽说气味熏不到我：我住在上边，紧挨房顶的敞亮斗室里，上那儿得爬一架极陡的、嘎嘎作响的梯子。我那儿只有几样东西值得一提，那就是半圆形的窗户、极低的天花板、一张漆布面的长沙发（入夜，卢克里娅就在上面给我铺上被褥、放上枕头），其他的家具只有两件：一张极简易的木板桌和一把有窟窿的藤靠椅。

话又说回来，我们家毕竟还保留了一点儿昔日舒适生活的残迹，比方说，客厅里就有一盏很不差的瓷灯，墙上挂着一幅杰出的大版画——德累斯顿的圣母像①，而在正对的那一面墙上则挂着珍贵的巨幅照片——照的是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青铜铸

① 此处指拉斐尔（1483—1520）所作的《西斯廷圣母》（1515—1519），藏于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名画之一，他在德累斯顿时曾再三去观赏。——俄编注

造的大门①。就在这客厅的一个角落里，还挂着一个大神龛，里面有几帧祖传的古老圣像，其中有一帧（唯一的一帧）饰有镀金的宽大银袍，——正是母亲打算去典当的那一帧，另一帧（圣母像）饰有镶珍珠的天鹅绒长袍。圣像前吊着一盏每逢节日点燃的长明灯。就圣像的意义而言，韦尔西洛夫显然对它们很淡漠，只是有时因为长明灯照在镀金长袍上的反光，他会皱起眉头，显然有克制地稍稍抱怨几句，说这会损害他的视力，不过他并不阻止母亲点灯。

我通常进屋时总是一声不吭，脸色阴沉，眼睛望着某个角落，有时连招呼也不打。而且到家的时间总比这次要早，由她们把饭端到阁楼上。这次我一进屋就突然说了句："您好，妈妈。"这是我早先从来不曾有过的举动，虽说由于不好意思，这回我还是没法正眼望着她。我在客厅的对面靠墙坐下，感觉很累，但并不在意。

"你们这个愣头青还跟过去一样，进门没规没矩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数落我说。她先前对我也是骂骂咧咧的，这在我和她之间已经成了习惯。

"您好……"母亲答道。因为我向她问好，她似乎一下子感到不知所措了。

"饭菜早弄好了，"她补充说，几乎挺局促不安。"但愿汤还没有凉，肉饼我这就吩咐……"她急急地站起来想去厨房。整整一个月来，也许我头一回突然感到了羞愧，因为她总是那么匆匆忙忙地跳起来为我操劳，而且在今天以前我还要求她快

①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佛罗伦萨的圣玛丽亚大教堂等赞赏不已，还对专供婴儿举行洗礼的巴蒂斯托小教堂的几扇青铜铸成的门也很赞叹，并说希望买一套这些铜门的照片，大小与真门一样，准备挂在书房里。——俄编注

一点儿。

“多谢您，妈妈，我已经吃过了。要是不妨碍的话，我想在这儿歇一下。”

“嗳……没什么……怎么会妨碍呢，您坐吧……”

“您别担心，妈妈，我再也不会顶撞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了。”我坚定地一口气说了出来……

“哎呀，我的老天，他可真是大量！”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嚷道，“亲爱的索尼娅[①]，难道你还继续用您称呼他吗？他算是什么人值得这样尊称他？再说你还是他亲妈呢！瞧瞧，你在他面前那副局促不安的样子，真是丢人！”

“要是您，妈妈，用你来称呼我，我心里会很高兴的。”

“嗳……也好，我会这样称呼的，”母亲急急地说，“我……我也并不总是……好吧，打今儿起我知道了。”

她整个脸都涨红了。她的脸有时确实非常动人……脸相忠厚，但没有憨气，稍显苍白，少了点儿血色。双颊很是瘦削，甚至微微凹陷，前额开始出现了几道很深的皱纹，但眼角处还没有鱼尾纹。一对真诚的大眼睛总是闪着宁静而平和的光彩，我从第一天起就被她这种光彩所吸引。我也喜欢她脸上丝毫没有忧伤和受压抑的神情，恰恰相反，要是她不那么时常担心的话，她脸上的神情甚至是快乐的。其实她有时完全是白担心：为了一件根本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恐惧地听到了别人讲起陌生的话题，有时她会吓得从座位上跳起来，直到她相信一切照旧，一切很好，这才放下心来。对她来说，“一切照旧”就意味着一切很好。但愿不要有什么变化，但愿不要出什么新鲜事，哪怕是好事！……可以想见，她在童年时一定受过什么惊

---

① 索菲娅的爱称。

吓。除了她的眼睛，我还喜欢她那张鹅蛋的脸型，要是颧骨再稍微窄一点儿的话，不要说年轻时，即使现在她也称得上是个大美人。她现在还不到三十九岁，可是深褐色的头发里已经明显露出了银丝。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非常气愤地瞧了她一眼。

“跟这么个胖小子讲客气！还居然在他面前发抖！你真可笑，索菲娅，你让我生气，真是的！”

“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干吗现在您还这么对他呢！或许，您是在开玩笑吧，是不?”母亲添上了后一句，因为她发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脸上似乎含着微笑。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骂人有时确实不能当真，不过她的微笑（如果真是微笑的话）当然针对的仅是我母亲，因为她非常喜欢我母亲的善良，而且毫无疑问她已经察觉，此刻我母亲看到我温顺的态度心里有多高兴。

“偏偏在我进门说了句‘您好，妈妈’的时候，——而早先我是从不这样做的，偏偏在这种时候，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却跳出来骂人，我当然不会不感悟到您的意思呢。”我终于认为有必要回敬她。

“真是想不到，”她立刻光火起来，“他居然把这也算作功劳？你一辈子就这么礼貌了一回，莫非还要人家向你下跪不成？再说这算什么礼貌！进门时你眼睛干吗尽望着角落？敢情我不知道你怎样对她大发脾气吗！你也可以向我问声好哇，我给你裹过婴儿包，是你的教母呢。”

当然，我不屑回答。这当儿妹妹刚好从房里出来，我赶紧掉转脸去跟她说话：

“丽莎，我今天见到瓦辛了，他问起过你。你认识他?”

“是的，去年在卢加认识的。”她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在我

身边坐下，亲切地望着我。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只要我对她一讲起瓦辛，她总会飞红了脸。妹妹是个金发女子，一头浅色的金发根本不像母亲，也不像父亲，但眼睛、鹅蛋脸却几乎跟母亲一模一样。鼻子笔挺，小巧而端正，不过还有个特点：脸上有细小的雀斑，这是母亲完全没有的。她跟韦尔西洛夫的相似之处很少，大概只有纤细的身材、高挑的个子和优雅的步态。她跟我一点儿也不相像，简直是两个相反的极端。

“我认识他们[①] 有三个月了。”丽莎补了一句。

“你怎么称瓦辛为他们呢，丽莎？应该称他，而不是他们。请原谅我这么纠正你，妹妹，可我感到痛心，看来对你的教育完全给忽视了。”

“你居然当着母亲的面说这种话，真是不知羞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气红了脸，“你这是胡说，根本没有忽视。”

“我绝对不是指我母亲，”我急忙辩解道，“听我说，妈妈，我一向把丽莎看做是第二个您，您使她品德和性格方面变得跟您一样美好，想必您年轻时自己就是这样的，而且直到现在您也是这样，永远会这样……我刚才说的只是外表的风度，跟人交际时的那些愚蠢的、但又必要的讲究。我气愤，仅仅是因为如果韦尔西洛夫听见你把瓦辛称作他们，而不称他，韦尔西洛夫是绝对不会来纠正你的，因为他总是那么傲慢和冷漠地对待我们。就是这一点让我气愤！”

“自个儿粗笨得像头熊，倒来教人家什么风度。先生，以后不准在母亲面前叫‘韦尔西洛夫’，当着我的面也不准，我

① 俄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旧时对某一个人使用复数是表示下层人物对上层人物的尊敬。此处的“他们”，实指瓦辛一人，故下文阿尔卡季才说到教育问题。

受不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眼里凶光毕露。

“妈妈，我今天领到薪水了，五十卢布，喏，请您收下!”

我走过去递钱给她，她马上惊慌起来。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收这笔钱!”她说，似乎很怕碰到钱。

我不明白怎么回事。

“别那么说，妈妈。如果你们俩把我当自家人，当做儿子和哥哥，那么……”

“唉，我对不起你，阿尔卡季。有件事我本该向你承认的，但是我很怕你……”

这话她说得怯生生的，还挂着讨好的笑容。我又不明白了，便打断她说：

“顺便提一下，妈妈，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跟索科利斯基家的那场官司，今天已经开庭判决了，您知道吗?”

“啊，知道!”她叫了一声，吓得双手紧握在胸前（这是她受惊的姿势)。

“今天判决?”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全身一震，“这绝不可能，他会事先说的。他跟你说了吗?”她转脸问母亲。

“唉，没有，他没有说是今天。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提心吊胆的。哪怕官司打输了，我也会祷告上帝，但求没有心理负担，一切照旧。”

“妈妈，他居然连您也没告诉!”我惊叫了起来，“他就是这么个人物！瞧，这就是他冷漠和傲慢的证据，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到底是怎么判的，判了什么？谁告诉你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连连逼问我，“你倒是说呀!”

“听，他本人回来了！也许他会说的。”我听见过道里传来

他的脚步声，便通知大家说，自己则尽快在丽莎身边坐下。

“哥，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让妈妈为难，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容让一点儿……”

“我会的，我会的，我就是为此而回来的。”我握了握她的手。丽莎十分怀疑地瞧了我一眼。她怀疑得对。

二

他扬扬得意地走了进来，得意得甚至认为无须隐瞒自己的心情。总的说来，他最近已经惯于在我们面前毫不拘礼，不仅暴露自己坏的一面，甚至还暴露可笑的一面，这正是人人都忌讳的事，而且他也完全意识到，我们能看透他的一切。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说法，最近一年他在衣着方面跌了份儿：虽说总是穿得体面，但衣服已旧，不再讲究。此话不假，他宁愿两天不换衬衣，这甚至让母亲十分难过，因为妻子们认为这是一种牺牲，而在那群忠心相随的女人眼中，这简直就是舍己为人的壮举了。至于帽子，他总是戴那种黑色的宽边软帽。当他在门口摘掉帽子时，他那浓密却明显花白的头发便整绺地在头上竖了起来。我很爱看他脱帽后露出的头发。

“你们好，大家都在这儿，连他也来啦？我在过道里听见他声音了，好像是在骂我吧？”

他开始挖苦我，这是他心情好的一个标志。我当然不予回答。卢克里娅捧着一大纸包买来的东西走进来，放到桌上。

“胜诉啦，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地方法院判我胜诉，至于上诉，公爵家当然不敢。这场官司我打赢啦！我马上借到了

一千卢布。索菲娅，你把活儿放下，别费眼力了。丽莎，下班啦？”

“是的，爸爸，”丽莎答道，一副亲热的样子。她管他叫爸爸，我可说什么也不想这么叫。

“累了吧？”

“累了。”

“你把活儿辞掉，明天别去了，彻底不干了。”

“爸爸，这样我会觉得更糟的。”

“我求求你啦……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最不喜欢女人家干活。”

“不干活怎么办？居然叫女人不干活！……”

“我知道，我知道，这话说得好，说得对，而且我预先表示赞同，但我主要是指缝纫活。请您想想，这似乎是我童年时留下的印象，一种病态的，或者最好说是错误的印象。从我五六岁时留下的那些模糊记忆中，现在我最常想起的是（当然，想起来就厌恶）：一群聪明的女人围在圆桌旁，摆出一副严肃而冷峻的样子，仿佛在开会选举教皇似的，而桌上放着剪刀、衣料、纸样和时装图片。她们高谈阔论，煞有介事地徐徐摇头，又是量又是算的，准备裁剪。这些平时十分宠我的可人儿，突然变得不可接近了，只要我一淘气，就会有人马上把我拉走。即使拉我的是那可怜的保姆，她也会一手抓住我，不理睬我的喊叫和耍赖，反而瞅着我，就像在听极乐鸟唱歌似的。正是这些聪明女人的严肃神情、裁剪开始前的那种煞有介事，——甚至现在我想起来也会莫名其妙地难受。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可是很喜欢裁剪的啊！不管我的看法有多少贵族习气，但我还是更喜欢完全不干活的女人。你别把我的话扯到自己身上，索菲娅……哪能扯到你呢！即使不干活，女人就

已经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了。这一点其实你也知道，索尼娅。您有什么看法，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肯定会反对吧？”

“不，一点儿也不，”我答道，“女人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这话说得特别好。虽说我不明白，您干吗把这跟活儿联系在一起。没钱的时候不能不干活，这一点您自己也知道。”

“可现在有足够的钱了，”他转过脸去对妈妈说。她顿时满脸喜色（当他转脸对我说话时，她便全身哆嗦）。“至少开头这段时间别让我看见缝纫活，我替自己求你们啦。你作为一名当代青年，阿尔卡季，肯定有点儿社会主义思想，那你信不信，我的朋友，恰恰是一直劳动着的平民最喜欢闲散！”

“也许是喜欢休息，而不是闲散。”

“不，正是闲散，一点儿事也不干，这是他们的理想！我认识一个一贯劳动的人，虽说不是平民出身。这人的文化修养相当高，有概括能力。他那一辈子，说不定天天都在深切而感动地幻想过完全闲散的生活，可以说，他把这理想推到了极致——幻想获得绝对的自主，永远能自由自在地、闲散地静观默想。就这样，直到他积劳成疾，无法医治地死在医院里。有时我真想认真地断定，所谓劳动愉快，是那些闲散的人、当然也是有美德的人空想出来的。这是上世纪末的‘日内瓦思想’之一①。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前天我从报上剪下了一则广告，就是这一则（他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小片纸来），——这只是多如牛毛的‘大学生’中的一个，他们懂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精通数学，愿意出远门、住阁楼、去任何地方。您听听：‘某女教师愿为各类学校（听见没有，各类学校）的投考者补

① 这儿指的思想来自让-雅克·卢梭（1712—1788）的社会政治和道德观点。卢梭出生于日内瓦。

习，并能教算术课。'[1]——总共才一行字，但非常精彩！既然能给投考学校者补习，那么，当然不也就表明能教算术课吗？可是不，她要把算术课突出出来。这——这纯粹是出于饥饿，是因为穷到了极点。这里令人感动的恰恰是这种笨拙：显然，她根本没想过要当教师，而且也未必有能力教什么课。可是哪怕要投河自尽，也先得把最后一个卢布拿去登报，说她愿为各类学校的投考者补习，此外，她还能教算术课。Per tutto mondo e in altri siti.[2]"

"唉，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应该帮帮她！她住在哪儿？"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大声嚷道。

"嗳，这样的人多得很呢！"他把纸片塞进口袋里，"这个纸包里全是些糖果之类的小礼品——有你的一份，丽莎，也有您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索菲娅和我都不爱吃甜食。年轻人，看来也有你一份呢。这全是我亲自去叶利谢耶夫的商店和巴列的商店[3]买来的。照卢克里娅的说法，大家'挨饿'挨得太久了（请注意：我们家从来没有人挨过饿）。这儿有葡萄、糖果、鸭梨和草莓馅饼，我甚至买了些上等的果子酒，还有榛子。说来有趣，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从小到现在都爱嗑榛子，您该知道，是那种最普通的榛子。丽莎像我，她也喜欢像松鼠似的喀吧喀吧地嗑榛子。但是在我回忆童年的时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有时偶尔会闪现出自己在林子里、在灌

---

① 这种文理不通的广告在当时的报纸，特别是《呼声报》上登得很多。此处也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呼声报》1874 年第 270 期上刊出的下列一则广告的模拟："本人愿为军事学校和军事教育学校的投考者补习，并能教数学课。"——俄编注

② 意大利文：不管在任何国家和任何地区。

③ 叶利谢耶夫和巴列分别是当时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两家大食品店的老板。——俄编注

木丛中亲手摘榛子的情景，这是最令我神往的了……已是临近秋天的日子，但天气晴朗，有时空气那么清新，你躲在草木丛中，不知不觉走进林子，一股树叶的清香扑鼻而来……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发觉您的眼神似乎在表示有同感？”

“我儿时的头几年也是在乡下度过的。”

“是吗？可你好像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初他住在莫斯科安德罗尼科夫家的时候，您去过那儿，可是在这之前，他住在您已故的姑姑瓦尔瓦拉·斯捷潘诺芙娜那儿，是在乡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接过话茬儿说。

“索菲娅，这些钱你拿着，把它收好。他们答应过几天再给五千。”

“就是说，公爵家毫无希望啦？”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问。

“一点儿希望也没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我始终支持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支持你们全家，而且我是你们家的朋友，可是，虽说公爵家和我毫无关系，但我真的觉得他们挺可怜。您别生气，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我不打算把遗产分给他们，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您当然明白我的意思，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要是一开头您就提出跟他们对半分，那他们就会中止起诉了，当然，现在说这事已经晚了。不过，我不敢评论……我只是想，死者在遗嘱里肯定不会把他们漏掉的。”

“假如他会办事，知道该怎样写遗嘱的话，那就不仅不会漏掉他们，大概还会把全部遗产都留给他们，只把我一个人漏掉呢。可是现在法律在我这边，一切已成定局。我不能分，也不想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事情到此为止。”

他说这话的时候甚至恶狠狠的，他很少这样。塔季扬娜·

帕夫洛芙娜不做声了。母亲有点儿忧伤地垂下了眼睛：韦尔西洛夫知道，她赞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意见。

“他忘不了在埃姆斯挨的那记耳光！”我暗自想道。克拉夫特带给我的那封信就在我的口袋里，这信如果落到他的手里，就会受到可悲的对待。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还在拖累着我，这个想法，由于其他种种因素的介入，当然就把我惹火了。

“阿尔卡季，我希望你穿得更好一点儿，我的朋友。你现在穿得不坏，但是为今后着想，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高明的法国裁缝，这人做事绝对认真，很有审美力。”

“请您别再向我提这类建议。”我突然吼了起来。

“怎么啦？”

“我当然不认为这是在贬低我，可是对这种事我们根本不会看法一致，恰恰相反，甚至会截然不同，因为过几天，也许明天，我就不再去公爵家了，我不认为那儿有任何差事……”

“可你去那儿，陪他一块儿坐坐，——这就是差事！”

“这样想就是在贬低我。”

“我不明白，不过既然你这么爱面子，那你就别要他的钱，只是去走动走动。要不你会让他很伤心的：你该相信，他已经离不开你了……不过，随你的便……”

显然，他很不高兴。

“您说别去要钱，可是承蒙您的关照，我今天就干了件丑事：您没有事先交代我，结果我今天就向他索取了一个月的薪水。”

“你已经自己做了这样的安排，可我，老实说，原以为你不会去要钱的。不过，你们这些人现在也真够精明的！如今没有年轻人啦，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他恨得要命，我也气得要死。

“我本该跟您算算账……是您逼我这么干的，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算。”

“对啦，索菲[1]，你马上把阿尔卡季的六十卢布还给他，你呢，我的朋友，别因为我急于清账而生气。瞧你的脸色我就猜到，你头脑里在酝酿干什么事业，你需要……一笔流动资金……或者类似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的脸色表明什么，可我万万没想到妈妈会把钱的事告诉您，可当初我那么求她来着。”我目光如电地瞧了母亲一眼。我无法表达自己有多委屈。

“阿尔卡沙[2]，亲爱的，看在上帝的分上，原谅我吧，我无论如何不能不告诉……”

“我的朋友，你别抱怨她向我泄露了你的秘密，”他转脸对我说，“何况她是出于好意，只不过是当娘的想夸耀一下儿子对她的孝心而已。但是请你相信，即使她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你有钱。你所有的秘密都写在你那张诚实的脸上呢。他有‘自己的思想’，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对您说过这话。”

“别提我那张诚实的脸，”我继续吼道，“我知道，尽管您在别的事情上鼠目寸光，但也往往能看透事物，您这种洞察力让我吃惊过。不错，我有‘自己的思想’。您这么措词当然只是一种巧合，可我不怕承认：我有‘思想’。我不怕，也不害臊。”

“关键是：别害臊。”

“可我还是决不会告诉您。”

“就是说，你是不屑告诉我啦。我的朋友，你不必告诉我，

---

① 即索菲娅。
② 阿尔卡季的爱称。

我也知道你思想的实质，至少是这样：

我要躲进荒漠……①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的意思是：他想……成为罗特希尔德，或者罗特希尔德之类的人物，然后躲起来自我陶醉。当然，他会慷慨地给家人和您一笔赡养费，我呢，也许他不会给，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再也见不着他了。他在我们这儿宛如一钩新月：刚露面，就不见了。"

我的心里猝然一震。当然，这一切全是巧合：尽管他提到了罗特希尔德，但他什么也不知道，说的根本不是那回事，可是他怎么能如此确切地判定我的心思，知道我要跟他们断绝关系、远远地躲起来呢？他预先就猜到了一切，于是预先想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玷污事情的悲剧性。他很恼火，这是毫无疑问的。

"妈妈！请原谅我发了脾气，再说即使我不发脾气，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能看出我在发脾气呢。"我佯笑起来，竭力想用玩笑把话题哪怕暂时打断一下。

"你笑了，我亲爱的，这是最好的事。一个人用笑，即使用表面上的笑所占的便宜之多，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我完全是认真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他总是摆出一副样子，似乎他心里装着一件什么大事，弄得连他自己也羞羞答答的。"

"我认真地请您说话庄重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说得对，我的朋友，可是这次应该把话挑明，免得以后再提。你从莫斯科来到我们这儿，是想立即大闹一场，据我们

① 这是俄国一首流行歌曲的开头。

目前所知，这就是你此行的目的。至于你来这儿还想用什么事叫我们大吃一惊，这一点当然我现在不提。接着整整一个月以来，你在这儿老是对我们要态度，可是你看来是个聪明人，既然聪明就犯不着要态度，这种事应该让给那些不满于自己卑微、又想不出别的出气办法的人去干。你总是在掩饰自己，不过你那诚实的面容和红润的脸颊却足以证明，你最好还是完全坦诚地面对大家的好。他犯了疑心病，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弄不懂，如今他们这些人为什么都会犯疑心病？”

“既然您连我在哪儿长大都不知道，那您怎么能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疑心病？”

“唔，我明白啦：你生气，原来是因为我居然忘了你在哪儿长大！”

“根本不是，您别以为我会这么蠢。妈妈，刚刚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因为我笑了就夸我，那就让我们笑吧——何必这么干坐着！要不要我来给你们讲些我本人的笑话？何况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对我的不平凡经历还一无所知呢。”

我怒火中烧。我知道，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只要我一跨出这个家门，以后我再也不会跨进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离家出走的前夕，我才忍无可忍。是他自己把我逼到了这种结局。

“讲笑话当然挺好，只是希望能真的逗人发笑，”他目光锐利地盯住我说，“我的朋友，你在你长大的地方变得有点儿粗野了，不过你还是相当懂礼貌的。他今天挺可爱，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而您总算把纸包打开了，做得好。”

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却眉头紧皱，甚至听到了他的话也不回过头去，只管继续解包，把礼品分放在端来的盘子里。母亲也十分困惑地坐在那儿，当然她心里明白并预感到，我们

之间情况不妙。妹妹再一次碰了碰我的臂肘。

三

“我只是想给你们大家讲一讲，”我态度十分放肆地开口说，“有一位父亲跟自己可爱的儿子第一次是怎样见面的，这件事恰恰发生在‘你长大的地方’……”

“我的朋友，可这事不会……很乏味吗？你该知道：tous les genres...[①]”

“别皱眉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讲这件事的目的，根本不是您以为的那种。我确实是想逗大家发笑。”

“愿上帝听见你这话，我亲爱的。我知道你爱我们大家，而且……你不想搅乱我们的家庭晚会。”他嘟嘟囔囔地说，显得有点儿不自然，而且另有所思。

“您当然是根据我的脸色猜出我爱你们的吧？”

“对，多少是根据脸色。”

“那好，而我根据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脸色，早就猜出她深深爱着我呢。别这么凶巴巴地瞪我，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最好还是笑笑！最好笑笑！”

她突然朝我迅速转过身来，目光锐利地盯了我半分钟。

“你当心点儿！”她举起一个指头吓唬我，但神情那么严肃，根本不可能是指我刚才开的愚蠢玩笑，而是对另一件事的

① 法文：“一切风俗画……”。这句话没有说完，全句应该是：“一切风俗画都是好的，除了乏味的之外。”它是法国伏尔泰(1694—1778)的喜剧《浪子》(1738)序言中的一句话，后来成为名言。

警告：你想开始干?!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跟您生平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莫非您真的不记得?”

“上帝作证，忘了，我的朋友，我感到由衷的抱歉。我只记得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是在一个什么地方……”

“可您呢，妈妈? 您记不记得去过我生长的乡下，大概在我六岁或七岁之前，关键是，您是不是在什么时候真真实实地去过那个乡下，要不，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您，——这仅仅是我做梦般的幻觉? 这事我早就想问您了，可总是一拖再拖，现在是时候了。”

“怎么会是幻觉呢，阿尔卡申卡[1]，当然不是！对，我在瓦尔瓦拉·斯捷潘诺芙娜那儿做过三次客，第一次去的时候你才一岁，第二次你三岁多，后来的那一次你刚满六岁。”

“这就对了，整整一个月以来，我就想问您这件事。”

回忆如潮水一般迅速涌上母亲的心头，她突然飞红了脸，动情地问我：

“阿尔卡申卡，敢情你在那儿就记住了我的模样?”

“我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知道，只有您脸上的某种神情却终生留在我的心里，此外还留下了一种感知：您是我母亲。现在回想起来，这乡下的一切就像朦胧的梦境，我甚至连自己的保姆也忘了。那位瓦尔瓦拉·斯捷潘诺芙娜我倒还记得一点点，这仅仅是因为她老患牙痛，腮帮上总是绑着纱布。我还记得屋旁的几棵大树，好像是椴树，有时在敞开的窗户上闪耀着强烈阳光，种着鲜花的房前花圃，还有一条小径，至于您，妈妈，我记得清楚的只是在一瞬之间，就是有一次在当地

① 阿尔卡季的爱称。

教堂里给我行圣餐礼时，您把我举起来受圣餐、吻圣杯的那个瞬间，这是在夏天，有一只鸽子在教堂圆顶下横穿飞过，从一个窗户飞进来，从另一个窗户飞出去……”

“天哪！当时的情形真是这样，”母亲双手一拍说，“连那只鸽子我也记得清清楚楚。快要吻圣杯的时候你还哆嗦了一下，嘴里直嚷嚷：‘小鸽子，小鸽子！’”

“您的脸，就是说，您脸上的某种神情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所以五年之后，在莫斯科，我一下子就认出了您，虽然当时并没有人告诉我说您是我母亲。我跟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第一次见面之后，就被人从安德罗尼科夫家带走了，而在这以前，我一连五年在他们家里平静而快乐地度日子。他们那套公家的住宅我记得十分清晰，还记得所有那些太太和姑娘，她们现在想必都已老了吧。我记得他们全家人，安德罗尼科夫本人，记得他经常亲自从城里带回来一包包各种各样的食品，鸡鸭啦，熏鲈鱼啦，烤乳猪啦，在饭桌上他主动代替那位老爱摆架子的太太舀汤分给我们，这件事常常引得我们全桌人发笑，而第一个笑的就是他。在那儿，小姐们教我学法语，可我最喜欢的是克雷洛夫[①] 的寓言，我背熟了许多篇，不管安德罗尼科夫有空没空，我每天都径直走进他的小书房，朗诵一篇寓言给他听。对啦，就是因为背寓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才认识了您……我看得出，您开始有点儿记起来了。”

“有一点是记起来了，我亲爱的，就是当时你给我讲过什么……好像是一个寓言，或者是《智慧的痛苦》里的一个片断？你的记性真好，了不得！”

“记性！那还用说！我有生以来就记住了这件事。”

① 伊·安·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寓言作家。

“好，好，我亲爱的，你简直让我兴奋起来了。”

他甚至还微微笑了一下，紧接着母亲和妹妹也开始露出了笑容。坦诚的气氛在渐渐恢复，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桌上分放好礼品之后，却坐到了屋角里，继续用令人难堪的目光审视我。

“事情是这样的，”我继续说，“有那么一个早晨，我童年时的朋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来找我，在我的生活中她总是出人意料突然而至，就像舞台上似的，于是我被一辆轿式马车载到了一幢贵族宅邸，——非常豪华的寓所。您当时住在法纳里奥托娃那儿，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住在她那幢空宅里，这宅子是她早先从您手里买下的，而她自己那时正侨居国外。我平时总是穿短外套，这一回却突然给我穿上了蓝色常礼服，配上考究的衬衣。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为我张罗了整整一天，给我买了许多东西，而我则在所有的空房间里走进走出，见到镜子就照照自己。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我就这样在寓所里溜达，突然——完全是无意的——走进了您的书房。我在头一天刚被送来的时候就见过您，但只是在楼梯上匆匆一瞥。当时您正下楼，打算乘马车去什么地方：那会儿您是单身来莫斯科的，您几乎很少在家。当您碰见我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时，您只慢声慢气地‘啊’了一声，连脚步也没停一下。”

“他特别怀恋这事呢。”韦尔西洛夫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说。她掉转脸去没有答理。

“当时您那副健壮、英俊的模样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可是在这九年之中，您却惊人地变老、变难看了，请原谅我说得这么坦率。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那时候您也已经三十七岁了，可我当时望着您简直出了神：您的头发非常好看，几乎是乌黑的，闪着光泽，见不到一丝儿白发，小胡子和连鬓胡就像精致

的装饰——我不能做别样的形容。您的脸呈雾白色，不是现在这样的虚弱苍白，而是像您女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现在那种样子，——前不久我有幸见过她。您一双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牙齿白得发亮，特别在您笑的时候。那天我走进书房，您把我上下打量一番时，就是这么笑的，当时我识别能力还不强，见到您笑心里就乐滋滋的。那天早晨您穿一件深蓝色的丝绒上衣，系着紫红色的领结，漂亮的衬衫上镶有阿朗松花边[①]，您一手拿着个本子站在镜子前，正有腔有调地练习恰茨基[②] 的最后那段独白，特别是最后的一声喊叫：

马车，给我备马车！"

"啊，我的天哪！"韦尔西洛夫叫了起来，"他说的是真的！虽然当时我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很短，但由于日列伊科病了，我就接替他，在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的家庭演出中扮演恰茨基！"

"敢情您已经忘啦？"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笑了起来。

"是他让我记起来的！说实话，当初在莫斯科的这几天，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会儿我们大家还那么年轻……大家那么热情地期望着……那会儿我在莫斯科意外地遇见了那么多……不过，你接着讲吧，我亲爱的：这一次你做得很好，用各种细节让我记起来了……"

"我站在那儿望着您，突然嚷了一句：'啊，念得多好，真

① 阿朗松是法国的一个城市。此处是指法国路易十四时财政大臣柯尔培尔（1619—1683）在该城创办的著名花边厂所生产的花边。——俄编注

② 格里鲍耶陀夫的剧作《智慧的痛苦》里的主人公。

正的恰茨基！’您猛地转过身来，问我：‘难道你已经知道恰茨基啦？’问完，您就自个儿坐到长沙发上，兴致勃勃地喝起咖啡来，——当时我真想热烈地吻您。于是我就告诉您说，安德罗尼科夫家里每个人都读过好多书，小姐们能背诵许多诗篇，至于《智慧的痛苦》里的几场戏，她们还经常互相练对白呢，就在上一个星期，每天晚上大家都聚在一起朗读《猎人笔记》①，而我最喜爱克雷洛夫的寓言，而且能背得出来。于是您就叫我背点儿给您听听，我背了一篇《好挑剔的闺女》：

有个闺女想找个郎君，”

“对呀，对呀，现在我全记起来了，”韦尔西洛夫又叫喊起来，“而且，我的朋友，我连你也清楚地记起来了：当时你是个多么可爱的孩子，甚至是个机灵的孩子，我敢担保，这九年之中你也今不如昔啦。”听了这话，所有的人，包括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内，都大笑起来。显然，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是因为我刚才讥嘲他变老了，所以才以牙还牙地用玩笑来“回敬”我。大家都乐开了，他这话说得确实妙。

“我背诵的时候，您一直脸带微笑，可我还没有背到一半您就叫我打住，您摇了摇铃，吩咐进来的用人去请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她风风火火地跑来了，那副高兴的样子几乎让我认不出她了，——虽说头天晚上我还见过她。当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面，我又从头开始背《闺女》，而且非常出色地背完了，连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露出了笑容，而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甚至大声叫‘好！’还热情地指出，要是我

①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的作品。

能背《蜻蜓与蚂蚁》[1]，这还不算稀奇，因为一个头脑清楚的孩子，像我这个年纪，当然能背内容清楚的寓言，可是这篇寓言却不同：

> 有个闺女想找个郎君，
> 这可算不上罪过……

‘您听听，他是怎么念的：“这可算不上罪过”！’——您当时这么说。总之，您是赞叹不已。接着您突然跟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讲起法语来了，她顿时双眉紧皱，开始反驳您，甚至显得很激愤，但是，只要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想干什么，别人是无法违抗他的，于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便急急把我带到自己房里：在那儿她又重新给我洗脸，洗手，更换衬衣，在我头发上抹香油，甚至还替我卷发。之后，到了傍晚，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自己也打扮得相当华贵（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她带我坐上一辆轿式马车出门。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上戏院，观看维托夫托娃家的票友演出。无数的蜡烛，华丽的枝形吊灯，到处是贵妇人、军人、将军和名媛淑女，巨大的幕布、一排排椅子——我还从来没见过类似这样的场面。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后排占了个极不起眼的位子，让我在她身边坐下。剧场里当然也有像我那样的小孩，但我已经顾不上东张西望，只是屏息凝神地等待开演。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当您出场的时候，我开心极了，开心得流泪了，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自己至今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开心得流泪？这一点，在后来的整整九年中，我一想起就觉得奇怪！我屏息凝神

---

① 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

地注意剧情的发展，当然，在这出喜剧中我只看懂她对他变了心，而那些抵不上他一个脚指头的蠢人们却嘲笑他。当他在舞会上独白的时候，我明白他是受了侮辱和欺凌，他是在谴责所有那些卑鄙小人，可我明白，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当然，我在安德罗尼科夫家见过对白练习，这有助于我理解这些，但帮我理解的，——还有您的演技呢，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这出戏的舞台演出！终场的时候恰茨基喊叫：‘马车，给我备马车！’（您这声喊叫太精彩了），我从椅子上直蹦起来，随着全场掌声雷动，我拼命鼓掌，使劲喝彩：‘好！’我清楚地记得，就在这一刹那，好像有根什么针在我背后，在‘齐腰的下部’扎了一下，这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狠狠地拧我，但我根本不理睬！不用说，《智慧的痛苦》一演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就立刻把我带回家：‘小孩子不能留下来跳舞，就因为你，我自己也不能留下啦。’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一路上在马车里就这么抱怨我。当天夜里我尽说梦话，第二天十点钟我就已经站在书房门口了，但书房门虚掩着：您有客，您跟他们在洽谈事务。后来您又突然乘车出去了整整一天，到深夜才回来，就这样，我连您本人的面也见不到！当时我究竟想跟您说些什么，现在当然忘了，即使在那时候我也不清楚，我只是热切地想见到您，尽快地见到您。可是第三天一清早，八点刚过，您就动身到谢尔普霍夫市去了。当时您刚刚卖掉了在图拉的庄园，用来清偿债务，但您手头还剩下一大笔让您动心的款子，所以您当时才光临莫斯科，而在此前您是不敢去那儿的，因为害怕债主。在所有的债主中间，唯独住在谢尔普霍夫的那位态度粗暴，不答应您用折半偿还的办法了却债务。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对我提出的种种问题甚至避而不答：‘这不关你的事，后天我就送你去寄宿学校，你准备一下，带

上你的笔记本，书要理好，你要学会自己收拾箱子，先生，您总不能长成个大懒虫吧。’您一会儿要我这样，一会儿要我那样，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这三天里您剋我剋个没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事情的结局竟是这样：您把我这个热爱您的天真孩子送进了图沙尔寄宿学校，尽管我跟您的那次见面也许只是毫无意义的巧遇，可您信不信，即使过了半年之后，我还想从图沙尔那儿逃出去找您呢！”

“你讲得很好，让我栩栩如生地记起了一切，”韦尔西洛夫慢条斯理地说，“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你的故事里充满了某些古怪的细节，比方说，关于我债务的事。且不说这些细节讲得有失体面，我只是不明白，你到底怎么弄来的这些细节？”

“细节？怎么弄来的？我可以再三声明，整整这九年中我就只做了一件事：搜集有关您的细节。”

“这样坦率真是罕见，这样消磨光阴也真罕见！”

他侧过身，斜靠在圈椅里，甚至还微微打了个呵欠，——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

“怎么说，要不要我继续讲下去，讲我怎样从图沙尔那儿逃出去找您？”

“不许他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制止他，把他撵出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斩钉截铁地说。

“不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韦尔西洛夫威严地回答她，“阿尔卡季显然有什么打算，所以一定得让他讲完。就随他讲去！等他讲完了，包袱也就卸了，对他来说，主要就是要卸掉包袱。我亲爱的，开始讲你的新故事吧，我只是指新的，你放心，我知道它的结局。”

四

“我打算逃跑，就是说我想跑去找您，原因很简单。您还记不记得，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就在我进校之后过了两星期左右，图沙尔给您写过一封信，——不记得啦？而这封信后来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给我看过，她也是在已故安德罗尼科夫的文件中发现的。图沙尔突然意识到自己收钱收少了，所以他在信里‘理直气壮’地向您声称：到他学校里接受教育的全是公爵和参政员的子弟，因此他认为，收留像我这种出身的学生是降低了学校的声誉，除非给他增付学费。”

“Mon cher，你本可以……”

“哦，没关系，没关系，”我打断他说，“关于图沙尔我只想稍稍说几句而已。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两周之后您从县里给他回了一封信，断然拒绝了。我记得他当时走进教室时气得满脸通红。他是个很矮壮的法国佬，四十五岁左右，确实是巴黎人，当然，是鞋匠出身，但很早以前就在莫斯科当上了一名编内的法语教员，甚至还有文职人员的官衔，这一点他非常自豪，其实此人很没有教养。他总共只有我们六名学生，其中确有一名是莫斯科某参政员的侄儿。我们大家住在他那儿，完完全全像是他的家庭成员，多半由他夫人照管。他夫人是俄国某个文官的女儿，是个喜欢装模作样的太太。我在这两周里对同学们大摆架子，夸耀我的蓝色礼服和我的好爸爸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至于他们问我为什么姓多尔戈鲁基而不姓韦尔西洛夫，我根本不觉得羞辱，这仅仅是因为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原因。”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几乎用威胁的语气喊道。母亲则正好相反，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显然希望我讲下去。

"Ce[1] 图沙尔……现在我确实记起来了，他那么矮小，好动，"韦尔西洛夫漫不经心地说，"可当时人家向我推荐他时，说他为人极好……"

"Ce 图沙尔手里拿着信进来，走到我们那张橡木大桌跟前，当时我们六个学生正围着桌子在背书，他紧紧抓住我的肩膀，把我从椅子上拎起来，命令我带走我的练习本。'你的位子不在这儿，而在那里。'他指着前室左边的一间斗室对我说，斗室里有一张简易的桌子、一把藤椅和一张漆布面的长沙发，跟我现在住的阁楼一模一样。我就搬了过去，心里觉得奇怪，又很害怕，因为还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粗暴。半小时以后图沙尔走出了教室，我就开始跑过去跟同学们互使眼色、相对而笑，当然，他们是在讥笑我，但我没有察觉到，以为我们发笑是因为我们开心。这时偏偏图沙尔闯了进来，他揪住我一把头发就往外拖。'你没有资格跟贵族子弟坐在一起，你出身卑贱，说到底只是个奴才!'他在我红润的胖脸上狠狠揍了一下，揍得我好痛。他顿时揍得兴起，接着就揍第二下，第三下。我号啕大哭，实在感到莫名其妙。我坐了足足一个小时，双手捂住脸哭个不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什么也弄不明白。我不明白，像图沙尔这样的外国人并不是恶人，甚至还为俄国农奴获得解放而欢欣鼓舞过，他怎么会揍一个像我这样的傻孩子呢。不过，我只感到莫名其妙，而不觉得受了侮辱，当时我还不懂得是受侮辱。我想我准是干了什么淘气事，只要我改正就

---

① 法文：这个。

会饶恕我，大家又会开开心心去院子里玩耍，过上最好不过的日子。”

“我的朋友，要是我当初知道这样的话……”韦尔西洛夫慢声慢气地说，脸色有点儿困倦，挂着不经意的笑容。“这个图沙尔真是个坏蛋！不过我还是心存希望，希望你不管怎样能尽力克制自己，最终能原谅我们这一切，我们又能过上最好不过的日子。”

他干脆打了个哈欠。

“可我并不是在责怪你们，根本不是，请相信我，我也不埋怨图沙尔！”我叫了起来，有点儿被他懵住了。“再说，他揍我也不过两个来月吧。我记得，我总想用什么方法去平息他的怒气，扑过去吻他的双手，不停地吻，不停地哭。同学们都嘲笑我，瞧不起我，因为图沙尔开始有时把我当仆人使唤，碰到他穿衣，就命令我给他递衣服。这时我的奴性就潜意识地对我有了用处：我千方百计地讨好他，没有丝毫屈辱感，因为我还一点儿也不懂得这些，直到现在我还感到奇怪，当时我竟会这么笨，居然不明白我跟他们的地位是多么不平等。的确，当时同学们已经使我明白了不少事情，这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后来图沙尔不大揍我的脸了，他更喜欢用膝盖在背后顶撞我，半年以后他甚至有时对我和气点儿了，只是偶尔地，每月一次，非得揍我一顿，为了提醒我别忘乎所以。不久，他也就让我跟同学们坐在一起了，准许我跟他们一块儿玩耍。但在整整两年半之中，图沙尔从未忘记过我跟他们社会地位不同，虽然不太经常，但依然时而把我当仆人使唤，我想，这正是为了提醒我吧。

“我逃跑，就是说，我试图逃跑，这已经是头两个月之后又过了五个月的事。一般来说，我这辈子总是不能爽快地拿定

主意。当我躺到床上蒙在被窝里的时候，我就马上会思念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只思念您一个人，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甚至还会梦见您。尤其是，我老是狂热地幻想您会突然走进来，我扑进您的怀抱，您就带我离开这个地方，带进自己的家，带进那间书房，我们又上戏院去看戏，如此等等，最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再分开。——这是最重要的！可是每当我早晨不得不醒来，男孩子们又一起开始嘲笑我，瞧不起我，其中有一个竟然开始揍我，逼我给他拿靴子，他特别起劲地要我明白自己的出身，供大家取乐，所以用最不堪入耳的称呼辱骂我。等到图沙尔本人终于出场的时候，我心里冒出了某种忍无可忍的感觉。我意识到，我在他们这儿是永远得不到宽恕的，——哦，我已经开始渐渐明白了，他们不能宽恕我的什么，我究竟错在哪里！我终于决定逃跑。这件事我已经反复思量了整整两个月，总算下定了决心，当时是9月份。我等到星期六同学们全都回家去度假的时候，就偷偷地把最必需的用品小心地打了个包袱，身上揣着两个卢布的钱，打算等到天黑再走。‘到时候我就下楼，’我思忖着，‘溜出去，然后走掉。’往哪儿走呢？我知道安德罗尼科夫已经调到彼得堡去了，于是我决定去阿尔巴特街找法纳里奥托娃的宅子。‘今夜我随便找一个地方走一宿或者坐一宿，挨到早晨再去那宅子的院落里向人详细打听：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现在在哪儿？假如不在莫斯科，那么在什么城市或什么国家？人家一定会告诉我的。于是我就离开，再到另一个什么地方去问另一个人：假如要去某某城市，该从哪个城门出去？于是我就出了城门，不停地走哇走哇。我将一直坚持步行，在灌木丛旁边找个地方宿夜，只吃面包充饥，而两个卢布用来买面包，是足够我支撑许多日子的。可是，星期六我怎么也没能跑掉，只好等到第二天——星期

天。事有凑巧，星期天图沙尔带着妻子出门去什么地方，整座房子里只剩下了我和阿加菲娅。我苦苦地等待天黑，记得那时我坐在客厅的窗前，愁闷地望着尘土飞扬的街道、那些木结构的小房子和稀稀落落的行人。图沙尔住的地方很偏僻，透过窗子可以望见城门：莫非就该从那儿出城？——我恍恍惚惚地想。夕阳通红，天空冷冰冰的，风跟今天一样凛冽，刮得沙尘滚滚。终于，天完全黑了，我站到圣像前面开始祈祷，只是祷词念得急急匆匆，我心里着慌。我抓起包袱，蹑手蹑脚走下吱吱嘎嘎的楼梯，非常害怕厨房里的阿加菲娅听见我的声音。门锁着，我刚刚把它打开，突然间，眼前出现黑糊糊的一片，漆黑的夜无边无际，仿佛隐藏着无数未知的凶险，一阵风扑来，甚至吹落了我的制帽。我想跨出门去，这时从人行道那边传来了一个过路醉汉的高声叫骂，我站在门口张望了一会儿，便悄悄回到楼上，悄悄脱掉外衣，放好包袱，脸朝下，趴在床上，没有眼泪也没有杂念。正是从那一刻起，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才开始明白了事理！我意识到自己除了是个奴才以外，同时还是个胆小鬼，正是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地、正确地开始走向成熟！”

“也是从那一刻起，我看透了你！”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猛地从座位上蹦跳起来，这来得那么突然，我丝毫没有准备。“你不但当时是个奴才，现在也是个奴才，你是奴才的胚子！当初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要是送你去学鞋匠，这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是这样，他倒对你做了件好事呢，至少你能学会门手艺！难道有谁会替你向他提出更多的请求或者要求吗？你的父亲，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不只是请求，几乎是要求过，千万不要让你们，让他的子女脱离下等阶层。安德烈·彼得罗维

奇栽培你到大学，你靠了他获得了种种权利[1] ——不，你不珍惜这些。你们听听，几个小男孩儿招惹他啦，所以他发誓要报复全人类……你是个十足的无赖！”

说真的，这一番粗暴的话把我惊呆了。我站起来瞧着她，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说了一番我闻所未闻的话，”我终于把脸转向韦尔西洛夫，坚定地说，“不错，我是这样的一个奴才，我怎么也不能仅仅满足于韦尔西洛夫不送我去学鞋匠，连‘种种权利’也不能让我动心，我要说，把整个韦尔西洛夫给我，把父亲给我……这就是我当初的要求——怎么不是个奴才呢？妈妈，有件事在我心头已经八年了，那次您只身一人到图沙尔来看我，我当时怎样接待的您，可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些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不会让我讲的。那就等到明天吧，也许我跟您还会见面。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给说说，假如我怎么也不能容忍一个人撇开活着的妻子另外再娶，我还是一个十足的奴才吗？而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埃姆斯差点儿就这么干！妈妈，要是您不愿跟一个随时都会另娶女人的丈夫过下去，那么请您记住，您有一个儿子，他答应永远做个孝顺儿子，您要记住，到时我们一块儿走，但只有一个条件：‘要么跟他，要么跟我，’——您愿不愿意？我不要求您马上答复：我知道这种问题不可能马上答复……”

可是我无法把话讲完，首要的原因是我太激动、心慌意乱了。母亲脸色刷白，仿佛失了嗓音：一句话也讲不出。塔季扬

---

① 这儿指普通中学的毕业生有权进入综合性大学（非普通中学的毕业生没有这一权利）及其他所有的高校，此外还有权优先进入一级国家生产企业，任职一定的期限。

娜·帕夫洛芙娜扯大嗓门唠唠叨叨说了些什么，我甚至没法听清，她还两次用拳头捶我肩膀。我只记得她大声叫嚷，我说的话是“胡说，出于小人之心，挖空心思在编造”。韦尔西洛夫一动不动地坐着，神情十分严肃，没有一丝笑容。我朝自己的阁楼走去。最后目送我出房间的，是妹妹投来的责备的目光：她在背后对我严厉地摇头。

第七章

一

我毫不顾惜自己，把这些场面全写了出来，是想清楚地记起一切，恢复早先的印象。当我走进自己的阁楼后，我根本不知道我该感到羞愧呢，还是该像完成自己义务似的感到得意。要是我稍微有点儿经验的话，我就会悟出在这种事情上只要稍有疑惑，就应该朝坏的一方面去想。然而我却被另一种情况弄得晕头转向：我不明白自己高兴什么，尽管我心存疑惑，而且明确意识到自己在楼下出了丑，但我还是异常高兴。就连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么恶骂我，我也只觉得滑稽可笑，根本没有触怒我。十之八九这都是因为我总算斩断了枷锁，第一次感到自己自由了的缘故。

我也意识到我搞糟了自己的处境：现在我如何处置那封有关遗产的信，也就更加无所适从了。如今人家肯定会认为我是想报复韦尔西洛夫。可是还在楼下唇枪舌剑的时候，我就决定将这封涉及遗产案的信件交付第三者仲裁，交由瓦辛决定，如

果找瓦辛办不成，就另请别人，我已经知道该去请什么人了。总有一天我会为这事到瓦辛家跑一趟，但只去这么一次，然后——然后就长期躲起来谁也不见，几个月不露面，尤其不跟瓦辛见面，也许只偶尔去见见母亲和妹妹。当时我的思绪乱糟糟的，我觉得自己干了一件什么事，但又干得不太对头，而且——而且还很得意：我再说一遍，我仍然由于某种原因而感到高兴。

我本打算早点儿睡觉，因为我预料到明天将步行走很多路。除了租房和搬家之外，我还有一些明天无论怎样都要完成的打算。可是这天晚上不出怪事就没法结束，韦尔西洛夫居然做了件让我大为惊愕的事。他压根儿没有来过我的阁楼上，而这一回当我在小屋里还没待上一小时，就突然听见他爬楼梯的脚步声，还叫我给他照亮。我拿着蜡烛走过去，朝下面伸出一只手，待他抓住后就拉他上了阁楼。

“Merci，朋友，我还一次也没有爬上来过，甚至租房子的时候也没上来过。当初我就料到阁楼不怎么样，可还是想不到竟然如此糟糕，”他站到我那斗室的中间，好奇地四下打量。“简直像口棺材，十足的棺材！”

确实，待在这儿有点儿像待在棺材里，我甚至很惊讶，他竟一语道破。斗室又窄又长。墙壁和斜顶的交角处不比我肩膀高，屋顶的最高一头我也能用手掌触到。起初韦尔西洛夫不得不弓着背，担心头碰着了天花板，可他没碰着，最后才放心大胆地坐到我那张长沙发上，那上面已经铺好了我的被褥。至于我，却没有坐下，只是十分惊愕地望着他。

“你母亲说，刚才你想付她一个月的膳食费，她不知道该不该收你这笔钱。这会儿见了这么一口棺材，不但不该收你钱，相反，我们该倒贴给你才对！我可从没有来过这儿……我

不能想象这地方可以住人。”

“我住惯了。在楼下发生了那种事之后，您还上这儿来找我，这倒让我说什么也习惯不了了。”

“是啊，你刚才在楼下相当粗鲁，不过……我上这儿来是别有用意，我会向你解释的，虽说我来看看你其实也挺平常，甚至楼下发生的事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可是看在基督的分上，请你坦率地告诉我：你刚才在楼下所讲的那番话，你那么一本正经地让我们做好了准备才开始讲的那番话，难道这就是你打算公开或者告知的一切吗？你再没有别的什么话了吗？”

“没有了，就是说，不妨认为没有了。”

“少了点儿什么吧，我的朋友。老实说我从你的开场白，从你引我们发笑这件事来判断，总之，我看到了你那副一吐才快的样子，我曾预料你还会说更多的话。”

“对您来说还不都一样？”

“说真的，我只是出于分寸感才这么说的：你讲的那么点儿事不值得大吵大闹，这就有失分寸。你沉默了整整一个月，你在做准备，可是一开口——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本来有好多话想说，但就连已经说的那点儿话我都感到害臊。不是什么事都可以用语言说清的，有些事最好永远不说。其实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只不过您不明白而已。”

“哈！连你有时也会为无法说清思想而痛苦！我的朋友，只有杰出的人才会体会到这种不平凡的痛苦，傻瓜们总是对自己的话感到满意，而且总是说得言过其实，他们喜欢把话说个够。”

“比方说，就像我刚才在楼下那样吧。我也说得言过其实：我要‘整个韦尔西洛夫’——这太言过其实了，我根本不需要韦尔西洛夫。”

“我的朋友，我看得出，你是想弥补你在楼下的失算。显然，你后悔了，对我们来说，后悔就意味着马上又要攻击别人，所以这回你一心想击倒我。我来早了，而你还没有冷静下来，再说你又受不了批评。可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坐下吧，我来是因为有话跟你说。谢谢，你坐下了，很好。听了你在楼下临走时跟母亲说的那番话，事情已十分清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还是分道扬镳为好。我来这儿，是想劝你把这事做得尽量温和些，别闹事，不要给你母亲增添伤心和惊吓。就连我亲自上这儿来一趟，也已经使她感到兴奋：她有点儿相信我们还能言归于好，相信一切还会照旧。我想，要是现在我们俩在这儿稍为大声地笑上一两回，准会让她们那两颗胆怯的心感到高兴。就算她们心地单纯，但是却充满了真挚而朴实的爱，只要有可能，为什么不让她们高兴高兴？这是其一。其次，我们分手时干吗贪图报复，咬牙切齿，彼此诅咒呢？毫无疑问，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搂着脖子，热烈拥抱，但是，这样说吧，我们也可以互相敬重，好说好散，是不是，啊？”

“这一切都是废话！我答应搬走时不闹事——这就够了。您这是在替母亲操心吗？可我倒觉得，您根本不在乎母亲是否安宁，您不过是这样说说罢了。”

“你不相信吗？”

“您跟我说话简直就像对小孩子似的！”

“我的朋友，为此我准备千百次地求你原谅，还包括你数落我的种种不是，你童年时过的那些日子等等等等，可是，cher enfant，这会有什么结果呢？你那么聪明，你不想让自己落到如此愚蠢的境地吧。何况我至今还不很明白你那些责备的实质：说实在的，你究竟责备我什么呢？是因为你生下来没有姓韦尔西洛夫？或者不是这原因？哦！你在轻蔑地笑，你在摇

头，看来不是这原因啦？”

“请相信我，不是这原因。请相信我，我不认为姓韦尔西洛夫就那么荣幸。”

“荣幸不荣幸我们且不谈，再说你的回答肯定会符合民主意识。不过，既然是这样，那你到底责备我什么呢？”

“刚才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都说了，说我本该懂得、可是在她开导之前却不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您没把我送去学鞋匠，所以我该感恩。可是我直到现在，经过人家开导之后，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不知感恩。难道是您高傲的血统在起作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

“想必不是。而且你该承认，你在楼下说的那番粗鲁的话，本意是想攻击我，结果只让你母亲一个人受尽痛苦和折磨。其实，似乎也轮不到你去责难她。她到底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啦？顺便也请你向我解释解释，我的朋友：你无论在寄宿学校还是在中学里，在你的整个生活中，我听说，你见人就宣扬自己是个私生子，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何居心？我听说，你还特别乐于这样做呢。可这一切全是胡扯，是卑鄙的诬蔑：你是合法婚姻所生，姓多尔戈鲁基，你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的儿子，他是一个可尊敬的人，才智出众，性格刚强。如果你受到了高等教育的话，那确实是全仗你以前的主人韦尔西洛夫的栽培，但这件事又能说明什么呢？更主要的是，你宣扬自己是私生子，这本身就是在诬蔑，你以此揭露了你母亲的隐私，你出于某种虚伪的傲慢，把自己的母亲拖到了任人笑骂的境地。我的朋友，这样做很不正派，更何况你母亲本人是无辜的：她心地很纯洁，如果说她不姓韦尔西洛夫，那仅仅是因为她丈夫至今还活着的缘故。”

“够了，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十分相信您有头脑，所以

我很希望您停止对我过多的训斥。您那么喜爱分寸，而且干什么都讲究分寸，甚至包括您对我母亲突然发生的爱。我们最好这么办：既然您下了决心到我这儿来，坐上刻把钟或者半小时（我还是不知道您来干什么，好吧，就算是为了安安母亲的心吧），此外，尽管发生了楼下那种事，您还有如此雅兴跟我说话，那您最好还是跟我讲讲我的父亲——就是讲讲那位朝圣者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我正是想听听你对他的了解：我早就想问您了。既然我们要分手，而且可能是长期分手，所以还有一个问题我很想得到您的答复：在这整整二十年里，难道您就不能影响我母亲（现在甚至包括我妹妹）的那种陈腐观念，不能用您文明的影响去消除她由环境造成的蒙昧吗？哦，我不是指她的纯洁！即使她没有得到启蒙，在道德上也总是远远高出于您，请原谅我这么说，然而……她不过是一个道德无限高尚、却毫无生气的人。只有韦尔西洛夫一个人在生气勃勃地活着，而他周围的其他人，所有跟他相关的人，全都在半死不活地过日子，他们顺从一个必须的前提：有幸用自己的精力和心血去供养他。可是从前她不也是生气勃勃的吗？您不是也爱上了她身上的某种朝气吗？从前她不也是个活生生的女人吗？”

“我的朋友，如果你同意的话，也可以说她从来不是，”他回答我说，立刻摆出一副早先对待我的神态。这种神态我永世难忘，而且使我大为光火，那就是：表面看去，他很真诚和朴实，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心底里深深藏着的却只是嘲笑，所以我有时说什么也辨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她从来不是！俄国女人——从来不是真正的女人。”

“那么波兰女人，法国女人就是真正的女人啦？要不，意大利女人，热情似火的意大利女人？她们才能迷住像韦尔西洛夫那样文明的高等俄国人？”

“嘿，真想不到我会碰上一个斯拉夫派[①]!”韦尔西洛夫放声大笑说。

他下面讲的那番话，至今我还字字记得，他甚至津津乐道起来，显得十分得意。但我却十分清楚，他上这儿来根本不是为了清谈，也根本不是为了安慰母亲的心，他一定另有意图。

二

“我跟你母亲过的这二十年，完全是默默度过的，”他开始闲谈起来（极其做作，很不自然），“我俩之间的一切事，也是默默发生的。我们二十年共同生活的主要特色——就是默默无言。我想，我们甚至没有发生过一次争吵。诚然，我经常离开，撇下她独自一人，但最后我总是回来的。Nous revenons toujours,[②] 这就是男人的基本特性，这是因为男人宽容。要是婚姻之事单由女人来维系，那么就没有一桩婚姻能保得住。恭顺、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同时却又坚定有力，有一种真正的力量——这就是你母亲的性格。请你注意，她是我在世界上认识的所有女人中最出色的一个。至于她有一种力量，这一点我能作证：我见过这种力量在如何支撑她。凡是涉及到——我不说是信念，这儿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信念，——凡是涉及她

① 19世纪俄国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派别，主张俄国的发展道路应该同西欧各国有原则区别。他们反对俄国欧化，美化古代宗法制社会，美化俄国的社会制度和农民村社，赞扬俄国人的“温顺”、“虔诚”。

② 法文：我们总是回来的。此处暗含着法国的一句谚语：“人们总是回到自己的初恋。”

们认为是信念的、从而也就被她们认为是神圣的东西，那她们简直就甘愿忍受苦难。事情就是这样，你自己可以判断：我像不像个给别人制造苦难的人？这就是我几乎事事都宁肯保持沉默的原因，而不只是因为这样做比较轻松，老实说，我对此至今不悔。这样一来，所有事情也就宽松并合乎人道地自然而然解决了，因此在这方面我也不想怎样夸奖自己。顺便说说，不知为什么我在猜想，她压根儿就不曾相信过我的人道精神，所以她才老是战战兢兢的，不过尽管她很害怕，却还是不屈从于任何文明。他们不知怎的能做到这点，对此我们却不明白，而且一般来说，他们比我们更善于处理好切身的事情。即使处在对他们来说极不自然的环境里，他们也能继续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在他们极其陌生的环境中完全保持本色。我们却做不到。”

“他们指谁？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平民，我的朋友，我是指平民。无论在道德还是在政治方面，平民都证明了这种伟大的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证明有史以来自己的胸襟豁达。不过，为了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我该讲一讲你的母亲。她并不是事事都沉默，有时你母亲也会发表意见，但她的意见会让你一下子明白，你所说的简直是浪费时间，虽然在这之前我甚至花了五年时间一直在循循诱导她。再说，她的那些反对意见是最出人意料的。再一次请你注意，我根本不认为她是傻瓜，恰恰相反，她有她的聪明，甚至是绝顶聪明，不过，你也许不相信她聪明……”

“为什么不信？我只是不信您自己会真的、而不是假装相信她聪明。”

“是吗？你认为我是这样的变色龙吗？我的朋友，我让你放肆得有点儿过了头……就像对待一个惯坏了的儿子……但这一次就这么算了。”

"请您给我讲讲我的父亲，如果可以，请讲实话。"

"讲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正如你已经知道的，是个家奴，这样说吧，他想要某种名誉……"

"我敢打赌，您此刻一定在忌妒他什么！"

"正好相反，我的朋友，正好相反，要我说的话，我倒很高兴看到你有这种令人费解的情绪呢。我发誓，正是现在我心里痛悔不已，正是现在，此时此刻，我对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感到后悔莫及，也许还会后悔千百次。再说上帝可以作证，这事的发生完完全全是偶然的……事后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人道的安排，至少是按照我当时对人道行为的理解做了处理。哦，当时我们大家都热衷于行善，为公众的利益、崇高的思想服务，我们对各种规矩、我们的世袭权利、庄园制度甚至抵押信贷行[1]都痛加指责，至少我们中的部分人是这样……我可以向你发誓。我们人数不多，可是我们说得好听，请相信我，有时甚至也做得好。"

"是指您伏在他肩上痛哭的时候吧？"

"我的朋友，这件事随你怎么说我都表示同意，顺便提一下，伏肩痛哭的事是我告诉你的，所以这当儿你是在滥用我的诚实和我的信任。但你应该同意，说真的，这件事并不像乍一看那么坏，特别在那个时代，要知道，当时我们才初出茅庐呢。当然，我是故作姿态，可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在故作姿态。比方说，难道你在实际场合中从来就不曾故作姿态过？"

---

① 俄国的抵押信贷行始于 18 世纪，由政府监督，旨在抑制私人放高利贷者。但事实上城乡的抵押信贷行收取的利率远远高出官方许可的范围，这种信贷行实质上成了剥削机构。按：抵押信贷行最早在 15 世纪始于欧洲，是以动产或不动产做抵押放款并兼储蓄钱款业务的信贷机构。

“我刚才在楼下动了点儿感情，所以回到这儿以后，一想到您会认为我在故作姿态，我就感到十分羞愧。在某些场合即使你感情真诚，但有时还是会像演戏，这是真的。我敢发誓，我在楼下和此刻的表现都不是故作姿态。”

“事情正是这样，有句话你说得精辟极了：‘即使你感情真诚，但还是会像演戏。’喏，我那件事正好就是这样：虽说我像演戏，但我痛哭得十分真诚。我不否认，如果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更敏锐一点儿的话，他会把伏肩痛哭一事看做是对他的进一步嘲笑，但他的诚实当时影响了他的洞察力。我只是不知道，当初他是否怜悯我，记得当初我就很想得到他的怜悯。”

“听我说，”我打断了他，“您现在说这话的时候也还是在嘲笑。总之，整整一个月以来，您跟我谈话时总是在嘲笑。为什么您总是这样跟我谈话呢？”

“你以为是这样吗？”他温和地答道，“你太多心啦。不过，即使我笑，也不是笑你，或者至少不是在笑你一个人，请放心。可我现在并没有笑，至于当时——一句话，当时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而且请你相信，这一切并不对我有利。我们这些优秀人物和平民相反，当时根本不会做于己有利的事：恰恰相反，总是尽量地作践自己。现在想来，正是这一点当时被我们认为是什么‘我们最大的长处’吧，当然是就最高意义上说的。当今一代先进人物则贪得无厌，跟我们无法相比。那时候，还在造孽之前，我就异常直率地跟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解释了一切。现在我同意，其中许多事情是根本不该解释的，更何况还解释得那么直率：且不说不解释更合乎人道，至少会更礼貌些。但是当你跳舞跳入了迷，想迈出优美舞步的时候，你还能自控吗？也许对美和崇高的追求真会导致无法自控的情

境，这个谜我有生以来都无法解开。① 不过，对于我们这次浅泛的谈话来讲，这个话题过于深奥了，但我向你发誓，如今一回想起来，我有时真会羞得要死。当时我提议给他三千卢布，我记得他一直不吭声，只有我一个人说话。你简直想象不到，当时我还误以为他是怕我，就是说，怕我的农奴主权利，我记得，我还竭力给他鼓气呢，我劝他毫无顾忌地说出他所有的愿望，甚至对我的种种不满。我向他保证，要是他不愿接受我提出的条件，即三千卢布、自由证②（当然发给他以及他妻子）、随意去旅行（当然不带妻子）——他不妨直言相告；那么我会马上发给他自由证，把妻子归还他，还赏给他们两口子，好像也是三千卢布，这样就不是他们离我远去，而是我自己离他们去意大利三年，孤零零一个人去。Mon ami,③ 请你相信，我决不会带 mademoiselle 萨波日科娃去意大利的，因为那时候我异常纯洁。你猜怎么着？这个马卡尔十分明白我会说到做到，可他还是一声不吭，待到我准备第三次伏到他肩上时，他就闪开身子，把手一挥走了出去，态度甚至有点儿放肆，请你相信，这种态度当时连我也感到吃惊。那时我在镜子里瞧了一眼自己，至今也未能忘记。一般地说，他们在默不作声的时候最为凶险，而这个又性格阴沉，老实说，我把他叫进书房来时不

① “美与崇高”这一说法始于德国哲学家伊·康德（1724—1804）与英国政论家、美学家埃·柏克（亦译伯克或博克，1729—1797），他们在自己的美学论文中对“美与崇高”的概念进行过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是从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接受这一说法的。“美与崇高”这一说法在 18 世纪末，以及在 1820—1830 年间浪漫主义美学中甚为流行；至 19 世纪后半期使用它时则常带有讽刺意味。

② 旧俄农奴主释放农奴时发给的一种证件。

③ 法文：我的朋友。

但不信任他，甚至还非常害怕他：在这个阶层里有烈性子的人，而且很多，可以说，他们就是行为不端的化身，而这一点让你比挨揍更害怕。Sic.[①] 当时我冒了多大的风险哪！喏，万一他大声叫嚷，闹得满院子都听见，万一这个乡下的乌利亚呼天抢地吼起来，——那我这个如此矮小的大卫会怎么样，我当时又能干什么呢？[②] 正因为如此，我才先许诺给他三千卢布，这是受了本能的驱使，但我很走运，看错了：这个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完全是另一种人……"

"告诉我，那时候你作过孽没有？您刚才说过，您是在作孽之前把她丈夫叫来的？"

"就是说，你该知道，这要看怎么理解……"

"那么你是作过孽了。您刚才说您看错了他，他是另一种人，到底是哪一种人呢？"

"到底是哪一种人，我至今也不明白。但他是另一种人，你要知道，他甚至极其正派，我这样判断，是因为事情的结果使我双倍地有愧于他：第二天他就同意去旅行，没有多说一句话，当然没忘记我提出的所有回报条件。"

"他收下钱啦？"

"那还用说！你该知道，我的朋友，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使我十分吃惊。当然，那时候我口袋里并没有三千卢布，可我设法凑足了七百卢布，交给他作为第一笔付款。你猜怎么着？余

---

① 拉丁文：正是这样。

② 这儿韦尔西洛夫对圣经中的一个情节做了讽刺性的转义运用。据《旧约全书·撒母记下》（第 11 章）：大卫王见到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便引诱了她。乌利亚猜到了这事，不肯回自己的家。于是大卫命令约押在作战时将乌利亚派到阵势极险之处，乌利亚在打仗中被杀。这时大卫就娶乌利亚的遗孀为妻。"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下的二千三百卢布他竟然要我立下借据，而且为可靠起见，借据开在某个商人的名下。后来，过了两年，他通过法院向我索要这笔钱并外加利息，弄得我再次吃惊不已，尤其是他真的为了修建教堂而外出化缘，[1] 从此二十年来云游四方。我不明白，一个朝圣者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属于个人的钱财……钱财乃世俗之物……不用说，当初我许诺给这笔钱是出自真心，可以说，还怀着最大的热情，可事隔那么久之后，我当然可能改变主意……我曾指望他至少会怜惜我……或者说，怜惜我们，顾惜我和她，至少宽延一段时间再要。可他甚至不肯等上一等……”

（我在这儿必须提请读者注意：要是我母亲比韦尔西洛夫活得长，那么没有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这三千卢布她老年时准会一贫如洗。如今这钱加上利息早已翻了一倍，他在去年所写的遗嘱里，把这笔钱一个不剩地统统留给了她。甚至在那个时候，他已预料到韦尔西洛夫的结局。）

“有一次您告诉我说，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到您那儿小住过几回，总是歇宿在妈妈的住所里，是吗？”

“是的，我的朋友，我该承认，起初我很害怕他上门来。整整二十年中，他只来过六七次，头几次只要我在家，我就躲起来。一开始我简直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上门来干吗？但后来我觉得，从某些角度去思考，他这么做，就他而言根本不算那么愚蠢。后来有一回，很偶然地我起了好奇心，便走出去想瞧瞧他，请你相信，我得到了一个异常独特的印象。这已经是他第三或第四次上门了，那个时期我正好担任调停官，当然尽心尽力地在着手研究俄国。我从他那儿听到了许许多多新鲜

① 此语借引自俄国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1821—1877）的《弗拉斯》（1854）一诗。

事。另外，我还在他身上见到了我早先无论如何也料不到的品格：心肠好，性格温和，最令人惊奇的是，心情几乎是很快活。对那件事（tu comprends?①）他丝毫没有暗示，他非常善于谈事情，而且谈得很出色，就是说，没有家奴他们那种愚蠢的钻牛角尖的深思远虑，我向你坦率承认，尽管我有民主思想，但还是不能忍受这种愚蠢的钻牛角尖的深思远虑。在我们的小说里和舞台上，那些'真正的俄国人'满嘴都是很不自然的仿造出来的俄语，可他的谈吐中却没有。同时他很少谈到宗教，除非我自己提起，要是我好奇地问他，他会把修道院及修道院的生活叙述得十分动人，甚至颇为别致。而最主要的是，他态度恭敬，一种谦逊的恭敬，这是高度平等所必要的那种谦恭，此外，在我看来，没有这种谦恭人就不能出类拔萃。正是通过毫无傲气，人才能达到高度的品行端正，无论处境怎样、遭遇如何，无疑都能自尊自重。这种自尊自重恰恰是世间罕见的能力，至少像真正的自尊心一样罕见……这一点你自己慢慢就会知道的。但后来，恰恰是后来而不是最初（韦尔西洛夫补充道），最让我震惊的是：这个马卡尔居然仪表非凡，请相信我，而且异常英武。固然，他老了，但：

脸孔黝黑，身高而腰直，②

---

① 法文：你明白吗？

②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弗拉斯》一诗。该诗中主人公弗拉斯的性格特征、外貌以及他的朝圣行为，对塑造马卡尔这一形象无疑起了影响。但同时马卡尔又明显不同于弗拉斯。弗拉斯那种复杂、矛盾的性格特征在马卡尔身上没有反映，后者是平和、温顺、爽朗等因素的化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来与涅克拉索夫发生严重的思想分歧时，曾于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写过专文《弗拉斯》。

纯朴而庄重。我甚至觉得奇怪，我那可怜的索菲娅当初怎么会舍他而就我。当初他五十岁，却依然是条壮汉，跟他相比我却是个心浮气躁的小子。不过，我记得，就是那时他的头发也已经白得很厉害，因此，就是那样的白头人娶她为妻……除非是这一点有了影响。”

这个韦尔西洛夫有一种上流社会最恶劣的习气：一旦说了（不得不说）几句极其聪明的好话之后，突然会故意用蠢话来收场，比方他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花白头发及其对母亲的影响的猜测。这是他故意如此的，多半自己也不明白为了什么，不过是出于上流社会最愚蠢的习惯而已。听他说话，似乎说得挺认真，其实他心里却在表示轻蔑或嘲笑呢。

三

我不明白当时我怎么会突然间怒火中烧。总之，现在我很不乐意回想起我那时的某些出格举动：我蓦地离开椅子站起来。

“听我说，”我开口道，“您说您来这儿，主要是想让母亲认为我们已经言归于好。现在您在这儿待的时间，足够让她这么想了，您能不能让我单独待一会儿？”

他微微红了脸，站起身：

“我亲爱的，你对我太不客气啦。不过，再见吧，强扭的瓜甜不了。我只想提一个问题：你真的想撇下公爵那边的工作？”

“啊哈！我就知道您来这儿另有目的……”

“就是说，你怀疑我来这儿是出于一己的私利，想劝你留在公爵那边。可是，我的朋友，难道你以为我写信叫你从莫斯科回来，也是出于某种私利吗？啊，你真多疑！而我恰恰相反，对你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即使现在我的经济状况大大好转了，我也希望你至少有时候能让我和母亲帮帮你。”

“我不喜欢你，韦尔西洛夫。”

“你甚至直呼我‘韦尔西洛夫’了。顺便说说，我很遗憾不能把这个姓传给你，要说我有过错的话，实际上我的全部过错就在于此，难道不是吗？不过，我总不能娶一个已婚的女人吧，你自己想想看。”

“看来就因为这缘故，您才想娶一个未婚的女人吧？”

他的脸微微抽搐了一下。

“你这是在指埃姆斯发生的那件事。听我说，阿尔卡季，刚才你在楼下大放厥词，当着母亲的面指责我。可你要知道，恰恰在这件事上你最失策。我跟已故的莉季娅·阿赫马科娃之间的事，你根本一无所知。你也不知道你母亲本人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件事，不错，虽然她当时并不在我身边。如果说我什么时候遇见过善良的女人的话，那么就是在那时，在我见到你母亲之时。不过，到此为止吧，眼下这一切还须保密，而你——你却不知道在胡诌些什么，人云亦云。”

“正是在今天，公爵对我说，您专爱追求未成年的姑娘。”

“这是公爵说的？”

“对，您听着，要不要我确切向您挑明，为什么您现在来我这儿？这段时间我一直坐着暗问自己：这次来访有何居心，看来现在终于被我猜到了。”

他已经朝外走去，这时却停住脚步，向我转过头来等待下文。

“刚才我只是随口提到图沙尔写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那封信，说它本来保存在安德罗尼科夫的文件里，可在他死后却落到了莫斯科的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手里。当时我就瞧见你的脸突然抽搐了一下，直到刚才您的脸又再一次同样抽搐了一下，我才猜到：原来您在楼下时已经想到，既然安德罗尼科夫保存的一封信已经落到了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手里，那么另一封信难道不也会落在她手里吗？而安德罗尼科夫死后是可能留下一些至关紧要的信件的，啊？难道不是吗？”

“于是我到你这儿来，就是想套你说出什么消息？”

“您自己心里明白。”

他顿时脸色惨白。

“你不是自己猜到的，这是受了一个女人的影响，所以在你话里——在你草率的猜测中充满了憎恶！”

“女人？今天我正好见到了这个女人！也许您就是为了想刺探她的消息，所以才要我留在公爵的身边吧？”

“可我已经看到，你在你新的生活道路上准会大有作为呢。莫非这就是‘你的思想’？继续干吧，我的朋友，你在刺探方面具有毋庸置疑的才干。既然有才干，那就应该加以发挥和提高。”

他暂停了一下，喘口气。

“您要当心，韦尔西洛夫，别把我弄成您的敌人！”

“我的朋友，在这种场合谁也不会说出自己最后的决定，而总是秘藏在心里的。现在我请你给我照个亮吧。就算你是我的敌人，看来还不至于巴望我摔断自己的脖子吧。Tiens，mon ami①，你该想想，”他一边下楼梯一边说，“这整整一个月来，

① 法文：瞧，我的朋友。

我可一直把你当做好心肠的人。你渴望生活，渴望得那么厉害，看来即使给你三倍的寿命，你也活不够：这在你脸上写着呢，而这样的人多半都是好心肠的人。谁知我竟想错了！”

四

我无法表达当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怎样心如刀绞：仿佛我被活生生地剜去了身上的一块肉！我干吗发那么大火，干吗要那么伤害他——重重地、故意地伤害他，我至今也说不清楚，那时当然更说不清楚了。他的脸色那么惨白！也好：这种惨白也许表露了他最真诚、最纯真的感情和最深沉的痛苦，而不是怨恨和委屈。我总觉得有过一些时刻他是钟爱我的。那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尤其在许多事情业已水落石出的现在，我还不相信这一点呢？

我突然发火而且真的赶走了他，或许还因为我突然猜测，他来我这儿是指望打听到：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手里是否还有安德罗尼科夫保存的信件？他必须寻找这些信件，而且正在寻找之中——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是谁知道呢，也许在当时，就在那时那刻，我完全猜错了！谁知道也许正是我，正是通过我这个错误，才引发他事后想到了玛丽亚·伊万诺芙娜，想到了她手里可能有信件呢？

最后，还有一件怪事：他还一字不差地重述了我的想法（关于给三倍寿命等等），而这个想法我才刚刚跟克拉夫特说过，关键是他竟用了我的原话。话语相同还可算是巧合，但他不知怎的竟然了解我个性的实质：多么敏锐的眼光，猜得好准！可是，既然他能透彻明白我的这一面，那为什么对另一面

却毫不明白呢？莫非他并非假装不知，而是真的猜不到我所要的不是韦尔西洛夫的贵族身份，我不能原谅他并非因为我是私生，我这辈子所要的就是韦尔西洛夫本人，要的是他整个人，是父亲，而且这个想法已经融进了我的血液里？难道他这样一个敏感的人竟会如此迟钝和粗心？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干吗要激怒我，干吗要装腔作势？

第 八 章

一

翌晨我努力尽早起身。通常我们八点左右起床，这是指我、母亲和妹妹，韦尔西洛夫则要赖到九点半。八点半母亲会准时给我端来咖啡。可这一回我不等送来咖啡，就在八点整溜出了家门。我还在昨晚拟定了今天一整天总的行动计划。虽说我满腔热情，决意立即实施这一计划，但我已经意识到，计划中的几个关键还有太多的不大可靠和不太明确之处。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几乎一整夜都似睡非睡，就像处于半昏迷之中，做了许多梦，几乎一刻也没有好好睡着过。尽管如此，我起身时还是比任何时候都精神饱满、头脑清醒。我特别不想跟母亲照面。我见了她就不能不谈昨天的话题，我怕某种意想不到的新感受会使我偏离预定的打算。

早晨很冷，一切都蒙上了乳白色的湿雾。不知为什么，我对彼得堡上班的清晨总是抱有好感，虽说那情景很不雅观，但所有那些为自己的事奔波、只关心自己并总是若有所思的人，

在早晨八点光景对我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特别喜欢在急匆匆赶路的时候，或者自己向别人打听什么事，或者别人问我点什么：问话与答话总是简明扼要、清楚易懂，而且谁也不停步，态度几乎始终是友好的，这是一天之中人们最乐意答话的时刻。中午以后或者到了傍晚，彼得堡人就变得不太好交往了，动不动就会破口大骂或者嘲笑人，跟上班之前的清晨——最清醒、最严肃的时刻相比，情形就迥然不同。这一点我察觉到了。

这回我又出发去彼得堡区。由于十一点多我必须回到喷泉街去找瓦辛（十二点钟他多半在家），所以我匆匆赶路，尽管很想在什么地方喝杯咖啡，也没敢停步。再说，我又非得赶在叶菲姆·兹韦列夫在家的时候找到他，我这是第二次去找他了，而且差一点儿碰不见他：他刚喝完咖啡，正打算出门。

“什么风竟把你刮到这儿来啦？”他迎面问我，但没有起座。

“我这就给你解释。”

各地的清晨，包括彼得堡的清晨，对人的本性具有清醒作用。夜间某种火热的幻想会随着晨光与寒气渐渐消失殆尽。每逢早晨，我自己有时想起夜间那些刚逝去的梦幻，有时想起那些夜间的行为，总是责备自己或心怀羞愧。但我还是想顺便指出，我认为彼得堡的早晨，这个看似是整个地球上最无诗意的早晨，却几乎是人世间最充满幻想的早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或者最好说是个人的感受，但我坚持这一点。在彼得堡这种潮湿发闷、雾气蒙蒙的早晨，我觉得，任何一个像普希金《黑桃皇后》里的格尔曼一样的人物，他的离奇幻想必定会更加坚定。（格尔曼是个巨人，一个非同寻常的、十足的彼得堡

的典型——彼得堡时期的典型！）[1] 在这迷雾之中，我曾上百次地产生过一个无法摆脱的奇思怪想："一旦迷雾散开，向上空飘逝，那会怎么样？整个这座潮湿发闷、道路打滑的城市是否会随同迷雾一起流散，随同迷雾飘向上空，如烟一般消逝？[2] 于是剩下早先的芬兰湾沼泽，而作为点缀，沼泽中间也许会留下铜骑士，跨在那匹气喘吁吁、筋疲力尽的马上？[3]"总之，我现在无法表达我的感受，因为这一切只是想入非非，只是幻境，可见全是胡诌。但是我过去常常会困扰、现在还困扰于一个极不明智的问题："瞧他们这些人正在东奔西忙，可说不定也许这一切只是某人的一个梦境，也许这儿根本没有一个真的人、现实的人，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行动呢？一旦这个做梦的某人突然醒来，——一切也就倏然消失了。"不过我已离题万里了。

我事先说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一些古怪的念头和想法，它们似乎荒唐得让人一见就认定是发疯。这天早晨，我就是怀着一个古怪念头来到了兹韦列夫家：我找他，是因为我办

---

① 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及其中格尔曼这个形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系列作品产生过很大影响。普希金笔下的这位彼得堡的主人公，充满了发财的奇思怪想，这在《少年》中也有所反映。

② 把彼得堡说成一个幻影似的城市，说它会马上消失，像热气消失于黑暗的天空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看法最早见于他的短篇小说《脆弱的心》（1848），以后见于他的小品文和1873年《作家日记》的手稿里。断言彼得堡是一座"人工的"（矫揉造作的）城市，与俄国没有"有机的"联系，因此注定要消失——这是当时俄国斯拉夫派的看法。

③ 此处指的是彼得大帝的雕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了普希金长诗《铜骑士》中的这个形象，但他对彼得大帝的业绩及其后果的评价，与普希金有所不同：普希金在《铜骑士》中对彼得大帝是既肯定又否定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的改革，一般持否定态度。

这件事在彼得堡没有别人可找。要是办这事我找人还有挑选余地的话，叶菲姆这个人我恰恰是会排在最后的。我在他对面坐下之后，连我自己都觉得，我这个呓语和狂热的化身，所面对的恰恰是折中和平庸的化身。可我这方有思想、有真情，他那方却只有一个讲究实际的结论：事情从来不是这么办的。长话短说，我当时简明扼要地向他解释，由于一桩名誉攸关的大事，我想派一个人作为决斗副手去通知对方，可是除他而外，我在彼得堡根本找不到其他人，我说他是我的老同学，所以他甚至没有理由拒绝我，我告诉他我要找近卫军中尉索科利斯基公爵决斗，因为一年多以前他在埃姆斯打了我父亲韦尔西洛夫一记耳光。这儿我要说明一下，叶菲姆对我家的一切情况、我跟韦尔西洛夫的关系知之甚详，连我自己所了解的韦尔西洛夫的经历，他也几乎全知道：这是我以前陆续告诉他的，当然，隐去了某些秘事。他坐在那儿听着，照例露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活像关在笼子里的麻雀，闷声不响，一本正经，脸有点儿浮肿，浅色的头发蓬乱竖起，嘴角边始终挂着一抹讥嘲的僵硬笑容。这种笑容完全不是故意的，而是情不自禁的，所以更显得可恶。看样子，此刻他确实真的以为，自己无论在智商和性格方面都大大高出于我呢。我同时怀疑，他之所以瞧不起我，还因为昨天在杰尔加乔夫家出现的那种场面。这是必然的：因为叶菲姆属于芸芸众生，叶菲姆是个市井小民，而市井小民总是只崇拜胜利者。

“韦尔西洛夫知道这件事吗?”他问。

“当然不。”

“那你有什么权利去干预他的事呢？这是其一。其次，你想用这事来证明什么呢?”

我料定他会反对，于是立刻跟他解释，说这事绝不像他认

为的那么愚蠢。首先，这可以向那个无赖的公爵证明，即使在我们这一阶层，也还有人懂得维护名誉；其次，这可以让韦尔西洛夫自感羞辱，给他上堂课；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就算韦尔西洛夫当时做得对，按他自己的什么信念不要求跟公爵决斗，决意忍受那记耳光，那至少也可以让他看到，有个人能感觉到他所受的侮辱，强烈得如同身受，而且甘愿为他的利益去拼命……尽管这个人即将永远跟他分手……

“等一下，你别嚷嚷，我姑姑不喜欢这样。你告诉我，韦尔西洛夫不就是在跟这个索科利斯基公爵打遗产官司吗？既然这样，这倒不失为一种打赢官司的、别出心裁的全新办法呢：在决斗中杀掉对手。”

我 en toutes lettres[①] 向他指出，他简直又愚蠢又无赖，要是他那种讥嘲的微笑越来越厉害的话，这只能证明他的自以为是与俗气，他根本想不到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动过是否有利于官司的念头，这种念头只有他那个诡计多端的脑瓜子才想得出来。接着我告诉他：官司已经打赢，再说对手也并非索科利斯基公爵一人，而是索科利斯基公爵家族，所以即使打死一个公爵，还有其他公爵在呢，但是毫无疑问，应该把决斗推迟到上诉期限之后（虽说公爵家并不会上诉），这样做只是出于礼貌而已。上诉期限一过就进行决斗，我现在正是为这事来找他的，尽管不是马上决斗，但我得预先征得他的同意，因为我没有副手，跟谁都不认识，所以假如他叶菲姆拒绝的话，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我还来得及另找别人。我说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好哇，你到时候再来说好啦，何必白跑十里路。”

他起身去取帽子。

---

① 法文：直截了当地。

“到那时你会去吗?”

“不，我当然不去。”

“为什么?”

“假如我现在答应你到时我去，那么整个这段上诉期限里你就会天天上我这儿跑，单就这个原因我就不会去了。而主要原因是，这件事纯属胡闹，如此而已。我会为了你而毁掉自己的前程吗? 万一公爵问我：‘谁派你来的?’‘多尔戈鲁基。’‘多尔戈鲁基跟韦尔西洛夫有什么关系?’那我就得向他讲你的家谱，不是吗? 他准会哈哈大笑的!”

“那你就揍他的臭脸!”

“得了吧，这简直是神话。”

“你害怕? 你那么大个子，在中学时比谁都力气大。”

“我害怕，当然怕。再说公爵也决不会答应决斗的，因为他们只跟身份相等的人决斗。”

“就我的文化修养而言，我也是有身份的人，我有权利，我身份相等……恰恰相反，他才不够身份。”

“不，你是个小孩子。”

“怎么是小孩子?”

“就是个小孩子，我们俩都是小孩子，他才是大人。”

“你真是个傻瓜! 按照法律我一年前就可以结婚了。”

“那你结婚去吧，不过你毕竟没有成熟：你还在长个儿呢!”

我当然明白，你是存心在嘲笑我。毫无疑问，这件蠢事的全部经过我本可以不讲的，甚至让它湮没无闻更好，再说这件事的成败虽然相当严肃，但它那些既不重要又无必要的细节是会令人厌恶的。

不过为了更严厉地惩罚自己，我决定把这事讲完讲全。当

我看见叶菲姆是在嘲笑我，我居然斗胆抡起右手，或者最好说抡起右拳去碰他的肩膀。于是他便抓住我的双肩，把我掀了个嘴啃泥：用实践来向我证明，他真的在我们中学同学里比谁都力气大。

二

读者当然会想，我从叶菲姆家出来后心情肯定很糟，但他想错了。我非常清楚，刚才发生的纯属中小学生之间的事，可办事的严肃性却依然存在，丝毫不减。我一直走到瓦西里岛才喝足了咖啡，故意不去昨天我去过的、位于彼得堡区的那家小饭馆，如今我双倍地憎恨这家饭馆和里边的夜莺了。我有一个怪脾气：我能像恨人一样恨一些地方和物品。不过我在彼得堡也有几处幸福之地，那就是由于某种原因，我在那里有过幸福感的地方，不用说，我珍惜这些地方，故意尽可能久地不去那儿，为的是以后我完全孑然一身、感到失意的时候，可以去那里伤感怀旧。喝咖啡的时候，我对叶菲姆及其看法做了十分公道的评价。是的，他比我讲究实际，但未必比我现实。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比最疯狂的幻想更危险，因为它是盲目的。① 虽然我公道地评价叶菲姆（此刻他多半以为我一边在街上走，一

①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观点之一，他曾多次表述过。如 1868 年 12 月 11 日致阿·迈科夫、1869 年 2 月 26 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等。在谈到生活现象的外表及其应该成为真正艺术家研究对象的隐蔽本质时，他指出，这种隐蔽的本质，“终与始”，“这一切目前对人们来说，还是幻想的东西。”

边在骂他呢)，但我在信念上还是没有丝毫退让，至今也不会退让。我见过这样一些人，就因为被人泼了第一桶冷水，他们不仅放弃了自己的行为，甚至还放弃了思想，自己开始嘲笑一小时前还认为是神圣的东西。哦，他们居然那么轻率！就算叶菲姆在事情的实质上比我正确，就算我蠢到了极点，只是装腔作势，但在这件事的最深处毕竟还有这么一个点，立足于这一点上看问题，我也是对的，我也有我的公道，而且关键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明白这一点。

瓦辛住在谢苗诺夫桥附近的喷泉街，我到那儿时几乎十二点整，但他不在家。他在瓦西里岛工作，总是在严格规定的时间回家，顺便说说，他几乎总是过了十一点才往家赶。此外，这一天正好是什么节假日，所以我估计肯定能碰见他，谁知他竟不在家。尽管我是初次登门，但还是决定等他。

我是这样考虑的：如何处理有关遗产的那封信，这事有关良心，而我选择瓦辛来裁决，是想借此向他表示我深深的敬意，不用说，这肯定会使他感到愉快。当然我也真的被这封信搞得很不安，确实相信有必要由第三者来仲裁解决，不过现在想来，即使在那时我也可以完全不借助于旁人的帮助来摆脱这一困境。而且重要的是，当时我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办，即只要把这封信亲手交给韦尔西洛夫本人，由他随意处置就行：这就是解决办法。在这类事情上，由我自己充当最高法官和裁决人甚至是完全不合理的。为了摆脱困境，我只要亲手将信交给他，并且不发表任何意见，这样我就立即使自己凌驾于韦尔西洛夫之上，从而占得上风。因为此事多少与我有关，一旦我放弃遗产方面的一切好处（作为韦尔西洛夫的儿子，这笔钱中迟早有一部分终将归属于我），那我就有权永远以最高的道德标准来审视韦尔西洛夫下一步的行动。而且谁也不能责备我，说

我毁害了公爵一家，因为这个文件在法律上不起决定性作用。我坐在瓦辛的空房间里反复思考了这一切，弄清了这一切，甚至突然想到，我来找瓦辛，如此渴望向他求教怎么办，其实只有一个目的：想让他看到我是一个十分高尚、十分无私的人，可见，我是想借此洗雪昨天我在他面前低声下气的屈辱。

我意识到这一切之后，便觉得十分懊丧。然而我没有离开，依旧留了下来，尽管我确实知道，我等的时间愈久，只会更加懊恼。

首先，我很不喜欢瓦辛的房间。是的，不妨这么说："让我瞧瞧你的房间，我就会知道你的性格。"瓦辛住的这间带家具的房间，是从二房东手里转租的，这些二房东显然很穷，靠转租过日子，除瓦辛以外还有别的房客。我熟悉这种转租的房间，又窄又小，只有几样家具，却追求舒适的外表，房间里必定有一张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柔软长沙发，但要移动它却有散架的危险，必定还有一个洗脸盆和一张用屏风隔开的铁床。瓦辛显然是个最出色最可靠的房客，女房东通常总会挑出唯一一个作为这里最出色的房客，于是他便受到特别的优待：他的房间被收拾打扫得特别细心，在长沙发的墙头上挂幅石印画，在桌子底下铺一小块破旧地毯。要是有人喜欢这种有点儿死气沉沉的整洁环境，特别是喜欢女房东的巴结和敬重，那么他自己的人品就值得怀疑了。而我深信，最出色的房客这个名声，一定让瓦辛本人感到快意。我不知为什么，但那两张摆满书籍的桌子的模样儿，开始让我渐渐恼火。书籍、纸张、墨水瓶——一切都按照最令人厌恶的秩序摆得整整齐齐，这种要求陈列整齐的理想，符合那个德国女房东及其女佣的世界观。书相当多，不是报章杂志，而是真正的书。很显然，他常常读书，而且多半在坐下读书或动手写作时，会带着一种异常庄重和认真的神

态。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我更喜欢书籍乱放的房间，至少不把读书写作当成神圣的行为。这个瓦辛待客人想必极有礼貌，但看来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告诉客人："这会儿我可以陪你坐上一个半小时，等你走后我再干正事。"客人想必可以跟他谈得异常有趣，还可以听到新鲜事，不过——"现在我可以跟你聊一会儿，使你感到很有趣，等你走后我再干最有趣的事。"……但我还是坐着不走。我根本不需要求教他，这一点我已经确信无疑。

我已经坐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了，靠窗有两把藤椅，我在其中的一把上坐着等他。我感到恼火，还因为时间在白白过去，可傍晚以前我还得找到住处呢。我出于无聊，本想随便取本书看看，但是没取：一想到我还要排遣自己，心里双倍地恼火。异常的寂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在很近的某处，在长沙发挡住的那扇门的背后，传来了低语声，声音愈来愈大，我不由自主地渐渐去分辨。这是两个人在说话，显然都是女的，这一点听得出来，但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不过我出于无聊，不知怎的开始探究起来。很清楚，她们说话又亢奋又激烈，决不是谈裁剪衣服之类的事：她们在商量什么，或者在争论什么，要不就是一个女人在劝说和恳求，而另一个女人却不肯听从，在反驳。十之八九是别的什么房客。我很快就感到厌烦了，耳朵也听惯了，因此尽管我还在继续听，但已经漫不经心，有时甚至完全忘了我在听。突然，传来了一种不寻常的响声，仿佛有人从椅子上跳下来双脚落地，或者从座位上霍地站起来跺了跺脚，随即响起了哀求声和突发的喊叫，这甚至不是喊叫，而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尖声怒号，已经不在乎旁人会不会听见了。我迅速奔到门口，打开门，跟我同时打开的还有走廊尽头的另一扇门，事后我才知道那是女房东的房门，从那门里探出两颗好

奇的脑袋。但喊叫声倏然而止，我旁边那扇女邻居的门蓦地打开，只见一个女人迅速冲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我依稀觉得这女人挺年轻，而另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想拦她，可又拦不住，只好朝着她的背影哀哀地喊：

“奥莉娅，奥莉娅，你去哪儿呀？唉！”

可是一发现我们两家的门已打开，她急忙把自家的门关得只留下一条缝隙，从门缝里谛听楼梯上的动静，直到奥莉娅跑下楼的脚步声完全消失，她才把门彻底关上。我回到我的窗前，一切又陷于寂静。这件事很无聊，也许还挺可笑，于是我不再放在心上。

大概过了一刻钟，从走廊里，就从贴近瓦辛的房门口处，传来了一个男人洪亮而毫无顾忌的说话声。接着有人抓住了门把，把房门推开些许，正好可以让我看清走廊里站着一位高个子男人，他显然也看见了我，甚至已经对我端详过了，但却没有进房来，依然一手握住门把，隔着整条走廊继续与女房东说话。女房东尖着嗓子快活地跟他搭话，从她的声音里可以听出，这位客人她早就认识，而且受到她的敬重，被她看做是位体面的客人，很风趣的先生。这位风趣的绅士大声嚷嚷，说着俏皮话，但内容也不外乎是瓦辛不在家，让他老是扑空，也算是他命该如此罢，他只好像上回那样再等等啦，看样子这些话在女房东看来是绝顶风趣的。终于这位客人猛地把门完全推开，走了进来。

这位先生，穿一身考究的衣服，显然出自上等裁缝的手艺，属于所谓“贵族老爷式”，但他本人却极少贵族老爷的气派，尽管看来他很想有这种气派。他倒不像是目中无人，而是天生就有点儿嬉皮笑脸，就是说，比起那种照着镜子练就的嬉皮笑脸来，毕竟令人好受些。有点儿花白的深褐色头发、黑眉

毛、大胡子、大眼睛——这一切非但没有突出他的个性，似乎反而赋予他跟常人无异的某种共性。这种人总是笑嘻嘻的，喜爱欢笑，但不知为什么，跟他在一起时您永远不会愉快。他可以从笑嘻嘻迅速变作一本正经，又从一本正经迅速变作轻浮俏皮或者挤眉弄眼，但这一切变化似乎漫不经心，毫没来由……不过，没必要提前去描写他。后来我对这位先生的了解要深入得多，因此比起当初他推门进房来时，现在我自然认为对他的认识更清楚了。但即使现在，我也难于说出有关他的任何明确看法，因为这些人的主要特点，恰恰在于他们变化无常，三心二意，很不稳定。

还没有等他坐定，我就突然隐隐约约地记起，这位先生想必是瓦辛的继父，好像姓斯捷别利科夫，我已经听说过他的什么事，但因为是无意中听到的，所以怎么也说不出是什么事，只记得是件不光彩的事。我知道，有很长一段时间瓦辛在他手底下过的是孤儿般的日子，但早就摆脱了他的影响，他们追求的目标与利益彼此不同，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已完全分开。我还记起，这位斯捷别利科夫手头有些钱，甚至是个投机商，喜欢钻营，总之，关于他，我也许知道得更多，可我忘了。他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眼，居然没有点头致意，便把自己的高筒礼帽往长沙发前的小桌上一放，神气活现地用脚拨开桌子，不是坐到——而简直像散架似的躺倒在那张我不敢坐的长沙发上，以至于震得沙发吱嘎直响。他耷拉下两条腿，接着又高高跷起右脚上的漆皮靴靴尖，开始欣赏它。当然，他随即朝我转过脸来，那双有点儿呆滞的大眼睛又把我上下打量一番。

"我扑了个空！"他朝我微微点了点头。

我没有吭声。

"他不守时！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从彼得堡区来的吗？"

“那您是从彼得堡区来的啰?”我反问他。

“不，我是在问您呢。”

“我……我是从彼得堡区来的，可您怎么会知道的?”

“怎么会知道的? 嘿嘿。”他挤了挤眼，但不肯解释。

“我是说我并不住在彼得堡区，只是刚才去过那儿，从那儿过来的。”

他还是不开口，挂着意味深长的笑容，我很不喜欢这种笑容。他挤眉弄眼有点儿愚蠢。

“去过杰尔加乔夫先生那儿啦?”终于他开口问道。

“什么去过杰尔加乔夫那儿?”我瞪大了眼睛。

他得意地望着我。

“我又不认识他。”

“嘿嗯。”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答道。他渐渐让我觉得很讨厌。

“嗯，很好。不，请听我说：您在一家铺子里买了商品，而另一个顾客在旁边另一家铺子里买另一种商品，您猜他买的是什么商品? 买的是钱，从那种称作高利贷者的商人那儿购买……因为钱也是商品，高利贷者也是商人……您在注意听吗?”

“好吧，我在注意听。”

“第三个顾客打旁边经过，他指着其中一家铺子说：‘这家可靠。’而指另一家说：‘这家不可靠。’我能给这位顾客下什么评语呢?”

“我怎么会知道。”

“不，对不起。我来举个例子：人就是靠好例子过活的。我在涅瓦大街上走，看见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位先生也在往前

走，我想判断他的性格。我们各自在两边人行道上朝前走，一直走到海洋街的拐角处，就在一家英国人开的商店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了第三个行人，刚好被马踩死。现在请您仔细想想：第四个行人打旁边经过，他想判断我们三个人的性格，包括那个被踩死的人在内，判断我们是否实际、是否可靠……您在注意听吗？"

"对不起，十分费劲。"

"好，我料想也会这样。现在我来换一个题目。我在德国的一个泉水区，是个矿泉区，这种地方我去过不止一次，至于是哪一个矿泉区——这无关紧要。我常在矿泉处散步，见到一群英国人。要跟英国人结识是件难事，这一点您是知道的，但两个月之后，疗养期一满，我们大家却结成一伙去了山区，拄着尖棍一起登山，至于登哪一座山，这无关紧要。到了拐弯处，也就是可以歇脚的地方，正是在那儿，一群僧侣在酿造沙尔特廖斯甜酒[①] ——这一点请您注意——我碰见一个本地人，他孤身一人站在那儿，默默地看着。我想判断他是否可靠，请您想想：就因为我在矿泉区没跟这次同行的那群英国人说过话，那我还能不能请他们帮我做判断呢？"

"我怎么知道，对不起，我很难跟上您的思路。"

"很难？"

"是的，您让我听累了。"

"嘿嗯！"他挤挤眼，做了个手势，想必这种手势是表示他得意扬扬和占了上风的意思。随后，他极其庄重平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显然是刚买来的。他打开报纸，开始阅读最后一版，看来不想再理睬我了。有五分钟光景他没看我一眼。

---

① 一种芳香的甜酒，酒名来自法国的地名。

“布列斯特—格拉耶沃公司的股票居然没有下跌，啊？[1] 前一阵它在涨，现在还在涨！可我知道有许多股票一下子都跌了。”

他兴致勃勃地瞧着我。

“我还不太懂交易所的事情。”

“您不赞成？”

“不赞成什么？”

“挣钱啊。”

“我并不否认钱的重要，可……可我觉得首先得有思想，其次才是钱。”

“我是说，对不起……有这么个人，可以说他拥有一笔资本……”

“首先要有崇高的思想，然后才是钱，光有钱没有崇高的思想，社会必定崩溃。”

我不知为什么变得激昂起来。他有点儿茫然地望着我，似乎给弄糊涂了，可突然间，他脸上堆满了极开心、极狡黠的笑容：

“那么韦尔西洛夫呢？啊？他毕竟‘宰’了人家，‘宰’了！昨天判决了，不是吗？”

我突然出乎意料地发现，他早就知道我是谁了，而且也许还知道得很多。我只是不明白自己干吗会突然脸红，而且还傻呆呆地盯着他看。他显然得意非凡，开心地瞧着我，仿佛他巧施奸计抓住了我什么，揭穿了我的心思。

① 这儿指布列斯特—格拉耶沃铁路股份公司，该公司创建于19世纪70年代初。铁路从布列斯特通往波兰的格拉耶沃，后者是俄德交通的重要铁路枢纽。斯捷别利科夫说这话，是暗指该公司在扩大自己的资本。——俄编注

"不，"他扬起双眉，"您这是想向我打听韦尔西洛夫先生吧！关于是否可靠的判断，我刚才跟您说什么来着？一年半以前，由于那个小孩儿，他本可以把这件好事做得十分圆满，——本来可以的，可他栽了，的确栽了。"

"什么小孩儿？"

"一个吃奶的婴儿，直到现在他还把他寄养在外边呢，不过即使他这么做，也决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

"什么婴儿？这是怎么回事？"

"当然是他的孩子啦，亲生的孩子，他跟 mademoiselle 莉季娅·阿赫马科娃生的……'这迷人的少女对我异常恩爱……'[1] 吞了含磷的火柴——不是吗？"

"这是胡说，荒唐透顶！他根本没跟阿赫马科娃生过孩子！"

"嗬！可我当时在哪儿？我可是个大夫，而且是个产科医生呢。我姓斯捷别利科夫，难道没听说过？不错，我当时已经不再行医了，但我可以对医疗方面的事出些内行的主意呢。"

"您是产科医生……给阿赫马科娃接过生？"

"不，我没有给阿赫马科娃接过生。在那儿城郊有个姓格兰茨的医生，家庭负担很重，可每次出诊，人家只付他半个塔勒[2]，那地方医生待遇就是如此，再说，很少有人认识他，于是他就代我去出诊……我之所以推荐他，就是为了不让人知道这件事。您在注意听吗？当韦尔西洛夫，当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向我请教时，他是私下里向我请教这件极秘密的事的，我当时才出了这么一个具体的主意。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决定要

---

① 引自普希金的抒情诗《黑色的披肩》(1820)。

② 旧时的德国货币，一塔勒等于三马克银币。

追两只兔子。”

我听得大为惊讶。

“有一句民间谚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平民的谚语：‘同时追两只兔子，就会一无所获。’我倒想说：例外不断重复，就会成为惯例。他掉头去追另一只兔子了，俄语的意思是，又去追另一个女人了，——结果一无所获。既然他已经逮住了一只，那就紧紧抓住它呀。可他在本该当机立断的事情上，却优柔寡断。亏他韦尔西洛夫还是‘娘儿们的先知’[①]呢！这个雅号是年轻的索科利斯基公爵当着我的面给他起的。不，您该到我家里来！如果您想多了解韦尔西洛夫，请到我家里来。”

他显然在欣赏我那副惊得目瞪口呆的样子。在这以前我从来不曾听说过任何有关婴儿的事。可就在这刹那间，隔壁女邻居的门突然砰地一声响，有人急匆匆走进她们的房里。

“韦尔西洛夫住在谢苗诺夫团驻地，莫扎伊斯基街十七号，是利特维诺娃的房子，我刚去居民地址查询处查过！”有个女人在气愤地大声嚷嚷，每个字眼我们都能听清。斯捷别利科夫扬起双眉，竖起一个指头举过头顶。

“我们刚说起他，他的事就在那边……这就是不断重复的例外！Quand on parle d'une corde...[②]”

他迅速跃身在沙发上坐起，侧耳谛听紧靠沙发的那扇门背

---

① 是那些不理解韦尔西洛夫的人给他起的讽刺性绰号，也是对他寻神说的讽刺评价（见上文老公爵对他的评述），很可能来自宗教哲学家彼·雅·恰达耶夫的思想敌人对恰达耶夫的评价。恰达耶夫改信天主教、他的哲学与神学的言论著作以及他在妇女中间的宣传取得极大成功，据研究者阿·谢·多利宁推测，均体现在韦尔西洛夫这个形象中。

② 法文：“刚说起绳子……”这是法国谚语中的典型说法，如：“刚说起狼，就见到狼尾巴”，“刚说起太阳，就见到阳光”。

后的动静。

我也感到非常震惊。我猜想，十之八九就是刚才气呼呼跑出去的那个年轻女人在大声嚷嚷。但怎么会牵涉到韦尔西洛夫呢？突然，又传来了刚才的那种尖声怒号，这是一个气得发狂的女人的尖叫：因为人家不肯给她什么，或者阻拦她干什么。跟刚才相比只有一点儿不同：尖叫声和怒号声持续得更长了。听得出那边在争吵，说话声又急又快："我不要，我不要，退掉，马上退掉！"——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我无法一一记起。接着又跟刚才一样，有人飞快地奔向门口，打开门。两个女邻居冲到了走廊里，也跟刚才一样，其中一个显然想拦住另一个。听得津津有味的斯捷别利科夫早就从沙发上蹦了起来，一个箭步窜到门口，立刻毫无顾忌地径直冲到了走廊上，冲到了两个女邻居跟前。不用说，我也跑到了房门口。但是他在走廊里一出现，就好比给女邻居浇了桶冷水：她们飞快地躲进屋里，砰地一声随手关上了门。斯捷别利科夫急追一步，便站住了，他竖起一个指头，笑嘻嘻地在动脑筋。这一回，我从他的笑容里看出了异常险恶的阴暗心理。他看到女房东又站到了自己的房门口，便踮起脚尖飞快穿过走廊，跑到她的跟前。他跟她嘁嘁喳喳谈了两分钟光景，不用说，打听到了一点儿底细，便神气活现地果断回到房里，从桌上拿起高筒礼帽，匆匆照了照镜子，把头发弄弄蓬松，甚至瞧都不瞧我一眼，便充满自信、大模大样地走到女邻居家门口。他竖起耳朵在门前听了一会儿，对着走廊尽头的女房东得意地挤挤眼，女房东朝他竖起一个指头吓唬他，还摇了摇头，意思是："唉，真是个淘气鬼，淘气鬼！"终于，他神情坚决，但极有礼貌地——礼貌得甚至似乎哈着腰，——弯起手指叩了叩女邻居的门。里边响起了一个声音：

“谁呀？”

“有件极重要的事，能让我进来吗？”斯捷别利科夫煞有介事地高声问。

屋里的人迟疑了一会儿，但还是开了门，起初只推开一点点，四分之一光景，可斯捷别利科夫马上紧紧抓住了门把，不让门再关上。双方开始对话，斯捷别利科夫嗓门很响，老想往房里闯，我记不起他的原话，但他在讲韦尔西洛夫，说他可以相告一切，说清一切，诸如“不，你们该来问我才是”，“不，你们该来找我才对”等等。很快他就被让进了屋里。我回到长沙发那儿开始偷听，可无法句句听清，只听出那边不时提到韦尔西洛夫。根据说话的语气，我猜想斯捷别利科夫已经控制了这场谈话，他的口气已经不再曲意迎合，而是居高临下，就像刚才跟我谈话时那样毫无顾忌：“你们在注意听吗？”“现在请你们仔细想想”等等。不过，跟女人们谈话想必他还是异常客气的。已有两次传来了他响亮的笑声，但大概笑得完全不是时候，因为除了他的说话声以外，同时还传来了两个女人的说话声，有时比他的声音还响，而且根本不像在说什么开心事，特别是刚才尖声怒号的那个年轻女人：她说了许多话，说得又快又激动，显然是在揭露和抱怨什么，想找人评理。但斯捷别利科夫也不甘落后，嗓门愈扯愈高，笑的次数愈来愈多：别人说什么，这种人是根本听不进去的。我很快离开了沙发，因为我觉得偷听是可耻的，所以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即坐到了窗前的藤椅上。我深信，瓦辛肯定认为这位先生不值一提，但要是我也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立即就会一脸正经地替他辩护，用说教的口吻指出，这是一位“很实际的人，当今务实的人之一，不该用我们一般的抽象观点去评判他”。不过，就在这一刻，我记得，不知为什么我的精神紧张到了极点，我的心怦怦直

跳，无疑我已预料到了什么。过了十分钟左右，忽然在一阵突发的大笑声中，仿佛有人跟刚才完全一样从椅子上跳了下来，随即响起了两个女人的喊叫声，可以听见斯捷别利科夫直蹦而起，说话的语气已经全变了，似乎是在替自己辩白，又似乎在哀求对方听完他的话……但对方不想再听下去，发出了愤怒的喊叫："滚！您是坏蛋，您是个不要脸的东西！"总之，很明显，人家在赶他走。我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正好瞧见他从女邻居屋里跳到走廊上，看样子确确实实是被她们用手猛猛地推了出来。他一见我，突然指着我喊叫起来：

"瞧，这是韦尔西洛夫的儿子！要是你们不相信我，那么有他的儿子，他的亲生儿子在！你们瞧！"他霸道地抓住我的胳膊。

"这是他的儿子，他的亲生儿子！"他一边重复着，一边把我拉到两个女人跟前，并没有做任何进一步的解释。

此时年轻的女人站在走廊里，而上了年纪的那个女人就站在门口，在她身后只一步之遥。我只记得这位可怜的姑娘长得不错，二十岁上下，但很瘦弱，带点儿病态，浅棕红色的头发，脸似乎有点儿像我妹妹，这个特征在我心里一闪而过，便印进了我的记忆里。但丽莎从来不曾、当然也永远不会像我眼前站着的姑娘那样，气得发狂：当时我自己也陷入了一种异常尴尬的不体面的境地，因为这无赖干的好事，我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

"儿子又怎么样！既然他跟您在一起，那他也是个坏蛋。既然您是韦尔西洛夫的儿子，"姑娘突然转脸对我说，"那就替我转告您父亲：他是个坏蛋，是个不要脸的小人，我不要他的钱……拿去，拿去，拿去，您马上把这些钱还给他！"

她从口袋里迅速掏出几张钞票，但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

（事后得知，这是她母亲）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奥莉娅，这也许不是真的，也许这位先生根本不是他的儿子！”

奥莉娅迅速瞧了瞧她，拿定主意，鄙夷地瞥了我一眼，便转身回屋去，但她关门之前，站在门口再一次朝斯捷别利科夫狂怒地喊道：

“滚！”

甚至还向他跺了跺脚。接着砰的一声关了门，还上了锁。斯捷别利科夫仍抓着我的肩膀不放，他竖起一根手指，咧开嘴，久久地挂着若有所思的笑容，用询问的目光瞪着我。

“我认为您这样对待我是可笑的，卑鄙的。”我气愤地嘟哝道。

可是他尽管目不转睛地瞪着我，却根本不在听我说话。

“这件事应该调查！”他若有所思地说。

“可您凭什么硬要把我卷进去？这是谁？这女人是什么人？您居然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过去，这算怎么回事？”

“哎，见鬼！一个失去贞操的女人……‘一个经常重复的例外’——您在注意听吗？”

他想用手指戳我的胸脯。

“哎，见鬼！”我拨开了他的手指。

可他完全出人意料地突然笑了起来，笑得很轻，几乎听不见，但笑得很久，很开心。末了，他戴上自己的帽子，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阴沉，皱起眉头说：

“得给女房东出个主意……应该把她们赶出屋去——对，尽快赶出去，否则她们在这儿……您等着瞧吧！您记住我这句话，等着瞧吧！哎，见鬼！”他突然又开心起来，“您是想等到

格里沙[1] 回来吧?”

“不，我不等了。”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好吧，随您便……”

他不再吭声，便转身走出屋子，下楼去了，甚至对那个显然在等他解释和消息的女房东都没瞧上一眼。我也拿起帽子，请女房东转告瓦辛，说我多尔戈鲁基来过，就跑着下了楼。

三

我只是浪费了时间。一出门，我就立刻去寻找住处：可我心神不定，在街上游荡了好几个小时，虽说我踏看过五六处愿意转租的寓所，但我相信，我一定心不在焉地错过了二十处。更令我沮丧的是，我根本没想到租房子竟这么难。各处出租的房间都跟瓦辛的一样，甚至还差得多，可租金却很贵，就是说，不符合我的预算。我直言要求有个能够转得过身的小角落就行，人家就鄙夷地跟我说，既然这样，那就该到“角落里”去找。此外，各处都有许多古里古怪的房客，单就他们的模样我就无法跟他们毗邻而居：我宁肯出钱也不跟他们住一块儿。有些先生不穿外套，单穿坎肩，胡子蓬乱，一点儿也不懂得规矩，好奇心十足。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坐着十来个这样的人，边打牌边喝酒，而房主要租给我的房间就在他们隔壁。在另外几处，房主刨根究底地盘问我，我就乱说一气，惊得他们朝我直瞪眼睛，在一个寓所里我甚至跟他们吵了一架。不过，所有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必细述，我只想说，当我累得筋疲力尽，

① 即瓦辛。

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点儿东西的时候，天色已近昏暗了。我最后拿定主意：回去，由我一个人亲自把有关遗产的那封信立即交给韦尔西洛夫（不做任何解释），然后把阁楼上属于我的东西装进箱子、打成包袱取走。哪怕去旅馆住上一夜也行。我知道在奥布霍夫斯基大街的尽头，靠近凯旋门的地方，有几家客栈，花三十戈比甚至可以租一个小小的单间。我铁心花掉一夜的住店费，只要能不在韦尔西洛夫处过夜。可是当我快经过工艺学院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地想顺便去看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她就住在工艺学院的对面。说实话，我去看她的借口，无非是那封关于遗产的信件，但驱使我身不由己地要去看她，却另有原因，只是至今我还说不清楚而已：关于"吃奶的婴儿"和"变成习惯的例外"这些话搅得我头脑一片混乱。我不知道当时是想找个人谈谈、卖弄卖弄自己呢，还是想吵一架、甚至哭一通，——总之，我登上了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的楼梯。在这之前，她家里我只去过一次，那是我从莫斯科刚到这儿来不久，母亲托我去办件什么事。我记得，那时我上门交代了事情之后，连坐都没坐就立刻走了，她也没有请我坐坐。

我拉了拉门铃，厨娘立刻给我开了门，一声不吭地放我进屋。为了让读者明白这件荒诞不经的事、这件对以后的一切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是怎么发生的，我必须写出所有的详情细节。先讲讲厨娘。这是个凶巴巴的翘鼻子芬兰女人，似乎憎恶她的女主人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可是女主人却恰恰相反，出于某种癖好竟离不开她，就像老处女离不开湿鼻子的老哈巴狗，或者老爱睡觉的懒猫。这个芬兰女人要么发脾气、说粗话，要么大吵一场后几个星期不说话，借此来惩罚女主人。看样子我正碰上这种不说话的日子，因为甚至对我的问话："女主人在

家吗?”——我确切记得，当时我这么问过她，——她竟然也没有回答，一声不吭地回到厨房里去了。既然如此，我自然就相信女主人在家，于是我走进房间，见里边没人，就开始等候，心想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很快会从卧室里出来：否则厨娘干吗要放我进来呢？我没坐下，等了两三分钟，这时暮色已经很浓，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这个昏暗的小寓所，由于到处挂着触目皆是的印花布，显得更为阴森。关于这个蹩脚的小寓所我得交代几句，好让读者明白事情发生的地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生性固执，颐指气使，又保留了某些旧日的地主癖好，她住不惯从二房东手里转租的带家具的房间，就是为了能单独居住，自由自在，她才租下了这么个不像样的小寓所。这儿两个房间小得活像两只金丝雀笼子，互相紧连在一起，一间小，另一间更小，地处三楼，窗户对着院子。一踏进寓所，就是狭窄的过道，只有一俄尺半宽，左首是上面提及的两只金丝雀笼子，而正对进门的过道尽头，便是厨房的入口。一个人十二小时所需要的一个半立方俄丈[①] 的空气，这两间房里也许还有，但未必会更多。房间低得不像样，最荒唐的是所有的门窗和家具全都挂上或铺上印花布，一种漂亮的法国印花布，还镶着锯齿形边饰，但这么一来，房间里显得加倍阴暗，就像旅行马车的车厢。我待在里边等候的那间房间，尽管塞满了家具，但尚能转身。顺便说说，家具倒挺不差：几张式样不同的小桌，镶嵌精细，带青铜装饰，还有几口箱子和一张精雅的、甚至豪华的梳妆台。可相连的那个小间，也就是我等待女主人从里边出来的那间卧室，却用帷幔跟这一间严实隔开，后来才知道，里边其实只有一张卧床。要弄明白我所干的那件蠢事，

① 一俄丈等于二点一三米。

以上这些细节交代是必不可少的。

我就这样等着，一直以为她在家，突然响起了门铃声。我听见厨娘迈着不慌不忙的脚步走过过道，完全跟刚才对待我一样，一声不吭地放来人进屋。这是两个女人，说话声音却很响，我一听简直惊呆了：根据嗓音我分辨出一个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而另一个——偏偏是我现在，特别是在这种情势下，最不愿见的那个女人！我不可能弄错：昨天我就听见过这响亮有力的清脆嗓音，虽说只有三分钟，但却永远留在我心中。是的，这正是“昨天那个女人”。我该怎么办？我根本不是在问读者，我只是在回想当时的那一瞬间，即使此刻我也根本无法解释，不知怎么搞的我竟会突然朝帷幔背后奔去，结果进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卧室。简而言之，我躲了起来，刚冲进卧室，她们就进了房间。为什么我不向她们迎上去，而要躲起来，——这一点我现在也不明白：一切都出于偶然，完全出于无意识。

我冲进卧室，便撞着了床，但我马上发现卧室里有扇门通向厨房，因此要摆脱困境还有出路，完全可以逃之夭夭，谁知倒霉透了！那扇门上了锁，锁孔里没有插钥匙。我绝望地一屁股坐到了床上，清楚地意识到，看来现在我会沦为偷听的角色，而且从头几句话、从开始谈话的口气，我就已经猜到，这是一场微妙的秘密谈话。哦！当然，只要是个诚实高尚的人，即使挨到了这个时分，也应该挺身走出去，大声说：“我在这儿，请你们稍后再谈！”说完，不管自己处境有多可笑，当着她们的面走出去。可我没有站起身，也没有走出去：我没这胆量，我很卑鄙，胆怯了。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您是我亲爱的人，您让我非常伤心，”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用恳求的语气说，“请您一百个

放心吧，您这样甚至不符合您的性情。过去您到哪儿，哪儿就有欢乐，可现在突然……我想，您对我总还是信任的吧：您知道我对您有多忠心。我对您的忠心并不亚于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不想隐瞒，我仍旧永远忠于他……但是，请您相信我吧，我敢以我的名誉向您发誓，这个文件不在他手里。也许根本不在任何人手里。再说，他也没本事要这种花招，您不该怀疑他。你们俩之间的这种敌意完全是自己臆造出来的……”

“文件是有的，而且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说昨天吧，我刚进门，头一眼就碰见了——ce petit espion①，这是他故意安插在公爵身边的。”

“哎，ce petit espion。第一，他根本不是个 espion，因为这是我，是我坚持要把他安置在公爵那儿的，要不他在莫斯科准会发疯或者饿死，——那边就是这样说他的。而更主要的是，这个粗野的孩子是个十足的小傻瓜，他怎么会做奸细呢?”

“是啊，是像个小傻瓜，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坏蛋，昨天就因为我心烦，要不准会笑死：他脸色惨白地跑过来，双脚一并行个礼，开口讲起法国话来。可是在莫斯科，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却要我相信他是个天才呢。至于那封倒霉的信还完整地保存着，而且是在某个最危险处——这一点我主要是根据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的脸色断定的。”

“您，我的美人儿啊！您自己这话就表明，她那儿什么也没有！”

“这恰恰表明一定有：她只是在扯谎，我跟您说，她是个扯谎的老手！我在去莫斯科之前还心存希望，以为没留下任何文件，可现在，现在……”

---

① 法文：这个小奸细。

“哎呀，亲爱的，正好相反呢，人家说她是个好心肠、明事理的人，是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最最器重的一个侄女。的确，我不太了解她，可是——您一定能笼络住她，我的美人儿！因为您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人人倾倒，连我这么个老太婆——也爱上您了，这会儿真想吻吻您……您要笼络她是不用花力气的！”

“我笼络过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试过，甚至逗得她十分开心，可她太狡猾了……不，这是她一贯的本性，很特别，莫斯科式的……您想想，她居然劝我去找本地的一个姓克拉夫特的人——安德罗尼科夫生前的一个助手，据她说，他也许知道点儿什么。我知道有这么个克拉夫特，甚至现在也能大致地记起他。但她一跟我提到这个克拉夫特，我就马上确信：她不是毫无所知，而是在扯谎，她全都知道。”

“可为什么，为什么呢？也许您真的可以从他那儿打听到呢！这个德国人，克拉夫特，不会乱说一气，我记得，他是个非常诚实的人——说真的，您该好好问他！不过他眼下好像不在彼得堡……”

“唉，他昨天就回来了，我刚去过他那儿……我这么心急慌忙、手脚发抖地跑来找您，就是想请您帮个忙，您是我的天使，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什么人都认识，能不能哪怕查一下他的文件，因为现在他一定留下了一些文件，他的这些文件现在会转交给谁？说不定又会落到某些危险的人物手里。我跑来就是想请您出个主意。”

“您指的是哪些文件？”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不明白，“您不是说您刚才去过克拉夫特那儿吗？”

“去过，去过，刚去过，可他开枪自杀了！就在昨天晚上。”

我霍地从床上跳起来。当她们管我叫奸细和白痴的时候，

我还能坐得住，她们谈得越深，我越觉得不能露面。否则简直不可想象！我决意平心静气地坐下去，直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送客出门（要是我走运，在这之前她不进卧室来取东西的话），等阿赫马科娃走掉以后，到时哪怕我跟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打一架都行！……可此刻我一听到克拉夫特自杀的消息，就霍地从床上跳起来，全身都颤抖了。我不假思索、忘乎所以、不问后果，就跨步掀开帷幔，突然出现在她俩眼前。房里的亮度还足以让她们看清我，我脸色惨白，浑身打颤……她俩齐声尖叫起来。怎能不惊叫呢？

"克拉夫特？"我朝阿赫马科娃转过脸去，嘟哝地问，"自杀了？昨天？日落的时候？"

"你刚才在哪儿？你是从哪儿来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使劲抓住我的肩膀，尖声逼问，"你在当奸细？你在偷听？"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从长沙发上站起来，指着我对她说。

我火冒三丈。

"谎言，胡说！"我狂怒地打断了她，"您刚才管我叫奸细，哦，天哪！对您这号人不但不值得刺探，而且就因为有你们在旁边，甚至叫人感到活在世上都没意思！宽容的人以自杀结束自己的一生，克拉夫特开枪自尽了——这是为了思想，为了赫卡柏……①

① 此处暗指莎士比亚剧中哈姆雷特听了伶人朗读赫卡柏因丈夫被杀而悲痛欲绝的独白后，针对该伶人的心态所说的一段话："在它的影响之下，他的整个脸色变成惨白，他的眼中洋溢着热泪，他的神情流露着仓皇，他的声音是这么呜咽凄凉，他的全部动作都表现得和他的意象一致，这不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吗？而且一点儿也不为了什么！为了赫卡柏！赫卡柏与他有什么相干，他对赫卡柏又有什么相干，他却要为她流泪？"（见《哈姆雷特》，第2幕，第2场）赫卡柏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的妻子。

不过，你们哪儿能体会赫卡柏的痛苦！……在这个世上——人们只能生活在你们的阴谋之中，在你们的谎言、欺骗和陷阱中厮混……够了！”

“您掌他的嘴巴子！掌他的嘴巴子！”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大声叫嚷。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虽然朝我瞪着眼睛（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目不转睛，却站在原地没动，因此再过一刹那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准会照自己的说法来做。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扬起手来想护住脸，就因为这个动作，她竟然以为我要动手打人。

“好哇，你打，你打！你来证明你是个天生的下流胚！你比女人力气大，还客气什么！”

“您别造谣，别造谣！”我喊叫起来，“我从来没动手打过女人！您说话不知羞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总是瞧不起我。是啊，跟下人打交道何必尊重他们！您在冷笑，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看来是笑我的模样吧：不错，上帝没有把您那些副官们的好模样赐给我。但我在您面前并不觉得自卑，恰恰相反，我觉得我是高尚的……好吧，不管你们怎么说，我都无所谓，反正我没错！我走进房来完全是偶然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要怪只能怪您那个芬兰女人，或者最好说，该怪您宠她：她干吗不回答我的问话，便径直领我进房？后来，您自己也该同意，我觉得从女人的卧室里跳出来太荒唐了，所以我决定宁肯默默忍受你们的污蔑，也不露面……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您又在冷笑了，是吗？”

“滚，滚，滚出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大叫大嚷，差点儿要动手推我。“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您别信他的胡说八道：我告诉过您，那边说他是个疯子！”

“疯子？那边说的？什么人说的？打哪儿说的？够了，我

都无所谓。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我以一切神圣的名义向您发誓，这场谈话和我听到的一切，我决不泄露出去……我知道了您的秘密，这能怪我吗？何况明天我就不再到您父亲那儿干活了，至于您在寻找的文件，您可以完全放心！”

“您说什么？……您指的是什么文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心里发慌，甚至脸色煞白——也许这仅仅是我的感觉。我明白，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了。

我很快走了出去：她们默默地目送着我，眼神里一片极度的惊诧。总之，我给她们出了个谜……

第 九 章

一

我急急往家里赶去，说来真怪，居然很得意。当然，人家对女人是不会说这种话的，何况还是对这样的女人——确切点儿说，是对这样一个女人，因为我并不把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包括在内。也许根本不该对这类女人当面说："我唾弃你们的阴谋诡计。"可我说了这种话，而且恰恰为此感到得意。且不说别的，至少我相信这种口气把当时我处境中的可笑成分一扫而光。但这件事我当时没工夫去细细回想：我脑子里尽是克拉夫特。倒不是他的死使我十分难受，但毕竟让我受到了彻底的震动，在我心里，此时甚至丝毫没有某种人类惯有的幸灾乐祸的感觉，即见了别人折断腿、丧失名誉、失去爱人等等通常会产生的那种卑劣的快感，它已经让位于另一种异常纯粹的感觉：悲痛，为克拉夫特而惋惜——是不是惋惜我说不准，但确实是一种极为强烈的善意的感情。当时我也为此感到得意。说来也怪，当一个人被某个惊人的消息彻底震动的时候，头脑中

竟会闪现出那么多杂念，按理说，这种消息似乎必定会压倒其他的感情、驱散一切杂念，特别是微不足道的杂念，可是情况恰恰相反，微不足道的杂念却不断涌进脑海。现在我还记得，一种显然是神经性的颤抖渐渐直透我的全身，持续了好几分钟，甚至等我回到家里，跟韦尔西洛夫摊底牌的时候，我也这样神经性地打颤。

这次摊底牌是在奇特而超常的情况下发生的。上文已经提到，我们住在院子里的一所单独的侧屋里。这个寓所的门牌是十三号。我还没有跨进大门，就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向什么人打听，口气焦躁而气愤："十三号在哪儿?"这是位女士，就站在大门口的一家杂货铺前，她推门朝里边喊问。但店里的人好像没理睬她，或者甚至撵她走，于是她神情紧张，而且十分愤怨地走下台阶。

"这里的看门人到底在哪里?"她跺跺脚，大声喊道。听她的声音，我早知道她是谁了。

"我正要去十三号，"我走到她跟前，"您想找谁?"

"我找看门人整整找了一个小时了，见人就打听，跑遍了所有楼梯。"

"十三号在院子里。您认不出我啦?"

可她已经认出了我。

"您是想找韦尔西洛夫。您有事找他，我也一样，"我接着说，"我是来跟他永远告别的。咱们走。"

"您不是他的儿子吗?"

"这毫无意义，不过，就算是他的儿子吧，虽说我姓多尔戈鲁基，我是个私生子。这位先生的私生子数不胜数。即使是亲生儿子，只要有良知、珍惜名誉，照样也会离家出走。这种

事圣经里就有。[1] 何况他得到了一笔遗产，而我不想沾光，我要靠双手劳动走自己的路。必要时，胸襟豁达的人甚至也会舍弃自己的生命：克拉夫特开枪自杀了，克拉夫特是为了思想，您想想，一个年轻人，本来大有希望……往这儿走，往这儿走！我们住在单独的侧屋里。圣经里就有孩子离开父亲、自立门户的事……只要有思想吸引……只要有思想！思想最重要，一切在于思想……"

当我们顺着台阶向我们家走去的时候，我一直跟她这么唠唠叨叨。读者想必会注意到，我很不顾自己的脸面，必要时我会很出色地介绍自己：我想学会说真话。韦尔西洛夫在家。我没脱大衣就走了进去，她也一样。她穿得非常寒酸：深色连衣裙上部罩了一块破旧的什么东西，晃晃荡荡的，想必是充当披肩或斗篷，她头戴一顶破旧的水手帽，使她显得相当难看。我们走进客厅时，母亲正坐在常坐的位子上做针线，妹妹从自己房里出来想瞧瞧，结果在房门口站住了。韦尔西洛夫照例坐着什么也不干，这时便起身相迎：他用严厉的怀疑目光盯住我。

"这跟我毫不相干，"我急忙挥挥手，站到了一边。"我在大门口才碰见了这个女人，她在到处找您，可没人能告诉她。我是为自己的事来的，我乐意待会儿向您解释，等到她……"

韦尔西洛夫依然怀疑地打量我。

"对不起，"那个姑娘迫不及待地开了口，韦尔西洛夫朝她转过脸去。"我想了很久，为什么您昨天心血来潮要把钱留在我那儿……我……总之……拿去吧，您的钱！"她几乎又像刚才那样尖叫起来，把一叠钞票扔到桌上。"我只好去居民地址

① 事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章，第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查询处找您的地址，要不早就送来了。听我说，您！”她突然向我母亲转过身去，母亲的脸刷地白了。“我不想侮辱您，您的样子很老实，也许这一位还是您的女儿。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他的妻子，但您该知道，一些女教师为了在报上登求职广告，掏尽了自己最后一分钱，可这位先生却剪下这些广告，按地址去找这些不幸的女人，心存不良地想占便宜，想用金钱勾引她们堕落。我不明白昨天我怎么会收下他的钱！他的样子那么老实！……滚，您不用解释！您是个坏蛋，先生！哪怕您真是出于好心，我也不要您的施舍。不要，决不要！哦，我真高兴能当着您那些女人的面揭穿您！您真可恶！”

她很快跑了出去，但在门口又迅速回了回头，只为了喊一声：

“据说您得到遗产啦！”

接着她便影子般地消失了。我再一次提醒读者：这是个气狂了的女人。韦尔西洛夫震惊万分：他若有所思地站着，在考虑什么，末了突然转脸问我：

“你根本不认识她？”

“刚不久我偶然见过她，她在瓦辛那儿的走廊里大发脾气，尖声喊叫，还咒骂您，可我没有答腔，什么也不知道，这次是在大门口碰见她的。看来她就是昨天您提到的那个‘能教算术课’的女教师吧？”

“正是她。我这辈子行了一次善，可是……不过，你有什么事？”

“这封信您拿去吧，”我回答说，“我认为没必要做解释了：这封信是从克拉夫特那儿取来的，他是从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手里得到的。您看了内容就会知道。我想补充一点，现在除我以外，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封信在哪里，因为克拉夫特昨

天把信交给我之后，等我一出门就开枪自杀了……"

我气急败坏、匆匆说话的时候，他接过信，左手拿着它伸得远远的，留心地注视着我。当我说到克拉夫特自杀时，我特别留意他的脸色，想看看他的反应。结果呢？——这消息丝毫没有触动他：他甚至连眉毛都没抬一下！恰恰相反，他见我一住口，便掏出挂在黑带上、从不离身的长柄眼镜，把信凑近蜡烛，先瞧了瞧落款，然后开始聚精会神地琢磨它的内容。我无法表达他这种傲慢而冷漠的反应让我有多难受。照理说他跟克拉夫特是很熟悉的，何况这消息毕竟非同寻常！所以我自然就希望他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我等了半分钟光景，知道信很长，便转身离开了客厅。我的箱子早已收拾停当，只剩下几件东西打成包袱就行。我想到了母亲，想到自己居然没走到她跟前说几句话。十分钟以后我已经准备就绪，刚要去雇马车，这时妹妹进了我的阁楼。

"这是你的六十卢布，妈妈叫我还给你，她再次请你原谅她，因为她把这事告诉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这儿还有二十卢布。你昨天给了她五十卢布作为你的生活费，妈妈说收钱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三十，因为在你身上花不了五十，所以她叫我找还你二十卢布。"

"好吧，谢谢，但愿她说的是实话。再见了，妹妹，我这就走。"

"这会儿你去哪儿？"

"暂时去住客栈，只要不在这房子里过夜就行。你转告妈妈，说我爱她。"

"这点她知道。她知道你也爱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你怎么不感到害臊呢，竟然把这个可怜的女人领到家里来！"

"我向你发誓，不是我领来的：我是在大门口碰见了她。"

“不，明明是你领来的。”

“你要相信我……”

“你想一想，问问自己，你就会明白你也有过错。”

“我只是很高兴见到韦尔西洛夫丢面子而已。你想想，他居然有一个跟莉季娅·阿赫马科娃生的孩子……不过，我干吗告诉你这些呢……”

“他？孩子？这可不是他的孩子！你从哪儿听来的这种瞎话？”

“哼，你哪能知道真相。”

“我怎么不知道？我在卢加还照料过这孩子呢。听我说，哥：我早就看出你根本不了解情况，可你却冤屈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冤屈妈妈。”

“如果他做得对，那么错的就是我，事情就是如此，可我照样爱你们。你干吗一下子脸红了呢，妹妹？瞧，现在更红了！好吧，可我还是要找这个公爵小子决斗，为了他在埃姆斯打过韦尔西洛夫的耳光。如果韦尔西洛夫在阿赫马科娃的那件事上没有错，那我就更应该这样做了。”

“哥，你醒醒吧，你怎么能干这种事！”

“好在眼下官司已经打完了……瞧，这会儿你的脸色又白了。”

“可公爵根本不会跟你决斗的。”丽莎惊恐中露出惨淡的微笑。

“那我就当众羞辱他。你怎么啦，丽莎？”

只见她脸色更为惨白，站都站不稳了，便跌坐到长沙发上。

“丽莎！”楼下传来母亲的叫唤声。

她恢复了常态，站起身，亲切地朝我微笑。

“哥，别去干这些无聊事，要不，等你了解许多情况之后再决定：你知道得太少了。”

“丽莎，一听说我要去决斗，你就脸色惨白，这事我会记住的！”

“对，对，这一点你也该记住！”临别时她又朝我笑了笑，就下楼去了。

我叫了一辆马车，车夫帮我把行李一起搬出了寓所。家里谁也不反对我走，谁也没劝我留下。我没有去跟母亲道别，因为我不想碰见韦尔西洛夫。我在马车上已经坐稳，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去喷泉街，谢苗诺夫桥附近。”我突然吩咐车夫，于是又动身去瓦辛家。

二

我突然想到，瓦辛一定知道克拉夫特出事了，也许知道的比我多一百倍呢：结果真是这样。他马上很乐意地把一切详情都告诉了我，但情绪并不很激动，我断定这是因为他太累的缘故，事情果真如此。早上他去过克拉夫特那儿。克拉夫特用手枪（就是我见到的那一支）自杀是在昨天，当时天色已经完全昏暗，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出。临开枪之前他在日记上写下了最后一段话，其中提到他几乎是在黑暗中写的，差点儿连字母也辨不清了，但他不想点燃蜡烛，因为他担心死后会引起火灾。“我可不愿点燃蜡烛，免得临开枪前再去熄灭它，就

像熄灭我的生命。"①——几乎在日记的最后一行，他奇怪地补上了这么一句。早在他刚回到彼得堡的第三天，还在拜访杰尔加乔夫之前，他就开始记这临终日记。等我离开他之后，他每隔一刻钟就写上一段，最后的三四段则是每隔五分钟记一次。这篇日记在瓦辛面前放了那么长时间（人家拿给他看过），他居然没有抄下来，何况篇幅总共也不到一个印张②，记的每一段都很短，——这不由让我大声地表示惊奇："您哪怕抄下最后一页也好哇！"瓦辛含笑地对我说，他不抄也照样记得，再说每段所记互不关联，全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我本想说服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才珍贵，但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开始再三要他讲讲他记得些什么，于是他记起了几行，大概是在自杀前一小时写的，讲"他觉得浑身发冷"，"他本想喝盅酒暖暖身子，但一想到酒后自杀也许会流血更多，他就没喝"③。"差不多全是诸如此类的话。"——瓦辛结束道。

"您居然把这说成是无聊话！"我叫了起来。

"我哪儿这么说了？我只不过没抄下来而已。可即使不是无聊话，这日记也确实相当平常，或者更确切地说，相当自然，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必定会这么写……"

"可这是最后的一些想法，最后的一些想法呀！"

"最后的想法有时也会毫无价值。有一个也是这样自杀的人，他也是在这样的日记里甚至诉苦说，在如此重大的时刻，

---

① 写克拉夫特自杀这个插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利用《公民报》(1874 年 11 月 18 日) 上关于一个自杀者的报道。这自杀者也在自杀前记下自己的感受。他也写道，要熄灭蜡烛，以免引起火灾。——俄编注

② 一印张四万个印刷符号。

③ 这段话也借自克拉夫特的原型、民事法官克拉默自杀前的日记。——俄编注

他真希望头脑中出现哪怕一个‘崇高的想法’，可事情恰恰相反，尽是些微不足道的无聊想法。”①

“那么浑身发冷也是无聊想法啦?”

“您是具体指觉得发冷，还是担心流血更多？但是有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在那些临死前——不管是不是自杀，——还有能力思考自己死亡的人中间，许多人常常爱关心他们尸体的雅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拉夫特才担心流血过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人人知道这个事实……这是不是事实，”我嘟哝道，“可我奇怪的是，您居然认为这一切很自然，但前不久克拉夫特不是还在说话、激动，不是还坐在我们中间吗？难道您一点儿也不为他惋惜?”

“哦，我当然感到惋惜，可这完全是另一码事。不管怎么说，克拉夫特是以自己的死亡表述了他的逻辑结论。看来大家昨天在杰尔加乔夫家里对他的议论全是有道理的：他身后留下了一本笔记本，里面尽是些关于俄罗斯人是二等人种的学术性论断，他的依据是颅相学、颅骨学②，甚至数学，由此断定作为俄罗斯人就根本不值得生存下去。您不妨认为这件事最突出的启示是：一个人通过逻辑推论可以得出任何结论，但就因为这逻辑结论而突然开枪自杀——不用说，却是少见的事。”

“至少应该对这种刚强的性格表示敬意。”

“也许不只是刚强吧。”瓦辛模棱两可地说。但很明显，他的意思是指这事做得愚蠢或者缺乏理智。这让我恼火。

“瓦辛，昨天您自己就谈过有关感情的话。”

---

① 这段话也与上引那个自杀者手记有相似之处。——俄编注

② 颅相学是研究头盖骨外形与人的智慧、精神素质之间联系的一种理论，后来的发展证明它不符合科学；颅骨学是人类学与动物学的一个分支，研究人与动物的头盖骨。

“我现在也不否认。但是根据已发生的事实，可以看出他的某些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因此凡是严肃看待这件事的人，甚至就会不由自主地把怜悯心也给挤掉了。”

“听我说，我刚才从您的眼神就猜到了您准会指责克拉夫特，可我不愿听您指责他，所以我决定不想问您的看法，但您主动说了出来，我又身不由己地不得不认同您的看法，然而我对您非常不满！我惋惜克拉夫特。”

“您要知道，我们扯得太远了……”

“对，对，”我打断他说，“但至少有一点值得庆幸呢：谈到这种事时，活着的人总可以评判死者，总可以对自己说：‘尽管有人开枪自杀了，这个人值得大家惋惜与体谅，但毕竟还有我们在呢，所以大可不必太悲伤。’”

“是的，当然，如果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哎，看来您这是在开玩笑！而且开得挺妙。这会儿是我喝茶的时间，我这就去叫人端来，想必您会跟我一起用茶吧。”

他朝我的箱子与包袱扫了一眼，便走出房去。

我确实想说些较为尖刻的话，替克拉夫特鸣不平，而且我也做到了，可奇怪的是，起初他居然把“还有我们在呢”这句话当成了正经话。但不管是否如此，他毕竟处处都比我正确，甚至包括感情方面。我承认这一点并没有丝毫不快，但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喜欢他。

等茶端来之后，我跟他说，我想请求他招待我留宿，总共只住一夜，要是不行的话他尽管直说，我就去住客栈。接着我扼要地说明了原因，直率而简明地告诉他，我跟韦尔西洛夫已彻底闹翻，但我没讲详细经过。瓦辛注意地听我说完，却丝毫也不激动。总之，他只是对我的问话一一作答，虽说回答得很亲切，而且十分详尽。至于刚才我来找他出主意的那封信，这

会儿我只字未提，我把刚才那次上门说成是一般的来访。由于我已经向韦尔西洛夫作过保证，说除我之外谁也不会知道这封信，所以我认为自己已无权再把信的事告诉任何人。不知为什么，我开始竭力阻止自己把另一些事告诉瓦辛。我指的是另一些事，但不包括别人的事：我讲述了刚才在走廊里、在隔壁、女邻居最后在韦尔西洛夫寓所里发生的种种事情，这居然引起了瓦辛的注意。他听得异常用心，尤其是有关斯捷别利科夫的事。关于斯捷别利科夫盘问我是否去过杰尔加乔夫那儿，这个细节他逼我重复了两遍，甚至陷入了沉思，不过他最后还是一笑了之。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任何事情都永远难不倒瓦辛。顺便说说，我记得，这种最初的看法，当时被我认做是对他的极高评价。

“总之，我听不出斯捷别利科夫先生的话里有多大启迪，”我对斯捷别利科夫下判断说，“他说话有点儿语无伦次……而且为人似乎有点儿轻率……”

瓦辛立即正色道：

“他的确没有口才，但只是初看上去这样。实际上他往往会发表一些极其精辟的见解。总的说来，这种人身上的务实精神和投机心理多于综合思考，应该从这个观点去评判他们……”

这话跟我刚才猜测的完全吻合。

“但是他在您的女邻居家里大闹了一场，天知道会惹出什么后果呢。”

谈到女邻居，瓦辛告诉我说，她俩在这儿住了约莫三个星期，是从外省某地来的，租的房间极小，种种迹象表明她们很穷，她们住在这儿似乎在企盼什么。瓦辛并不知道那个年轻女人在报上登过愿当教师的求职广告，但他听说韦尔西洛夫去过

他们那儿，当时他不在家，是女房东事后告诉他的。可是这两个女邻居通常是避免与他人来往的，甚至对女房东本人也是这样。就在最近这几天，连他也开始察觉出她们家里有点儿反常，但像今天发生的这种场面却不曾有过。我现在之所以回忆起我们关于女邻居的这一席谈话，是因为后来出了事；至于在谈话的当时，仅一门之隔的女邻居家里却是一片死寂。我谈到斯捷别利科夫曾建议必须跟女房东谈谈，应该劝她撵走这两个女邻居，他甚至重复了两遍："您等着瞧吧，您等着瞧吧！"这个细节瓦辛听得特别用心。

"那您就等着瞧吧，"瓦辛补充了一句，"他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决不是平白无故的：看待这种事他目光敏锐。"

"那么依您的看法，是该劝女房东撵走她们啦?"

"不，我不是说要撵走她们，我只是担心别出什么事……不过，不管出这样那样的事，反正都会收场的……我们别谈这事了。"

关于韦尔西洛夫拜访女邻居这件事，他断然拒绝下结论。

"各种可能性都存在：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口袋里有了钱……不过，也很可能他只是做了一次施舍，这合乎他的习惯，但也许还合乎他的癖好。"

我告诉他，斯捷别利科夫刚才还扯到了关于"婴儿"的事。

"斯捷别利科夫在这件事上是彻头彻尾弄错了。"这话瓦辛说得特别认真，而且口气特别强调（所以我记得分外清楚）。

"斯捷别利科夫，"他继续往下说，"有时过于相信自己对具体实事的推断能力，所以他往往按照自己的逻辑——这种逻辑时而也能洞察秋毫——匆匆做出结论。可是如果认真研究当事人的话，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可能带有意想不到的浓厚的离

奇色彩。他对这件事的判断就是这样：他多少知道了一点儿事情，就断定孩子是韦尔西洛夫的，可实际上这孩子并不是韦尔西洛夫所生。"

我再三追问他，结果大吃一惊地得知：这孩子竟然是谢尔盖·索科利斯基公爵的。莉季娅·阿赫马科娃不知是因为有病呢还是仅仅因为脾气古怪，有时她会做出一些傻事来。还在碰到韦尔西洛夫以前，她就迷恋上了公爵，按瓦辛的说法，公爵"对她的委身相许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男女私情持续了很短时间：读者已经知道，后来他俩吵了一架，莉季娅赶走了公爵，"那一位似乎很高兴这样收场"。

"这个姑娘挺古怪，"瓦辛补充说，"甚至很可能她的理智并不是始终清醒的。可是公爵临去巴黎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把自己的受害者抛进了何种境地，直到最后，直到他回国以前，他还不知道真相。韦尔西洛夫跟这年轻女子交上朋友后，之所以向她求婚，就是因为她的状况逐渐暴露出来（看来，她的父母几乎直到最后都没起过疑心）。堕入爱河的姑娘喜出望外，把韦尔西洛夫的求婚'不仅仅看做只是他的自我牺牲'，不过她对这种自我牺牲也是很看重的。""当然啰，他把这事办得十分妥帖，"瓦辛补充道，"孩子（一个女婴）早产了一个月或者六星期，被安置在德国的某个地方，但后来韦尔西洛夫把她接了回来，现在寄养在俄国的什么地方，也许就在彼得堡。"

"可吞含磷火柴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我毫无所知，"瓦辛断然答道，"莉季娅·阿赫马科娃在产后两星期左右就死了，其中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公爵从巴黎回来后才知道有了孩子，好像开头还不相信这是他的孩子……总之，这件事直到现在有关各方还守口如瓶呢。"

"这个公爵真不是个东西！"我气愤地喊道，"竟这样对待

一个有病的姑娘!"

"那时她病得还不怎么厉害……再说是她主动赶走他的……诚然，他一赶就走，也许太急了些。"

"您还替这样的卑鄙小人辩护?"

"不，我只是不称他为卑鄙小人而已。这件事有许多因素，除了直接卑鄙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成分。总的说来，这件事相当平常。"

"告诉我，瓦辛，您对他多少有所了解吧?我特别相信您的意见，很想听听您对他的看法，因为这涉及到一个跟我极其有关的情况。"

可是对这个问题，瓦辛答得似乎过于谨慎。他认识公爵，至于在什么情况下跟他相识，他显然故意不提。接着他告诉我说，根据公爵的性格，他理应得到某些宽容。"他充满了许多真诚的志向，感受力又强，但却既无足够的智力，又无足够的意志力去驾驭自己的种种意愿。"他是个没有学问的人，许多思想和事物对他来说是力所不及的，然而他却会一头扑进去。比方说，他会喋喋不休地要您相信这类思想:"我是公爵，而且属于留里克王朝的家族①，万一我不得不挣钱糊口、而又干不了别的营生的话，那我何不去当一名皮匠帮手呢?招牌上可以写上:'某某公爵皮匠店'——甚至挺气派呢。""他说得出就做得出，"瓦辛补充道，"可这完全不是出于信念的力量，而只是出于一种极其轻率的感想而已。事后他必定后悔，于是他总会走上完全相反的某个极端，——这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在

① 留里克王朝即罗斯公的王朝，古代基辅公、弗拉基米尔公、莫斯科公以及俄国沙皇(9—16世纪)都被认为是留里克的后裔，20世纪以前的一些贵族家族以及一些封侯的后裔也属于留里克王朝的家族。

我们这个世纪，有许多人就这样陷入了困境，”瓦辛总结道，“就因为他们生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不禁沉思起来。

“他早先是被团队开除的，真的吗？”我问。

“我不知道他是否被开除，但他离开团队确实是由于惹了些麻烦。去年秋天，也就是在退役之后，他在卢加住过两三个月，您知道吗？”

“我……我知道您那时住在卢加。”

“对，我也住过一段时间。公爵同样也认识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

“是吗？我可不知道。说实话，我跟我妹妹很少交谈……不过，难道我母亲真的在家里接待过他？”我嚷了起来。

“哦，不：他跟您母亲并不直接认识，是通过了第三个家庭。”

“对，我想起来了，妹妹不是跟我说过那孩子的事吗？莫非那孩子也在卢加？”

“待过一段时间。”

“现在在哪儿？”

“肯定在彼得堡。”

“我这辈子永远也不会相信，”我异常激动地嚷道，“我母亲会多少参与过莉季娅这件事！”

“在这件事上，除开我不想去弄清的那些疑团之外，韦尔西洛夫本人这个角色倒并没有什么特别应受指责的地方。”瓦辛宽容地含笑说。看样子，他觉得跟我谈话渐渐成了一个负担，只是他没有明显表露而已。

“我永远永远也不会相信，”我又嚷了起来，“一个女人会把丈夫让给别的女人，这我决不相信！……我敢发誓，我母亲

没有参与过这件事！”

“不过，她好像也没有反对。”

“要是我处在她的位置上，哪怕仅仅出于自尊，我也不会去反对！”

“就我而言，我是根本不会去评判这种事的。”瓦辛结束道。

是的，尽管瓦辛极其聪明，但他也许对女人毫不了解，所以她们的许多想法和做法对他是个谜。我不再谈下去了。瓦辛在一家股份公司里临时当差，我知道他往往把工作带回家里来做。经过我再三逼问，他才承认现在他得干工作——算账，于是我竭力请求他不必跟我客气。这似乎让他挺高兴，但他在伏案算账之前，先动手给我在长沙发上铺被褥。起初他是想把床让给我睡的，可我不答应，这似乎也让他挺高兴。他从女房东那儿取来了枕头和被子，显得异常客气和殷勤，但不知为什么，我见他为我这么张罗，心里感到不自在。我倒更喜欢有一次偶然在叶菲姆家过夜的情景，那是大约在三星期前，我去了位于彼得堡区的他家。记得当时他胡乱给我弄了睡铺，也是在长沙发上，而且瞒着他姑姑，不知为什么他总以为，要是让姑姑知道了有同学来他处过夜，她准会生气。没有被单就铺上衬衣，没有枕头就把大衣叠起来代替，我们笑得好开怀。记得兹韦列夫铺好床之后，还爱惜地用手指弹了弹沙发，跟我说：

“Vous dormirez comme un petit roi.”①

他那种傻乎乎的快乐和那句跟他毫不相配的法国话起了作用：我当时在这位丑角那儿美美地睡了一大觉。至于瓦辛，我一直等到他终于背对我坐下工作时，这才大大松了口气。我懒

① 法文：“您会睡得像个小国王呢。”

洋洋地躺在长沙发上，望着他的后背，想了很久，想了很多。

三

也确实有可想的。我思绪万千，但没有连贯的思路：尽管有些感受显现得非常清晰，然而由于感受太多，没有一种感受能使我沉湎其中。一切似乎都是一闪而过，互不关联，又没有次序，我记得，我自己也根本不想停留在某一种感受上，或者理顺思考的次序。甚至关于克拉夫特之死的思考，也不知不觉退到了次要的位置。最使我激动的是我自己的处境：我已经实现了“决裂”，我随身带着我的箱子，我已经不在家里，开始了全新的路，仿佛在这之前我的全部打算和准备都是闹着玩的，而“只有现在，一切才突然地、更是出乎意料地真正开始了”。尽管我心烦意乱，这个念头却使我振奋，使我开心。可是……可是还有一些别的感受，其中之一特别从其他感受中凸现出来，控制我的心灵，奇怪的是，这个感受也使我振奋，似乎在把我引向某种极大的快心事。不过，这个感受却始于担心：我从刚开始不久就一直担心，我在冲动和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是否把文件一事对阿赫马科娃泄露得太多。“是的，我说得太多了，”我想，“没准她们会猜到些什么……那就糟了！要是她们起了疑心，不用说，那就决不会让我安宁，不过……随它去吧！也许她们根本就找不到我——我会躲起来！可是，万一她们真的开始对我紧追不舍呢……”于是我开始细细回想刚才的情景，越想越开心：我怎样站在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面前，她那双傲慢、但充满惊讶的眼睛又是怎样瞪着我。直到我走出房间时，她还是那副惊讶的样子，这一点我也记起来

了。她的眼睛并不十分黑……只有睫毛才很黑，所以衬得眼睛看上去乌溜溜的……

突然，我记得，我开始感到这种回忆太龌龊了……我又懊恨又厌恶——既对她们，又对自己。我责备自己不检点，于是极少去想别的事。“在年轻女邻居这件事上，我为什么对韦尔西洛夫没有一点儿气愤呢？”——我突然冒出了这个念头。就我来说，我坚信他在这件事上扮演的是煽情角色，他上门是想去找乐子，可这一点却没有引起我的愤慨。我甚至觉得他不可能有别样的作为，尽管实际上我也很高兴见到他当众出丑，但我并不责难他。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我认为重要的是，当我跟年轻女邻居进屋的时候，他会那么恶狠狠地瞧着我，他从来不曾用这种眼神瞧过我。“他终于认真看待我啦！”我暗自思忖，心都抽紧了。哦，要是我不爱他的话，我就不会见他恨我而感到如此高兴！

我终于打起了瞌睡，完全进入了梦乡。我只记得在睡意蒙眬之际，瓦辛结束了工作，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定睛望了望我的长沙发，就宽衣，吹灭了蜡烛。这时已是半夜十二点多。

四

差不多过了整整两个小时，我突然像发疯似的半睡半醒地直蹦起来，坐在我的长沙发上。从那扇跟女邻居家隔开的门背后，传来恐怖的叫声、哭声和呼号声。我们的房门已经敞开，在烛光晃动的走廊里有人在嚷嚷着，奔跑着。我本想喊一声瓦辛，但我猜到他早已不在床上了。由于不知道到哪儿去找火

柴，我便摸索到自己的衣服，开始在黑暗里匆匆穿衣。显然，女房东、也许还有房客们全都跑到了那两个女邻居的家里。但只有一个声音在哭叫，就是那个上了年纪的女邻居，而令我记忆犹新的昨天那个年轻的声音，——却始终听不见：我记得这就是我当时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我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瓦辛就慌慌张张走了进来，他一伸手就熟练地找到了火柴，房里亮起了烛光。他只穿着内衣和睡袍，脚上是双便鞋，于是他马上开始穿衣。

“出什么事啦?”我大声问他。

“一件最糟糕、最麻烦的事!”他几乎恨恨地答道，“您讲过的那位年轻女邻居在自己房里吊死了。”

我不由啊的一声叫了起来。我无法表达当时我心里有多痛苦！我们奔到了走廊上。我得承认，起初我还不敢走进女邻居的屋里，直到人家把死者解了下来，我才看见了这个不幸的姑娘，即使这样，我还是离她有一段距离，遗体盖上了一条被单，两只窄窄的鞋底露在外边。不知为什么，我始终没有瞧一眼她的脸。她母亲的状况十分可怕，我们的女房东守在她身边，但女房东的惊吓程度倒不太大。寓所里的所有房客都聚在这儿了。人数并不多，总共才三个：一个是上了年纪的水手，平时爱唠叨、好挑剔，但这会儿却一声不吭；还有一对是从特维尔省来的老年夫妇——相当可敬的文职人员。我不想描述后半夜余下的情形，先是忙碌张罗，之后是官府来人。说真的，天亮以前我浑身都在微微打战，但我认为自己决不该回去睡觉，尽管我在那儿没干什么事。何况所有的人都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样子，甚至似乎是特别打起了精神。瓦辛还乘车到什么地方去跑了一趟。女房东原来是个很值得尊敬的女人，比我估计的要好得多。我劝她别留下母亲孤零零一个人守着女儿的尸

体，希望她把母亲带到她的屋里去，至少要待到天明（我认为我这个主意出得好）。她一口答应了，不管这位母亲如何挣扎、哭着不肯离开尸体，但最终还是去了女房东那儿，女房东立即吩咐烧起茶炊。在这以后，房客们也就各自回到自己屋里，关上了门。可我还是说什么也不想回去躺下，久久地坐在女房东那儿，她甚至很高兴多我这么个人在场，何况这个人还能告诉她们有关这件事的某些情况。茶炊很有用处，凡是遭到了灾祸与不幸，特别是那些可怕的、出人意外又离奇费解的灾祸与不幸，茶炊总是俄罗斯人不可或缺的东西：此刻连这位母亲也喝下了两杯茶，当然是在别人再三请求、甚至几乎是硬逼之后喝下的。不过说句心里话，我在这不幸女人身上看到的如此毫不掩饰的剧烈痛苦，是我前所未见的。在几次号啕大哭、歇斯底里发作之后，她居然乐意开口了，我就贪婪地听她诉说。在这种场合，有些不幸的人，特别是不幸的女人，甚至是必须要让他们尽量多讲话的。此外，有一些可以说是备受苦难蹂躏的人，无论是大难还是连续不断的小难，他们一辈子忍受着，忍受过许多许多，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不幸，不管碰上什么飞来横祸，他们都不感到意外，甚至面对心爱人的棺材，也不会忘记任何一条迎合他人的规则——他们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的处世经验。我并没有责难的意思，因为这不是出于庸俗的利己主义，也不是由于教养粗俗。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比起外表十分高尚、受人尊敬的女人来，也许甚至能找到更多的闪光东西。可是长期逆来顺受的习惯、自我保护的本能、长期担惊受怕的体验最终起了作用。在这一点上，那个自杀的可怜女人就不像她的妈妈。不过她俩的脸看上去却很像，虽说死者长得绝对不难看。这位母亲还不算太老，才年近五十，也是浅色的头发，但眼睛和双颊都深陷了进去，一副不整齐的牙齿又大又

黄。而且她浑身上下看着都有点儿发黄：脸上和手上的皮肤活像牛皮纸，她那套深色的衣服也旧得完全发了黄，而右手食指的指甲上，不知为什么，还细心、工整地涂上了黄蜡。

这个可怜女人的诉说，有些地方前言不搭后语。下面我就按自己听懂并记住的来叙述。

五

她们从莫斯科来。她已守寡多年，“还是位七品文官的夫人”。虽说丈夫生前当官，死后却几乎什么也没留下，“只有两百卢布的赡养费。可两百卢布够什么用呢?”然而她还是把奥莉娅培养成人，让女儿上完了中学……“要知道她学习多么用功，多么用功啊，毕业时得到了一枚银质奖章……”（说到这里，这位母亲当然又哭了很久。）丈夫生前在彼得堡本地一个商人身上损失了一笔钱，几乎有四千卢布。后来这个商人又一下子发了，“我就找人商量，说我手头有契据，人家说：‘您去找他，钱一定能全数收回……’于是我就开始写信讨钱，商人终于答应还钱了。人家劝我说，您得亲自登门去要。我就跟奥莉娅收拾行装来到了这里，已经有一个月了。我们手头拮据，租这么间房是因为它是这儿最小的一间，而且我们俩都看出，这所房子里都是正派人，这一点对我们最重要：我俩都是没经验的女人，随便什么人都可能欺侮我们。就这样，我们给您付了一个月的房租，过日子东拼西凑，彼得堡的物价又贵得要命，而我们找的那个商人却翻脸不认账。‘我认都不认识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的事。’我手头的契据不完备，这一点我自己也明白。于是有人给我出主意：您该去找某某著名律师，他当

过教授，不仅是律师，还是个法学专家，他准会告诉您该怎么办。我就带了仅剩的十五卢布去找他。那位律师走了出来，没听我讲完三分钟就开口说：‘我明白了，知道了，’他说，‘那位商人要是愿意还钱，他就会还，要是不愿意还，他就不会还，您要是打官司——您自己就可能吃亏，您最好还是和息吧。’接着他还开玩笑地引用了福音书里的话：‘你同对头还在路上，赶紧跟他和息吧，免得花尽最后一文钱。’① ——他边笑边送我出门。而我的十五卢布就这么白花了！我回到奥莉娅身边，两个人对坐着，我哭了。奥莉娅却不哭，傲然坐在那儿，十分气愤。她在我面前一辈子就是这样，连小时候也这样，从不叹气从不哭，这会儿她坐着，目光威严，甚至让我瞧着都心惊肉跳。你们信不信：我怕她，真的很怕她，早就怕她了，有时候我真想诉诉苦，但当着她的面就是不敢。我最后一次去找那个商人，在他那儿大哭了一场。‘哭也是白哭！’商人说，我的话他连听都不要听。可我得跟你们说实话，由于我俩没有打算在这儿长住，所以早就囊空如洗了。我开始把衣服一件件拿去典当，借以维持生活。我们把能当的衣服全当光了，她就把仅剩的一件内衣也给了我，我不由痛苦得哭了。她一跺脚跳了起来，自个儿跑去找商人。这商人是个鳏夫，跟她谈了一会儿说：‘您后天五点钟来，也许我有话跟您说。’她回来后挺高兴：‘他也许有话跟我说呢。’当然，我也高兴，只是不知怎么的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想，没准会出什么事，但我又不

① 这段话出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25～26节，但引文不够确切。原话是：“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敢细问她。到了那一天，她从商人那儿回来时，脸色惨白，浑身发抖，一头扑倒在床上，于是我明白了一切，但还是不敢问她。你们想都不会想到：这个强盗拿出十五卢布给她，居然说‘要是我发现您是处女，我就再加四十卢布’。他就这么当面对她说，毫不知羞耻。她告诉我，她当时立即扑过去想揍他，但他把她一推，就躲进了另一间房里，甚至还锁上了门。然而跟你们说句掏心话，我们几乎没有吃的了。我们把一件兔皮袄拿出去卖了，她去一家报馆登了个广告：说她能帮人补习包括算术在内的各门功课，‘哪怕补一次课给三十戈比也行’。打这以后，直到快出事之前，我这当娘的甚至瞧着她都感到害怕：她不跟我说一句话，整小时整小时地坐在窗口，望着对面的屋顶，往往会突然喊叫：‘哪怕洗衣服、挖土，我都干！’——她跺跺脚，只喊叫这么一句。我们在这儿没有一个熟人，根本没地方可以投靠，我心里着急：‘我们往后怎么办？’但我还是怕跟她说。有一次她白天睡了一会儿，醒来后，睁大眼睛望着我，当时我坐在箱子上，也望着她，只见她默默地站起来，走到我跟前，紧紧地紧紧地抱住我，我们俩忍不住都哭了，我们紧抱在一起，坐着哭个不停，谁也不肯松开手。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这样。我们正抱在一起坐着。您的纳斯塔西娅突然走进来说：‘外边有位太太在找您，在打听。’这不过是四天前的事。那位太太走了进来，我们看见她穿得挺讲究，虽然说的是俄国话，但好像带点儿德国口音：‘您是不是在报上登过广告，说您想教课？’当时我们听了好高兴，赶紧给她让座，她很亲切地笑着说：‘不是我要聘您，而是我侄女有几个小孩，要是您愿意，请到我们那儿来，到时我们会谈妥的。’她留下地址就

走了：沃兹涅先斯基桥边，某号某住宅[1]。奥莉娅去了，当天就急匆匆地去了，可两个钟头后她回来时，歇斯底里发作，浑身颤抖。后来她讲了事情的经过：'我向看院子的人打听：某某住宅在哪儿？他朝我打量了一眼，问："您要上那个住宅里去干什么？"'这话问得很蹊跷，本该让人有所醒悟。但我这个女儿向来独断独行，又没有耐心，受不了这些盘问和无礼。'您要去就去吧！'看院子的人给她指了指楼梯，便掉头回到了自己的小屋。你们猜怎么着？她刚走进住宅开口询问，便有一群女人从四面八方朝她跑来：'请进，请进！'——全是些女人，嘻嘻哈哈地扑过来，脸上搽满胭脂，举止十分下流，还有人在弹钢琴，她们不容分说把她拉了过去。奥莉娅说：'我本想拔腿就逃，可她们不放我走。'她当时就害怕起来，两腿发软，但人家硬是不放她走，亲热地又说又劝，还开了一瓶黑啤酒，端来请她喝。她顿时跳了起来，哆嗦着拼命喊：'放我走，放我走！'她冲到门口，门口有人把着，她尖声吼叫。这时，刚才来我们家的那个女人跳过去，打了我的奥莉娅两记耳光，把她推出门外说：'你这个贱骨头，待在这种华贵的房子里你还不配！'而另一个女人对着楼梯上她的背影喊：'是你自个儿跑来求我们的，因为你没有饭吃，可你这副嘴脸我们还瞧不上呢！'这天夜里她一直发烧，胡话不断，可第二天早晨却目光炯炯，起床后走来走去地说：'上法院告她，上法院！'我没有吭声，心想就算上了法院，又有什么证据呢？她不停地走来走去，绞着双手，泪水直淌，可是却把嘴唇咬得紧紧的。打这开始直到死去，她的整个脸色始终发灰。到了第三天，她的心情轻松了些，不说话，似乎平静了下来。就在这天下午四点钟，

① 按 1872 年的统计资料，该地所在的区里妓院特多。——俄编注

韦尔西洛夫先生来到了我们家。

“实话直说：我至今也弄不懂，奥莉娅向来疑心很重，当时怎么会几乎从头一句话开始就听信了他呢？当时最引起我俩好感的，是他态度十分认真，甚至有点儿严肃，说话轻声轻气，措辞慎重，一举一动很有礼貌，——岂止有礼貌，简直是恭恭敬敬，但却看不出有丝毫献殷勤的意思：人家来这儿分明是出于一片好心。‘我读了您在报上登的广告，尊敬的女士，’他说，‘您写得不够妥当，这么写甚至可能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开始做解释，老实说我听不明白，提到了算术什么的，但我瞧见奥莉娅涨红了脸，整个人都仿佛有了精神，她不但听他解释，还乐意跟他交谈，（这个人想必非常聪明！）我听见她甚至还向他道谢。他那么周详地问清了她的一切情况，显然他在莫斯科住过很久，原来他还直接认识一所中学的女校长。‘我一定能给您找个教书工作，’他说，‘因为我在本地有许多熟人，甚至许多头面人物我也可以去拜托，所以即使您想谋一份固定工作，也可以考虑……不过眼下请恕我向您提一个直率的问题：现在我能否为您效点儿劳？假如您允许我不管从哪方面为您效点儿劳的话，那不是我让您高兴，恰恰相反，是您让我高兴。这钱就算是您向我借的，等您一找到工作，您不妨在最短时间内还给我。请相信我的人格，往后要是我自己也陷入了这种贫困，而您反倒丰衣足食，那我也会直接来找您帮这种小忙，我会派我妻子和女儿来的……’我实在记不全他说的话，当时我只是感动得直掉泪，因为我看见，连奥莉娅也感激得嘴唇发颤。‘如果说我收下这笔钱的话，’她回答他说，‘那是因为我信任一个正直而人道的人，一个可以做我父辈的人。’她说得真好，又简明又得体：‘一个人道的人。’他马上站起来说：‘我一定能给您找到教书工作，一定替您谋个职位，从今

天起我就着手去找，因为您的文凭说明您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工作。’……我还忘了说，他进屋以后，一开始就详细看过她中学里的所有证书，是她拿给他的，他还亲自查问过她各门功课的成绩……‘妈妈，’事后奥莉娅告诉我说，‘您知道，他还查问过我的功课成绩呢，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跟这样一个既有修养又有学问的人谈话，真是难得。’……她喜形于色。桌上放着六十卢布，‘您收起来吧，妈妈，’她说，‘等我有了工作，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尽快还钱，我们要证明我们是正派人，是懂礼貌的人，这一点他已经看到了。’接着她沉默了一会儿，我瞧见她呼吸沉重：‘您该知道，妈妈，’她突然跟我说，‘要是我们不懂礼貌的话，也许我们出于自尊就不会收他的钱了，我们现在收了这笔钱，只是向他证明我们懂礼貌，我们完全信任他，信任一个可敬的白发老人，是不是?’起初我不怎么懂她的意思，于是我说：‘奥莉娅，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一个高尚而有钱的人的恩赐呢，何况他还是个好心人?’她脸色一沉，对我说：‘不，妈妈，不是这么回事，我们需要的不是恩赐，可他的“人道精神”很可贵。至于这钱，刚才我们要是根本不拿有多好，妈妈，既然他已经许诺给我谋个工作，这就够了……虽说我们很穷。’我说：‘行啦，奥莉娅，我们已经穷得不收钱万万不行了呢。’——当时我甚至还笑了一笑。是的，我心里暗暗庆幸，但一小时后她又叮咛说：‘妈妈，这笔钱您先别花，’这话她说得斩钉截铁。‘怎么啦?’我问。‘就这样。’她冲出了这么一句，就不再多说。整个晚上她都一声不吭，但夜里一点多钟我醒来时，听见奥莉娅在床上翻来覆去。‘妈妈，您睡不着吗?’‘是啊，睡不着。’我答道。她说：‘您听我说，他这是想侮辱我吗?’‘瞧你说的，这怎么可能呢?’我说。‘肯定是这样：他是个卑鄙小人，’她说，‘他的钱您一个子儿也不

许花。’我刚开始想劝她，甚至在床上哭了几声，可她一骨碌翻过身去，脸对着墙说：‘您别说啦，让我睡觉！’第二天早上，我瞧见她一直在走来走去，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你们信也好不信也罢，可即使面对上帝的审判我都敢说：那时她已经精神失常了！自从她在那所下流的房子里受到侮辱，打那时起，她的心神……还有意识都糊涂了。那天早上我瞧着她，心里就犯疑，我担心极了，心想我得处处顺着她。‘妈妈，’她说，‘他居然连自己的地址都不敢留下。’‘你这么说真是罪过，奥莉娅，’我说，‘昨天他的话你都亲耳听见了，后来你自己还夸他，感激得差点儿掉了泪呢。’我话音刚落，她就跺跺脚尖叫起来：‘您是个自卑自贱的女人，您受的是农奴制的旧式教育！’……她二话没说，抓起帽子跑了出去，我在她背后喊叫，心想她这是怎么啦？她要跑哪儿去？而她却跑去找住址查询处，查明了韦尔西洛夫先生的地址后，回来说：‘我今天马上去把钱还给他，把钱扔到他脸上。他是想侮辱我，就跟萨夫罗诺夫一样（萨夫罗诺夫就是我提到的那个商人），只不过萨夫罗诺夫像粗野的乡巴佬那样侮辱我，而他却像个狡猾的伪君子。’不幸的是，就在这时，昨天那位先生突然来敲门，说：‘我听见你们在谈韦尔西洛夫，我可以奉告一点儿情况。’她一听到对方能谈韦尔西洛夫的情况，就扑到他跟前，发疯似的说个没完，我瞧着她十分吃惊：她向来沉默寡言，怎么竟会跟人家这么喋喋不休，而且还是跟一位完全陌生的人？她脸颊发烧，眼睛发亮……而他的话又正中她的下怀：‘您说得完全对，尊敬的女士，韦尔西洛夫活脱就像报纸上描写的那些本地将军：这种人衣冠楚楚，佩满勋章，凡是在报上登广告的家庭女教师，他们都一一上门拜访，走这家走那家，有时真能找到他们要的东西，要是找不到呢，就坐上一会儿，聊上一会儿，许

下许多愿，一走了之，——毕竟他也给自己解了闷呢。’奥莉娅听得甚至纵声大笑起来，只是笑声里带着愤怒，我看见这位先生抓住了她的一只手，把它拉近自己的胸前，说：‘尊敬的女士，我本人就有一笔资金，随时都可以提供给漂亮的姑娘，不过最好先让我吻吻她可爱的小手……’我瞧见他硬拉着想吻手，她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也同时跳了起来，我俩一块儿把他撵了出去。就在傍晚时，奥莉娅硬是从我手里取了钱跑了，回来时她说：‘妈妈，我报复了那个不正派的人！’‘唉，奥莉娅啊奥莉娅，’我说，‘也许我们失去了一个好运气，你侮辱了一个高尚而仁慈的人！’我被她气哭了，再也忍不住了。她冲着我嚷道：‘我不要，我不要！哪怕他是个最正派的人，我也不要他的施舍！我用不着别人来可怜我！’我躺到床上，根本没想到会出事。您在墙上钉的那颗钉子我留意过好多回，以前是挂镜子用的，可我没有料到，根本没有料到，无论是昨天还是早先我都没想过，根本没想过，我万万想不到奥莉娅会干这种事。通常我都睡得很沉，还打呼噜，那是因为血尽往我头里涌，有时还涌进我的心，我会在睡梦里大叫大喊，引得奥莉娅夜里来叫醒我：‘妈妈您这是怎么啦，睡得那么沉，需要叫您时都叫不醒。’‘哦，奥莉娅，’我说，‘我就是睡得沉，哦，睡得真沉。’昨天我想必又打呼噜了，她候到这时就毫不担心地起了床。那根皮带子原是捆箱子用的，很长，搁在眼皮子底下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昨天早上我还想过：‘该把它收好，免得这么乱丢着。’那把椅子想必是她后来用脚蹬开的，事先她还用自己的裙子垫平了椅子脚，免得它发出响声。想必过了很久很久，过了整整一小时或者比一小时更多，我才醒过来叫喊：‘奥莉娅，奥莉娅！’我似乎一下子觉得出了什么事，我喊她。也许是因为我听不见她床上有呼吸声，也许是因为我在黑暗中

依稀辨出，她那张床好像空着，——总之，我蓦地跳了起来，伸手去摸：床上没人，枕头也是凉的。我顿时心慌意乱，定在原地好像失去了知觉，头脑里乱成一片。我心想：‘她出去了’——于是我朝前跨了一步，我看见她自己好像就站在靠床的墙角处，在房门的旁边。我站在那儿默默地望着她，而她好像也在黑暗中望着我，一动也不动……我想：‘可她干吗要站在椅子上呢？’‘奥莉娅，’我悄声唤她，心里感到害怕，‘奥莉娅，你听见没有？’突然我好像一下子开了窍，再跨前一步，朝前伸出双手，一直伸过去抱住了她，可她在我手里摇摇晃晃，我抓紧她，她还是摇晃，我全明白了，可我不想明白……我想喊，可喊不出声……完了！我心里想着，便一头栽倒在地上，这时才喊出声来……”

“瓦辛，”早晨五点多钟时，我说，“要不是您那位斯捷别利科夫介入，也许就不会出这种事。”

“谁知道呢，迟早总会出事的。这事不该这样看，即使没有他介入，事情也已经有了因由……当然，这位斯捷别利科夫有时候……”

他没有说完，厌恶地皱了皱眉头。六点多钟他又出去了，他一直在奔波。最后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天已放亮。我微微有点儿头晕。眼前仿佛浮现出韦尔西洛夫的身影：这位太太的诉说使人对他有另一种看法。为了更便于思考，我就穿着靴子、和衣躺到瓦辛的床上，只想躺一会儿，根本无意睡觉——谁知一下子就睡着了，甚至不记得是怎么入睡的。我几乎睡了四个小时，谁也没来叫醒我。

第 十 章

一

十点半左右我醒了，久久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在我昨天睡觉的那张长沙发上，坐着我的母亲，而她身边坐着不幸的女邻居——那个自杀姑娘的母亲。她俩手拉着手在说话，多半是为了不吵醒我，声音放得很轻，而且双双都在流泪。我一下床就径直扑过去吻我的母亲。她顿时容光焕发地回吻我，还举起右手给我画了三次十字。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房门打开了：进来的是韦尔西洛夫和瓦辛。妈妈立即站起身，带着女邻居出去了。瓦辛跟我握了握手，韦尔西洛夫却对我一句话也不说，一屁股坐到圈椅里。看样子，他和妈妈在这儿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他眉头紧皱，一脸忧虑。

“我最最后悔的是，”他慢条斯理地对瓦辛说，显然是在继续刚才的谈话。“我没能赶在昨天晚上处理好一切，否则这件可怕的事肯定就不会发生！再说时间还来得及：当时还不到八点。昨天她一跑出我们家，我就想立刻跟着她来这儿，说服她

改变自己的看法，可又偏偏碰上了一件意外的紧急事情，其实这事我完全可以推迟到今天……甚至过一星期再办的，——就是这件该死的事情绊住了我，坏了大事。两件事情就这么凑在了一起！”

“也许您根本说服不了她，因为即使您不介入，看来她也已经憋足了气，怨恨到了极点。”瓦辛顺嘴插了一句。

“不，我本可以说服她，肯定能说服她。要知道，当时我想过让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替我去。我产生过这个念头，但只是一闪而过。光是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一个人就能说服她，这不幸的姑娘就能活下来。不，今后我再也不会去管闲事……不会去‘做善事’了……我生平管闲事就管了这么一次！我原以为自己还没有落伍，自己还能理解现代青年。是啊，我们老一辈人几乎还没有成熟就衰老了。顺便说说，确实有许多当代人，依旧在想当然地自认为是年轻的一代，就因为昨天他们还是这样的一代，然而他们却没有发现自己已被时代淘汰了。”

“这里出现了一个误会，一个十分明显的误会，”瓦辛有根有据地指出，“她母亲说，她在妓院里极度受辱之后似乎就失去了理智。再加上一个情况：她最初在商人那儿受到的侮辱……如此种种在先前也同样可能发生过，所以依我之见，这根本不能说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青年的特点。”

“现代青年有点儿浮躁，当然，还对现实缺少了解，虽说任何时代的任何青年都对现实缺少了解，但当今的青年似乎更甚……您说，斯捷别利科夫先生在这件事上使了什么坏？”

“一切都该怪斯捷别利科夫先生，”我突然插嘴道，“倘若没有他，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他火上加油。”

韦尔西洛夫听着，但没有瞧我一眼。瓦辛皱起眉头。

“还有一个荒唐可笑的情况，我也得责备自己，”韦尔西洛夫继续说道，依旧慢条斯理，拖词带腔。“看来由于我的坏习惯，当时我竟在她面前显露了一点儿愉快的心情，冒失地笑了几声，因而，我还不够生硬、冷淡和阴郁，而这三种品性似乎又是现代青年特别看重的……总之，我使她有理由把我当做流浪的塞拉东①。”

“完全相反，”我又生硬地插嘴道，“她母亲特别强调说，您恰恰是以认真、甚至严肃和诚恳引起了她们极大的好感，——这是她亲口说的。等您走后，那位自杀的姑娘也曾这样夸过您。”

“是——吗？”韦尔西洛夫口齿含糊地说，终于瞥了我一眼。“请您把这张纸收好，要了结此事少不了它。”他把一张纸片递给瓦辛。瓦辛接过纸片，见我好奇地瞧着，便递给我看。这是一张便条，歪歪斜斜写着两行铅笔字，大概是摸黑草就的：

妈妈，亲爱的，恕我中止了我在人生舞台上的初次演出。

让您伤心的奥莉娅

“这是早晨才找到的。”瓦辛解释道。

“这便条真怪！”我惊得叫了起来。

---

① 是法国作家奥诺莱·杜尔菲（1567—1625）所著带有田园诗意的长篇小说《阿丝特莱》中的主人公。小说写牧羊人塞拉东与牧羊女阿丝特莱的恋爱故事。后来塞拉东这个名字就成了“爱向妇女献殷勤者”的代名词。

“怪在哪里？”瓦辛问。

“难道在那种时刻还能写幽默话吗？”

瓦辛用询问的目光瞧着我。

“而且这幽默也很怪，”我接着说，“这是中学同学之间用的那种套话……谁会在那样的时刻、在那样的便条里给不幸的母亲写道：‘我中止了我在人生舞台上的初次演出’，要知道，她分明是爱她母亲的呀！”

“为什么不能这么写？”瓦辛还是不明白。

“这里面根本没有丝毫幽默，”韦尔西洛夫终于发表了意见，“当然，这样的措辞不恰当，语气完全不适合，也确实可能是在中学里兴起来的，或者如你所说，是中学同学之间用的某种套话，要不就是从什么讽刺小品文里引来的，但死者在这张可怕的便条里使用这种措辞，完全是诚心诚意、十分认真的。”

“这不可能，她修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毕业时还得过银质奖章。”

“如今银质奖章说明不了什么。现在很多人毕业时都得过呢。”

“又在责难青年人了。”瓦辛微微一笑。

“一点儿也不，”韦尔西洛夫回答他说，起身取过了帽子，“如果说当今的一代人文字功底不怎么样的话，可他们毫无疑问却拥有……许多别样的长处，”他异常认真地补充完了这句话，“何况我说的是‘很多人’，不是‘所有人’，比方说您吧，我就不能责难您文字功底差，而您也是个青年人。”

“何况瓦辛也没发觉‘初次演出’这种字眼有什么不好！”我忍不住说了出来。

韦尔西洛夫默默地把手伸给瓦辛，瓦辛想跟他一块儿出

去，也抓起了帽子，对我喊了声“再见”。韦尔西洛夫出去时却对我不理不睬。我也觉得不该浪费时间了：无论如何得赶紧出去找个住所，——现在比任何时候更迫切！妈妈已经不在女房东那儿，她带着女邻居走了。我走到街上，似乎特别精神抖擞……心里油然升起一种强烈的新感受。而且一切好像有意要促成这种感受：我出奇快地碰到了一个机会，找到了一个完全合适的住所，关于这个住所我以后再谈，现在先把主要的事情讲完。

刚过一点钟，我就重新回到瓦辛住处取我的箱子，凑巧又碰见他在家。他一见我，便神情愉快而诚恳地朝我喊道：

“您能碰见我真让我高兴，我刚准备出去呢！我可以告诉您一件事，想必您会很感兴趣的。”

“我相信会这样！”我嚷道。

“哦！瞧您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告诉我，关于某一封信的事您一点儿也不知道吗？这封信本来保存在克拉夫特那儿，昨天落到了韦尔西洛夫手里，这信恰恰跟他打赢的遗产官司有某种关系。立遗嘱人在这封信里申述了自己的意愿，意思正好跟昨天法庭的判决相反。信还是很早以前写的。总之，我还不知道确切的详情，您可知道点儿什么吗？”

“怎么不知道。前天克拉夫特之所以把我……从那些先生那儿带到他家里，就是为了把这封信转交给我，而我昨天把它转交给了韦尔西洛夫。”

“真的？这跟我料想的一样。您该想到，刚才韦尔西洛夫在这儿说，有件事妨碍他昨天晚上赶来这儿说服这个姑娘，——指的就是由这封信引起的事。就在昨天晚上，韦尔西洛夫直接去找了索科利斯基公爵的律师，他把这封信交给了律

师，拒绝接受判给他的全部遗产。[1]现在他的拒绝已通过立据具有了法律形式。韦尔西洛夫并不是拱手相赠，而是在文据中承认公爵一家拥有全部继承权。”

我被惊呆了，可心里却欣喜不尽。说实在的，当初我完全确信韦尔西洛夫准会把信毁掉，再说，尽管我跟克拉夫特说过，毁信是不高尚的行为，尽管我独处小饭馆时心里反复这样想过，而且认为“我是来找一个纯粹的人，而不是这种人”，——然而在更深的内心，就是在我心灵的最深处，我却认为除了完全把信毁掉之外，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也就是说，我认为毁信是很平常的行为。即使事后我会责备韦尔西洛夫，那也只是故意做的，装装门面，就是说，用以维护我高出于他的局面。可是现在我一听到韦尔西洛夫的这个高尚行为，我却充满了真诚的欣喜，同时又羞又愧地责备自己无耻，责备自己忽视美德，顿时把韦尔西洛夫抬得比我无限地高，我差点儿拥抱瓦辛了。

“一个了不起的人！真是了不起的人！还有谁能这么做呢？”我兴高采烈地叫道。

“我同意您的看法，许多人都不会这么做……而且，无可争辩，这个举动是极其无私的……”

---

① 批评家瓦·雅·基尔波京认为，小说的这一情节是对法国作家狄德罗作品《父亲与子女对话》的回应。狄德罗的这部作品探讨的是一起遗产事件：某死者的遗产没有判给其法定的继承人，而是依据一份偶然找到的文件（这文件已经失去了法律效力，而且是否反映死者的意愿也是疑问）判给了另一个人（作品中的“父亲”）。获得遗产的“父亲”剥夺了死者穷亲属们的物质支援，但直到临终时也不坚信自己是否正确。这场对话的主题是：应该“按法律”还是“按良心”行事。韦尔西洛夫则相反，在类似的事件中剥夺自己获得的遗产。——俄编注

"'但是'呢？……请说下去，瓦辛，您还有'但是'吧？"

"是的，当然还有'但是'：依我看，韦尔西洛夫的举动有点儿仓促，有点儿不够坦率。"瓦辛微微一笑。

"不够坦率？"

"是的，这样做似乎有点儿'硬充好汉'。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本来可以既做到光明磊落，又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即使以最慎重的态度来看待这场官司，那么就算不是一半遗产，无疑也有部分遗产现在可以归属于韦尔西洛夫，更何况这封信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他已经打赢了官司。连对方的律师也持这种看法，我刚才就跟他交谈过。那样做的话同样是高尚的举动，可是就因为自尊心作怪，事情才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主要是韦尔西洛夫先生一时使了性子，行事太仓促了。他刚才还亲口说过，他本可以推迟一星期再办的……"

"您想听我说吗，瓦辛？我不能不同意您的看法，但是……我更爱他这样做，更喜欢他这样做！"

"不过这是趣味问题。要不是您自己引起我说话，我就不说了。"

"就算这样做是'硬充好汉'，那也更好，"我接着说，"尽管'硬充好汉'听起来不怎么样，但它本身却很可贵。要知道，'硬充好汉'毕竟也是一种'理想'，当今有些人心里没了理想，不见得更好，虽说这'理想'甚至有点儿怪，但还是有理想好！您自己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瓦辛，我的好瓦辛，我亲爱的瓦辛！总之，不用说，我是在信口开河，但您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就因为您是瓦辛，所以您能明白，不管怎么说，我要拥抱您，吻您，瓦辛！"

"因为高兴？"

“太高兴了！因为此人‘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①！瓦辛，我是个坏透了的孩子，比不上您。我之所以承认这一点，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完全不一样，要高明些，深刻些。前天我曾经当面恭维过您（而我恭维您，仅仅是因为当时有人在贬低我，压制我），为此我恨了您整整两天。就在那天夜里，我发誓永远不来找您，甚至昨天早上我来您这儿，是心怀恶意的，您要明白：是心怀恶意。我独自坐在这儿的椅子上，对您的房间，您，您的每一本书和您的女房东大加腹诽，竭力贬低您，嘲笑您……”

“这种事不该说出口……”

“昨天晚上，我从您的一句话里断定您不了解女人，当时我很高兴，因为能在这一点上抓住您的短处。刚才我抓住您没发觉‘初次演出’用得不妥，我又非常高兴，这一切全是因为前天我自己恭维过您……”

“这很自然的！”瓦辛终于嚷道（他还是脸带微笑，对我的话毫不感到惊奇），“要知道事情总是这样，几乎人人都这样，甚至做起来很开心，只不过没有人会承认罢了，再说也根本无须承认，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总会过去的，出不了什么事。”

“难道人人都这样？大家都这样？而您说这话时居然还能冷静？要知道抱着这样的看法是没法活的！”

“那么您认为：

对我来说，使我高尚的欺骗，

① 引文出自《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5章，第24节。原是一位父亲谈到归家的儿子（浪子）时说的。小说主人公反其意而用之，此处当指他的父亲韦尔西洛夫。

胜过无数卑劣的真理?①"

"可这是对的,"我嚷道,"这两行诗里含有公认的神圣真理!"

"我不知道,我不想评判这两行诗的是非。想来真理总是取乎其中:就是说,在一种情况下是神圣的真理,可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是谎言。我能确知的只有一点:这个思想还将长久地成为人们争议的一个要点。不管怎么说,我看得出您现在高兴得想手舞足蹈。那就手舞足蹈去吧:活动活动身体有好处,可今天早上我偏偏有好多事要办……您让我误了时间啦!"

"我走,这就走,马上就走啦!只想说一句话,"我已经抓起了箱子,嚷道,"如果说我刚才又一次'讨好'您,那全是因为我进门后,您心甘情愿告诉了我那件事,您为我能碰见您而'高兴',而且没有计较我刚才关于'初次演出'所说的话,您这种心甘情愿一下子又使得我这颗'年轻的心'向着您啦。好了,再见,再见,我会尽可能久地不来找您,我知道这样会使您非常愉快,瞧您的眼色我就看出来啦,这样甚至对我俩双方都有好处呢……"

我一边这样快活地唠唠叨叨,唠叨得几乎气喘吁吁,一边拖着箱子走了出来,带着它乘车去我的住所。关键是韦尔西洛夫刚才明显在生我的气,不愿跟我说话,不想瞧我,这让我特高兴。我把箱子运到住所后,立即飞快去见我的老公爵。说实话,两天不见他,我心里还有点儿不自在呢。何况韦尔西洛夫做的这件事,他肯定已经听说了。

① 引自普希金《英雄》(1830)一诗,引文不够确切。原诗是:"能使人高尚的欺骗,/远胜于无数卑劣的心理。"

二

我就知道，他见了我准会高兴异常，我敢发誓，即使没有韦尔西洛夫那件事，今天我也会去看他的。在此前以及昨天，我只是因为想到也许在那里会碰见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所以心存惧怕，可现在我已经什么都不怕了。

他高兴得开始拥抱我。

“韦尔西洛夫那件事！您听说了吧？”我一开口就开门见山地谈主要问题。

“Cher enfant，我亲爱的朋友，这件事那么高尚，那么光明正大，总之，甚至给基利扬（楼底下那个办事员）也留下了极强烈的印象！就他来说，这么做事欠明智，然而这是件光彩的事，舍己为人的事！应该珍惜理想！”

“果真是这样？果真是这样？在这方面我跟您总是不谋而合。”

“我亲爱的，我跟你总是不谋而合呢。这几天你去哪儿啦？我确实想亲自去看你，可我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你……因为我毕竟不能上韦尔西洛夫家去……哪怕是现在，在他做了这一切之后……听我说，我的朋友：我觉得他就是凭这一点征服了不少女人，就是凭这种品行，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先说件事，免得待会儿忘了，这是我专为您记住的。昨天有个极卑鄙的小丑，当着我的面辱骂韦尔西洛夫，说什么他是‘娘儿们的先知’，这个说法怎么样，说法本身怎么样？我是专为您记住的……”

“‘娘儿们的先知’！Mais…c’est charmant！[①] 哈哈！对他倒挺合适，我是说根本不合适——呸！……可这话挺确切，我是说这话根本不确切，但是……”

“没关系，没关系，别不好意思，您把它只看做是俏皮话得啦！”

“这俏皮话太精彩了，而且，听我说，它含义极深……这种想法极其正确！我是说，你信不信……总之，我得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天你注意到那个奥林皮阿达没有？你信不信，她正为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而有点儿伤心呢，好像还对他有意思……”

“对他有意思！她，配吗？”我大声嚷嚷，气愤地做了个轻蔑的手势。

“Mon cher，你别嚷嚷，这没有什么的，从你的观点来看，也许你是对的。顺便问问，我的朋友，上次你见到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时你是怎么啦？你摇摇晃晃的……我以为你会跌倒呢，真想跑过去扶住你。”

“现在不谈这个。好吧，总之，我只是难为情罢了，由于一个原因……”

“瞧你现在也脸红了呢。”

“行啦，您别扯远了。您知道，她跟韦尔西洛夫有仇……喏，就因为这一点，就因为这缘故我感到不安：唉，不谈了，以后再说。”

“不谈了，不谈了，我也高兴不谈这些事……总之，我很对不起她，你该记得，那一回我甚至在你面前还抱怨过……你忘了这事吧，我的朋友，她也会改变对你的看法的，这一点我

---

① 法文：可是……这太妙了！

清楚地预感到了……瞧，谢廖扎公爵来了！”

进来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军官。我贪婪地扫了他一眼，我还从未见过他。我说他漂亮，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其实这张年轻漂亮的脸上却有某种不太讨人喜欢的神情。我注意到的恰恰是这一点，这是我扫了他第一眼之后，最初一瞬间得到的印象，然而却永久留在我的心里。他很清瘦，身材优美，一头深褐色的头发，脸色红润但微微发黄，目光果敢。一双漂亮的深色眼睛显得有点儿严峻，甚至在他完全心平气和的时候也是这样。他那果敢的目光之所以惹人反感，是因为不知为什么让人觉得，这种果敢他得来不费什么功夫。只是我不会贴切地形容而已……当然，他脸上的严峻表情善于一下子变得出奇地亲切、和蔼与温柔，而且关键是这种变化无疑十分诚实。正是这种诚实才显得动人。我还想指出另一个特点：尽管这张脸有时变得亲切和诚实，但却从未变得快乐过，即使公爵开怀大笑，您还是觉得他心里似乎从未有过真正的、无忧无虑和轻轻松松的快乐……不过，这样描写人的面容是异常困难的，我根本不善于此道。这当儿老公爵立刻跑过来替我们做介绍，还是按他愚蠢的习惯介绍我说：

“这位是我年轻的朋友，阿尔卡季·安德烈耶维奇（又是安德烈维奇！）① ·多尔戈鲁基。”

年轻的公爵马上朝我转过脸来，神情显得分外客气，但看得出，我的姓名对他是完全陌生的。

“他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亲属，”我那令人气恼的

---

① 安德烈耶维奇是父称，表示阿尔卡季的父亲是安德烈（即韦尔西洛夫），但多尔戈鲁基这个姓又表示他不是韦尔西洛夫家的——不是韦尔西洛夫的儿子。

老公爵嘟哝说。(这些老头儿连同他们的迂腐习惯，有时真让人气恼!) 年轻的公爵立即猜到了。

“哎! 我早就听说过……”他迅速说道，“去年在卢加，我非常高兴能认识令妹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她也跟我谈起过您……”

我甚至感到十分纳闷：他脸上的那股子高兴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对不起，公爵，”我嘟嘟囔囔地说，缩回了双手。“我应该对您开诚布公，我很高兴能当着我们亲爱的公爵的面告诉您：我本来就打算跟您见面，前不久，就在昨天我还这么打算过，但完全抱有另一种目的。不管您如何吃惊，我也要直言相告。简短地说吧，我想找您决斗，因为一年半前您在埃姆斯侮辱了韦尔西洛夫。当然啦，您也许不会接受我的挑战，因为我只不过是个中学生，一个未成年的少年，但是不管您接不接受，不管您如何处置，我还是会向您发出挑战……而且，直话直说，即使此刻我也抱有同样的目的。”

事后老公爵告诉我，这席话我说得气度非凡。

公爵脸上露出了一种真诚的悲哀。

“只是您没有让我把话说完，”他严正地答道，“如果说我跟您说话是出于一片诚意，那全是因为我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现在有了真正的认识。可惜眼下我不能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您，但我可以用人格向您担保，对于我在埃姆斯做出的可悲举动，我早就已经深感后悔了。就在动身回彼得堡的时候，我就决定尽一切可能让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感到满意，也就是说，按照他本人指定的方式实实在在地公开向他道歉。我之所以改变看法，是因为受了极其高尚和强有力的影响。因此我们打官司这件事也丝毫不会动摇我的决心。昨天他对我采取的行动，

可以说震撼了我的灵魂，您信不信，直到现在我似乎还没有镇静下来。我应该告诉您，我来找公爵，就是要告诉他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三小时以前，也就是恰恰在为拒绝遗产立据的同时，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派全权代表跑来找我，通知我说他要求跟我决斗……为了埃姆斯那件事正式提出挑战……”

“他要求跟您决斗？”我叫了起来。顿时觉得我两眼放光，血涌到了脸上。

“是的，他要求跟我决斗，我当即接受了挑战，但我决定在交手前先给他送去一封信，陈述我对我以前举动的看法，我痛悔犯了这个可怕的错误……因为这仅仅是一个误会——一个可悲的、致命的误会！我要告诉您，我在团队里的地位促使我做这样的冒险：我在交手前送出这样一封信，就可能使自己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您明白吗？可是即使这样，我还是下定了决心，只是没来得及把信送出去，因为就在接到他要求决斗的通知后一个小时，我又收到了他一封短信，他在信中请求我原谅刚才的惊扰，忘掉他决斗的要求，还补充说，他十分后悔自己这种‘由于意志薄弱和利己主义造成的一时冲动’——这是他的原话。这样一来，他就完全减小了我送这封信的必要性。信，我还没有送出，但我来找公爵就是想商量这件事……请您相信我，由于良心的谴责，我自己所受的痛苦也许比任何人都多得多……您对这样的解释满意了吧，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至少现在，暂时感到满意吧？能不能请您充分相信我的诚意？”

我完全被征服了：我见到了毋庸置疑的坦率，那是绝对出乎我意料的。再说我也根本没有去预料这类事。我喃喃地说了句什么作答，便径直向他伸出了手，他开心地握住我的手摇了摇。随后他把老公爵领到卧室里，交谈了五分钟光景。

“要是您肯特别赏光的话，”他从老公爵卧室里出来，对我率直地高声说，“那就马上跟我一块儿走，我给您看看我即将给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送去的那封信，还有他给我的信。”

我异常高兴地答应了。老公爵开始张罗起来，临到送我之时，也叫我到他卧室里去了一下。

“Mon ami，我真高兴，我真高兴……这一切我们以后再谈吧。顺便说一下，我公文包里有两封信：一封必须送去，并亲自做说明，另一封送银行，在那儿也要……”

接着他向我交代委办的事，这两件事似乎都刻不容缓，似乎都异常劳神费力，非得我乘车去跑一趟，正式呈交、要求签字等等。

“您呀，诡计多端！”我边嚷边接过信，“我敢发誓，这全是胡诌，其实根本就没什么要紧事，这两件委办的事是您故意找出来的，就为了要我相信我在办事，我没白拿钱！”

“Mon enfant，我向你发誓，你想错了：这是两件刻不容缓的事……Cher enfant！”他突然万分感动地叫了起来，“我可爱的年轻人！(他把双手按在我的头上。)我祝福你和你的命运……愿我们永远像今天这样心地纯洁……尽可能地善良和美好……愿我们热爱一切美好的东西……不管它表现为任何不同的形式……好吧，enfin...enfin rendons grâce...et je te bénis!①”他没有把话说完，便俯在我头上啜泣起来。说实话，我也差点儿哭了，至少我是真诚、愉快地拥抱了这个怪老头儿。我俩动情地亲吻了。

① 法文：而现在……现在让我们来赞美……我祝福你！

三

谢廖扎公爵（也就是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今后我将这样称呼他[①]）带我坐上一辆时髦的敞篷轻便马车，驶到了他的住宅，首先使我惊讶的是他的住宅那样富丽堂皇。我不是说真正富丽堂皇，但这座住宅跟“上流社会人士”的住宅一样：有许多高大敞亮的房间（我只见到了两间，其余的都虚掩着），家具款式虽说不属于什么非凡的 Versailles 或者 Renaissance[②]，但它们既柔软又舒适，而且数量多，极阔绰，还有地毯、雕花木器和许多小巧玲珑的雕像。然而人人都在说他们家穷，穷得几乎一无所有。可是我偶尔听说过，这位公爵凡是可以摆阔气的地方总是处处摆阔气，——在这儿，在莫斯科，在先前的团队，在巴黎，他甚至嗜赌成性，欠了不少债。我身上的常礼服皱巴巴的，而且还粘着绒毛，因为我是和衣睡着的，而衬衫也已经穿了四天了。虽说我的礼服还不算很蹩脚，然而一进公爵家，我就想起韦尔西洛夫要我做衣服的劝告了。

“您不会想到吧，有个女人自杀了，我一夜都是和衣而睡的。”我摆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说。由于他马上露出了关心的神色，我就简要地讲了经过。但显然他最关心的还是他那封信。我最纳闷的是，刚才我公然向他宣布我想跟他决斗时，他不仅不笑，甚至根本不露出一丝儿笑意。哪怕是我做到了使他不笑

① 谢廖扎是谢尔盖的小名，改用这个称呼表示亲近。
② 法文：凡尔赛（或者）文艺复兴。这里是指高雅家具的古典风格，分别兴起于法国（17 世纪）和意大利（15—17 世纪初）。

话我，但对他这种人来说，这毕竟是件怪事。我们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大书桌旁面对面坐下，他把那封已经写好、誊清的致韦尔西洛夫的信拿给我看。信的内容跟他刚才在老公爵家告诉我的基本相同，甚至写得很有激情。对他这种明显的坦诚和要做好事的意愿，说实话，我还不知道最终该怎么看，但我已经开始甘拜下风了，因为说到底，我又有什么理由不信呢？不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管人家怎么讲他，他毕竟还能有良好的意向。我也看了韦尔西洛夫最后那封短短七行字的信——放弃决斗的要求。尽管他在信中确实写到了自己“意志薄弱”和“利己主义”，但总的看来，这封信似乎显示出某种傲慢……或者最好说，这整个举动透露出某种轻藐的态度。不过，这话我没有说出口。

“可您怎样看待他放弃决斗呢？”我问，“您不会认为他胆怯吧？”

“当然不，”公爵微微一笑，但不知怎的笑得十分严肃，总之，他变得愈来愈心事重重了。“我清楚地知道，这个人敢作敢为。他放弃决斗当然有他的独特看法……他个人的思想境界……”

“这一点毫无疑问，”我热烈地打断了他，“有位姓瓦辛的说，他对那封信的处理以及拒绝遗产的做法，其中含有‘硬充好汉’的味道……依我看，这种事可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符合某种内心的基本要求。”

“我很熟悉瓦辛先生。”公爵说。

“哦，对啦，您在卢加该见过他。”

我俩突然对视了一下，记得当时我似乎有点儿脸红了。不管怎么说，他中止了谈话。可我却很希望谈下去。一想起昨天我跟一个人的谈话，我就心里痒痒地想向他提几个问题，只是

我不知如何开口。总之，不知怎的我感到很不自在。他的举止是那样异常文雅、彬彬有礼而又落落大方——总之，他们这些贵族几乎在摇篮里就养成的翩翩风度，也把我给镇住了。我在看他的信时找出了两个严重的语法错误。一般来说，在这种交际场合我从不肯低人一头，而是显得格外轻慢，这样做有时也许很不好。可在眼下这个场合，一想到自己衣服上还粘着绒毛，更加剧了我这种自尊自大的想法，因此我甚至有失检点，不拘什么礼节了……我暗暗察觉到，公爵有时在全神贯注地打量我。

“告诉我，公爵，”我突然冒出个问题，“像我这么个‘黄口小儿’居然想找您决斗，而且还是为了别人的受屈，您心里不觉得可笑吗？”

“父亲受屈，做儿子的很可能不平。不，我不觉得可笑。”

“可我觉得这太可笑了……别人会这么看……就是说，当然，不是我自己这么看。更何况我姓多尔戈鲁基，不姓韦尔西洛夫。如果您跟我说的是假话，或者是出于上流社会的礼貌而说得委婉，那么，可见您在其他方面也在欺骗我？”

“不，我不觉得可笑，”他异常认真地重复道，“难道您感觉不出您血管里流着父亲的血吗？……固然您还年轻，因为……我不清楚……似乎未成年人不能决斗，对未成年人的挑战也不应该接受……似乎这些都是规矩……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儿只有一条反对理由是有力的：如果您为了某人受屈而提出决斗，可又瞒着他，那么这就表明您对他本人似乎有点儿不敬，不是吗？”

我们的谈话突然被打断：有个仆人进来禀报什么事。公爵好像在等他，一见他便话也没有说完就站起来，快步走到他跟前，所以仆人悄声禀报些什么，我当然听不到了。

“对不起，”公爵转脸对我说，“我一分钟就回来。”

于是他走了出去。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在房间里一边踱步一边想。真是怪事，我既喜欢他，又讨厌他。他这人有某种特别之处，我自己也说不上来是什么，然而却令人讨厌。“既然他毫不笑话我，那么无疑他十分憨厚，可要是他笑话我呢，那么……也许我会觉得他更聪明……”我就这样古怪地想道。我走近桌子，重看了一遍他给韦尔西洛夫的信。看得甚至忘了时间，等我回过神来，突然发觉公爵说的一分钟无疑已经拖长到整整一刻钟了。这让我有点儿烦躁，我又来回踱了一阵，终于拿起了帽子，记得我当时决定走出去，见谁就叫谁去请公爵，等他一来我就当面跟他告辞，推说我有事在身，不能再等了。我觉得这样做最得体，因为一想到他撇下我这么久，对我这么怠慢，我心里就不太痛快。

这个房间的两扇门都关着，在同一面墙的两端。我忘了刚才是从哪扇门进来的，再加上此时心不在焉，我随手打开了其中一扇，突然看见在相邻的那间狭长的房间里，在长沙发上，坐着我的妹妹丽莎。房里除了她而外没有别人，显然她是在等什么人。我甚至还来不及吃惊，就突然听见了公爵的声音，他正跟什么人大声说着话，回到书房来。我迅速掩上门，这时公爵从另一扇门进来，什么也没有察觉。我记得他开始向我道歉，提到了某个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的什么事……可我又窘又惊，几乎什么也没听清，只是喃喃地说我该回家了，接着便毅然决然地快步走出去。不用说，彬彬有礼的公爵对我的举止一定感到奇怪。他把我一直送到前厅，嘴里说个不停，可我既不答话，也不看他。

四

我走到街上，便朝左边漫无目的地前行，头脑里一片茫然。我慢慢地走着，似乎走了很长一段路，有五百步光景，突然觉得肩膀上被什么东西轻轻敲了一下。我一掉头，看见了丽莎：她追上了我，用伞轻轻敲了我一下。她双眼发亮，眼神里透出极大的喜悦，还带一丝儿狡黠的神气。

“哈，我真高兴，你恰好朝这方向走，要不然我今天就碰不到你啦！”她因为走得太快，有点儿气喘吁吁。

“瞧你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我拼命跑来着，追你呀。”

“丽莎，刚才我碰见的是你吗？”

“在哪儿？”

“在公爵……索科利斯基公爵家……”

“不，不是我，不，你没有碰见过我呀……”

我不再吭声，我俩走了十来步路。丽莎哈哈大笑起来：

“是我，是我，当然是我啦！喂，你明明看见了我，你还盯了我一眼，我也盯了你一眼，干吗还要问碰见的是不是我呢？瞧你这个人！你知道，当时你盯我的那一眼，盯得那么滑稽，我真想放声大笑呢。”

她笑得十分开心。我顿时觉得我满腔的烦恼一扫而光了。

“跟我说说，你去那儿干吗？”

“找安娜·费奥多罗芙娜呗。”

“安娜·费奥多罗芙娜是谁？”

“就是斯托尔别耶娃呀。我们住在卢加那会儿，我整天都

泡在她家，她还接待过妈妈，自己也常来我们家走动。她在那儿可是几乎从不去别人家走动的。她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远房亲戚，也是索科利斯基公爵家的亲戚：论辈分，公爵该叫她奶奶。”

“那么，现在她就住在公爵家里？”

“不，是公爵住在她家里。”

“这寓所是谁的？”

“她的，这寓所全部归她所有已经整整一年了。公爵刚从外地来这儿，临时住在她家。她自己来彼得堡也才四天呢。”

“行啦……听我说，丽莎，她的寓所啦，她本人啦，全都去它的吧……”

“不，她心地好……”

“就算是吧，她精于此道。我们自己心地也很好！你瞧，天气多好，瞧，多么舒畅！今天你真漂亮，丽莎。不过你的孩子气真令人担心。”

“阿尔卡季，你说说那个姑娘，昨天那个姑娘。”

“唉，丽莎，真让人可怜，真是可怜！”

“唉，真可怜！命运太不公了！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么快快乐乐地走着，甚至是一种罪过，因为这会儿她有罪的灵魂却飘荡在黑暗中的什么地方，在一片茫无边际的黑暗中，带着自己的冤屈……阿尔卡季，她的不幸是谁的错？啊，这太可怕了！你什么时候想过那片黑暗吗？啊，我很害怕死，这真是罪过！我不喜欢黑暗，这样灿烂的阳光才好呢！妈妈说不该害怕……阿尔卡季，你很了解妈妈吗？”

“还了解太少，丽莎，我了解太少。”

“哦，她是个了不起的人，你非常非常应该去了解她！对她需要做特别的理解……”

“你瞧，早先我也不了解你，可现在我却全了解了，只一会儿工夫我就对你全了解了。你尽管害怕死，丽莎，可你想必很自尊，勇敢而且坚强。你比我好，比我好得多！我非常爱你，丽莎。哦，丽莎！死神该来的时候就让它来吧，可现在应该好好活着！我们为不幸的死亡感到惋惜，可我们毕竟是在赞美生活，不是吗？难道不是吗？我有‘思想’，丽莎。你可知道，丽莎，韦尔西洛夫已经放弃了遗产？”

“怎么不知道！我跟妈妈还为这件事互相亲吻呢。”

“你不了解我的心，丽莎，你不了解这个人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

“还说不了解呢，我全了解！”

“你全了解？对，当然啦！你很聪明，你比瓦辛聪明。你和妈妈有一双敏锐、仁慈的眼睛，我是说眼光，不是眼睛，我在扯谎……我在许多方面都很坏，丽莎。”

“你得有人管束才行！”

“那你就管束我吧，丽莎。今天我瞧见你这副样子，心里真是高兴。你可知道，你长得挺漂亮？我还从没有见过你的眼睛如此……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了……这双眼睛你今天打哪儿弄来的，丽莎？在哪儿买来的？付出了什么代价？丽莎，我没有朋友，而且我认为交朋友这种想法是胡闹，可我跟你是认真的……你愿意我们成为朋友吗？你明白我想说的意思吗？……”

“我很明白。”

“听我说，我们不提条件，也不订约，——简简单单交个朋友！”

“对，简简单单，简简单单，但只有一个条件：假如有朝一日我们互相责怪，假如我们彼此有什么不满，假如我们自己

变恶变坏，甚至假如我们忘了这一切，那么我们也决不忘记今天这个日子和今天的这一刻！让我们各自许下诺言。我们许诺：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天，记住我跟你这么手挽手地走着，笑着，我们那样开心……行吗？能行吗？”

“行，丽莎，行，我愿起誓。不过，丽莎，我好像头一回听你说话似的……丽莎，你读过很多书吧？”

“早先你还从未这样问过我呢！直到昨天我对你的一句话做了些说明，我才头一回有幸得到了尊驾的注意，大智大慧先生。”

“既然我这么傻，那你干吗不主动跟我说话呢？”

“我一直在等你变得聪明些。一开头我就看透了您，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看透之后我就想：‘他会来找我的，最后他肯定会来找我的。’——喏，我认为最好把这个面子让给您，让您走这第一步，我想：‘不，现在还是请你来找我吧！’”

“你呀，真是个小妖精！好吧，丽莎，你直话告诉我：这一个月以来你是不是在笑话我？”

“哎唷，你很可笑，可笑极了，阿尔卡季！听我说，这一个月里我越发喜欢你，也许就因为你是那样一个怪人呢。但在许多方面你这个怪人很坏，——我说这话是免得你骄傲。你知不知道，还有谁在笑话你？妈妈在笑话你，妈妈跟我一块儿笑话你，我们悄悄在说：‘好一个怪人，真是怪人！’可你呢，那会儿得意地坐着，还以为我们挺怕你呢。”

“丽莎，你对韦尔西洛夫怎么看？”

“他的为人我思考了很多，可是你听我说，现在我们不议论他。今天不该议论他，不是吗？”

“完全正确！哦，你太聪明了，丽莎！你肯定比我聪明。你等着吧，丽莎，我会了结这一切的，到那时我也许会告诉你

一些事情……”

“你干吗皱眉头呢？”

“不，我没有皱眉头，丽莎，我就是这样……你瞧，丽莎，还是直话直说的好：我这人有个特点，不喜欢触动我灵魂里的某个敏感处……或许最好说，要是经常把某些感情释放出来供大家玩赏，这是很难为情的事，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更喜欢皱眉头、不吭声。你是聪明人，你该明白的。”

“不仅明白，我自己也这样呢，我完全理解你。连妈妈也是这样的，你知道不？”

“哦，丽莎！但愿我们能在世上活得更长久！啊？你说什么来着？”

“不，我什么也没说。”

“你在看我吗？”

“你也在看我呢。我越看你越喜欢。”

我送她几乎送到了家门口，把我的地址给了她。临别时我还生平第一次吻了她……

五

这一切本来都好，然而只有一点不好：从昨夜开始，我脑海里就翻腾着一个苦恼的念头，摆脱不了，这就是，昨晚我在我家大门口碰见那个不幸姑娘后，我对她说过我自己将离家出走，离开老窝，人们总是避开恶人去自立门户，还说过韦尔西洛夫有很多私生子。这些话，这些出自儿子之口对父亲的议论，当然会使她确信她对韦尔西洛夫的种种怀疑是对的，使她确信自己受了他的侮辱。我责怪斯捷别利科夫，可说不定恰恰

是我在火上加油。这个念头太可怕了，现在我都觉得可怕……但那时，在那天早晨，虽然我已经开始折腾不安，但我仍认为这是瞎想："不，即使我不介入，'她也已经憋足了气，怨恨到了极点'，"我不时反复地想，"不，这没什么，会过去的！我能改正！我会设法补过的……干点儿善事……我前头还有五十年的生命呢！"

可这个念头还是在脑海里翻腾。

第二部

第 一 章

一

现在我跳过中间相隔的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读者且莫担心：看了下文一切便可分晓。我把 11 月 15 日作为明确的标界，出于诸多原因，这一天对我分外难忘。首先，凡是两个月前见过我的人，如今谁也认不出我了，至少就外表而言。也就是说，即使认得出，也无法肯定。我穿得像个公子哥儿，——这是首要原因。韦尔西洛夫一度向我推荐过的那个“做事认真，很有审美力的法国裁缝”，非但给我做过整套行头，而且已经被我淘汰了：现在替我做衣服的是另一些裁缝，更高级，属于顶顶第一流的，我甚至可以在他们那里赊账。虽说我也知道这样做有失体统，有损于自己的名声，但我在一家著名餐馆[①]里也常赊账，不过这方面我还有所顾忌，因此一有钱就立

① 在作者草稿上该餐馆叫博雷尔（位于彼得堡大海洋街）。——俄编注

即付账。涅瓦大街上有个法国理发师跟我是旧交，我去他那儿理发，他总会跟我讲些趣闻轶事。老实说，我是通过他在练习法语。尽管我懂法语，甚至程度不差，但在重大的交际场合不知怎的还不敢开口，更何况我说的法语多半远不是巴黎口音。我认识一个叫马特维的车夫，他有一辆考究的马车和一匹快马，只要我一叫，他就会来替我效劳。他那匹公马是浅红色的(我不喜欢灰色的马)。不过，也有些事很糟糕：今天是11月15日，入冬已经三天了，可我的皮大衣还是旧的，那是韦尔西洛夫穿破了的一件浣熊皮大衣：卖掉的话也只值二十五卢布。是该添新的了，可我囊空如洗，此外我得备些钱供今天晚上用，这是非备不可的，否则我就会“倒霉和完蛋”——这是我本人当时的座右铭。哦，想来真是卑鄙！那么，这几千卢布、快马以及博雷尔餐馆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呢？我怎么会把前事忘个精光、变成这样了呢？说来可耻！读者诸君，我这就开始讲我这段可耻的经历，对我来说，这是生平中最最丢脸的回忆！

现在我这样说，是站在法官的立场上，我知道我有罪。可是，即使当初我在那个旋涡里转昏了头，孤零零的，既无人开导也无人劝说，但我敢起誓，当时我自己就已经意识到是在沉沦，所以我是不可饶恕的。然而在这两个月里，我却几乎是幸福的——干吗要说“几乎”呢？我太幸福了！幸福得甚至连羞耻感，那种一闪即逝、（却常常闪过！）令我灵魂震颤的羞耻感，——您信不信？——甚至连这种感觉也使我更加迷醉：“沉沦就沉沦吧，可我决不会沉到底，我能游出来！我自有福星高照！”我在独木桥上走，没有栏杆，下临深渊，我却走得很开心，甚至还探头望望脚下的深渊，既冒险又开心。那么我的“思想”呢？“思想”以后再说吧，思想可以等一等，以前

的一切“仅仅是一条邪路”：“干吗不让自己乐一乐呢？”“我的思想”坏就坏在，我再说一遍，它完全允许走各种邪路，要是它不那么坚定彻底的话，我也许就不敢走邪路了。

我那个小小的住所暂时还继续租下去，但租而不住，里面只存放我的箱子、布袋和一些什物。谢尔盖·索科利斯基公爵的下榻处成了我的主要公馆。我待在他那儿，宿在他那儿，甚至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如此……至于怎么会这样，我马上会交代，但先得说说我的小住所。这个住所对我已经十分亲切了，因为韦尔西洛夫在那次争吵之后，破天荒头一遭，主动上我这儿来过，以后他又来过多次。我再说一遍，这是一段极可耻、但又极幸福的时日……而且事事顺利，一切如意！“过去的种种忧愁又为了什么呢？”在心醉神迷的时刻，我有时会暗暗想，“那些旧日的伤痕裂口，我那孤独阴郁的童年，我在被窝里的愚蠢幻想、誓言、策划、甚至‘思想’，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一切全都出自我的想象和虚构，原来世事远非如此。瞧我现在多快乐多轻松：我有父亲——韦尔西洛夫，我有朋友——谢廖扎公爵，我还有……”但还有什么——暂且不谈。唉，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为了宽容和名誉，可事后却成了丑恶、卑鄙与无耻。

不再说了。

二

他第一次上我这儿来，是在我们决裂之后的第三天。当时我不在家，他就留下来等我。虽说这三天我一直在盼他来，可我一踏进我的小屋，还是两眼发蒙似的，心怦地一跳，我甚至

在门口怔住了。幸好他跟我的房东坐在一起，房东不想让来客枯等，认为必须立刻跟他认识，开始热心地给他讲起什么故事来。房东是个九品文官，已经四十来岁，一脸麻子，很穷，害肺痨的妻子和一个病孩儿拖累了他，但他生性极善交际，脾气温和，不过也相当圆滑。我很高兴有他在场，甚至可以说是他救了我，否则我能跟韦尔西洛夫说些什么呢？我相信，这三天来我确实相信，韦尔西洛夫一定会主动先来找我，——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我无论如何决不会先去找他，倒不是出于我的固执任性，而是出于对他的爱，出于一种由爱而生的妒忌，——我不善于形容这种心情。而且总的说来，读者也决不会认为我有什么口才。尽管这三天我一直在盼他来，几乎不停地想象着他如何上门，但哪怕想得绞尽了脑汁，还是无法预先想出，在发生了那一切之后，我们俩一开口该谈些什么。

“啊，你回来啦，”他友好地伸手给我，但并没有起座。“请坐到我们这儿来，彼得·伊波利托维奇正在讲一个挺有趣的故事呢，说是有块石头，在帕夫洛夫兵营附近……或者就在那一带……”

“对，我知道这块石头。”我赶忙答话，在他们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他们坐在桌旁。整个房间只有两平方俄丈大小。我喘了口粗气。

韦尔西洛夫的眼里闪过一丝喜悦的光：似乎他原本缺乏信心，以为我要装腔作势的。这下他放心了。

“您再从头讲起吧，彼得·伊波利托维奇。”他们已经用名字加父称彼此尊称了。

“且说这事发生在先皇在位的时候，”彼得·伊波利托维奇转脸对我说，神色不安，颇有点儿紧张，似乎预先在担心这故事是否能打动我。“您已经知道有这么块石头，石头愚蠢地立

在街当中，既没用处，又没来由，只会挡路，不是吗？皇上打那儿经过了好多回，回回都见到这块石头。最后，皇上不满了，也确实该不满：石头像座山，街当中有座山太不雅观啦，于是开金口道：'朕不要这块石头！' 瞧，皇上说一声 '不要'，您明白这 '不要' 两字的分量吗？您还记得这位先皇吗[①]？该拿这块石头怎么办？大家张皇失措。这事归杜马管[②]，但主要落实在当时一位显赫的大臣身上，我记不清他是谁了。这位大臣一打听：据说办这事至少得花一万五千卢布，而且要用银币(因为只有先皇在位时，这些纸币才能兑换成银币)[③]。'怎么要一万五千，真是胡说八道！' 起初英国人打算铺上轨道，将石头搁在轨道上由蒸汽机运走，可这要花多少钱哪？当时还没有铁路，只有一条皇村铁路[④]……"

"那好办，可以把石头锯开呀，"我皱起了眉头，面对韦尔西洛夫我觉得尴尬极了，很不好意思，可他也装出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明白，他同样很高兴有房东在场，因为他跟我在一起同样感到不好意思，这一点让我瞧出来了，我记得，当时他这样子好像还挺感人呢。

"正是可以锯开呢，有人正好出了这么个主意，那就是蒙

---

① 此处当指沙皇尼古拉一世，卒于1855年。——俄编注

② 指市杜马——城市的管理机构，在贯彻1870年城市条例以前，市杜马负责城市经济，它必须将一切收支情况呈报总督。——俄编注

③ 在1839—1843年俄国实行币制改革，当时贬值的纸币停止流通。——俄编注

④ 这是俄国的第一条铁路，联结彼得堡和皇村，1838年启运。——俄编注

费朗：他当时在建造伊萨基辅斯基大教堂。[1]他说，先锯开再运走。话是不错，可这得花多少钱？"

"不用花什么钱，锯开运走就得啦。"

"不，对不起，锯石头要安装机器，还要有蒸汽机，再说往哪儿运？这可是一座山哪！据说要花一万卢布，少了不行，一万或一万二。"

"听我说，彼得·伊波利托维奇，这是无稽之谈，不是这么回事……"可这当儿韦尔西洛夫悄悄向我使了个眼色，正是在这个眼色中我看到了他对房东的那种委婉的怜悯，甚至为房东而难过。这一点引起了我极大的好感，于是我放声笑了。

"请听我说，听我往下说，"房东一下子高兴起来，他什么也没有察觉，倒是一味担心别人用提问来岔开话题，这些讲故事的人往往总是这样。"这时刚巧走来一个小市民，年纪还轻，我跟你们说，这是个俄国人，蓄着尖胡须，身穿束腰长袍，几乎有点儿醉意……可是，不，他没有喝醉。这个小市民只是在一边站着，听见他们——就是几个英国人和蒙费朗正在商议，而那位承办此事的大臣正好乘马车赶来，他一听就恼火了：他们怎么老是议来议去定不下来呢？突然他发现不远处有个小市民站在那儿假笑，我不是说假笑，不是这意思，好像该说……"

"是嘲笑吧。"韦尔西洛夫谨慎地附和道。

"对，是嘲笑，我是说带点儿嘲弄的笑容，你们该知道，俄国人善意的笑容就是这样的。听我说，这位大臣当然因为有

---

① 奥古斯都-里卡尔·德·蒙费朗(1786—1858)，法国建筑师，1816年起在俄国宫廷任职。自1818年始主持建造彼得堡的伊萨基辅斯基大教堂。亚历山大圆柱也是由他设计建成。他还兴建了一些私人住宅。——俄编注

人打搅而生气了：‘你，大胡子，待在这儿等什么？你是什么人？’‘是这样，’小市民答道，‘我在瞧这块小石头呢，殿下。’好像称的正是殿下，这位大臣十之八九属于苏沃洛夫公爵世族，意大利封的公爵，是一位统帅的后裔[①]……可是，不对，他不姓苏沃洛夫，真是可惜，我忘了他究竟是谁了。不过，虽然是位殿下，听我说，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俄国人，具有俄国人的外貌，爱国，而且有俄国人一颗善解人意的心。喏，他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于是说：‘怎么样，难道你能把石头运走？要不，你得意地笑什么？’‘我主要是笑这些英国人，殿下，他们在漫天要价，因为俄国人的钱袋鼓鼓的，他们家里却没有吃的啦。您只要拨出区区一百卢布，殿下，明晚之前咱们就能把这块小石头除掉。’你们听听，这种大话简直难以想象。不用说，英国人恨得真想把他一口吞掉，蒙费朗也听得直笑，只有这位特级公爵，善解人意的俄国人才说：‘给他一百卢布！可是你真能除掉吗？’‘明晚之前包您满意，殿下。’‘可你怎么做呢？’‘希望殿下不要生气，这可是咱们的秘诀啦。’你们听听，他就用了这种俄国式的答话。大臣高兴地说：‘好哇，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说完，他们就走了。你们想过他会怎么干吗？”

房东打住了话头，用深深感动的目光扫了我们一眼。

“我想不出。”韦尔西洛夫含笑答道。我紧皱眉头。

“他是这么干的，”房东得意扬扬地说，好像这事是他自己

---

① 此处大概指俄国最高统帅亚·瓦·苏沃洛夫（1729/1730—1800，他于 1799 年曾受封为意大利公爵）之孙 A. A. 苏沃洛夫（1804—1882），后者自 1861 年起任彼得堡总督。但根据彼得·伊波利托维奇所讲故事发生的时间（可能是尼古拉一世执政时），A. A. 苏沃洛夫不可能承办此事。——俄编注

干成似的。“他雇了几个农民，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俄国人，拿起铁锹开始在石头旁边，就在紧靠石头的一边挖坑。他们挖了整整一夜，挖出一个大坑，正好跟石头一般大小，只是深度多挖了一俄寸①。坑挖成之后，他就吩咐众人一点儿一点儿地，小心挖出石头底下的土。当然啰，等到土挖空到一定程度，石头就缺了支撑，失了平衡，等到石头失去平衡，他们就从另一边用手去推，按俄国人的习惯喊一声‘乌拉’：石头扑通掉进了坑里！于是再用铁铲填上土，用夯夯结实，铺上石子，——路面平了，石头不见了！”

“真是想不到！”韦尔西洛夫说。

“这时人们蜂拥而来，多得数都数不清。那些英国人早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恨得不得了。蒙费朗也来了，说：‘这是乡巴佬的办法，非常简单。事情本来就这么简单，可你们却想不出来，你们真是些笨蛋！’我跟你们说，这位大臣，这位治国之才，居然高兴得大叫一声，拥抱他，吻他，问道：‘打哪儿冒出你这么个人来？’‘我从雅罗斯拉夫尔省来，公爵大人，咱们的本行是裁缝，可一到夏天就进京城来贩水果。’就这样，事情传到上司那儿，上司便下令给他挂一枚奖章，于是他就脖子上挂着奖章到处走动了，据说后来他酗酒伤了身子。你们很清楚，俄国人就是管不住自己！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还受外国人欺压呢，是的，就是这样！”

“是啊，当然，俄国人的头脑……”韦尔西洛夫刚开了个头。

然而幸亏这时有病的房东太太一声喊，把讲故事的丈夫唤走了，否则我真受不了了。韦尔西洛夫笑道：

---

① 一俄寸等于四点四四厘米。

“我亲爱的，在你回来以前，他已经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在逗我开心。讲这块石头……这是此类爱国故事当中最不严肃的一个①，可又怎么能打断他呢？你已经看到，他乐得飘飘然了。何况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块石头好像现在还立在街上，根本没有埋进土坑……”

“哦，我的天哪！”我叫了起来，“的确是这样。他怎么敢！……”

“你怎么啦？你好像挺气愤似的，得了吧。他确实把故事搞混了：我还在小时候就听过这类石头的故事，当然情节不一样，讲的也不是这块石头。‘事情传到了上司那儿’——哪有的事！可他一讲到‘事情传到了上司那儿’，他的心都乐开了花。在这种可怜的生活环境里缺不了这类离奇的故事。这类故事他们有许多许多，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克制。他们什么也没学，几乎什么都不懂，可除了赌牌和干活以外，却很想聊点儿与一切人有关的事，想入非非的事……这个彼得·伊波利托维奇，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很穷的人，甚至是个不幸的人。”

“你瞧，他也许连牌也不赌呢！我再说一遍，他讲这么个荒诞故事，合乎他对别人的爱心：要知道，他这是想逗我们开心。他的爱国感情也得到了满足。比方说，他们还有一个离奇

① 房东所讲的这个故事源出于俄国作家、辞书编纂家、民族志学者弗·伊·达里（1801—1872）的小册子《农夫真实故事八十则》(1862)。后来列·托尔斯泰以此为基础在《启蒙读本》中也写过《农夫怎样搬开了石头》(收入他的《识字读本》，第2册，1872年）的故事。达里和托尔斯泰使用这一题材是为了表现普通俄国人的机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对“民众读物”中这类旨在培养官方爱国主义与民族自豪感的题材是持讽刺态度的。——俄编注

的故事，说是英国人拱手送给扎维亚洛夫一百万，只求他别给自己的产品打上商标①……”

“哦，我的天，这故事我听过。”

“谁没听过呢？他讲的时候甚至完全清楚你一定听人说过，可他还是要讲，故意设想你还没有听过。讲瑞典国王见到幽灵的故事，② 他们好像觉得过时了，可在我的少年时代，人们却反复讲述这个故事，讲得眉飞色舞，还神秘地压低了声音，就跟讲述本世纪初某人似乎在参政院里向参政员下跪过一样③。关于城防司令巴舒茨基也有很多故事，比方有关纪念雕像被运走的笑话。④ 他们特别爱讲宫廷的趣闻，例如关于前朝大臣切尔内绍夫⑤的种种故事，讲这个七十岁的老头经常把自己的外貌装扮成酷似三十岁的样子，以至先皇临朝时为之大吃一惊……”

“这故事我也听过。”

---

① 扎维亚洛夫在19世纪中叶以制造各种刀而闻名。——俄编注

② 这是一个传说，讲述瑞典国王卡尔十一世（1655—1697）见到了幽灵，后者向他预言谋反之事。——俄编注

③ 这儿大概是指一个不确实的口头传说，说是一天夜里，沙皇尼古拉一世被谋反的十二月党人唤去参政院，逼其签署退位诏，沙皇的弟弟跑去营救时却撞见尼古拉一世正跪在参政员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早在青年时代就听过这个口头传说，或者是在西伯利亚时，那里广泛流传这一传说。——俄编注

④ 帕·雅·巴舒茨基（1771—1836），在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两朝曾任彼得堡城防司令之职，有关他的蠢笨有许多趣闻。据说有一次他在沙皇的朝廷上，一位大臣对他开玩笑说，瑞典的奸细昨夜偷盗矗立在广场上的彼得大帝铜像，已装船运走了。巴舒茨基竟然信以为真，吓得在沙皇面前俯首认罪。——俄编注

⑤ 亚·伊·切尔内绍夫（1785—1857），公爵，曾参加过反拿破仑战争，历任要职，1832—1852任军政大臣。他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舅舅的梦》中的老公爵的原型之一。——俄编注

“谁没听过呢？所有这些故事都极不严肃，可你该知道，这类不严肃故事的流传，远比我们想象的深广。即使在我们最正派的上流社会，你也能见到为了逗人开心而想扯谎的现象，因为我们有个通病：管不住自己的心。只是我们讲的是另一类事。我们专讲美国，这类故事多极了，连国家要员也津津乐道！说实话，我本人也有这类不严肃的行为，为此一辈子深感内疚……”

“关于切尔内绍夫的故事，我自己也讲过好几回。”

“连你也讲过？”

“除我而外，这儿还有一位房客，是个文官，也是麻子，而且已经老了，但此人俗不可耐。只要彼得·伊波利托维奇一开口，他就立刻打岔和反驳。弄得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只好像奴仆一样去侍候他、讨好他，就为了让他肯听自己讲故事。”

“这是另一类不严肃的行为，也许甚至比前一类更讨厌。前者纯粹是出于高兴！‘只要你让我扯谎，你瞧着，效果会有多好。’后者则很消沉、枯燥：‘我就不让你扯谎，你得说清楚，这事到底发生在何地、何时、什么年份？’一句话，这种人没有心肝。我的朋友，你应该经常让人扯点儿谎，这没有害处。甚至该让人多多扯谎。第一，这可以表明你有礼貌；第二，人家为此也会让你扯谎——一举两得呢。Que diable![1]应该爱他人嘛。不过，我该走啦。你替自己安置得挺好，”他补充了一句，从椅子上站起来。“我会告诉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和你妹妹，说我顺便来看过你，见你身体挺好。再见了，我亲爱的。”

怎么，难道就这么结束啦？可我需要的根本不是这样，我

① 法文：真是见鬼！

企盼的是另一种样子的见面，重要的见面，虽然我完全明白，事情也只能如此。我举着蜡烛送他下楼，这时房东快步凑上来，可我瞒着韦尔西洛夫，暗暗使劲抓住他的胳膊，狠狠地把他推开。他吃惊地瞧了我一眼，但还是眨眼间溜走了。

“这种楼梯……”韦尔西洛夫支支吾吾地说，把每个词都拖得很长，显然想随便说点儿什么，显然怕我说出什么话来。“这种楼梯，我走不惯了，而你又住在第三层，不过，下面的路我能辨清……你放心回去吧，我亲爱的，要不会着凉的。”

可我没有回去。我们已经顺着二楼楼梯往下走。

“这三天我一直在盼您来。”我突然冒出一句。这话似乎自动地脱口而出，我一时感到气急。

“谢谢，我亲爱的。”

“我相信您一定会来的。”

“我知道你相信我一定会来。谢谢，我亲爱的。”

他不再多说。我们已经走到了出口处，可我还是跟在他后头。他打开门，忽地刮进一阵风来，把我的蜡烛吹灭了。我一下子抓住了他的手，这时四周漆黑，我感到他哆嗦了一下，但没有做声。我便俯下身去，把嘴贴在他的手上，突然贪婪地吻起来，吻了好几次，吻了许多次。

“我亲爱的孩子，你干吗要如此爱我呢？”他问，但声音已经全变了。他嗓子发颤，响起了一种全新的音调，就像不是他在说话似的。

我本想回答些什么，可我说不出口，便向楼上跑去。他却还在原地等着，当我跑到了我住的三楼，我才听见楼下的外大门被打开，接着砰地一声关上了。不知为什么房东又冒了出来，我一溜烟似的打他旁边经过，进了自己的房间，闩上门，没点蜡烛就扑到床上，伏在枕头上哭个不停。打从离开图沙尔

寄宿学校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哭！我是那么号啕大哭，我感到太幸福了……可又何必描写这些呢！

现在我老着脸皮记下这件事，是因为这一切尽管十分荒唐，但或许也是美好的。

三

可他却为此吃尽了我的苦头！我变成了可怕的暴君。不用说，后来我俩绝口不提发生过的这件事。正好相反，第三天我们见面时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岂止这样：在这第二次见面的晚上，我几乎采取了粗暴态度，而他似乎也很冷淡。这次见面又在我那儿：尽管我很想见到母亲，可不知为什么我自己还是没去他家。

在所有这段时间里，也就是在这两个月里，我们始终只谈最抽象的话题。正是这一点让我觉得奇怪：我们专谈抽象话题——当然啦，这些话题事关全人类，而且非常必要，但却毫不涉及切身之事。然而却有很多、非常多的切身事情必须明确和澄清，甚至亟待解决，对此我们却闭口不谈。我甚至只字不提母亲和丽莎的事……而且连我自己的事、自己的经历也不提。这究竟是出于害羞，还是出于年轻人的某种傻气——我不清楚。我想是出于傻气吧，因为害羞毕竟是可以克服的。我对他的态度十分专横，甚至多次粗暴无礼，甚至违背自己的心意：这一切似乎是自然而然、不可抗拒地发生的，我克制不了自己。他的态度呢，虽说不管怎样总是异常亲切，但还是照旧带点儿嘲讽。让我觉得奇怪的还有：他更喜欢自己上我这儿来，结果弄得我很少去看妈妈，一星期至多去一次，尤其是最

近，我在旋涡里转昏了头。他总是晚上来，在我这儿坐着聊天，也很喜欢跟房东聊天，像他这样的人居然喜欢跟房东这种人聊天——这使我很恼火。我时而也会闪过一个念头：莫非除我而外，他没有人家可以走动了吗？可我确实知道他有不少熟人，最近他甚至在上流社会还恢复了许多老关系——那是一年以前由他中断了的，但他似乎并不特别热衷于这些关系，他跟很多人只是表面上恢复关系而已，他更喜欢上我这儿来。有时让我十分感动的是，几乎每次他晚上推门进来时，似乎都是怯生生的，一开头总是带着莫名的不安瞧瞧我的眼色，意思是说："我没有打扰你吧？要是打扰的话，你说一声——我就走。"这种话他有时甚至说出了口。比方有一次，就在最近，我穿好了一套刚从裁缝那儿取来的新衣服，打算乘车去找"谢廖扎公爵"，然后一块儿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我以后说明），这时他走了进来。一进屋就坐下了，大概没有察觉出我准备出门；他时而显出很奇怪的心不在焉的神气。偏偏在这时候，他又谈起了房东，于是我火了：

"去他的吧，让房东见鬼去吧！"

"哎，我亲爱的，"他马上起座说，"你好像正要出门，我打扰你了……请原谅。"

于是他恭顺地匆匆走了。他，这样一位独断独行、富有个性的上流人士，居然对我如此恭顺，正是这种态度一下子复活了我心中对他的千种柔情和万般信任。可是，既然他如此爱我，为什么在我可耻地沉沦之时不来阻止我呢？当时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也许就能克制住自己。不过，或许也克制不住。然而他明明看到了我讲究穿着，喜爱夸口，雇马车夫马特维（有一次我甚至想请他乘坐我的马拉雪橇回去，可他不坐，这种事甚至有过好多次，他都不肯坐），他明明看到了我大把大把花

钱，可他一声不吭，片言不发，甚至没表露出一点儿好奇心！这一直让我纳闷，甚至现在我也感到奇怪。至于我呢，不用说，当时对他毫不客气，干事明目张胆，当然也不做任何解释，他不问，我也就不说。

话得说回来，有过那么两三回，我们好像也谈起过切身之事。有一次，那是在见面之初，在他拒绝遗产之后不久，我问他：现在他将靠什么过活？

“总能过得去的，我的朋友。”他异常平静地说。

现在我才知道，在这最近两年当中，连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份五千卢布的小小资产，也有一半给韦尔西洛夫花掉了。

还有一次，不知怎么的我们谈起了妈妈。

“我的朋友，”他突然忧伤地说，“在我和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结合之初，其实也不光是这开头，就在这之后，在最近，我都常常对她说：‘亲爱的，我害你现在和将来受苦了，你在我跟前我并不觉得怜惜，可是万一你死了，我知道我会用自杀来惩罚自己。’”

不过，我记得，那天晚上他特别直言不讳：

“但愿我是个生性懦弱的小人物，并且由于意识到这一点而痛苦！然而我却不是，我知道我无限坚强，你猜我靠的是什么？就靠一种天赋的力量：随遇而安。这是我们这一代所有聪明的俄国人固有的力量。什么也毁不了我，什么也压不垮我，什么也惊不倒我。我像看家狗一样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我能十分舒畅地同时感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当然，这并非出于我的意愿。然而我也知道这不严肃，主要是因为过于理智了。我已年近半百，至今还不知道活这么久究竟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我热爱生命，这是直接从事实引出的结论，然

而，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热爱生活是可耻的。近来社会出现了新变化，克拉夫特们无法随遇而安，纷纷开枪自杀。很明显，他们这样的人愚蠢，而我们这样的人聪明，所以在这一点上两者怎么也不能相提并论，但问题还是没有答案。难道地球的存在只适合于我们这样的人？很可能是的，然而这样的想法也太悲凉了。不过……不过，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他说得很忧伤，但我还是猜不出他这些话是否出自肺腑，他这人总有那么一种气质，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丢弃的。

四

在那段时间里，我向他提了一大堆问题，像饿汉扑向食物似的扑向他。他总是胸有成竹地直言回答我，可末了又总是归结为几句最一般性的箴言，所以实际上我什么也没有得到。然而所有这些问题自我有生以来一直在困扰我，而且我得坦白承认，还在莫斯科时，我就指望把问题拖到彼得堡跟他见面时再解决。我甚至把这一点当面告诉了他，他并不笑话我，恰恰相反，我记得他还握了握我的手呢。可是在整个政治局势以及种种社会问题方面，我从他那儿几乎一无所获，但正是这些问题跟我实现“思想”有关，因而也最困扰着我。关于杰尔加乔夫那类人，有一回我从他口中套出了一个看法：“对他们不值得加以评议”，但同时他又奇怪地添了一句：他“保留否定这一看法的权利”。至于现代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结局如何，怎样恢复社会安宁，他久久地避而不答，但有一次我最终还是从他口中逼出了几句话。

“我想，将来的一切变化怎么说也是十分平常的，”有一次

他回答说，“无非是：所有国家尽管目前预算平衡、‘没有赤字’，但 un beau matin[①] 都会彻底陷入困境，到那时大家无一例外地不肯支付债务，以便在共同破产中获得新生。可是全世界的保守分子会群起而抵制这样做，因为他们是股东和债权人，他们不容许实施破产。不用说，这时就会发生所谓普遍的质变，于是会跑来大批犹太人，开始建立犹太王国，随后那些从未拥有过股票、基本上一无所有的人，也就是所有的穷人，当然反对这种变化……于是开始斗争，在历经七十七次失败之后，穷人消灭了股东，抢夺了他们的股票，取而代之成为当然股东。这些人也许会颁布什么新决策，但也许不会。十之八九也会破产。至于以后改变这世界面貌的前景，我的朋友，我就根本无法预测啦。不过，你可以去查《启示录》[②] 呢……”

“难道这一切都起因于物质，难道当今世界的完结仅仅归咎于财政?”

“哦，当然，虽说我只是抓住了画的一角，但这一角却跟整体相连，可以说，千丝万缕不可分割。”

“那可怎么办呢?”

“天哪，你不用慌：这一切不会那么快。总之，最好什么都不干，至少能因为什么都没参与过而感到心安呢。”

“得了吧，您说正经的。我想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该怎么生活?”

“你该怎么办吗，我亲爱的? 你该诚实，永不扯谎，别觊

① 法文：总有一天。

② 指《新约全书·启示录》。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谈到《新约全书·启示录》，如《白痴》(第 4 部，第 6 章，第 7 节)；《群魔》(第 3 部，第 7 章，第 2 节)。此处韦尔西洛夫对阿尔卡季的这个建议具有揶揄意味。

觎别人的房屋，总之，去读读十诫[1]：那儿白纸黑字都写着呢。”

“够了，够了，这些都是老一套，况且全是些空泛的话，可我需要实在的指点。”

“好吧，要是苦闷之极，你就想法去爱上个什么人，或者爱上件什么东西，要不甚至简简单单迷上点儿什么也行。”

“您尽开玩笑！再说，我就一个人，按您的十诫能有什么作为？”

“尽管你有种种问题和疑虑，只要你做到十诫，你就会成为伟人。”

“可这样做了谁也不会知道。”

“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2]

“您简直是在开玩笑！”

“那好，既然你对这一点十分看重，那么你最好尽快去专一行，从事建筑业或者律师事务，一旦你干了实实在在的正经事，你就会安下心来，忘掉那些空想。”

我不吭声了：从这些话里能获得什么呢？可每次这样谈话之后，我总会觉得比谈话前更加激动。此外，我明显地看出，他心里似乎藏着什么秘密，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越来越吸引我。

“听我说，”有一回我打断了他，“我一直在猜想，您说这些话纯粹是出于愤慨和苦恼，其实您暗暗地，心底里却狂热地信奉某种极高尚的思想，您只是瞒着或者羞于承认罢了。”

“谢谢你，我亲爱的。”

---

① 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17节。

② 引自《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4章，第22节。

“听我说，再没有比做一个有益的人更高尚了。请告诉我，在目前这种时候，我干什么最为有益？我知道这个问题您解决不了，可我就是只想听取您的意见：只要您说出来，我就照您说的去做，我敢向您发誓！那么，究竟什么是伟大的思想呢？”

“喏，把石头变成食物① ——这就是伟大的思想。”

“是最伟大的思想吗？不错，您确实指出了一条大道，但告诉我：这是最伟大的思想吗？”

“这是很伟大的思想，我的朋友，很伟大，然而不是最伟大：伟大，但居于次位，仅仅在当前是伟大的：人一旦吃饱之后就再也想不起前事，恰恰相反，马上会说：‘瞧，我吃饱啦，现在该干什么？’问题永远悬而未决。”

“有一次您提到过‘日内瓦思想’，我不懂什么叫‘日内瓦思想’？”

“日内瓦思想——这是一种没有基督的美德，我的朋友，这是现代思想，或者最好说是一切现代文明的思想。②总之，说来话长，谈起来很乏味，要是我们谈点儿别的，那会好得多，要是别的也不谈，那就更好了。”

“您就想什么都不谈！”

“我的朋友，你该记住：沉默是件好事，既安全又优

① 典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4 章，第 3～4 节。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作者这里的意思是，改变世界的唯一途径是道德。

② 在小说的准备材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日内瓦思想”是“现代法国思想”，这是把卢梭的学说与其追随者（社会主义者及巴黎公社活动家）的思想相结合。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释，这种思想的精髓是：人人社会经济平等，否定宗教和基督教伦理，追求共同的保障和富足。按：让-雅克·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法国侨民家庭。——俄编注

雅。”

“优雅？”

“当然。沉默总是优雅的，沉默的人总是比说话的人优雅些。”

“我们之间这样谈话，不用说，跟沉默也没有什么两样。去它的什么优雅吧，至于什么好处，更让它见鬼去！”

“我亲爱的，”他突然对我说，口气有所改变，甚至颇有感情，显得分外坚决。“我亲爱的，我根本不想引诱你用资产阶级的美德去代替你的理想，我也不会喋喋不休地对你说‘幸福胜于壮士气概’①，恰恰相反，壮士气概高于任何幸福，单单具有当壮士的能力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因此这问题在你我之间是解决了的。我之所以敬重你，恰恰就因为你在我国的变质时代还能在心里树起某种‘自己的思想’（你放心，我记得很清楚）。但还是不该不考虑要有分寸，因为你现在想要的恰恰是轰轰烈烈的生活，想点燃什么，粉碎什么，想凌驾于整个俄国之上，叱咤风云，让人又害怕又敬佩，而自己则隐遁到北美合众国去。你心里大概就是这类想法，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预先提醒你，因为我已经真心实意地爱上你了，我亲爱的。”

我能从这番话里得到什么呢？这儿有的仅仅是对我和我的物质命运担忧，表现了一个当父亲的虽则善良、但却讲求实际的平淡无味的感情。可是为了思想，难道我需要的是这些？为了思想，每一个令人尊敬的父亲都该叫自己的儿子去殊死拼搏，就像古代的贺拉斯为了罗马思想叫儿子们去决斗

① 俄罗斯谚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处用的“壮士气概”，其意义接近于果戈理在《死魂灵》等作品中的解释：“壮士气概”是俄国人力量的象征，象征俄国人为了崇高的精神理想而抗恶的能力。——俄编注

一样。①

我常常用宗教问题去纠缠他，可这方面的回答更是模糊。我问他：我在宗教方面该怎么办？他回答得太不高明了，就跟哄小孩子似的："应该信仰上帝，我亲爱的。"

"可是，如果我不信这一套呢？"有一次我气得叫了起来。

"那也很好嘛，我亲爱的。"

"好什么？"

"这是种极好的迹象，我的朋友，甚至是极可靠的迹象，因为我们俄国的无神论者，只要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并且稍有头脑，那么他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总喜欢跟上帝保持亲善关系，因为他必定是善良的，而善良是因为他无限满足于自己是个无神论者。我国的无神论者都是些可尊敬的人，极可信赖，可以说是祖国的栋梁……"

当然，这话有点儿意思，但我不希望这样模糊，只有一次他说明白了，但又说得非常奇怪，特别是因为我听说过他改信天主教、为修苦行而戴铁链之类的事，所以我尤为吃惊。

"我亲爱的，"有一次他不是在家里，而是在某处街上对我说，当时在长谈之后我正送他出来。"我的朋友，要爱本来面貌那样的人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应该去爱，所以你给人行善时，必须克制真实的感情，捂住鼻子，闭上眼睛（后一点必须做到）。你要容忍人们对你所做的恶事，尽量不生他们的气，

① 在古罗马传说中，罗马与阿尔巴两国为决出谁居首位发生战争，相持不下。最后决定由双方各派三将士到阵前交锋，一决雌雄。于是罗马派遣贵族贺拉斯世家中三兄弟与代表阿尔巴的居里亚斯三兄弟进行决斗。结果贺拉斯三兄弟中战死两个，第三个凯旋回到罗马。法国作家高乃依据此创作了悲剧《贺拉斯》(1640)，作品中的老贺拉斯（三兄弟之父）是爱国主义与公民职责的体现者。

‘记住你也是人’。当然，如果你天资比一般人略为聪明，你就必定会对人严厉。人的本性是卑贱的，喜欢因恐惧而爱人，别接受这种爱，要始终鄙视它。《古兰经》里有一处说，真主命令先知把‘执迷不悟之人’看做老鼠，给他们行善，但不与之为伍，这样做有点儿傲慢，却完全正确。① 即使在人表现好的时候，你也要学会鄙视人，因为人在这种时候往往也是坏的。哦，我亲爱的孩子，我是剖析了我自己才这么说的。只要是不太笨的人，不可能既活着又不鄙视自己，不管他诚实与否，都是这样。既要爱他人又要鄙视他人——这是不可能的事。依我看，人生来就有一种自然天性——不可能去爱他人。‘爱人类’这句话一开头就含有某种错误，应该理解为只爱你在自己心中创造的人类（换句话说，你自己创造了自己，爱的也是你自己），所以这样的人类实际上永远不会出现。”

“永远不会出现？”

“我的朋友，我不否认这有点儿荒谬，可错不在我，因为创世的时候并没有跟我商量过，所以我对此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

“既然您这么看，怎么还能说您是基督徒呢？”我叫了起来，“怎么还能说您是戴过铁链的苦修士和布道者呢？我真不明白！”

“谁这样说过我？”

---

① 这段议论可能是把普希金诗歌中的思想与形象糅合的结果。“执迷不悟之人”取自普希金的《仿〈古兰经〉》（1824）：“把天书的抄本赐予你，/先知啊，不是为了开导执迷不悟之人；/从容地宣扬《古兰经》吧，/也不要强迫渎神的人信神！”而在另一首诗《不寐章》（1830）中提到过“这生活，像老鼠似的瞎忙”。——俄编注

我告诉了他，他听得很仔细，但不再谈下去了。

这一次谈话，我终生难忘，但我怎么也记不起谈话是由什么引起的，不过他当时甚至显得很激动，这种情况他几乎从未有过。当时他说话很有激情，不带讥嘲，仿佛不是说给我听的。可我还是不相信他：他怎么可能跟我这样的人正经地谈论这类事情呢？

第二章

一

11月15日那天上午，我正巧在“谢廖扎公爵”那儿碰见了他。他跟公爵交往是我搭的桥，但即使我不搭桥，他们之间也有许多接触的理由（我是指早先在国外发生的那些事和别的事）。除此之外，公爵还许诺分给他至少三分之一的遗产，肯定值两万卢布吧。他只分给他三分之一，而不是整整一半，记得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可我没有吭声。分遗产的许诺是当初公爵主动提出的，韦尔西洛夫没有做过半点儿暗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公爵自告奋勇，韦尔西洛夫只是默许，而且事后一次也没提起过，甚至也没表露过他多少还记得这个许诺。顺便说说，起初公爵对他简直着了迷，特别是对他的那些言谈，甚至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一点公爵跟我表白过好几回。他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会几乎绝望地哀叹自己“走上了这样的邪路！……”哦，当时我们俩还挺要好呢！……那会儿我总是竭力只向韦尔西洛夫介绍公爵的优点，虽然我自己也看到了他

的缺点，却一直在为之辩护，然而韦尔西洛夫要么避而不谈，要么淡然一笑。

“即使他有缺点，那他的优点至少也跟缺点一样多!”有一次单独相处时，我对韦尔西洛夫嚷道。

“天哪，你这是在大大地奉承他呢。”他笑了起来。

“怎么是奉承呢?”我不明白。

“一样多的优点！要是他的优点真跟缺点一样多的话，他的圣尸就要显圣了!①”

可是，这当然不算评价。那时候不知怎的他总是避而不谈公爵，就像避而不谈切身之事一样，不过对前者回避得尤为厉害。当时我已经猜到，他时常撇开我独自去会公爵，他们俩有特殊关系，可我听之任之。我也不妒忌他跟公爵说话比跟我似乎更认真，可以说更为正经，很少讥嘲。当时我感到很幸福，因此他这样做甚至正合我意。我不计较这点，还因为公爵稍欠聪明，喜欢别人把话说得又直又白，有些俏皮话他甚至根本听不懂。但最近他的态度有点儿放肆起来。他对韦尔西洛夫的感情似乎也开始变了。敏感的韦尔西洛夫看出了这一点。我还要预先说明，公爵同时对我也改变了态度，甚至改变得异常明显，最初我们那种几乎很热情的友谊，如今只剩下了一些死板的形式。但我还是继续去他那儿，话说回来，既然我已沉沦在旋涡里，我又怎么能不去呢?哦，我那时真是幼稚，难道单凭心灵的一时迷误就能把人弄得如此蠢笨和屈辱吗?我从他那儿拿钱，还以为这不算什么，该拿。不，不是这样，我当时就知道不该拿，只不过我很少去想罢了。我不是为了钱才跟他来往，虽说我很需要钱。我知道我跟他来往不是为了钱，但又明

① 这里意思是“他就是圣徒了”。

白我每天上门都是去拿钱。可是我处在旋涡中，此外，当时我还怀有一桩完全不同的心事——在我灵魂里欢唱！

上午十一点左右，我刚进门，就赶上韦尔西洛夫正在结束一番长篇大论：公爵在房里边踱步边听，韦尔西洛夫则坐着。公爵看样子有几分激动。韦尔西洛夫几乎总能弄得他激动起来。公爵这人极易受外界影响，甚至到了幼稚的程度，让我在许多事情上不能不看轻他。可是，我再说一遍，最近他的态度中却露出了一种龇牙咧嘴的凶狠。他一看见我，便止住了脚步，脸上似乎还抽搐了一下。我心里明白，这天上午他为什么有点儿不快，但没料到他的脸竟会抽搐得这么厉害。我知道他心头郁积着各种烦恼，但糟糕就糟糕在我只了解其中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对我来说，当时还是天大的秘密。其所以糟糕和荒唐，是因为我居然还常常自以为是地去安慰他、出主意、甚至居高临下地嘲笑他意志薄弱："为了这么点儿小事"而失去自制力。他总是避而不答，可这种时候他不可能不恨死我：我采取的姿态太虚伪了，这一点我简直没有料到。哦，愿上帝给我作证，关键的东西我根本没有料到！

不过，他还是客气地向我伸过手来，韦尔西洛夫朝我点了点头，没有中断他的议论。我摊开四肢半躺在长沙发上。当时我的举止和作风真不像话！我甚至更加装腔作势，把他的熟人当自己的一样不放在眼里……唉，要是一切现在可以重新来过，我的举止准会不同！

再说两句，以免忘记：当时公爵还住在原来的寓所里，可几乎已经全部占用了：寓所的女主人斯托尔别耶娃只住了个把月，又动身去别处了。

二

他们在谈论贵族阶层。我要指出的是，别看公爵表面上主张进步，但贵族这个观念有时会使他十分激动，我甚至怀疑他生活中发生的许多坏事，都始源于这一观念：他看重自己的公爵封号，可又穷得像个乞丐，因此出于虚假的尊严而一直挥金如土，结果负债累累。韦尔西洛夫好几次都暗示他说，公爵封号的实质不在于此，想给他心里灌输一种较为崇高的想法，可末了公爵似乎总会因被人教训而生起气来。看样子，这天上午的情形大致也是这样，只是我没赶上谈话的开头。韦尔西洛夫的话起初让我觉得他保守，但后来他矫正了。

"'荣誉'这个字眼的含义就是义务，"他说（我只能凭记忆转述其大意），"当国家由领先的阶层统治的时候，这个国家是巩固的。领先的阶层总有自己的荣誉和荣誉观，这种荣誉观也可能并不正确，但几乎总是一种纽带，能使国家巩固：在道德上有益，在政治上则更有益。可是奴隶们，即所有不属于这一阶层的人，却正在蒙受痛苦。为了不使他们受苦，就需要实行权利平等。我国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很好。但根据所有经验，各国至今（即欧洲各国）在实行权利平等的情况下，荣誉感都有所减弱，因而义务感也随之减弱。利己主义取代了先前的团结观念，整体分解为个人自由。而获得自由的人们一旦撇开了团结观念，最后必定失去任何崇高的纽带，到头来连自己已经获得的自由也不再能捍卫了。但俄国的贵族阶层历来跟欧洲的不同。我们的贵族阶层即使现在失去了特权，还可以继续成为最高阶层，成为荣誉、光明、科学与崇高思想的捍卫

者，关键是它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特定阶层，如果封闭的话，贵族这一观念也就消亡了。恰恰相反，在我国，进入这一阶层的大门很久以前就已经打开，现在是到了彻底敞开的时候了。应该让我国每一个人拥有一种权利：只要在荣誉、科学和勇敢方面建立任何功勋，他就有权进入上层人物的行列。这样一来，这个阶层就自然而然只能演化为优秀人物的集合体，这是就优秀这个词真正的直接意义而言，而不是就其早先作为特权阶层这一意义而言。只有在这种新的，或者最好说是革新的形式下，这个阶层才可能保存下来。"①

公爵龇牙咧嘴地讥嘲说：

"到那时这还能算贵族阶层吗？您这是在设计某个共济会② 分会，而不是贵族阶层。"

我再说一遍，公爵的学识非常浅薄。他这话让我恼火得甚至在沙发上背过脸去，虽说我对韦尔西洛夫的观点也不尽赞同。韦尔西洛夫很清楚公爵是在讥笑。

"我不知道您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共济会，"他答道，"但是，既然连俄国公爵都拒绝这种观念，那么，不用说，实现它的时刻还没有来到。每一个想加入开放的、不断革新的阶层的人，都把荣誉与启蒙观念当做神圣的誓言，这当然是一种理想

---

① 认为贵族应该是"优秀人物"，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固有的见解。他在给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的信（1876 年 3 月 10 日）中就希望弟弟一家都成为"优秀人物"，并认为这是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基本想法"，虽然有许多偏差之处。这一见解在《作家日记》1876 年 10 月号第 2 章"优秀人物"中有所发挥。

② 18 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宗教道德运动，此后在许多国家（其中包括俄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中传播。共济会会员希图建立一个全世界的秘密组织，以达到把全人类联合在宗教兄弟同盟之中。

国，然而为什么不能实现呢？即使这种思想甚至只活跃在少数人的头脑里，那它并没有消亡，还会像漫漫黑暗中的一点儿星火，闪闪发光。”

“您喜欢使用‘崇高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团结观念’等等这些字眼，我倒想请教，您说的‘伟大的思想’究竟指什么？”

“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您这个问题，我亲爱的公爵，”韦尔西洛夫淡淡一笑，“要是我向您承认我自己也答不上来，这话倒更确切。伟大的思想——这多半是指一种感情，往往在很长时间里都不会有定义。我只知道它始终是真正的生活之源泉，这儿说的不是理性的生活、虚构的生活，恰恰相反，是一种毫不枯燥的快乐的生活，所以作为这种生活源泉的崇高思想是绝对必要的，当然，这会使大家恼火。”

“为什么恼火？”

“因为有思想的人活着很无聊，没思想的人活着倒总是快乐。”

公爵吞下了这剂苦药。

“那么依您看，这真正的生活又是什么呢？”他显然生气了。

“我也不知道，公爵。我只知道这种生活一定十分普通，极其平常，每时每刻都显而易见，而且它普通得让我们无法相信它这么普通，所以多少世纪以来我们跟它失之交臂，既没有注意它，也没有认出它。”

“我只想说，您关于贵族阶层的设想同时也就是在取消贵族阶层。”公爵说。

“好吧，如果您真想这么说的话，那么贵族阶层在我国也许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这话太玄，太不清楚了。既然要说，依我看，就应该说透……”

公爵皱起眉头，瞥了一眼挂钟。韦尔西洛夫站起身，取过帽子。

“说透？”他说，“不，还是不说透的好，何况我有个脾气——话说到适可而止。确实如此。还有件怪事：只要我开始想说透我信仰的思想，几乎总会这样收场——说到最后，连自己都不相信我说的了。我怕现在也会这样。再见了，亲爱的公爵：我在您这儿总是不可原谅地唠叨个没完。”

他走了出去，公爵彬彬有礼地把他送走，可我觉得委屈。

“您干吗垂头丧气的？”他突然蹦出这么一句，瞧也不瞧我就擦身向写字台走去。

“我所以垂头丧气，”我开口说，声音发颤。“是因为发现您对我，甚至对韦尔西洛夫的态度莫名其妙地变了，我……当然，韦尔西洛夫的话起初有点儿保守，但后来他做了修正，而且……他那些话里也许含有深刻的思想，只不过您没有听懂，而且……”

“我就是不愿意别人跳出来教训我，把我当小孩子！”他气呼呼地打断我。

“公爵，这种话……”

“劳驾别来演戏那一套。我知道我做的事卑鄙，我是败家子、赌棍、或许还是窃贼……对，是个窃贼，因为我输掉的钱是属于家庭的，可我根本不要别人来审判我。我不要，也不容许。我是我自己的审判官。他干吗说话模棱两可？既然想跟我宣传，那就请直说，别来那些玄玄乎乎、混乱不通的预言。可是要跟我说这种话，首先得有权利，自己就得是个清白人……”

“首先，你们起初的谈话我没碰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说

过些什么；其次，我想向您请教，韦尔西洛夫到底有哪点不清白？”

“够啦够啦，请您别说了。您昨天开口要三百卢布，拿去吧……”他把钱往我前面的桌上一放，自己则坐到圈椅里，气呼呼地靠在椅背上，交叠起双腿。我尴尬地怔住了。

“我不知道……”我喃喃地说，“虽然我向您开过口……虽然我现在很需要钱，可您这种口气……”

“别管口气不口气了。要是我说了什么冒昧的话，那么请您谅解。我向您担保，现在我顾不上这些。且听听实情吧：我收到了莫斯科来信，我弟弟萨沙四天前死了，您知道他还是孩子呢。而我的父亲已经瘫痪了两年，这一点您也知道，可信上说，现在他病情恶化，已经不能说话，认不得人了。家里人还在那边为遗产的事高兴，打算把他送到国外去，可医生给我写信说，他未必能活过两星期。这样一来，只剩下母亲、妹妹和我，因此现在我几乎是独当一面……瞧，总之，我要独自挑担……这遗产——哦，要是根本没有这笔遗产也许更好呢！我想告诉您的是：我许诺过从遗产中 minimum[①] 分出两万卢布给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可是，您想想，就因为手续问题至今还什么都办不成。我甚至……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我父亲，甚至还没有正式取得这份财产的所有权。然而我在最近三星期却花掉了那么多钱，斯捷别利科夫这浑蛋竟然要这么高的利息……现在我几乎把所剩的钱全给您了……”

“哦，公爵，既然这样……”

“我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今天斯捷别利科夫一定会送钱来的，足够我暂时应付一阵，可鬼才知道这个斯捷别利科

① 法文：至少。

夫安的什么心！我恳求他给我弄一万卢布来，至少让我能够先付一万卢布给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许诺过分给他三分之一的，这诺言一直在折磨我，令我烦恼。我许下了诺言，就不该食言。而且，我敢向您起誓，我一心想摆脱种种义务，哪怕先摆脱这个义务也好。这些义务压得我很重，很重，无法忍受！这种捆住我的关系……我无法见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不敢正眼看他……可他干吗要滥用一气呢？”

“他滥用什么，公爵？”我惊讶地在他面前站住了，“难道他什么时候向您暗示过要钱的事？”

“哦，没有，正是这一点叫我佩服，倒是我自己经常在提醒自己。而且我终于越陷越深了……这个斯捷别利科夫……”

“听我说，公爵，请您保持平静，看得出您越来越激动了，不过这一切也许只是一种幻觉。哦，我自己也不可原谅地、卑鄙地陷了进去，但我却知道这不过是暂时的……只要我能赢回一定数目的钱，那么，告诉我，加上这三百我总共欠您两千五百卢布，对不对？”

“我好像并没有要您还钱吧。”公爵突然咧开嘴讥笑道。

“您说您要先付韦尔西洛夫一万卢布。既然我现在从您这儿拿钱，那么这些钱当然就该算入韦尔西洛夫那两万卢布里，我不容许其他的处理办法。不过……不过我肯定能自己归还的……难道您真以为韦尔西洛夫是为了钱才来找您的吗？”

“要是他真是为了钱来找我，我倒觉得轻松些呢。”公爵令人纳闷地咕哝了一句。

“您说到有一种‘捆住您的关系’……如果这是指您跟韦尔西洛夫和我的关系，那实在太让人委屈了。您还说道：他教训别人该成为怎样的人，可他自己为什么不是这样，——这是您的逻辑！首先，请恕我直言，这算不上逻辑，因为即使他成

不了这样的人，他还是可以宣传真理……此外，用‘宣传’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您说他是先知。请问，不是您在德国时把他叫做‘娘儿们的先知’吗？”

“不，不是我。”

“斯捷别利科夫跟我说，是您。”

“他扯谎。我可不是起绰号嘲笑人的行家。如果谁宣传荣誉，那他自己就该是个清白人——这就是我的逻辑，即使这逻辑不对，我也不在乎。我希望是这样，永远是这样。不管是谁，不管是谁都不许上我家来审判我，把我当小孩子！够啦，”他叫喊着朝我把手一挥，免得我再讲下去。“哦，总算来了！”

门开了，走进来的是斯捷别利科夫。

三

他还是那副样子：穿得很考究，挺着个胸脯，瞪起傻眼瞧人，自作聪明，而且扬扬自得。可这一回他进门时却古怪地朝四下打量了一眼，目光中含着特别的谨慎和敏锐，似乎想从我们的脸色猜出些什么。不过，刹那间他便安下心来，嘴角边泛起了自信的笑容，但这是一种“无耻而有所乞求”的笑容，毕竟使我感到说不出的讨厌。

我早已知道他让公爵很苦恼。我就瞧见他上这儿来过一两回了。我……我在最近这个月里也跟他打过一次交道，可这一回，由于某个缘故，他的上门使我觉得有点儿奇怪。

“我这就给您，”公爵对他说，没跟他打招呼就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开始从写字台里取必要的文据和账单。至于我，此时正为公爵刚才说的最后几句话而大大生气：他那么明显（那

么莫名其妙地！）暗示韦尔西洛夫不清白，这事非要他说个明白不可。但当着斯捷别利科夫的面又无法这么做。我又摊开四肢半躺在长沙发上，随手翻开了放在我面前的一本书。

“《别林斯基文集》，第2卷！这可是件新鲜事，您打算深造啰？”我对公爵嚷道，显得非常做作。

他正急匆匆地忙得不可开交，可听了这话却猛然转过身来。

“我请您把这本书放下。”他厉声说。

这太过分了，特别是当着斯捷别利科夫的面！斯捷别利科夫好像故意似的，咧嘴露出了讨厌的奸笑，冲着我偷偷朝公爵那边歪了下头。我背转脸去不理这蠢货。

“您不用生气，公爵，我这就把您让给主要角色，我暂且退避三舍……”

我决定放肆起来。

“主要角色——这是指我吗？”斯捷别利科夫接嘴问，开心地指指自己。

“是啊，是您，您正是主要角色，这一点您自己也清楚。”

“对不起，我不是。这世上处处都有次要角色。我——就是个次要角色。有主要角色，便有次要角色。主要角色成事，次要角色得利。结果次要角色成了主要角色，而主要角色成了次要角色。是不是这样？”

“或许是吧，不过我照例不明白您的意思。”

“对不起。法国闹了场革命，要处决的人都处决了。拿破仑来了，他得到了一切。革命——这是主要角色，拿破仑则是次要角色。可结果呢，拿破仑成了主要角色，而革命却成了次要角色。是不是这样？”

顺便说说，我发现他之所以跟我谈起法国革命，是想重新

使用先前那种让我觉得十分滑稽的伎俩：他还是把我看做是什么革命者，所以每次见了我，总认为有必要说说这类话。

“请随我来，”公爵说，于是他们俩去了另一个房间。我独自被撇下之后，就铁心只要等斯捷别利科夫一走，便把那三百卢布还给公爵。我极需要这笔钱，但我还是下定了决心。

他们在那边毫无动静地大约待了十分钟，突然他们的嗓门响了起来。两个人同时在说话，可公爵突然叫嚷起来，像是气疯了似的。他有时候脾气很暴躁，所以连我也常常谅解他。不过正巧这当口有个仆人进来禀事，我给他指明了该进哪个房间，那边便一下子悄无声息了。公爵很快走了出来，一脸忧虑，却挂着笑容，仆人跑了出去，半分钟后便有一位客人走进来见公爵。

这是位贵客，肩上饰有绶带和花字[①]，年纪不超过三十，仪表威严，一副上流社会的绅士气派。我得先向读者交代，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还没有真正跻身于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尽管他对此有强烈的愿望（我知道他有这种愿望），所以他肯定十分重视这种来访。据我所知，公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刚刚开始与此人结识，这次是客人前来回拜，可惜却把主人弄了个措手不及。我瞧见公爵神色不安，心慌意乱地朝斯捷别利科夫匆匆使了个眼色，可斯捷别利科夫对这个眼色却视若无睹，根本不想退避，反而大模大样往长沙发上一坐，开始用手挠头发，挠得又散又乱，想必是表示我行我素吧。他甚至显现出一副妄自尊大的脸色，总之，简直让人无法想象。至于我，不用说，

---

① 绶带是一种饰在军服肩上的绦带，末端饰有金属，这是副官、总参谋部参谋（来客显然属于这类身份）军服上的饰物；花字由姓名起首字母及数字组成，在沙皇时代花字系沙皇所赐。戴花字表示与宫廷、皇帝十分亲近。——俄编注

我当时已经控制住自己，当然，不想使任何人丢脸，可我看到公爵居然同样心慌意乱、似求似恨地朝我使眼色，这太让我吃惊了：这么看来，他耻于我们两人在场，竟然把我和斯捷别利科夫同等看待。这个想法把我气疯了，于是我更加放肆地半躺在沙发上，开始翻看那本书，装出一副似乎万事与我无关的样子。与此相反，斯捷别利科夫却瞪大了眼睛，前倾着身子，开始竖起耳朵听他们谈话，想必以为这样做是彬彬有礼。客人朝斯捷别利科夫瞥了一两眼，不过，对我也如此。

他们谈起了家庭新闻。来客以前就认识公爵那位出身名门的母亲。据我观察，这位客人尽管态度亲切，谈吐也似乎朴实，但却过于呆板，当然，他自视甚高，可能以为自己的来访不管对谁都是大大地赏脸。要是只有公爵一个人，就是说没有我们两个人在场，我相信他准会自然些、机灵些，可眼下他的笑容却显得特别拘礼，也许亲切得过了分，再加上那种奇怪的心不在焉，这使他露了底。

他们还没有坐上五分钟，突然仆人又来禀报说有客来访，而且好像故意似的，这也是位让主人丢脸的人。虽然此人根本不认识我，可我却对他很了解，听说过他不少事情。他还非常年轻，不过也有二十三岁了，穿得十分迷人，出身好，长得又漂亮，可是——无疑结交了一伙坏人。去年他还在一个声名卓著的近卫军骑兵团里服役，可又不得不主动申请退伍，个中原因无人不知。亲属们甚至登报声明对他的债务概不负责，可他至今依然花天酒地，按百分之十的月息到处借钱，在赌徒堆里狂赌，将大把大把的钱花在某个法国女人身上。事有凑巧，一星期以前他一夜之间竟赢了一万两千卢布，于是扬扬得意。他跟公爵交情甚笃：他们常常一起或联手赌博，可此刻公爵一见是他，竟然打了个哆嗦，这一点让我坐在那儿看个正着。这个

小伙子不管在哪儿都跟在自己家一样，说话高声大气，嘻嘻哈哈，毫无顾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当然他不会想到，我们的主人正为自己的这伙朋友而在贵客面前哆嗦呢。

他一进门就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甚至还没坐下，便马上谈起昨天的赌局来。

“您好像也在那儿。”他三句话没完就转脸对贵客说，误把对方认作是自己一伙中的某某，但又立即认出不是，便嚷嚷道：

“哦，对不起啦，我差点儿把您也当做了昨天那个人！”

“这位是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达尔赞，这位是伊波利特·亚历山德罗维奇·纳晓金。”公爵急忙给他们做介绍。这个小伙子毕竟还值得介绍，因为他的姓氏高贵而有名望，可刚才公爵却不肯把我们介绍出去，我们依然是靠边坐。我压根儿不想把脸转向他们，但斯捷别利科夫一见那年轻人便开心得咧嘴笑了，显然想要攀谈。这一切甚至让我觉得挺滑稽。

“去年我在韦里金娜伯爵夫人家里常碰见您。”达尔赞说。

“我记得您，不过那时您好像穿着军服。”纳晓金和蔼地答道。

“是的，那时穿着军服，可是多亏了……啊，斯捷别利科夫，也在这儿？哪阵风把他吹来啦？瞧，就是多亏了这位先生我才不穿军服的呢。”他直指着斯捷别利科夫，哈哈大笑起来。斯捷别利科夫也开心地笑了，想必把这当做了亲热的表示。公爵红了脸，赶紧向纳晓金提了个什么问题，至于达尔赞，则走到斯捷别利科夫跟前，和他非常热烈地攀谈起来，不过声音已经放得低低的。

“您在国外时好像跟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阿赫马科娃挺熟吧？”客人问公爵。

“是啊，我认识……”

“看样子，这儿很快会爆出一条新闻来。据说她要嫁给比奥林格男爵。”

“这是真的！”达尔赞嚷道。

“您……真能肯定确有其事？”公爵问纳晓金，样子显得很激动，特别加重了问话的语气。

“我是听人说的，这事好像大家都在议论，不过是否确实，我不能肯定。”

“哦，这事千真万确！”达尔赞走到他俩跟前，“是杜巴索夫昨天告诉我的，这类新闻他总是第一个知道。按理说公爵也应该知道……”

纳晓金等达尔赞说完，又转过脸去对公爵说：

“她变得在社交界很少露面了。”

“最近一个月她父亲犯过病。”公爵不知怎的冷冷地说。

“这位夫人好像有不少风流韵事呢！”达尔赞突然蹦出了一句。

我昂起头，挺直腰。

“我有幸直接认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我有义务担保说，所有不堪入耳的传闻——全是造谣和诽谤……制造流言的那些人……是因为对她着了迷，可又达不到目的。”

我那么愚蠢地插了这番话之后就不再吭声，脸孔发烧，挺直腰杆，继续望着众人。大家朝我转过脸来，可是斯捷别利科夫突然嘻嘻地笑出声来，连几乎被我镇住的达尔赞也咧嘴笑了。

“这位是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多尔戈鲁基，”公爵指着我对达尔赞说。

“哦，请您相信我，公爵，”达尔赞坦率而善意地对我说，

“那种话可不是我编造的，如果说有流言的话，也不是我散布的。”

“哦，我不是说您！”我很快答道。可斯捷别利科夫却极其放肆地大笑起来，事后才弄清楚，原来他是笑达尔赞管我叫公爵。我这该死的姓氏在这种场合又坏了事。至今想来我都觉得脸红：那时我当然是出于羞怯，竟不敢纠正这句蠢话，竟没有大声宣布我是平民多尔戈鲁基。这对我来说还是生平头一回。达尔赞困惑不解地望着我和发笑的斯捷别利科夫。

“噢，对啦！刚才我在您家楼梯上碰见一个漂亮姑娘，挺机灵的，光彩照人，她是谁呀？”他突然问公爵。

“说真的，我不知道是谁。”公爵很快回答说，脸却红了。

“那么谁能知道呢？”达尔赞笑了起来。

“不过，这……这可能是……”不知怎的公爵语塞了。

“这……这就是他的好妹妹——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斯捷别利科夫冷不防指着我说，“因为我刚才也碰见过她……”

“噢，真有这事！”公爵接过话茬儿，但这一回脸色异常庄重严肃，“那么想必是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了，她跟我现在住的这所房子的主人——安娜·费奥多罗芙娜·斯托尔别耶娃很熟。今天她一定是来看达里娅·奥尼西莫芙娜的，这人也是安娜·费奥多罗芙娜的老熟人，房主临走时托她照管房子……”

事情确实如此。这个达里娅·奥尼西莫芙娜就是可怜的奥莉娅的母亲，关于奥莉娅自杀的事我已经讲过，事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终于把她母亲暂时安顿在斯托尔别耶娃家里。我清楚地知道丽莎常去斯托尔别耶娃家，后来也时而去看望可怜的达里娅·奥尼西莫芙娜，我们家的人都很喜欢她。可是在公爵做了说明——其实倒是非常有道理的说明之后，特别是在斯捷别利科夫愚蠢地多嘴多舌之后，也许还因为刚才人家管我

叫公爵的缘故，这一切弄得我面红耳赤。幸亏这时纳晓金起身要走了，他也伸手跟达尔赞握别。房里只剩下了我和斯捷别利科夫，他突然冲着我朝站在门口的达尔赞的背影歪歪头，我对他扬了扬拳头。

不一会儿达尔赞也走了，临走前，他跟公爵说好明天在约定的某个地点不见不散，——不用说，指的是赌场。走的时候他对斯捷别利科夫嚷了句什么话，还朝我微微点了点头。待他一走，斯捷别利科夫便从座位上蹦起来，站到房间中央，举起一个指头说道：

“这个小少爷上星期又干了件荒唐事：他开了一张期票，期票的背书竟弄虚作假，签上了阿韦里亚诺夫这个姓氏。期票就这样还在流通，可这是不允许的！这是刑事犯罪。八千卢布呢。”

“这张期票一定在您手里啦？”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我有一家银行，一家 mont de piété[①]，我可没有期票。听说过巴黎的 mont de piété 是什么吗？那是让穷人有饭吃、施恩于穷人的机构。我有 mont de piété……”

公爵粗暴而气愤地打断了他：

“您待在这儿干吗？干吗还不走？”

“哦！”斯捷别利科夫朝他飞了一眼，“那件事呢？难道不行？”

“不不不，不行，”公爵叫着跺了跺脚，“我已经说过了！”

“好吧，既然这样……那就这样好啦。只不过不是这么回事……”

他猛地转过身去，低头弓背地突然往外走。已经走到了门

① 法文：抵押信贷行。

口，公爵冲着他背后叫喊：

“放明白点，先生，我一点儿也不怕您！”

公爵火冒三丈，刚想坐下，可瞧了我一眼又不坐了。他那眼神似乎也在跟我说：“干吗您也赖着不走？”

“我，公爵，”我刚开口……

“老实说，我现在没空，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马上要出去。”

“只耽搁您一会儿，公爵，事情对我很重要。首先，请收回您那三百卢布。”

“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正在走动，可顿时止住了脚步。

“是这么回事，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还有，您说韦尔西洛夫不是清白人，再加上后来您那种态度……总之，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收下了。”

“可一个月以来您好几次都收下了。”

他蓦地坐到了椅子上。我站在桌边，一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抚弄着别林斯基的书。

“那时感觉不一样，公爵……再说，如果我永远也赢不回一定数目的钱……这种赌博……总之，我不能收下！”

“您不过是因为刚才没能突出自己，所以才生这么大气。我请您别动这本书。”

“‘没能突出自己’是什么意思？还有，您在您客人面前几乎把我和斯捷别利科夫同等看待呢。”

“啊，这就是谜底！”他咧开了嘴，挖苦道，“此外，达尔赞管您叫公爵，所以您尴尬了。”

他恶毒地笑起来。我涨红了脸：

“我简直不明白……您那个爵位白给我我也不要……”

“我了解您的性格。您那么可笑地大吵大嚷替阿赫马科娃辩护……别动这书！”

“您这话什么意思？”我也叫了起来。

“叫您别动这书！”他突然大吼一声，恶狠狠地在圈椅里挺直腰杆，仿佛要扑过来似的。

“您太过分了。”说完，我就快步走出房间。可我还没走到大厅尽头，听见他在书房门口朝我喊：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回来！回——来！马上回——来！”

我不睬他，继续往前走。他快步追上我，抓住我胳膊往书房拉。我竟然没有反抗！

“收下！”他把我扔下的三百卢布递给我，激动得脸色惨白。“一定要收下……否则我们……一定要收下！”

“公爵，我怎么能收呢？”

“好啦，我向您赔不是，行了吧？好啦，请原谅我！……”

“公爵，我一向都爱您，如果您对我也……”

“我——也一样，收下吧……”

我接过了钱。他嘴唇发颤。

“我明白，公爵，您是给那个坏蛋气疯了……可我还是不能收下，公爵，除非我们接个吻，就像早先吵嘴之后那样……”

我说这话的时候也在发颤。

“真是多情善感，”公爵咕哝着，尴尬地笑了笑，但还是俯下身吻了吻我。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在他吻我的瞬间，我分明看出他脸上有一种嫌恶的神情。

“他至少给您带钱来了吧？……”

“嗳，这无所谓。”

“我这是为您……”

“带来了，带来了。”

“公爵，我们俩是朋友……再说，韦尔西洛夫……”

“对，对，这很好！”

“另外，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这三百卢布……”

我手里揣着钱。

“拿去吧，拿去吧！”他又笑了笑，但笑得很令人不快。

我收下了钱。

第 三 章

一

我之所以收下钱，是因为我喜欢他。谁要是不信，我可以回答说，至少我收下这笔钱的那一刻，我深信只要我愿意，我完全能够从别的来源弄到钱。所以说我不是出于万不得已，而是出于礼貌才收下的，仅仅是不想让他难过而已。唉，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但是离开他家时我还是觉得心情很沉重：我看出这天上午他对我的态度有了异乎寻常的变化，这种态度还从来没有过，至于对韦尔西洛夫的态度，简直就是恩将仇报。当然，斯捷别利科夫刚刚用什么事惹恼了他，但在斯捷别利科夫到来之前他就这样了。我再重复一遍：在最近这些日子里，就已经可以看出他改变了原先的态度，不过并不像今天这样，没有到这样的程度——关键就在这里。

关于侍从武官比奥林格男爵的那则荒唐新闻，可能对他也有影响……我在激动之下也出了格，可是……问题在于当时我心里亮起了全然不同的希望，于是轻率地放过了眼前许多事

情，我急于放过它们，驱走一切阴霾，面向希望之光……

还不到下午一点。我坐上我那马特维的马车，离开公爵处直奔——信不信去谁家？——直奔斯捷别利科夫家！问题是他刚才让我觉得挺奇怪，倒不是因为他去找公爵（这是他事先约定的），而是因为尽管他出于愚蠢的习惯多次向我使眼色，然而却对我期望的话题闭口不谈。昨晚我收到了他通过本市邮局寄来的一封短信，弄得我摸不着头脑，他恳请我于今天一点多钟务必去他家，说是“他可以告诉我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可刚才在公爵那儿，他对写信一事连一点儿声色也不露。斯捷别利科夫跟我之间怎么可能有事要瞒旁人呢？想想都感到滑稽，不过由于刚才发生了那么些事，此刻我在去他家的路上甚至也稍觉不安。当然，大约两星期前我向他借过一次钱，他一口答应了，但当时不知在什么问题上我们意见不合，结果我主动拒绝借他的钱：那时候他照例不清不楚地咕哝起来，我似乎看出他是想提什么要求，某些特殊条件。由于我每次在公爵那儿碰见他时，总是居高临下地绝不把他放在眼里，所以这一回我傲慢地打断了他有关特殊条件的任何建议，扬长而去，尽管他追我追到了门口。后来我在公爵那儿弄到了钱。

斯捷别利科夫过着完全独身的生活，但日子倒过得挺富裕：寓所的四个房间都很漂亮，上等的家具，有男女仆人，还有一名女管家，不过她已经上了年纪。我怒气冲冲走进去。

“您听着，老兄，”我还在门口就开了腔，“首先，您写信是什么意思？我不允许您我之间有什么书信来往。有什么事您干吗刚才不在公爵那儿当面直说：我会洗耳恭听的。”

“那您刚才干吗也不提不问呢？”他咧开嘴，露出一副扬扬得意的笑容。

“因为不是我有事找您，而是您有事找我。”我突然怒气十

足地叫道。

“既然如此，那您干吗来找我呢？”他开心得差点儿从原地跳起来。我当即转身想走，可是被他抓住了肩膀。

“不，不，我开个玩笑而已。事情很重要，您自己会明白的。”

我坐了下来。我得承认我是感到好奇。我们在一张大书桌旁面对面坐好。他狡猾地笑笑，正想举起一个手指头。

“请您别耍滑头，别举起指头，特别是说话不要转弯抹角，有什么话请直说，否则我马上就走！”我又气冲冲地嚷道。

“您……好傲慢哪！”他用一种愚蠢的责备口气说，从圈椅里向我倾了倾身子，额头的皱纹都往上聚在一起。

“对您就该这样！”

“您……今天拿了公爵的钱，三百卢布，我有钱，拿我的要好些。”

“您从哪儿知道我拿了钱？”我大吃一惊，“难道他亲口跟您说过？”

“是他跟我说的，您放心，他是随口提到的，顺嘴说的，完全是顺嘴说的，绝非有意。他跟我说了。不过您本可以不从他那儿拿钱。对不对？”

“可我听说您要的利息宰得人受不了。”

“我开的是 mont de piété，我不宰人。我只是为朋友们开的，对别人我可不贷款。对别人来说 mont de piété……”

他这家 mont de piété 其实是最最常见的抵押贷款，用别人的名字开设在另一个寓所，生意十分兴隆。

“对朋友们我却可以大笔贷款。”

“那么，公爵莫非就是这样的朋友？”

“朋——友，不过……他老是说空话。可他没有权利说空

话。”

“怎么，他落在您手心里啦？欠了很多钱？”

“他……欠了很多。”

“他一定会还您的，他得到了遗产……”

“这——不是他的遗产，他欠钱，还欠别的。遗产不顶事。对您，我可以无息贷款。”

“也当我是‘朋友’？我哪能担当得起呢？”我笑了起来。

“您担当得起。”他整个身子又向我倾过来，想举起指头。

“斯捷别利科夫！别举指头，要不我就走。”

“听我说……他可能会娶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他阴险地挤挤左眼。

“您听着，斯捷别利科夫，这样谈下去有点儿不像话了……您怎么敢提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名字？”

“别生气嘛。”

“我只是在强迫自己听着，因为我清楚地看出其中必有把戏，我想弄个明白……可我的耐心有限，斯捷别利科夫！”

“别生气，别那么傲慢。先少来点儿傲慢，听我说完，然后再去傲慢吧。关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事您想必知道吧？关于公爵可能会娶……想必也知道吧？”

“这个主意我当然听说过，而且知道得一清二楚，可我从未跟公爵谈起过。我只知道是索科利斯基老公爵想的这个主意，他至今还病着，可我根本没说过什么，没有参与这件事。我跟您说这话仅仅是为了做个表白。我倒要请问您，首先，您为什么要跟我谈起这件事？其次，难道公爵跟您说过这种事吗？”

“不是他跟我说，他不愿跟我说，而是我跟他说，他却不愿听。刚才他还大吵来着。”

“那当然！我认为他做得对。”

“那个小老头儿，索科利斯基公爵，会给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大笔嫁妆，她挺讨他喜欢。到那时新郎索科利斯基公爵就能把欠的钱全部还我。连钱以外的债也还我。肯定能还清！可现在他却无法还。”

“那我呢，您找我干什么？”

“为了一个关键问题：您跟他们都很熟，您在那儿路路通。您能打听到一切。”

“哎，真见鬼……打听什么？”

“公爵愿不愿意，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愿不愿意，老公爵愿不愿意。一定要打听明白。”

“您竟敢叫我去当您的奸细，而且还是——为了钱！”我气得直跳。

“别傲慢，别傲慢。再忍着点儿吧，至多四五分钟就够了。”他又按我坐下。他显然不怕我的架势和喊叫，我则铁了心要听到底。

“我必须很快打听明白，很快打听明白，因为……因为也许稍一耽搁就为时太晚了。刚才那军官谈起男爵和阿赫马科娃的事时，您不是瞧见公爵像吞了苦药似的？”

再听下去肯定有失我的身份，然而我的好奇心却已被紧紧吸住，无法克制。

“听着，您……您是个卑劣的人！”我断然说，“即使我坐在这里听，容忍您对这样一些人说三道四……甚至我自己也搭腔，但这绝不是因为我承认您有这种权利。我不过是想见识一下某种卑劣的行径……第一，公爵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能抱什么希望呢？”

“不抱任何希望，可他气得发狂。”

“这不是真的！”

“他气得发狂。因为阿赫马科娃现在已经退出了赌博，而他在这场赌博中输掉了双倍的赌注。眼下他手里只剩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这张牌了。我可以借给您两千卢布……既不要利息也不立借据。”

这话一出口，他便果断自傲地往椅背上一靠，瞪眼瞧着我。我也瞪眼瞧着他。

“您身上穿的衣服是在大百万街定做的，需要一笔钱，您需要钱，拿我的钱比拿他的好。我可以借给您多些，不止两千呢……”

“要我干什么？真是见鬼，您要我干什么？”

我顿了顿足。他朝我俯过身来，意味深长地说：

“要您别碍我的事。”

“您就是不借钱给我，我也不会插手！”我嚷道。

“我知道您会保持沉默的，这很好。”

“我不用您来夸奖。就我个人来说，我自己也很希望这事能够成功，但我认为这不关我的事，而且甚至觉得这不体面。”

“您瞧瞧，您瞧瞧，不体面！”他举起一个指头。

“瞧什么？”

“不体面哪……嘻嘻！”他突然笑了起来，“我懂，我懂，您觉得不体面，可……您不会碍事吧？”他朝我使了个眼色，可眼色里却充满了无赖、甚至嘲笑和卑鄙的神情！他一定以为我心存什么卑鄙的念头，并且指望我这么卑鄙……这一点是明摆着的，可我根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同样是您的姊妹啊。”他暗示道。

“您没有资格说这种话。您根本没有资格提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别傲慢嘛，只要再听一分钟！您听着：他既能得到钱又能保全大家，”斯捷别利科夫振振有词地说，“注意到没有，我说的是大家，大家？”

“您以为我还会去向他拿钱吗？”

“现在您不是在拿吗？”

“我拿的是自己的钱！”

“怎么是自己的呢？”

“这是韦尔西洛夫的钱：他欠韦尔西洛夫两万卢布。”

“欠韦尔西洛夫的，可不是欠您的。”

“韦尔西洛夫——是我父亲。”

“不，您姓多尔戈鲁基，不是姓韦尔西洛夫。”

“反正一样！”

真的，我当时竟会这样辩解！我明明知道这不一样，我还没有傻到这种地步，可我再一次为了“脸面”，当时做了这样的辩解。

“够啦！”我大喊一声，“我确实什么都不明白。您怎么敢找我来谈这种无聊的事？”

“难道您真的不明白？您——是不是故意装作不明白？”斯捷别利科夫拖腔拖调地说，脸上挂着不信任的微笑，目光锐利地审视我。

“我对天起誓，真的不明白！”

“我说：他能保全大家，大家，只是您别碍事，别劝阻……”

“您一定是疯了！您提‘大家’干什么？难道韦尔西洛夫也要他去保全？”

“不光保全您，也不光保全韦尔西洛夫……还保全其他人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同样是您的姊妹，就像莉扎韦塔·马卡

罗芙娜！”

我瞪大了眼睛。突然瞧见他那讨厌的目光里甚至闪过一抹可怜我的神色。

“您不明白，那更好！好就好在您不明白，这非常之好。值得夸奖……如果您真不明白的话。”

我怒火中烧：

“您跟您这些无聊的事见鬼去吧，您是个疯子！”我大喝一声，抓起帽子。

“这决不是无聊的事！就这么谈定啦？您该知道，您会再来的。”

“不。”我在门口断然回答。

“您会来的，到那时……那时就是另一番谈话了。那会是关键性的谈话。两千卢布，请记住！”

二

他使我产生了一种极其恶心而又模糊的印象，所以我一出门就竭力不去想它，而只想摆脱它。一想到公爵可能跟他议论我和欠钱的事，我便如针扎一般。“我今天赢到钱今天就还掉。”我铁心想道。

尽管斯捷别利科夫十分愚蠢，说话躲躲闪闪，可我还是明显看出他是个十足的卑鄙家伙，而且关键是这里面肯定藏着什么阴谋。只不过我当时没有工夫去深究任何阴谋而已，而这恰恰正是我看不清暗地里发生的事情的主要原因！我不安地看了看表，两点还不到，因此还可以去做一次拜访，否则在三点以前我准会激动得要死。于是我就去看望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韦

尔西洛娃——我的姐姐。我跟她早就意气相投了，那是在我的老公爵家里，正值他生病期间。当时我想到已经有三四天没去看望他，良心很是不安；正好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替我照料他：老公爵对她异常依恋，甚至在我面前管她叫守护天使。顺便提一下，要把她嫁给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这确实是老公爵头脑里想的主意，他甚至不止一次跟我讲起过，当然是私下里讲的。由于我早就发现，尽管韦尔西洛夫对所有切身之事漠不关心，但每逢我跟他谈起我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碰面的情形，他却总是显得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便把老公爵的这个主意告诉了他。当时他支支吾吾地对我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聪颖过人，不用旁人指点也能应付这种微妙的事情。当然，斯捷别利科夫说得对，老公爵会给她一份嫁妆，可他斯捷别利科夫怎么敢指望在这件事上捞取什么呢？刚才公爵朝他背后喊叫，说他自己一点儿也不怕他：莫非斯捷别利科夫真的已经在书房里跟他谈起过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事？我想，要是我处在公爵的位子上，想必也会怒气冲天的。

最近我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甚至去得很勤。但这事总有点儿蹊跷：她常常主动约我去，而且肯定会在那儿等我，可是待我一进门，她却总是装出一副样子，似乎我来得很突然，出乎她的意料，虽然我注意到了她这个细节，但还是喜欢去找她。她住在外祖母法纳里奥托娃家里，当然是作为她的养女（韦尔西洛夫一点儿也不负担她的生活费），——但绝非通常描写的贵夫人家中的养女角色，例如普希金在《黑桃皇后》里描写的老伯爵夫人的那个养女。[①]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自己

① 《黑桃皇后》中老伯爵夫人的养女，是个寄人篱下的很可怜的姑娘。

就像是伯爵夫人，她在这幢房子里完全单独过活，就是说虽然跟法纳里奥托夫家的人住在同一座楼、同一个寓所里，可是却拥有两个单独的房间，所以，比方说，我出出进进就没有一次碰见过法纳里奥托夫家里的任何人。她有权在自己那儿接待愿接待的人，有权随意支配自己的时间。诚然，她已经虚岁二十三了。近一年来她几乎不再到社交场合去了，其实法纳里奥托娃倒并不吝惜在外孙女身上花钱，我听说她非常钟爱她。而我之所以喜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恰恰就在于我总是看见她穿得如此朴素，总是在忙乎什么事，看书或是做针线活。她那神态有点儿像修道院附属学堂里的女生，几乎像个修女，这也让我喜欢。她说话不多，但总是说得很有分量，而且极善于领会别人话里的意思，这一点我却从来做不到。好几次我对她说，尽管她的长相跟韦尔西洛夫毫无共同特点，可又让我觉得非常像他，她听了总是微微脸红。她动不动就脸红，总是红得很快，但又总是红得很淡，我极喜欢她脸上的这个特点。我在她面前提到韦尔西洛夫时，从不放肆地直呼其姓，而必定使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这一尊敬的称谓，而且不知怎的，自然而然就这么做了，虽说我已清楚地察觉到，在法纳里奥托夫家里想必都有点儿替韦尔西洛夫感到羞耻，话又说回来，这一点我是单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身上察觉到的，哪怕我还不能确定这儿使用“羞耻”这个字眼是否恰当，但确实存在类似的感情。我跟她也常谈起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这时她听得十分仔细，我觉得她很关心他的消息，但不知为什么总是这样：都是由我主动告诉她，她则从不追问。我从来不敢和她谈起他俩可能成婚的事，其实我倒常常想谈这事，因为我自己也多多少少喜欢这个主意。在她的房间里我感到非常舒坦。我还很喜欢她的博学，她读过许多书，甚至包括实用方面的书，比我读过的

多多了。

我头一次上她的门也是她主动邀请的。当时我就明白，她或许指望能时而向我打听点儿什么事。哦，那时候有许多人都能从我嘴里打听到许多事！“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暗暗想道，“她决不是单单为了这一点才在家里接待我的。”总之，我甚至很高兴为她效劳，而且……而且当我跟她做伴时，我心里总觉得坐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姐姐，不过关于我俩的嫡亲关系，我还一次也没有跟她谈起过，只字未提，甚至也没做过暗示，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不知为什么，我坐在她房里时总觉得开口谈这种关系是完全荒唐的，而且老实说，我望着她时偶尔还会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说不定她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嫡亲关系呢：她对我的态度让我做如是想。

三

我一进门，就意外地碰见丽莎在她那儿。这几乎让我大吃一惊。我清楚地知道她俩早先就见过面，那是在寄养“婴儿”的地方。关于自尊而腼腆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出奇地想去看婴儿，以及如何在那儿跟丽莎见面的事，如果有篇幅的话，我也许以后会讲，但我还是万万料不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竟会邀丽莎上她家里来。这让我又惊又喜。当然我没露声色，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问了好，跟丽莎热烈握了握手，就在她旁边坐下。她俩正在做活计：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件出门穿的连衣裙一半摊在桌上，一半搁在她们的膝上，裙子挺华贵，但已经旧了，就是说穿过三次了，她想多少改一改。丽莎是这方面的大“行家”，而且颇有鉴赏力，所以正在隆重召开“聪明女

子”磋商会。我想起了她们的父亲韦尔西洛夫，不觉笑出声来，再说我当时的心境也是十分欢畅。

“您今天挺快活，真叫人高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吐词又庄重又清晰。她音色浑厚，低沉而动听，说话又总是平心静气，总是微微垂下长长的睫毛，苍白的脸上闪现一丝笑容。

“丽莎知道，我不快活的时候会叫人多么扫兴。”我愉快地答道。

“说不定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知道这一点呢。”调皮的丽莎顶了我一句。亲爱的丽莎！要是我知道她当时的心境就好了！

“现在您在做些什么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问。（我得交代一下，今天我上她家来也是她邀请的。）

“现在我坐在这儿问自己：为什么我见到您看书，总比见到您做活计更觉得高兴？不，说真的，不知怎的做活计不适合您。在这一点上我跟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看法相同。”

“上大学的事您还没有决定吗？”

“我很感激您没有忘记我们的谈话：这表明您有时还想到我。可是……关于上不上大学，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再说我有我自己的目标。”

“他是说他有他自己的秘密。”丽莎插嘴说。

“别开玩笑，丽莎。有个聪明人前几天说过，在我国近二十年来的整个进步运动中，我们首先证明了自己的卑劣和愚昧。当然，这话也适用于我国大学里的人。”

“嘿，这话大概是爸爸说的，你总是一味重复他的思想。”丽莎又插嘴说。

“丽莎，你好像以为我自己真没有头脑似的。”

“在当今时代，倾听聪明人的话并且记住它们是有益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替我做了点儿辩护。

“正是这样，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热烈地接过话茬儿，“谁不思考俄国的现状，谁就算不上公民！或许我是以一种奇怪的观点看待俄国的：我们先是遭受了鞑靼人的侵占，继而又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农奴制，当然，这是因为两者都合乎我们的口味。现在给了我们自由，于是应该承受自由：我们能不能承受得起呢？自由会不会同样合我们的口味呢？——这是一个问题。”

丽莎迅速瞥了一眼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后者马上低下头去，开始在自己身旁寻找什么。我发现丽莎竭力在克制自己，然而不知怎的我俩的目光偶尔一下子碰上了，她便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发火了：

“丽莎，你真是莫名其妙！”

“原谅我！”她收住笑，突然几乎伤心地说，“天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她的嗓音里悠然颤栗着泪声。我惭愧极了：抓起她的手，重重地吻了一下。

“您心地真好。”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瞧见我吻丽莎的手，便温柔地对我说。

“丽莎，最让我高兴的是这一回我见到你笑了，”我说，“您信不信，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最近这些天，她每次见到我总是露出一种奇怪的眼神，那眼神仿佛在问：‘怎么样，你打听到什么没有？一切都顺当吧？’说真的，她总是这种神态。”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用敏锐的目光悠悠地望着她，丽莎垂下了头。不过我已经清楚地看出，她俩之间的亲密程度比我刚才进门时的估计要深得多，这个想法令我高兴。

“您刚才说我心地好，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可您不会相信，我是在您这里才整个儿人在变好，在您这里我才觉得很愉快。”我动情地说。

“恰恰是现在您说的这些话，让我非常高兴。”她意味深长地回答。我必须交代，她从未跟我谈起过我那些乌七八糟的生活以及我陷溺其中的旋涡，虽说我明白她不仅知道一切，甚至还侧面打听过。因此眼下她这句话似乎算是第一次暗示，这就使我更加对她心悦诚服。

“我们的病人怎么样啦?”我问。

“哦，他好多了：可以下地走动了，昨天和今天还乘车出门兜了兜风。难道您连今天也没去看过他？他一直在盼您呢。”

“我对不起他，可现在有您常去看望他，就足以替代我啦：他这人大大的喜新厌旧，舍了我换了您。”

她的神情顿时变得十分严肃，很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玩笑太庸俗。

“我刚才去过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那儿，”我嗫嚅地说，“我……顺便问问，丽莎，你刚才不是去看过达里娅·奥尼西莫芙娜吗?”

“是的，去过，”不知为什么她回答得十分简短，头也不抬，“而你好像每天都去生病的老公爵家吧?”她有点儿突然地发问，也许是没话找话。

“对，我去，只是没去找老公爵，”我淡然一笑，“我一进门就朝左拐。”

“连老公爵也看出来了，您去找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找得很勤。昨天他说起这事时还笑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

“笑什么？他笑什么?”

“您该知道，他开玩笑呢。他说情况正好相反，年轻美貌

的女子始终只会让您这种年纪的小伙子产生憎恨和愤怒的感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突然笑了起来。

“听我说……您要知道，他这句话说得太准确啦，”我叫了起来，“想必不是他说的，是您跟他说的？”

“怎么会呢？不，是他说的。”

“好吧，如果这个美女关注这个小伙子，哪怕他微不足道，哪怕他因为自己是‘小孩子’而站在角落里发脾气，可她突然把他看得胜过她周围所有的崇拜者，那便怎样？”我猛地摆出最勇敢的挑战姿态诘问道。我的心怦怦直跳。

“那你就会毁在她面前啰。”丽莎大笑起来。

“我会毁掉？”我嚷嚷道，“不，我不会毁掉。我觉得我毁不了。要是女人挡我的道，那她必须跟我走。谁挡我的道，谁就逃不过惩罚……”

很久以后，有一次丽莎回忆起这场谈话时，顺便告诉我说，当时我这句话说得非常奇怪，认真得好像经过了深思熟虑似的，但同时又“那么滑稽，让人忍俊不禁”。真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又纵情笑了起来。

“笑吧，笑我吧！”我喜不自胜地嚷道，因为整个这场谈话和谈话的调子十分投合我的心意。“您笑只会逗我开心。我喜欢您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您有个特点：先是沉默，突然又纵情地笑，变化只在一瞬间，快得让人看您脸色也猜不着。我在莫斯科时认识一个女子，间接认识的，我暗地里观察：她长得几乎跟您一样漂亮，但却不会像您这样笑，她的脸跟您一样楚楚动人，但一笑就失去了魅力，您的笑却非常迷人……就因为您有这种天分……这话我早就想告诉您了。”

我说到有个女子，“她长得几乎跟您一样漂亮”时，其中我要了个花招：我装作是碰巧脱口而出，仿佛是不经意说的，

我清楚地知道，这种“脱口而出”的赞美，女人会看得高于任何装模作样的恭维。尽管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听了脸红，但我知道她心里高兴。连那个女子也是我捏造的：我在莫斯科并没有认识任何女子，我纯粹是想赞美一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让她高兴。

“不难想象，”她迷人地笑了笑说，“最近这些日子您深受了某个漂亮女人的影响。”

我仿佛飘飘然起来……甚至真想向她们坦白地说出点儿什么……可我忍住了。

“顺便说说，前不久您言谈中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还充满敌意呢。”

“如果我说了什么坏话，”我眼睛发亮地说，“这要怪那些对她的荒诞诽谤，说什么她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仇敌，还诽谤他说，似乎他爱过她，向她求过婚，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话。这种说法太离奇了，同样离奇的还有对她的另一些诽谤，说什么她当丈夫还健在时就对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许诺过，一旦她守了寡就嫁给他，但后来又食言了。可是我从第一手材料得知，这一切并非如此，只是一句玩笑话而已。我是从第一手材料得知的。有一回在国外，在一次开玩笑的时候她确实跟公爵说过：将来‘也许’如何如何，但这里无非是说着玩，还能有别的意思吗？我完全知道，公爵这方面不会认为这种许诺有什么价值，再说他也根本没有这个打算，”我顿时醒悟措辞不当，便添加了后半句，“他的打算好像完全不同呢，”我乖巧地又插了一句，“刚才纳晓金在他家里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好像要嫁给比奥林格男爵了：请相信我，他听了这消息十分泰然，请相信我。”

“纳晓金去过他家？”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突然用着重的语

气问，似乎挺吃惊。

“是啊，他好像是那种体面的人物……”

“纳晓金跟他谈过她跟比奥林格男爵的婚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顿时十分关注起来。

“不是谈婚事，而是说有这种可能，传闻而已，他说社交界似乎有这种传闻，至于我，我相信这是无稽之谈。”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沉吟了片刻，便埋头做自己的针线活。

“我喜欢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我突然满腔热情地补充说，“他有他的缺点，这不用争辩，我已经跟您说过了，那就是思想有点儿偏执……可是他的缺点也正好证明他心灵高尚，不是吗？比方说，今天我跟他就差点儿为了一个观点而争吵起来：他坚信假如你宣扬高尚，那你自己就该高尚，否则你的一切宣扬都是谎言。瞧，这符合逻辑吗？然而这一点正好证明他心灵里对荣誉、责任和正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是吗？……哎呀，我的天，现在几点啦？”我无意间瞥见了壁炉炉台上的钟，突然叫起来。

“三点差十分。”她看了看钟，平静地说。在我谈论公爵的时候，她始终低着头听我说，脸上挂着狡黠但又可爱的笑意：她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夸他。丽莎边听边埋头干活，早就不再插嘴了。

我火烧火燎地直蹦起来。

“您耽误去什么地方了吧？”

“是……不……其实我是耽误了，不过我这就去。我只说一句话，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开始激动地说，“今天我不能不告诉您！我要向您承认，我已经好几次暗暗感激您的善良，感激您邀我上门的那份情意……我跟您的交往给了我极其强烈的感受。我在您的房里仿佛灵魂得到了净化，我离开您时

变得比原来好了。这是实话。我坐在您旁边时，不但坏事说不出口，连坏念头也不会有，坏念头在您面前都消失了，即使我在您旁边偶然想起了什么坏事，我也会马上为此觉得羞耻和胆怯，打心底里感到脸红。您要知道，我特别高兴今天能在您这儿见到我的妹妹……这证明您是那么高尚……态度那么好……总之，您表现出了那种手足之情，要是您允许我打破僵局的话，那我……”

我说这话的时候，她慢慢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脸色越来越红，但突然好像害怕什么，害怕某种似乎不该跨越的界限，于是迅速打断了我：

“请相信我，我一定会真心珍惜您的感情……即使您不说出口，我也明白……早就明白了……”

她害羞地住了嘴，握了握我的手。丽莎突然暗暗拉了一下我的衣袖。我告辞出来，但走到另一间房时，丽莎追上了我。

四

“丽莎，你干吗拉我的衣袖？”我问。

“她坏，她狡猾，她不配……她套住你，是为了从你口里探听消息。”她又急又恨地悄声说。我还从未见过她脸上有这种神情。

“丽莎，你这是怎么啦，她——那么可爱的姑娘！”

“那我就是坏姑娘。”

“你怎么啦？”

“我很坏。她也许是最可爱的姑娘，而我是坏姑娘。够了，别说了。听着：妈妈求你一件事，‘这事她自己不敢开口’，她

就是这么说的。亲爱的阿尔卡季！别再赌钱了，亲爱的，我求你……妈妈也求你……”

“丽莎，我心里明白，不过……我明白这是可悲的意志薄弱，不过……这只是小事，小事而已！你瞧，我像傻瓜似的欠了债，所以我只想赢钱还债。我会赢的，因为以前我下赌注时从不计算，像傻瓜似的全凭运气，可往后我每下一个卢布都会细细斟酌……要是赢不了钱，我就不是人！我并没有上瘾，这不要紧，这事一眨眼就会过去的，我向你保证！我有足够的毅力，想刹车就能刹住。等我还了债，我就跟你们在一起，你告诉妈妈，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们……”

“刚才这三百卢布让你付了多大的代价！”

“你怎么会知道的？”我猝然哆嗦了一下。

“达里娅·奥尼西莫芙娜刚才什么都听见了……”

可就在这刹那间，丽莎突然把我朝门帘后一推，于是我俩就落在幔帐背后，进了所谓的“晒亭”，也就是一间全是窗户的小圆屋。我还没清醒过来，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嗓音，马刺声，而且猜出了是哪个熟人的脚步声。

“是谢廖扎公爵。”我悄声说。

“是他。”她也悄声说。

“你干吗这么害怕？”

“没什么，我无论如何不想让他碰见我……”

“Tiens①，难道他也在追求你吗？”我笑着说，“真是这样的话，我可要给他点儿颜色瞧瞧啰。你去哪儿？”

“我们出去吧，我跟你一起走。”

“难道你在那边已经告辞过了？”

① 法文：原来是这样。

“告辞过了，我的大衣在前室……”

我们朝外走去，下楼时有个念头使我怔住了：

“听我说，丽莎，也许他是来向她求婚的！”

“不——不……他决不会求婚……”她放低了声音，语气坚定地缓缓说。

“你不知道，丽莎，尽管刚才我跟他吵过嘴，——这事想必有人转告过你了，可我真的发自内心地喜欢他，希望他这件事能够成功。我们刚才和好了。我们幸福的时候就会很善良……你瞧，他有许多美好的志向……有人道精神……至少有这种精神的萌芽……他在像韦尔西洛娃这样坚强而聪明的姑娘手里，准会完全变好，准会幸福。很抱歉，我没时间了……让我俩一块儿乘车再走一阵，这样我就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

“不，你乘车走吧，我不是顺路。你来吃饭吗？”

“来，来，我答应过的。听我说，丽莎：有一个坏蛋——总之，是个卑鄙透顶的家伙，要是你想知道的话，那就是斯捷别利科夫，这家伙对他的事情起着可怕的影响……通过期票……总而言之，把他捏在手心里，拼命逼他，而他则大失体面，以至于除了他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求婚以外，两人都看不出别的出路了。按理说，该有人预先提醒她一声，不过也是多此一举，她事后自己会把一切处理好的。你怎么看，她会拒绝他的求婚吗？”

“再见，我没工夫。”丽莎粗暴地打断了我，就在她那一闪而过的目光里，我突然看到了深深的恨意，吓得我当即叫了起来。

“丽莎，亲爱的，你干吗这样？”

“我不是针对你，只是你别再赌钱了……”

“噢，你是指赌钱，我不再赌就是了。”

“你刚才说：‘我们感到幸福的时候’，那么你很幸福吗？”

“非常幸福，丽莎，非常幸福！天哪，已经三点钟了，三点过了！……再见，丽佐克①。丽佐奇卡②，亲爱的，你说说，难道可以忍心让一个女人等我吗？我怎么行呢？”

“你这是去幽会，还是怎么的？”丽莎微微一笑，这是一种颤栗的惨淡的笑容。

“伸手给我，祝我幸福吧。”

“祝您幸福？要我伸手？决不！”

她急匆匆走掉了。重要的是，她最后喊出的这句话是十分认真的。我奔向我的雪橇。

是的，是的，正是这个“幸福”成了罪魁祸首，使我当时像瞎了眼的鼹鼠，除了我自己以外什么也不理解，什么也看不见！

①② 丽佐克、丽佐奇卡皆为丽莎的爱称。

第 四 章

一

现在讲起这事我都后怕。这一切虽然早已过去，但直到现在对我还像幻景一般历历在目。这样一个女人怎么可能主动跟我这么个当时的臭小子幽会呢？——这一点头一眼就能看出来！当我离开丽莎，坐在雪橇上疾驰的时候，我的心怦怦直跳，甚至想到我这是疯了：我突然觉得她约我幽会这个想法明显十分荒唐，根本不可信。但我却毫不怀疑，甚至很坚定：荒唐得越明显，我越相信。

时钟已敲过三点，这使我不安：“既然人家跟我幽会，我怎么可以迟到呢？”——我心里这样想。同时还闪过一些愚蠢的问题，诸如：“目前我采取什么态度更好：勇敢还是羞怯？”但这些问题只是一闪而过，因为我心里还有一个关键吃不准。昨天晚上她是这么说的：“明天三点我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就这么一句，可是，第一，我去她那儿时，她总是在自己房里单独接待我的，她不管有什么话都可以在那儿跟我

说，不必改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所以，她另定地点，改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其次，还有个问题：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会不会在家？假如这是幽会，那么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就不会在家。可是如果事先不向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说清楚一切，这又如何办得到呢？如此说来，莫非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知道内情？这个念头让我觉得太离谱，有点儿肮脏，接近于粗野了。

最后，也可能她只不过是想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走一趟，昨天告诉我时并无任何用意，而我却胡思乱想起来。何况她那句话说得很随便，漫不经心，口气很平静，而且是在一场枯燥的见面结束时说的，因为昨天我在她那儿时，不知为什么一直像掉了魂似的：我坐在那儿无精打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非常生气而又畏首畏尾，而她呢，后来我才知道正打算出门，因此当我站起来要走时，她显然很高兴。所有这些思绪在我脑子里涌现。最后我决定：走进去，拉门铃，厨娘一开门我就问："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家吗？"如果不在家，那就是"幽会"。可我不怀疑是幽会，不怀疑！

我一跑上楼梯，于是——在楼梯上，在寓所的门前，我所有的担心都消失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只求早见分晓！"厨娘打开了门，拖着鼻音、用她那可恶的冷淡口吻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不在家。"那有没有别人，有没有人在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本想这么问，可我没有问，心想"最好我自己去看看"，于是我对厨娘咕哝说我想等一会儿，便急急脱去皮大衣，打开了房门……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坐在窗旁，正在"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回来"。

"她怎么不在呢？"她一见我就突然问道，似乎又关心又烦

恼。她的声音和脸色根本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使我一下子在门口愣住了。

“谁不在?”我喃喃地问。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呀！昨天我不是托您转告她，说我三点来她家吗?”

“我……我根本没见到她。”

“您是忘了吧?”

我失望地坐下来。原来是这么回事！更要命的是，事情本来像二二得四那样清楚，可我——我还固执地相信这是幽会。

“我根本不记得您托我转告她什么。再说您也没有托过我：您只是说您三点钟去她家。”我不耐烦地冲口而出，眼睛没有瞧她。

“好哇!”她突然嚷起来，“既然您忘记转告了，可自己却知道我三点钟来这儿，那您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抬起头：她脸上既没有嘲讽也没有怒气，却只有开朗和愉快的笑容、某种格外调皮的表情，——不过这也是她常有的表情，几乎是孩子气的调皮。“瞧见没有，你这下给我牢牢抓住了吧，好啊，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她脸上的整个表情似乎在这么说。

我不愿回答，又垂下了头。冷场了半分钟光景。

“您刚从我爸爸那儿来?”她突然问道。

“我刚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来，根本没去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家……这您是知道的。”我立刻补了一句。

“您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里没出什么事吧?”

“您是指我现在这种疯疯癫癫的样子？不，我在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家以前就已经疯疯癫癫了。”

“您在她那儿没有变得清醒些?”

“没有，没有清醒。在那儿我反倒听说您要嫁给比奥林格男爵了。”

“这是她跟您说的？”她突然来了兴致。

“不，是我告诉她的，而我是听纳晓金刚才拜访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时跟他说的。”

我一直没有抬眼瞧她：只要瞧她一眼，我就会觉得自己充满了光明、快乐和幸福，可我不想成为幸福的人。因为有一种愤恨像利刃一般刺入了我的心，我在刹那间做出了重大的决定。接着我便滔滔不绝讲起来，讲了些什么，我现在几乎记不得了。我讲得上气不接下气，有点儿口齿不清，但我已经勇敢地望着她。我的心在怦怦乱跳。我先从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讲起，不过也许讲得挺有条理。起初她听的时候脸上始终挂着平静而耐心的笑容，但渐渐地出现了惊奇，后来在她凝视的目光中甚至闪过了一丝恐惧。她脸上依然挂着笑容，但这笑容似乎时不时在颤栗。

“您怎么啦？”我突然问道，因为我看到她全身哆嗦了一下。

“我怕您。”她几乎惊恐地回答。

“那您干吗不走呢？瞧，趁现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不在家，而且您也知道她不会来，那您不是正好该起身回去吗？”

“我本想等等她，可现在……真的该……”

她刚想欠起身。

“不，不，您坐下，”我止住她说，“您瞧您又哆嗦了一下，可您害怕的时候还挂着笑容……您总是挂着笑容。瞧，您现在笑开了……”

“您在说梦话？”

“是说梦话。”

“我怕……”她又喃喃地说。

“怕什么?”

“怕您会打破我们之间的壁垒呀……”她又莞尔一笑，但已经真的胆怯起来。

“我受不了您的笑！……”

于是我又滔滔不绝地讲。我像飘飘欲仙似的，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推动我。我从来没有，压根儿没有这样跟她说过话，总是胆怯，我现在也很胆怯，可我说了，记得我说起了她的脸。

“我受不了您的笑!”我突然嚷起来，“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怎么会把您想象成一个威严、华贵的女人，一个爱说上流社会那种刻薄话的女人呢? 对，在莫斯科。早在那儿我和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两人就谈起过您，我们想象过您该是个怎么样的人……您记得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吗? 您是去过她家的。在我来彼得堡的途中，我在车厢里整夜都梦见您。您回彼得堡之前，我在您父亲书房时足足有一个月在琢磨您的肖像，可还是什么也没有猜出来。您脸上的表情是一种孩子气的调皮和无限的天真——这就是真谛！每次我上您那儿时，总是对您这种表情感到十分惊奇。哦，您有时也会傲慢地看人，一眼就把人看扁：我还记得，当初您从莫斯科归来，您在您父亲房里是怎样看我的……那一次我算是见到您了，可当时出门后要是有人问我：您长得怎样? 那我肯定答不上来。甚至连您是什么身材也说不清。我一见您就目眩神迷了。您的肖像根本不像您：您的眼睛不是深色而是浅色的，只是因为睫毛长才看上去像深色。您体态丰腴，中等身材，可您丰腴得结实而灵巧，是乡村少妇那种健康的丰腴。而且您的脸也完全是乡村少妇型的，是乡村美人的脸，——请别生气，因为这很美，这更美——脸蛋又圆又红润，开朗而果断，常常挂着笑，而且……很腼腆！真的，

是一张腼腆的脸。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阿赫马科娃有一张腼腆的脸！腼腆而纯洁，我敢起誓！岂止纯洁，简直充满了孩子气！——这就是您的脸！我始终感到惊奇，始终在问我自己：这真是那女人吗？现在我知道您十分聪明，可起初我还以为您有点儿傻呢。您思想乐观，但不做任何矫饰……我还喜欢您总挂着笑容：我一见您笑——就幸福得如登天堂！我还喜欢您的文静，您的安详，您谈吐间的从容自然以及近于懒散的神态，——正是这种娇懒的神态让我喜欢。看来即使您脚下的桥塌了，您还会从容不迫、谈吐自如……我以前把您想象得极其傲慢和可怕，但这两个月来您跟我谈话却像大学生跟大学生一样……我没有想过您有这样的前额：像雕像似的略略偏低，可是在蓬松的头发衬托之下，宛如大理石一般白皙而柔和，您胸脯高高的，步态轻盈，美艳绝伦，却没有丝毫骄气。这一点我直到现在才信，过去是一直不相信的！”

她一直瞪大眼睛在听我这篇古怪的议论，她看见我在哆嗦。好几次她都动作优美而又小心地微微抬起戴手套的纤手，想阻止我说下去，可每次又都困惑而害怕地把手缩了回去。有时甚至连整个身子都猛然后缩。有两三次她的脸又绽开了笑容，还一度涨得绯红，可最后她绝对给吓坏了，脸色惨白。我刚一住口，她就想伸手告别，用一种似乎哀求的、但依然从容的声音说：

“不许这么说……不可以这么说……”

她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不慌不忙地拿起自己的围巾和貂皮手笼。

“您要走吗？”我叫起来。

“我真的怕您了……您在滥用……”她曼声曼气地说，既像惋惜又像责备。

“您听我说，上帝作证，我绝不会冲决堤防的。”

“可您已经开始啦，”她忍不住又嫣然一笑，“我甚至不知道，您放不放我走？”看样子，她真的担心我不放她走。

“我会主动给您打开门，您走吧，可您该知道：我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是您愿意照亮我心中的疑惑，那么请您回来坐下，再听完我几句话。要是您不愿意，那就请走，我主动给您开门！”

她瞧了瞧我，就坐到了位子上。

“换了别的女人，准会气冲冲地走掉，而您坐下啦！”我喜不自胜地叫道。

“您以前可从不放肆说这种话。”

“以前我总是胆小。连刚才进来时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您以为我现在就不胆小啦？我胆小着呢。可我突然做出了重大决定，我认为我能办到。我一做出这个决定，便马上疯疯癫癫起来，开始什么都说……请您听好，我就几句话：我是不是您的探子？请回答我……就是这个问题！”

她顿时涨得满脸通红。

“先不忙回答，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您听我说完，然后再告诉我真相。”

我一下子打破了所有的障碍，变得自由自在起来。

二

“两个月以前，我曾站在这儿的门帘背后……您知道……当时您正跟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谈论一封信。我突然跳出来，情不自禁地说漏了嘴。您马上明白我一定知道点儿什

么……您不可能不明白……您在找一个重要文件，为它担忧……请等一下，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先忍着别开口。我要郑重告诉您，您的怀疑是合理的：确实有这个文件……就是说有过……我看见过，这是您写给安德罗尼科夫的一封信，是不是？”

“您见过这封信？”她赶忙问，又窘又慌。“您在什么地方看见的？”

“我看见……我看见它在克拉夫特那儿……就是那个开枪自杀的人那儿……”

“真是这样？您亲眼看见的？这封信怎么样啦？”

“克拉夫特把它撕了。”

“当着您的面撕的？您看见的？”

“是当着我的面。他撕掉了，想必是因为要自杀了……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他要自杀……”

“这么说信是被毁掉了，感谢上帝！”她缓缓地说，松了一口气，还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我没有对她扯谎。就是说，虽然我扯了谎，因为文件在我那儿，根本不曾到过克拉夫特手里，但这只是小节，而最关键的一点我没有扯谎，因为就在我扯谎的那一刻，我已经决意当晚就把这封信烧掉。我敢起誓，要是这信当时就在我衣袋里的话，我会掏出来交给她，可是信不在我身边，而在寓所里。话又说回来，或许我又不会交给她，因为当时我会耻于向她承认信在我手里，我观察她那么久，迟迟不肯交给她。但结果反正一样：无论如何我会在家里烧掉它，所以我没有扯谎！我发誓，在那一刻我是正派的。

“假如是这样的话，”我几乎不由自主地往下说，“那就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因为料到了我知道文件的下落，所以才笼

络我、亲近我、接待我？您等一等，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请过一会儿再开口，让我把话全部说完：我上您那儿去的那段时间，我始终在怀疑，您亲近我的唯一目的，就是想从我嘴里探听这封信的下落，引我自己说出来……请再等一分钟：我怀疑，可我痛苦。我不能忍受您的表里不一，因为……因为我发现您是个极高尚的人！我就实话直说了吧：我曾经是您的敌人，可我发现您是个极高尚的人！我一下子就完全被征服了。可是您的表里不一，就是说我怀疑您表里不一，这使我苦恼……现在一切都该解决，一切都该说个明白，这样的时刻到了，可您还得稍等一会儿再说话，我要让您知道，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我自己对这一切怎么看。我坦白说：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我也不会生气……我是想说——我不会见怪，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我早就明白。这么做又有什么不自然和不好呢？您为文件而烦恼，您料想某某知道底细，当然您就很想让某某说出来……这没有什么不好，一点儿也没有。这是真心话。可您现在还是应该给我个说法……坦白交代（原谅我使用这个字眼）。我需要知道真相。不知为什么我需要这样！好啦，您说吧：您百般亲近我，是不是为了要从我这儿探听文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

我一边说一边仿佛要倒下去似的，我的额头在发烧。她听着听着已经不再恐慌，相反却露出了动情的脸色，可目光有点儿腼腆，好像感到害臊。

"是为了这个，"她缓缓地低声说，"请原谅我，我对不起您，"她突然补充了一句，向我微微抬起双手。我万万没有想到会这样。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两句话，竟会从我早已了解的她的嘴里说出来。

"您跟我说'对不起'！竟那么坦率：'对不起'？"我嚷道。

“哦，我早就开始意识到我对不起您……现在我甚至很高兴能说出了口……”

“您早就意识到了？那您以前干吗不说？”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她嫣然一笑，“就是说，我本该知道的，”她又嫣然一笑，“但不知为什么总是感到不好意思……因为我起初像您所说的‘笼络’您，确实只是为了这件事，可后来我很快就厌恶了……我讨厌这种虚情假意，请相信这是实话！”她痛心地补了一句，“连整个这件麻烦事也让我讨厌！”

“那您为什么，为什么当时不直截了当问我呢？您只要说一声：‘你明明知道信的事，干吗还要装假？’我就会马上告诉您一切，马上坦白说出来！”

“可是我……有点儿怕您。我承认，当时我也不信任您。说实话：如果说我耍了花招，您不是也耍了吗？”她笑了笑补充道。

“对，对，我不值得信任！”我嚷道，完全慑服了。“哦，您还不知道我已经堕落到可怕的深渊里了！”

“瞧，还可怕的深渊呢！我熟悉您说话的技巧，”她淡淡一笑，“写那封信，”她伤心地接着说，“是我生平最可悲、最轻率的举动。一意识到它，我总是责备自己。在当时发生的事故影响下，出于种种担心，我对我亲爱而宽厚的父亲的健康产生了怀疑。我知道这封信可能会落到……恶人的手里……我有充分的根据这样想（这话她说得很激动），我害怕有人会利用它，交给爸爸看……这会给他留下可怕的印象……在他这种身体状况之下……会影响他的健康……他会不再爱我……是的，”她直视我的眼睛，想必马上从我目光中领会到了什么，于是补充道，“是的，我同样也担心我自己的命运：我怕他……在疾病

影响之下……还会取消给我的恩惠……这种感觉也掺杂了进来，不过，想必我这是在贬低他：他是那么善良和大度，即使知道了，当然也会宽恕我的。整个事情就是这样。至于我对您做的事，那是不应该的，”她结束道，突然又害臊起来。“您让我感到羞愧。”

“不，您根本不用羞愧！”我叫道。

“我确实指望过……您对我的热情……这事我承认。”她垂下了眼睛说。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您说，难道有人在逼您，非得对我坦白地说出这些吗？”我如醉如痴地欢叫起来，“您本可以站起来，用最精心的措辞，最巧妙的方式，像二二得四那样向我证明，虽然事情是这样，但又根本不是这样，——您很清楚，你们上流社会里通常都善于这样来应付事实真相的，干吗不这么做呢？要知道我又愚蠢又粗俗，我会马上相信您的，不管您说什么我都相信！您这样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莫非您是真的怕我？要不您怎么会甘愿在一个冒失鬼面前，一个卑微的少年面前辱没自己呢？”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在您面前辱没自己。”她十分庄重地说，看来并不理解我的赞叹。

“哦，正好相反，正好相反！我正好因此而欢叫的！……”

“唉，从我这方面来说，这事做得多么差，多么轻率呀！”她感叹道，微微抬起一只手举近脸前，仿佛竭力想遮住脸似的。“昨天我就很羞愧，所以您坐在我那儿时，我那么不自在……实际的情形是，”她补充说，“现在我的种种事情一下子都纠缠在一起，逼得我必须最终弄清这封倒霉的信的真情实况，本来我已经开始把信的事忘了……因为我在家里接待您，绝不是只有这个用意。”她突然添了一句。

我的心颤栗了。

“当然不是，”她微妙地笑了笑，“当然不是！我……您刚才说得很确切，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说我们常常像大学生跟大学生那样交谈。请您相信，我在社交界有时感到很苦闷，特别是在回国之后，在我们家发生了种种不幸之后……现在我甚至很少外出，这不光是因为懒。我常常想到庄园去。希望在那儿重读我那些心爱的书，这些书早就被我搁在了一边，说什么也提不起兴致去读。我跟您说起过这事。还记得吗，您笑我只读俄国报纸，一天两份？”

“我没笑……”

“当然，因为您也同样读得很激动，而我早就向您袒露过：我是俄国人，我爱俄国。您一定记得，我跟您总是一块儿读‘事实’，这是您的用语（她嫣然一笑）。虽说您这人常常有点儿……古怪，可您有时却思维活跃，往往会说些精辟的话，而且您感兴趣的问题，恰恰我也感兴趣。当您安于‘大学生’角色时，说真的，您又可爱又独特。至于其他的角色，似乎不太适合您，”她含着迷人而狡黠的笑容补充了一句，“您想必记得，有时我们好几个小时就只谈些数字，又是计算又是比较，关心我国有多少所学校，教育向何处发展。我们计算有多少凶杀案和刑事犯罪案，再跟好消息比较……想弄清整个社会的趋势以及我们自己最后会怎么样。[①] 我发现您很真诚。在社交界，人们从不跟我们女人这样讲话。上星期我想跟一位公爵谈谈俾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创作都反映他十分重视具体的事实和发生的种种事件，重视这些事实的综合，认为这是基本规律与俄国生活趋势的反映。这种见解也见于他的一些书信。他还曾想出版一种定期刊物，发表各类事实信息，以此勾勒出俄国社会现状的客观图景。——俄编注

斯麦思想，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可自己又解决不了，您猜怎么着，他在我身边坐下后开始对我讲解，甚至讲得很详细，但始终带着一种讥嘲的口气，摆出一副恰恰是我不能忍受的居高临下的架势，如果我们女人过问‘不是自己的分内事’，这些‘大丈夫’通常就会用这种态度跟我们说话……可是您记得吗，我跟您谈论俾斯麦的时候，我俩差点儿还争吵起来呢？您不停地向我证明，您自己持有的思想要比俾斯麦思想‘纯洁得多得多’，”她突然笑了起来，“我生平只遇到过两个人，跟我谈话十分认真：一个是我去世的丈夫，他是非常非常聪明而且……高——尚的人，”她感人地说，“还有一个——您自己清楚是谁……”

“韦尔西洛夫！”我叫了出来。她的每句话都听得我透不过气来。

“是的。我非常喜欢听他谈，到最后我对他已经彻底……或许过于坦率了，可那时他还是不相信我！”

“他不相信？”

“对，您知道，从来没有一个人相信过我。”

“可是韦尔西洛夫，韦尔西洛夫！”

“他不但不相信我，”她垂下眼睛，有点儿奇怪地笑了笑说，“而且认为我有‘种种恶习’。”

“可您一点儿也没有！”

“不，我还是有一些的。”

“韦尔西洛夫没有爱过您，所以他不理解您。”我目光炯炯地嚷道。

“别谈这事了，请您再也不要跟我提起……这个人……”她情绪激昂地补充说，口气显得十分坚决。“不过谈够啦，该走了（她站起身想走）。那么，您到底是否原谅我？”她目光直

直地望着我问。

“您……要我……原谅您！您听我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可别生气！您快嫁人了，这是真的吗?”

“这事还根本没有决定。”她嗫嚅地说，似乎在害怕什么。

“他是好人吗？原谅我，原谅我提这个问题!”

“是的，很好的人……”

“别再说下去了，您不用回答我！我明知道我不该提这种问题！我本来只想了解他配不配，不过，他的为人我自己能打听到。”

“哎呀，您听我说!”她惊恐地说。

“好吧，我不去，我不去打听。我会回避……不过我只想说：不管您自己如何选择，愿上帝赐给您一切幸福……因为刚才，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您自己赐给了我多大的幸福！现在您已经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了。我得到了一件宝物：认识到了您的完美。我怀疑过您狡诈、您俗气地卖弄风情，我感到不幸……因为我无法把这种看法跟您联系在一起……这几天我朝思暮想，突然间一切渐渐皎如白昼了！我走进这儿时，原以为离开时我带走的印象将会是伪善、奸诈、一条刺探隐情的蛇，可我在这儿却发现了纯洁、美好、一个大学生！……您在笑?笑吧，笑吧！可您该知道，您——是个圣徒，您不能笑话神圣的东西……”

“哦，不是，我只是笑您用词那么可怕……喏，什么叫做‘刺探隐情的蛇’呢?”她笑了起来。

“今天您脱口说出了一句弥足珍贵的话，”我兴奋地接着说，“您怎么能当面对我说，‘您指望过我对您的热情’呢?虽然您是圣徒，连这种事也承认，因为您的一切也是神圣的！然而您毕竟可以不说出这句话，不用这么表达呀！……您这种甚

至超乎寻常的直爽只能表明您绝顶纯洁，尊重我，信赖我，”我语无伦次地惊叹道，“哦，别脸红，别脸红！……有谁，有谁会诽谤您，说您——是风流女子呢？哦，对不起：我看见了您脸上的痛苦表情，请原谅一个发狂的少年说出的蠢话！可是现在用什么字眼、用什么言辞难道是关键吗？任何言辞都无法形容您的高尚，不是吗？……韦尔西洛夫有一次说过，奥瑟罗杀死苔丝德蒙娜，然后自杀，并不是因为他忌妒，而是因为他的理想被埋葬了！……我很理解这一点，因为今天我又恢复了我的理想！①”

“您把我夸奖得过分了，我担当不起，”她动情地说，“您还记得吗，我跟您说过您的眼睛是什么？”她开玩笑地补问了一句。

“您说我长的不是眼睛，而是两架显微镜，您说我把每一只苍蝇都看成大骆驼！不，这回可不是骆驼！……怎么，您要走啦？”

她站在房间中央，手里拿着手笼和围巾。

“不，我等您先走，然后我自己再走。我还要给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写几句留言。”

“我这就走，马上走，可我要再说一遍：祝您幸福，祝您一个人幸福，或者跟您选择的人共同幸福，愿上帝保佑您！至于我——我只需要理想！”

“亲爱的、善良的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请相信我，我对您……我父亲总是这样谈起您：‘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孩子！’请您相信，我会永远记住您讲的那些事情：可怜的男孩儿被丢弃

① 奥瑟罗是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奥瑟罗的“理想”，是指奥瑟罗认为苔丝德蒙娜是理想的妇女。

在陌生人中间，以及他那些孤独的梦想……我十分明白您性格的形成……不过，虽说我们现在处得像两个大学生，”她含着恳求而羞涩的笑容补充说，握了握我的手。“可往后我们就不该再像先前那样见面了，而且，而且……信守不渝，您明白这意思吗？”

“不该？”

“不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该……这事得怪我……我看出，现在还要像先前那样见面是根本不行的……往后我们有时可以在爸爸那儿见面……”

“您是怕我‘热情’冲动，不信任我吗？”我本想叫起来，可她在我面前一下子变得那么害羞，使我不由自主地把话咽了回去。

“告诉我，”我已经走到了门口，她突然叫住了我，“您亲眼看见……那封信……被撕掉了？这事您记得很清楚？当时您凭什么知道那就是我写给安德罗尼科夫的信呢？”

“克拉夫特跟我讲了信的内容，甚至还给我看过……再见！每当我待在您书房里，您在场时我总是胆怯，可只要您一出去，我就甘愿扑到地板上，亲吻您的脚站过的地方……①”我突然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为了什么，随后我就没有瞧她一眼，便快步走了出去。

我动身回家，欣喜异常。一切像旋风般在脑际卷过。可我的心很充实。雪橇驶近妈妈住所的时候，我突然记起丽莎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忘恩负义，记起了刚才她那句古怪而残酷

① 批评家多利宁认为阿尔卡季与阿赫马科娃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卢梭《忏悔录》中年轻主人公对德·华伦夫人的爱情。译者按：在《忏悔录》第1部第3章中有与此相类似的细节。

的话，我的心突然为他们这些人发痛！“他们这些人的心肠多硬！连丽莎也是，她怎么啦?”我走上台阶时这样想。

我把马特维打发走了，吩咐他九点钟到我的寓所去接我。

第五章

一

我来晚了，误了吃饭的时间，可他们还没有入座，在等我。也许是因为通常我很少在他们那儿吃饭，所以这回甚至特地添了点儿菜：端来了沙丁鱼等做冷盘。可是令我又惊异又苦恼的是，我碰见他们好像都满怀心事，愁眉不展：丽莎见了我只勉强笑了笑，妈妈则显然很不安，韦尔西洛夫满脸堆笑，却是硬装的。"莫非他们吵嘴了？"我不由得想道。不过，起初一切还好：韦尔西洛夫只是对面丸子汤稍稍皱了皱眉头，可等到上米馅肉饼时，他就使劲做了个苦脸：

"只要我提过什么菜我的胃受不了，那么第二天就会有这道菜了。"他苦巴巴地随口说。

"可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还能想出什么菜来呢？怎么也想不出新的菜来呀。"妈妈怯生生地回答。

"你的母亲跟我们有些报纸截然相反，报纸只要新就是好。"韦尔西洛夫本想说句较为戏谑和友善的俏皮话，可不知

怎的没能成功，反倒更吓着了妈妈，不用说，她一点儿也不明白为什么把她跟报纸相比，因而困惑不解地左顾右盼。这当儿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走了进来，说了声她已经吃过饭了，便在妈妈旁边的长沙发上坐下。

我至今还未能博得这个大人物的好感，恰恰相反，现在她甚至为了任何一点儿小事，都会更加厉害地攻击我。最近一段时间，她对我的不满变本加厉：她容不得我那身考究的衣服，丽莎还告诉过我，说她一知道我包了辆漂亮马车，差点儿没晕过去。结果我只好尽量避开跟她见面。两个月之前，韦尔西洛夫让出遗产之后，我曾经跑到她那儿想去聊聊这件事，可是我没有看出她有半点儿嘉许的意思，相反倒气得要命：她很不满意让出全部遗产，而不是让出一半。当时她尖刻地对我说：

"我敢打赌，你一定相信他又是让遗产又是要决斗的，唯一的用意就是想改变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对他的看法。"

瞧，几乎给她猜着了：事实上我当时的确有这种感觉。

这回她刚一进来，我就立即明白她准会找我碴儿，我甚至有几分把握，实际上她就是为此而来的，所以我一下子变得异常放肆起来，而且这样做一点儿也不费力，因为由于刚才发生的事，我到现在还处于快活和飘飘然的状态之中。我要最后一次说，我有生以来始终不宜于放肆，就是说我不应该放肆，恰恰相反，放肆总会让我出丑。这次就是这样：不一会儿我就说走嘴了，我没有任何恶意，纯粹是出于轻率，我瞧见丽莎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便贸然说了一句，甚至没有掂量我在说什么：

"我在这儿难得吃一顿饭，可你，丽莎，好像作对似的，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我头痛。"丽莎答道。

“哎唷，我的上帝，”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抓住了把柄，“生病算得了什么？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肯赏脸来这儿用饭，你该开心得跳舞才对。”

“您简直是我生活中的灾星，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往后有您在这儿，我决不来！”我当真怄气地拍了拍桌子，妈妈哆嗦了一下，韦尔西洛夫却奇怪地望着我。我立即放声笑了，请求他们原谅。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关于灾星那句话我这就收回啦。”我对她说，态度还是很放肆。

“不必，不必收回，”她断然地说，“我是你的灾星比不是要光荣得多，请你相信。”

“我亲爱的，应该善于承受生活中的小小不幸，”韦尔西洛夫懒洋洋地含笑说，“没有不幸就不成其为生活。”

“听我说，您有时是个极端的守旧派。”我冲动地笑着大声嚷嚷。

“我不在乎你这么说，我的朋友。”

“不，不能不在乎！如果他——是头蠢驴呢，那您干吗不向他挑明？”

“你是指你自己？首先，我不想评判任何人，也不能评判。”

“为什么不想，为什么不能？”

“因为懒，因为我厌恶。有个聪明女人有一次跟我说过，我没有权利去评判他人，因为‘我不知道受苦是什么滋味’，而要去评判他人，自己先得在饱经苦难中熬到评判的权利。这话有点儿言过其实，但也许用在我身上倒挺合适，所以我甚至很乐意地听从这个论断。”

“莫非这话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对您说的？”我扬声说。

“你怎么知道的?”韦尔西洛夫有点儿惊奇地瞧了我一眼。

“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脸色，我就猜着啦：她突然那么抽搐了一下。”

我是碰巧猜中的。事后才知道，这话确实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前天在一场激烈的谈话中对韦尔西洛夫说的，总的说来，我再重复一遍，我那么开心、那么冲动地攻击他们大家，实在不是时候：他们各有心事，而且心事很重。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因为这些话说得那么抽象，这就是您的特点啰，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说话太喜欢抽象了。这可是利己主义者的特点：只有利己主义者爱说抽象的话。”

“您这话说得不傻，可别再纠缠了。”

“不，我很想请教，”我冲动地紧追不舍，“‘在饱经苦难中熬到评判的权利’是什么意思？谁正直，谁就能当评判官——这就是我的想法。”

“如果是这样，你能找到的评判官不会多。”

“我就知道一个。”

“那是谁?”

“他就近在眼前，正跟我说话呢。”

韦尔西洛夫奇怪地一笑，俯身凑到我耳朵边，扶着我的肩头悄声说：“他一直在对你扯谎。”

我至今也不明白，当时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但那会儿他显然异常焦虑不安（事后我才弄清楚，是一个消息引起的)。可是“他一直在对你扯谎”这句话却说得那么突然、那么认真，他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古怪，根本不像开玩笑，弄得我不知怎的，神经质地全身颤抖了一下，几乎给吓着了。我非常惊讶地望着他，但韦尔西洛夫却赶紧放声笑了起来。

“哦，感谢上帝!”妈妈放心地说，他凑在我耳边低语时，

她刚才显得挺害怕。“我原以为……你，阿尔卡季，别生我们的气。就算我们不在你身边，总会有聪明人跟你在一起，可是如果我们彼此不相爱，那还有谁来爱你呢?”

“妈妈，亲属之间的爱之所以不正当，就因为这是一种不配得到的爱。得到爱必须有配得上的理由。”

“再过一阵子你才会有配得上的爱，可在这儿不问理由都爱你。”

大家哄地笑了。

“瞧，妈妈，也许您本不想开枪，可是却打死了一只鸟儿!”我也大笑着嚷了起来。

“你真以为自己有什么理由配人爱吗，”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又攻击起我来，“说不问理由爱你，这还说轻了，人家是克制厌恶在爱你!”

“不对!”我开心地嚷道，“您知不知道，也许今天就有人跟我说过爱我呢?”

“人家笑话你才这么说呢!”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不太自然地狠狠接过了话茬儿，似乎她等的就是我这句话。“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尤其是女人，单凭你灵魂肮脏就会厌恶你。你梳着分头，穿着考究的衬衣、法国人缝制的外套，可这一切都是肮脏的!谁给你穿，谁给你吃，谁给你钱去玩轮盘赌?想想吧，你不知羞耻地在向谁拿钱?”

妈妈顿时满脸通红，我还从未见过她脸上如此羞愧的神情。我不由全身一阵抽搐：

“如果说我乱花钱，那花的也是自己的钱，用不着向谁解释。”我涨红了脸，粗暴地说。

“谁的钱是自己的?什么钱是自己的?”

“就算不是我的，那也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钱。他不会

不同意我……我在公爵那边拿钱，拿的是他欠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钱……"

"我的朋友，"韦尔西洛夫突然口气坚决地说，"那边没有一个戈比是我的钱。"

这句话太重要了。我一下子无言以对。哦，不用说，考虑到我当时那种满不在乎的反常心态，我当然可以用某种"极其高尚"的激情，或者漂亮的言辞，或者别的什么办法来摆脱困境，可是突然间我看到丽莎那张愁眉不展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气愤和责备的表情，一种对我不公道的表情，几乎是在嘲笑，于是我就像被鬼迷住了心窍：

"小姐，"我突然对她说，"您好像常去公爵寓所看望达里娅·奥尼西莫芙娜吧？那您就亲自把这三百卢布交给他行不行！为这钱您今天已经狠狠责备了我一顿呢！"

我掏出钱，递给她。信不信由你，我当时说出这种卑鄙话并没有任何目的，也就是说，丝毫没有影射什么事情。再说也不可能有这种影射，因为说这话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任何隐情。也许我只是想用什么话来挖苦她一下，用那种比较不太伤人的话，类似于说：小姐，您这是在多管闲事，既然您一定要管，"既然您那么想干预年轻男人的事"，那您就亲自去会会公爵，会会这个年轻男人、彼得堡的军官，把钱交给他行不行！可是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妈妈霍地站了起来，举起指头威胁我，她大声嚷道：

"不许说这种话！不许！"

我根本想不到她会这样，于是自己也霍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倒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出于一种痛苦，一种心灵上的伤痛，我突然猜到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可妈妈没过多久就支撑不住了：她双手捂着脸，急急离开了客厅。丽莎甚至没有朝我这

边看一眼，就跟着她出去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默默打量了我半分钟：

“难道你真的话中有话吗？”她莫名其妙地嚷了一句，非常吃惊地望着我，但没等我回答也跑去找她们了。韦尔西洛夫露出不友好的、近乎气愤的神态，从桌旁站起，去屋角取了帽子。

“我想你根本不那么傻，只是天真吧，”他讥嘲地对我咕哝了一句，“要是她们回来，你就说不必等我吃甜食：我出去走走。”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起初我觉得纳闷，继而又感到委屈，可后来我清楚地看出是我错了。不过，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只是有所感觉而已。我坐在窗旁等着。等了十分钟左右，我也拿起帽子上楼，去我早先的那间斗室。我知道她们在那儿，这是指妈妈和丽莎，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已经走了。果然，我看见她俩一块儿坐在我的长沙发上，正在悄声谈什么话。两人一见我进来，便马上不谈了。令我奇怪的是，她们居然不生我的气，至少妈妈还对我微笑了一下。

“我，妈妈，很对不起……”我刚开了个头。

“行啦，行啦，没关系，”妈妈打断我说，“只要你们彼此有爱心，永不吵嘴，那么上帝必会赐福给你们！”

“妈妈，他永远也不会欺负我的，我敢肯定！”丽莎坚定而动情地说。

“只要没有这个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根本就不会出什么事，”我嚷道，“她真可恶！”

“您瞧见没有，妈妈？听见啦？”丽莎指着我对她说。

“我要告诉你们俩，”我郑重其事地说，“如果在上流社会里让人讨厌，那么让人讨厌的只有我，其余的一切——都很迷

人!”

“阿尔卡沙，别生气，亲爱的，如果你真的不再……”

“赌？您是说赌？我会不再赌的，妈妈，今天我去是最后一次，特别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已经亲口宣布了：那边没有一个戈比是他的钱。您不会相信我听了有多脸红……不过，我该跟他解释清楚……妈妈，亲爱的妈妈，上次我在这儿说过……傻话……好妈妈，我那是胡说八道：现在我要真心诚意地信教，当时只是胡吹一气罢了，我很爱基督……”

上次我们确实谈过这一类话，当时妈妈很伤心不安。现在她听完我这番话之后，对我微微一笑，仿佛对小孩子似的：

“基督会宽恕一切，阿尔卡沙：你说的坏话基督会宽恕，比你更坏的话基督也会宽恕。基督是父亲，基督不求回报，即使在一片漆黑中也会大放光明……”

我跟她们告辞后出来，想着今天是否有机会和韦尔西洛夫见个面。我很需要跟他谈一次，但刚才行不通。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他一定在我寓所里等我。于是我徒步回去，从暖和的屋子里出来，开始觉得有点儿寒意，走一走倒挺舒坦。

二

我住在沃兹涅先斯基桥附近的一幢大楼里，楼前有个院子。我刚要跨进大门，就碰见韦尔西洛夫从里面出来。

“我一散步就习惯地走到你的住所来了，甚至还在彼得·伊波利托维奇那儿等了你一会儿，但觉得挺无聊。你那儿的人老爱吵架，今天他妻子甚至气病在床上，正哭呢。我瞧了一会儿就走了。”

不知为什么我心烦起来。

“看样子，您是只到我这儿走动了，除开我和彼得·伊波利托维奇而外，您在整个彼得堡就没有人家可去了吗？”

“我的朋友……要知道这无关紧要。”

“现在您去哪儿？”

“不，我不想回你屋里。如果你乐意，我们不妨一块儿遛遛，挺好的夜晚呢。”

“要是您平时不对我发什么抽象议论，说点关心体贴的话，比方说，哪怕只要对我暗示一下赌博这件该死的事，也许我就不会像傻瓜似的陷进去了。”我突然说。

“你在后悔？这很好，”他缓缓地答道，“我也一直在猜想，赌博并不是你爱干的主要事情，只是暂——时的迷误……你说得对，我的朋友，赌博是件坏事，况且还可能输。”

“还输掉别人的钱。”

“你还输掉了别人的钱？”

“输掉了您的钱。我从公爵那边拿钱是记在您账上的。当然，从我这方面来说，这太荒唐，太愚蠢了……把您的钱当成自己的，可我一直想赢回来。”

“我再一次提醒你，我亲爱的，那边没有我的钱。我知道，这个年轻人自己手头就非常拮据，因此尽管他做过许诺，我可没有指望他什么钱。”

“这样看来，我已经陷入了更加糟糕的境地……我的处境太可笑了！既然是这种情况，那他何必要给我钱，而我又何苦去拿他的钱呢？”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你拿他的钱，真的就没有一点儿因由了吗？啊？”

“无非是出于交情……”

“不，除开交情之外呢？有没有什么情况使你认为可以向他拿钱，啊？喏，其中有没有什么意图呢？”

“有什么意图？我不懂。”

“你不懂那就更好，老实说，我的朋友，我本来就相信你不懂。Brisons-là，mon cher,[①] 你好歹想法把赌戒了吧。”

“您要是早点儿说了该有多好！即使现在，您跟我说这话也像有气无力似的。”

“要是我说早了，你我只会吵嘴，你也就不会那么乐意让我天天晚上来你这儿了，你该知道，我亲爱的，所有这些过早的忠告——无一例外，都只是通过干涉别人的事去侵犯别人的良心。我冒犯别人良心的事已经够多了，可到头来只是碰钉子、遭奚落。碰钉子、遭奚落当然也算不了什么，关键是这种方法毫无效果：不管你如何去干涉，谁也不会听你的……而且人人都会厌弃你。”

“我很高兴您不再跟我谈抽象问题。我还有件事想问您，早就想问了，但似乎总是对您开不了口。好在我们现在是在街上。您该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住在您那儿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是两个月以前，当时我跟您坐在我那间‘棺材’里，我向您详细打听妈妈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事，——还记得吗，那时我对您有多‘放肆’？怎么能允许一个乳臭未干的儿子用那种字眼来议论母亲呢？可结果呢？您非但对此不置一词，反而自己‘敞开了心扉’，弄得我更加放肆了。”

“我的朋友，我非常高兴能听到你……有这种感受……是的，我记得很清楚，其实我当时是在等你自己脸红，如果说我本人在给你鼓气的话，那也许就是想让你放肆到极端……”

---

① 法文：我们别谈这个了，我亲爱的。

“可当时您只是让我失望，更加搅浑了我心灵里的那股清泉！是的，我是个挺可怜的少年，自己一直不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要是当时您哪怕稍稍给我指点一下路，我就会心领神会，立即走上正路。可您当时的做法只是让我恼火。”

“Cher enfant，我始终有一种预感，不管这样或者那样，你我总会取得一致的看法：即使没有我的指点，现在你就自然而然地感到了‘脸红’，我敢起誓，这样对你更好……我亲爱的，我发现你最近长进很大……莫非是在跟那个小公爵交往中学来的？”

“您别夸我，我不喜欢这样。请不要在我心里留下苦恼的猜疑，疑心您夸我是口是心非，违反事实，您只是想继续博得我的好感。至于最近……您知不知道……我经常去拜访女人们。我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比方说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家里，您知道吗？”

“这事我知道，是听她说的，我的朋友。是啊，她挺可爱，人也聪明。Mais brisons-là，mon cher. 不知怎么的，今天我心烦得出奇——难道是犯了忧郁症吗？我想是痔疮引起的。家里情况怎么样？没事啦？不用说，你在那儿跟她们和好了，大家还拥抱了。Cela va sans dire.①不知为什么，有时我一回到她们那儿总感到心情忧郁，即使在极恶劣的天气下散步之后，回到家也是这种感觉。说实话，有几次我宁肯在雨中多绕一点儿路，只求迟点儿回到这种洞穴里……很无聊，无聊得要死，天哪！”

“妈妈……”

---

① 法文：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你母亲是个极完美、极可爱的人，mais……[1]总之，也许是我配不上她们。顺便说说，她们今天发生什么事啦？最近这些日子她们一个个都有点儿不对头……你知道，我总是竭力不去理会，但今天她们那儿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你什么也没有察觉到吗？”

“我简直一无所知，要不是那该死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出口伤人——她不可能不咬人，那我根本就什么也察觉不到。您说得对：她们那边肯定有事。刚才我碰见丽莎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家里，她在那儿就已经有点儿不对头……甚至让我吃惊。她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家的事，想必您也知道吧？”

“知道，我的朋友。而你……你刚才究竟是什么时候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家里的？我是问，究竟几点钟？我需要知道这一点，以便弄清一件事。”

“在两点到三点之间，您简直想象不到，等我离开的时候，公爵正好到那儿……”

于是我就详详细细把我那次拜访的经过全部告诉了他。他默默地听我讲完，对公爵可能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求婚的事未置一词，听了我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热情赞美，也只是懒洋洋地说了一句：“她是可爱。”

“我今天让她大大吃了一惊，因为我告诉了她一条刚出炉的社交界新闻：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阿赫马科娃要嫁给比奥林格男爵了。”我突然说了出来，仿佛我一下子失去了某种控制。

“是吗？可你想不到吧，她刚不久，还在中午以前，就把这条‘新闻’告诉我了，就是说，比你让她吃惊的时间要早得

[1] 法文：可是……

多。”

“您说什么?”我一下子怔住了，“她怎么可能知道呢？不过，我这是怎么啦？她当然可能比我先知道，可是真叫您难以相信：她听我说完了这事，居然像听到了一条最新的新闻！不过……不过，我又何必计较呢？豁达大度万岁！应该豁达地对待不同性格的人，对不对？比方说，我就什么都藏不住，马上会说出来，而她呢，却像鼻烟壶上的封盖……随它去吧，随它去吧，不过她仍然是个极可爱的人，性格极好的人!”

“哦，毫无疑问，各人各个样嘛！可是最奇特的是：这些性格极好的人有时会用最奇特的方式难为别人。你简直想不到，今天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冷不妨提了个问题，弄得我难以回答：‘您爱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阿赫马科娃，还是不爱?’”

“多么古怪和荒唐的问题!”我叫了起来，又怔住了。我激动得甚至眼前发黑。我还从来不敢开口跟他谈这个话题，可是——瞧，他自己倒……

“她做了什么说明没有?”

“没有，我的朋友，根本没有，鼻烟壶马上又盖上了，而且盖得更加严实。关键是你要注意，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人家有可能跟我谈这种话，更不用说是她……不过，你自己说你了解她，所以你可以想想，她怎么会冒出这么个问题……你已经知道点儿什么了吧?”

“跟您一样，我也难以回答。也许是出于好奇，开个玩笑?”

“哦，恰恰相反，她问得非常严肃，不是一般问问，几乎可以说是在查问，显然是出于某种极不寻常、不容推诿的原因。你还会去她那儿吧？能不能打听到些什么？我甚至想求你

这么做，你要知道……”

“但关键在于，她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偏偏认为您爱着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对不起，我被惊傻了，现在还傻乎乎的。我以前从来也不允许自己跟您谈论这个话题或这一类话题……”

“你这样做很明智，我亲爱的。”

“谈论您俩早先的私情和您俩的关系——这个话题在我们之间当然是不成体统的，就我这方面来说甚至是荒唐的。但正是在最近，在最近这几天，我好几次都暗暗感叹：要是您先前哪怕有过一段时间，哪怕有过一分钟爱过这女人，那会怎么样呢？——哦，那您对她的看法，就绝不会像后来那样大错特错！后来发生的情况——我都知道：您俩互相敌对，可以说双方彼此厌恶，我知道，我听说过，听说过很多，还在莫斯科时就听说了，可是恰恰是这种情况首先给了人一个触目的事实，那就是强烈的厌恶，极端的不和——也就是不爱，然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却突然问您：‘您爱不爱？’难道她真那么消息不灵通吗？这就有点儿怪了！她是在笑话您，我敢担保，在笑话您！”

“可是我却看得出，我亲爱的，”他的声音里突然流露出某种感人肺腑、扣人心弦的神经质，这在他是十分罕见的。“我看得出，你谈这件事时自己也是热情过头了呢。你方才说你经常去拜访女人们……当然，多少也该轮到我来盘问你……按你的说法是——这个话题……可是‘这女人’难道也列在你最近结识的那些朋友的名单里吗？”

“这女人……”我突然声音发颤，“您听我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听我说：这女人就代表了您刚才在公爵家里提到的那种‘真正的生活’——您还记得吗？您当时说，这种‘真

正的生活’是那么明显，那么普通，那么明显地在望着您，您还说，正是因为这显而易见，才让人无法相信这就是我们一辈子苦苦寻找的目标……瞧，您就抱着这样的观点碰上了一个又理想又完美的女人，结果却认为这理想女人有‘种种恶习’！您活该！”

读者可以推想，我当时有多狂怒。

“‘种种恶习’！嘀嘀！这句话我知道！”韦尔西洛夫大声说，“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连这种话她都告诉你，那我是不是该向你祝贺点儿什么啦？这表明你们俩已经亲密无间，也许我还得夸夸你的持重和保密，因为只有罕见的年轻人才能做到这点呢……”

他的声音流露出亲切、友好、令人舒畅的笑意……他的话里含有某种亲切的挑衅，透过夜色我多少能看到他那张发亮的脸，脸上的神情也是如此。他出奇地亢奋。我不由自主地整个儿激动起来。

“持重，保密！哦，不，不！”我红着脸叫道，同时紧紧地握他的手，这只手不知什么时候给我抓住的，而且没有察觉竟然抓住了不放开。“不，绝对不是！……总之，我没有什么可以祝贺的，而且在这件事上永远永远也不可能发生什么，”我快喘不过气来了，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而我多么渴望这种感觉，它让我那么开心，“您听我说……但愿有一天能那样，但愿有小小的一次！您要知道，我亲爱的好爸爸——请允许我叫您爸爸吧，不但是父亲对儿子，而且任何人都不该对第三者谈论自己跟女人的关系，哪怕是最最纯洁的关系！甚至关系愈纯洁，愈应该禁止讲！否则这会让人恶心，这是不可饶恕的，总之——对知心人也不能讲！可是如果明明不是那么回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么想来就可以讲啦？可以吗？”

“听凭心的吩咐吧。”

“有一个冒昧的问题，非常冒昧的问题：您生平不是认识过一些女人，跟她们发生过关系吗？……我笼统地问问，并非特指什么!”我涨红了脸，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

“假定说吧，有过一些罪孽。”

“那么，有这样一个事例，您作为一个较有经验的人，替我解释解释：有个女人在跟您告别时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得很漫不经心，眼睛还瞧着旁边：‘我明天三点钟要去某某处’……喏，比方说，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吧，”我一下子脱口说了出来，已经完全忘乎所以了。我的心扑通一跳就停住了。我甚至一时语塞，说不下去了。他全神贯注地听着。

“就这样，第二天三点钟我去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进去的时候我这样想：厨娘一开门（您认识她家的厨娘吗?）我就劈头问：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家吗？要是厨娘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不在家，而她的一位女客则坐在那儿等着，那么请您告诉我，当时我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要是换了您……总之，假如是您的话……”

“那简直就是约你幽会嘛。不过，看来这事已经发生了，就在今天？是吗?”

“哦，不，不，不，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事情是有的，但不是那种，幽会是幽会，但不是为了那种事，这是我首先要声明的，否则我就是卑鄙的小人了，事情是有的，但……”

“我的朋友，这一切愈来愈令我好奇了，所以我想请你……”

“早先我自己就常常给乞讨者十个或二十五个戈比。让他们喝杯酒去！现在我这个中尉，一个退役的中尉只求你们赏儿

个戈比！"[1]一个身材高大的乞讨者突然拦住了我们的去路说，也许他真的是个退役中尉。但最奇怪的是，就他现在干的行当来说，他的穿着实在太考究了，然而他在伸手乞讨。

三

关于这个卑微中尉的小小插曲，我有意不想漏记，因为我现在要回忆起韦尔西洛夫的完整形象，就离不开当时处境中的所有细枝末节，而对他来说，当时正处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是决定性的时刻，那会儿我却竟然不知道！

"先生，要是您再不走开，我马上就叫警察。"突然韦尔西洛夫有点儿反常地提高了嗓门，劈面站到中尉跟前。

我说什么也无法想象，像他这样一位思想超脱的人，竟然会为了这样一件区区小事而发这么大的火。但是请读者注意，我们中断谈话的时候，正谈到令他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地方，这是他自己表示过的。

"敢情您连五个戈比也没有？"中尉把手一抡，粗暴地吼道，"那么，现在到底哪个骗子身上有五戈比！你们这些骗子！浑蛋！自己裹着海狸皮，却把五个戈比当成了国家大事！"

"警察！"韦尔西洛夫喊道。

其实也不用喊：有个警察刚好站在街角，他自己就听到了中尉在谩骂。

"我请您作证，他侮辱我们，请您领我们去警察分局告

① 这个乞讨几个戈比的退役中尉形象，以各种形式出现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几个作品里。——俄编注

他。”韦尔西洛夫说。

“嗨——，我才不怕呢，您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尤其证明不了您有头脑！”

“别放他走，警察，领我们去。”韦尔西洛夫坚持不松口。

“难道我们真要去分局？算了吧！”我悄声对他说。

“非去不可，我亲爱的。我们街上的这种胡闹现象已经太不像话了，让人再也无法忍受，要是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会让大家好过点。C'est comique，mais c'est ce que nous ferons.①”

中尉走了百来步，一直愤慨异常，精神抖擞，一副雄赳赳的样子，口口声声说“这样不行”，事情只不过是“为了五个戈比”如此等等。可末了却开始悄悄跟警察说起什么话来。警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而且显然反对这种在街上小题大做的冲动行为，他似乎站在中尉这一方，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已。他对中尉提的问题嘟嘟囔囔地回答说，“现在已经不行了”，“已经构成案件了”，又说“要是，比方说，您道个歉，而这位先生又肯接受道歉，那么也许……”

“喂，听——我说，阁下，喂，我们这是去哪儿呀？我问您：我们急冲冲赶哪儿去？这样做聪明吗？”中尉大声嚷道；“要是一个倒霉落魄的人肯道歉……要是您定要他低声下气……真是见鬼，我们又不是在客厅里，是在街上啊！在街上这样道个歉够了吧……”

韦尔西洛夫停住步，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甚至认为他挑起整个这桩事儿是为了寻开心，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完全原谅您，军官先生，我可以肯定，您这人很有能

① 法文：事情可笑，但我们得这样做。

耐。您在客厅里也不妨这么干，过不了多久，连客厅里也会蔚然成风呢。喏，我现在给您两枚二十戈比的硬币，喝杯酒，吃点儿东西去吧。对不起，警察，打扰啦，您出了力，我本想对您略致酬谢，可你们现在都很廉洁……我亲爱的，"他转脸对我说，"这儿有家小饭馆，其实是个脏得要命的地方，不过在那里可以喝一通茶，所以我想请你……瞧，就在那儿，我们去吧。"

我再说一遍，我还从未见过他这样亢奋，尽管他脸上很开心，容光焕发，可我发现他从钱包里掏那两枚硬币给军官时，他的手在发抖，手指根本不听使唤，结果只好请我替他掏出来递给中尉，这个细节我忘不了。

他领我进了一家小饭馆，在运河[1]旁边，是间地下室。顾客稀稀落落。有人在弹奏一架走了调的管风琴，乐声嘶哑，到处是一股油腻的餐巾气味。我们挑了个角落坐下。

"你也许不知道吧？我有时由于苦闷……由于精神上的极端苦闷……喜欢上这些形形色色的脏地方来。这种环境，这种弹得结结巴巴的《露契娅》[2] 中的咏叹调，这些穿着很不像样的俄国服装的跑堂，劣质的烟草气味，台球房里传来阵阵叫喊——所有这一切都那么庸俗乏味，几乎就像一幕幻景。喏，我亲爱的，这样不也很好吗？刚才那位战神的儿子打断了我们，好像我们正说到挺有趣的地方……瞧，茶端来了，我喜欢在这里喝茶……你不会想到吧，刚才彼得·伊波利托维奇突然硬要另一个麻脸房客相信，上世纪在英国议会里特意成立过一

① 指叶卡捷琳娜运河，现名格里鲍耶陀夫运河。——俄编注

② 意大利作曲家、浪漫主义歌剧代表人物多尼采蒂（1797—1848）作的三幕歌剧，1835 年在维也纳初次演出。该剧写主人公露契娅和埃德加的爱情悲剧。

个法律专家委员会，用来审核耶稣在祭司长和彼拉多前受审[1]的全过程，唯一的目的就是想弄清楚，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将会怎么判，他说当时一切进行得十分隆重，有律师、检察官等等人出席……结果呢，陪审员们不得不做出了有罪的判决……这太让人奇怪了！那个傻瓜房客开始跟他争起来，火冒三丈，吵翻了脸，扬言明天他就搬出去……房东太太为此号啕大哭，因为这会使她失去一笔收入……Mais passons[2]。在这些小饭馆里有时养着夜莺。你听说过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式的一个古老的莫斯科趣闻吗？说是在一家莫斯科的小饭馆里有只夜莺在唱歌，这时进来一个'我要咋办就咋办'的商人，问道：'这只夜莺值多少钱？'——'一百卢布。'——'烤熟了端上来！'人家就把夜莺烤熟了，端来了。'给我切十戈比的。'有一回我把这事说给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听，可他不相信，甚至还冒火呢……"

他还讲了许多。我引述这些片断只是做个示例。只要我开口想讲自己那件事，他便一再打断我，自个儿讲起十分特别、毫不相干的闲话来，而且讲得很兴奋、很开心，天知道在笑些什么，甚至还嘻嘻哈哈的，我从未见过他这种样子。他一口气喝完了一杯茶，又斟满了一杯。现在我才明白：他当时的情形就像是一个人收到了一封盼望已久、又珍贵又令他好奇的信，但是却搁在面前故意不拆开，相反地一会儿拿到手里久久地转动，一会儿又细细看那信封和火漆印，随后走进另一间房里张罗些什么，总之，他是在推迟那极其有趣的一瞬间，他知道这

① 关于耶稣在祭司长和彼拉多前受审的传说，参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5章，第1～15节。

② 法文：不过我们别谈这事了。

一瞬间决不会跑走，他这样做全是为了获取更充分的享受。

不用说，我把一切都讲给他听了，从头至尾一点儿不漏，也许讲了有个把小时。怎么可能不这样呢：我刚才就渴望一吐为快了。我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讲起，那是在老公爵家里，她刚从莫斯科归来，然后就讲这一切如何逐渐发展。我没有漏掉任何细节，再说也不可能漏掉：他自己就在不停地启发我、猜度我、提示我，让我好几次都觉得这情况真是不可思议，好像这整整两个月之中，他始终都坐在某处或站在门背后观察我：他预先就知道我的每一个手势，我的每一种感情。我感到这次向他倾诉真情是一种天大的享受，因为我看到了他那种发自内心的柔情，那种深沉而细腻的心理，还有那种仅凭只言半语就能猜出真相的惊人本领。他听我倾诉时，温存体贴得像女人一般。关键是他善于做到让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害臊，有时他会在某个细节上打断我，一边神经质地反复说："别忘了细枝末节，特别不能忘记细枝末节，有时愈是细小的地方愈重要。"就像这样，他打断了我好几次。哦，当然啦，我开头讲得挺傲慢，是对她的傲慢，可是很快就表露了真情。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我甘愿扑到地板上，亲吻她的脚站过的地方。最妙也最令人高兴的是，他极其理解她在"可能为那文件担心害怕"的同时，仍然可以保持做一个纯洁无瑕的人，就跟她今天在我面前所表现的那样，他极其理解"大学生"这个字眼的含义。可是就在我快讲完的时候，我发觉透过他那和善的笑容，他的目光中时不时闪过一种极不耐烦的神色，一种似乎心不在焉的焦躁。当我讲到"文件"时，我暗暗掂量："要不要告诉他事实真相?"尽管我当时十分兴奋，但我还是没有告诉他。我在这里记下这一点，是为了一辈子记住它。我对他所做的解释，就跟对她所说的一样：文件给克拉夫特毁掉了。他顿时目光闪

烁，额头上掠过一道奇怪的皱纹，阴沉沉的皱纹。

“我亲爱的，你确实记得是这封信，确实记得克拉夫特把它放在蜡烛上烧掉了吗？你没有弄错？”

“没有弄错。”我确认道。

“问题是这封信对她至关紧要，只要它今天落在你手里，你今天就能……”可是“就能”怎么样，他没有说出口。“怎么，它现在不在你手里吗？”

我整个人都猝然一震，但这是指内心，而不是外表。外表上我没露一丝儿声色，连眼睛也没眨一下。可我还是不肯相信他竟会有这个疑问。

“怎么会在手里呢？现在在手里？既然克拉夫特当时把它烧了，怎么还会在呢？”

“真的吗？”他用一种毫无表情、利箭一般的目光盯住我，这目光让我终生难忘。不过，他脸上还挂着笑容，然而他所有的温和、在这之前一直保持的那种女人般的体贴，一下子都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是一种捉摸不定的、心绪不宁的神态，他变得愈来愈心不在焉。要是当时他能更好地控制自己，就像刚才做到的那样，他就不会向我提这个有关文件的问题了，既然他提了出来，那肯定是因为他自己就处在一种迷狂的状态之中。话又说回来，我只是现在才这么说，当时可没有那么快就看透他发生的这种变化：我依然处于飘飘然的状态，心里还在欢唱。可是事情已经讲完，我望着他。

“有一件事挺奇怪，”我已经彻底讲完了一切，这时他突然说，“真是奇怪极了，我的朋友：你刚才说你是三点到四点之间在那儿，而且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不在家，是不是？”

“正是在三点到四点半之间。”

“瞧，你简直想象不到，正好在三点半钟，一分也不差，

我进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家，而且她是在厨房里碰见我的：要知道，我几乎总是走后边的门进她家的。”

“怎么，她是在厨房里碰见了您？”我叫了起来，惊得身子往后一仰。

“是的，她跟我说她不能接待我。我在她那儿只待了约莫两分钟，我只是去邀她吃饭。”

“说不定她刚出门回来吧？”

“我不知道，不过——当然不是。她身上穿的是对襟无扣的短上衣。当时正好是三点半。”

“可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没有跟您说我在她家吗？”

“没有，她没有跟我说你在她家里……否则我就知道了，也不用问你这件事了。”

“听我说，这个情况很重要……”

“是啊……这取决于从什么观点去看，瞧你脸都发白了，我亲爱的，不过，重要在哪儿呢？”

“我被人家当小孩子那样戏弄了！”

“她只不过是‘害怕你的热情冲动’，这是她亲口对你说的，——瞧，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家，她就有了保障。”

“可是，天哪，这个花招耍得太大了！您听我说，她让我在第三者的监视之下，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监视之下倾吐了一切，可见我那时所说的话，全都让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听见了！这……这甚至想想都可怕！”

“C'est selon，mon cher.① 何况刚才你自己还讲过，看待所有的女人要‘豁达’，还喊过‘豁达大度万岁！’”

“如果我是奥瑟罗，而您是伊阿古的话，那您也就不可能

① 法文：这取决于怎么看，我亲爱的。

高抬贵手[1]……不过，我该哈哈大笑！这儿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瑟罗，因为根本就没有那种关系。怎么不该哈哈大笑呢！随它去吧！我还是相信她无限地比我高尚，也不会失去自己的理想！……如果这是她开的一个玩笑，我会原谅她。跟一个可怜的少年开玩笑——也随它去！反正我在她面前没有一丝儿装假，至于大学生——大学生这种印象毕竟产生过，而且留下了，不管怎么说，在她头脑里产生过，在她心里产生过，这印象现在还在，将来也会在！够了！听我说，您认为如何：我要不要马上去找她，弄清全部真相？”

我嘴里说“我该哈哈大笑”，可眼里却噙满泪水。

“行啊，我的朋友，想去就去吧。”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您，似乎因此玷污了我的灵魂。请别生气，亲爱的，不过我还是要重复一遍，关于女人，关于女人的事是不该告诉第三者的，知心人也理解不了。要是你尊重女人，你就不该告诉知心人，要是你尊重自己，你也不该告诉知心人！我现在是不尊重自己。再见吧，我不会原谅我自己……”

“得啦，我亲爱的，你太夸大了。你自己说过，‘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走出饭馆，到了运河边，开始告别。

“难道你从来不想亲热地吻我一下，像孩子那样、像儿子对父亲那样吻我一下吗？”他对我说，声音奇怪地发颤。我热

---

① 伊阿古是莎士比亚剧作《奥瑟罗》中的人物。这句话暗示：就像伊阿古粉碎了奥瑟罗的理想（奥瑟罗认为苔丝德蒙娜是理想的妇女）那样，韦尔西洛夫使自己的儿子失去了理想。

烈地吻了吻他。[1]

“亲爱的……但愿你永远像现在这样，心地纯洁。”

我有生以来还不曾吻过他，从来也想象不到他会自己要我吻他。

① 两个情敌表示和好或亲吻之际，恰恰就是其中之一妒忌心达到极端之时，这种爱憎并存的细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如《白痴》和《永远的丈夫》）中也有。——俄编注

第六章

一

“当然要去！”我在急急回家的路上拿定了主意，“马上就去。很可能我会碰见她一个人在家，是一个人在家还是有别的人在一起——反正都一样：可以请她出来。她会出来见我的，她会觉得奇怪，但还是会见我的。要是她不见，我就坚持非见不可，我就叫人告诉她有急事。她会以为是关于文件的什么情况，就会见我。于是我要问清楚塔季扬娜这事的全部底细。然后……然后怎么办？如果是我不对，我就用行动报答她，如果是我对，是她错，那么这一切就该结束！无论如何——要结束这一切！我能输掉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输。要去！一定要去！”

然而，令我没齿难忘、永远能自豪地回忆起的是：我没有去！这个转折永远不会有人知晓，它将从此湮灭，但是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在这样的瞬息关头我能做出极其高尚的决定，这就足够了！“这是一种诱惑，可是我能摆脱它，”我终于下定

决心，改变了主意。“人家用事实吓唬我，可我不信，我还是信任她，相信她纯洁！我干吗要去，去问什么呢？凭什么她非得像我信任她那样地信任我，非得相信我‘纯洁’、不怕我‘热情冲动’、不拉塔季扬娜做她的保障呢？我在她心目中还不配得到这种信任。即使她不知道我应该得到这种信任，不知道我没有受‘诱惑’，不知道我不信人家对她的那些恶意诽谤，那也无所谓：然而我自己知道这些，并且为此而尊重自己。我应该尊重自己的感情。哦，她竟然让我在塔季扬娜监督之下倾吐了一切，她竟然让塔季扬娜留在家里，她知道塔季扬娜在那里偷听（因为这个人不可能不偷听），她知道这个人在笑话我，——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不过……不过，说真的——如果这样做是万不得已呢？在刚才那种情况下她还能怎么办？怎么能为此责怪她呢？要知道我在克拉夫特烧信这件事上自己也对她扯了谎，分明是我也欺骗了她，因为这样做同样万不得已，我不由自主地、毫无恶意地扯了谎。我的天哪！”我痛苦地涨红了脸，突然叫了一声，“我自己，我自己刚才干了些什么呀：难道我不是也让她同时暴露在塔季扬娜的面前了吗？难道我刚才不是也把一切都告诉了韦尔西洛夫吗？不过，我告诉的这些又算得了什么？这有区别。这里只涉及文件的事，实际上我告诉韦尔西洛夫的只是有关文件的事，因为根本没有更多的可讲，也不可能有。我不是一开始就提醒过他、嚷嚷过‘不可能有那种事’吗？他是个明白人。嗯……可是，他的心里却至今还对这个女人恨之入骨！可见他俩之间当初发生过一场激烈的冲突，可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当然是出于自尊心！除了出于极端的自尊心之外，韦尔西洛夫不可能出于其他感情！”

是的，这最后一个想法是我当时不由自主地冒出来的，我甚至没有去理睬它。当时诸如此类的想法在我头脑中接二连三

地闪过，我是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我没有作假，也没有欺骗自己，所以，如果说那时那刻我没能认清什么的话，那也只是因为我还不够聪明，而不是对自己不老实。

我回到家里情绪非常亢奋，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尽管惴惴不安，却又异常开心。可我害怕去分析，所以想方设法找点儿事来排遣。我立即去了房东太太那儿：果真不错，她和丈夫之间闹了很大的别扭。这位文官太太的肺病很重，也许她心地善良，但正像所有肺病患者一样，极其爱发脾气。我马上着手替他们调解，还到麻脸房客那儿去了一趟，那人姓切尔维亚科夫，是个很粗鲁的傻瓜，自尊心特强，在一家银行里供职，我自己很不喜欢他，不过跟他处得还好，因为，说来可鄙，我常常和他待在一起嘲笑彼得·伊波利托维奇。我很快就说服了他不要搬走，再说他自己也并没有决意真的要搬走。结果，我让房东太太完全放了心，此外，我还善于把她枕着的枕头弄得舒舒服服。“彼得·伊波利托维奇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她挖苦地说。随后我又去厨房里忙着替她弄芥末膏①，亲手做了两张顶刮刮的芥末膏。可怜的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只好眼巴巴瞧着我，羡慕不已，我却连碰都不让他碰一下，结果我真的赢得了她一把感激的眼泪。记得我当时突然对这一切厌烦起来，我突然悟出自己照料病人根本不是出于一片善心，而是出于别的原因，一种与善心完全无关的原因。

我焦躁地在等马特维到来：我决定在当天晚上最后一次去碰碰运气，而且……而且，除了碰运气之外，我感到自己非去赌博不可，要不然我就会管不住自己。如果我不去什么地方的

---

① 又叫芥子敷。在结实的纸上涂上一层芥子粉或黑芥末，给病人贴上，有刺激、消炎和止痛作用。

话，那我也许就会忍不住去找她。马特维眼看就该到了，可是突然门被打开，进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达里娅·奥尼西莫芙娜。我皱了皱眉头，暗暗诧异。她知道我的住处，因为有一次她受我妈妈之托来找过我。我给她让座后，便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她。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正视着我的眼睛，赔着恭顺的笑脸。

“您是从丽莎那儿来的吧？”我突然想起，问道。

“不是，我只是随便来坐坐。”

我提醒她我马上要出门，她还是回答说，“她只是随便来坐坐”，过一会儿就走。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可怜起她来。我该说明一下，起初她从我们大家那儿，从妈妈、特别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儿得到过很多同情，但是自从把她安顿在斯托尔别耶娃家之后，除了丽莎还常去看望她之外，我们大家似乎渐渐把她忘了。其中的原因恐怕在于她自己，因为她有一种疏远人、躲避人的本领，尽管她对人总是低首下心，挂着讨好的笑容。我个人很不喜欢她这种笑容，也不喜欢她那种明显是佯装的表情，有一次我甚至还想过，她为奥莉娅之死伤心了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可这一回不知为什么，我却可怜起她来。

只见她一言不发，突然弓起背低下头，又突然伸出双手抱住了我的腰，把脸俯到我的膝盖上。随后她抓起我的一只手，我以为她要吻它，可是她却用它捂住她的眼睛，于是热泪如泉涌一般流在了我的手上。她哭得全身抽搐，但哭声很轻。这让我觉得心酸，虽然似乎也感到有些懊恼。尽管在这之前，她对我那么胆怯而恭顺地赔着笑脸，但她还是十分信任地拥抱了我，丝毫不害怕我会生气。我开始劝她不要激动。

“我的少爷，亲爱的，我真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一到黄昏，我就管不住自己，一到黄昏，我就再也撑不住，身不由己地想去街上，想去黑暗处。主要是有一种幻想在吸引我。到

时我头脑里就会生出一个幻想：只要我一出门，我就会在街上突然遇见她。我走着走着，仿佛就看到了她。我是说，别的姑娘在前面走，我故意在后面边走边想：是她吗？就是她，我想，这就是我的奥莉娅吗？我不停地这样想着，想着。最后想昏了头，老是撞在行人身上，我心里不好过。我就像喝醉了酒似的老是撞人，有些人就骂我。于是我自个儿躲起来，谁家也不去。再说即使去了谁家，我心里也更不好过。刚才我路过您这儿，心里想：'让我上他那儿坐坐吧，他的心肠比谁都好，而且出事的时候他在场。'我的少爷，请您原谅我这么不中用，我这就走，我走……"

她突然站起身，急急要走。这当口正好马特维赶来了，我就让她跟我一块儿坐上雪橇，顺路送她回去，送到了斯托尔别耶娃的寓所。

二

最近不久，我才开始出入泽尔希科夫的轮盘赌场。在这之前我去过两三家赌场，都是跟公爵一起去，是他把我"带进"这些地方去的。[①] 其中一家主要是坐庄赌纸牌，赌注很大。可是我不喜欢在那儿：我看出，在那儿必须要有很多钱才痛快，此外，去那儿的又大多是些上流社会的恶少和"赫赫有名"的公子哥儿。公爵却偏偏喜欢这些，他不但爱赌，而且还爱与这些浪荡公子结交。我发现在这些晚局上，虽然他有时跟我肩并肩地一块儿进去，但不知为什么整个晚上却始终避开我，从不

① 当时俄国是禁止开设赌场的，这儿的赌场都是指地下赌场。

介绍我跟他圈子里的“自己人”认识。我看上去十足就像是一个闯进去的野人，有时甚至招得人人都注意我。在赌桌上时而我也有机会跟人攀谈，有一晚我跟一位公子哥儿不但攀谈，而且甚至坐在一块儿笑，甚至还帮他猜中了两张牌，可是到了第二天，当我在同一间屋子里试着跟他点头打招呼时，说什么也没想到——他竟然完全不认我。比不认更糟：他还装出一副似乎莫名其妙的样子，盯了我一眼，傲然一笑便擦身过去了。因此没过多久我就不再去那儿，开始迷上一个“脏地方”——我想不出别的用词。这是家轮盘赌场，相当蹩脚，规模很小，场主是某人蓄养的外室，但她本人从不在赌厅里露面。那儿三教九流的人都可以去，尽管也常常有军官和富商出入，赌桌上脏话不绝，不过倒也吸引了许多人。此外，我在那儿常常运气很好。可是有一回在赌得最紧张激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丑事，结果两个赌徒大打出手，从此那地方我就再也不去了，于是改去泽尔希科夫的赌场①，那也是公爵把我带进去的。泽尔希科夫是个退役的骑兵上尉，在他晚上开设的赌局上，风气相当不差，有点儿部队里的味道，在必须遵守正当规矩方面，严格得令人兴奋，而且赌得也干脆实在。比方说，那里就见不到捣蛋鬼和大酒鬼。此外，坐庄家的赌本甚至大得惊人，足以赔偿。那儿既玩坐庄赌纸牌，也玩轮盘赌。直到这一天，即 11 月 15 日晚上之前，那儿我总共只去过两回，但泽尔希科夫似乎已经认得了我的脸，不过我还没有任何熟人。偏偏这天晚上公爵和达尔赞去了我不再去的那家赌场，跟那些上流社会的浪荡公子赌纸牌，而且直到深更半夜才回来：因此这天晚上我在这群陌

---

① 据研究者阿·谢·多利宁考证，泽尔希科夫上尉的原型是退役上尉科列明，后者曾因开设赌场而受审。——俄编注

生人中间就成了一个生客。

要是我有读者，而且他读完了我已经记下的种种奇怪经历，那么毫无疑问，用不着再跟他解释：我天生就完全不宜出现在任何交际场合。关键是我在交际场合根本管不住自己。一走进人多的地方，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觉得，人人都目光如电地在搅扰我，简直让我感到恶心，一种生理上的恶心，甚至在戏院这种地方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在私人家里了。在所有这些轮盘赌场和人群聚集的地方，我根本做不到保持一点点风度：一会儿坐在那里责备自己过于温文尔雅，一会儿又突然站起来做出什么粗鲁的举动。最让我气恼的是，偏偏那些坏蛋跟我相比却表现得风度翩翩，这就越来越使我沉不住气。我要坦率地说，不只是现在，而且就在当时，所有这伙人，——如果说到底的话，甚至赢钱这事本身，最后也已经让我感到了厌恶而痛苦。确实感到痛苦。当然，我也感到异常满足，但这种满足是经过痛苦达到的。这一切，就是说这些人、这种赌博、尤其是我自己跟他们为伍，让我觉得太肮脏了。“只要一赢到钱，我就马上唾弃这一切！”——每次在我赌了一夜之后，当拂晓时分在寓所里蒙眬欲睡之际，我总是这样暗暗告诫自己。再说赢钱这件事吧：这么做，其实我根本不爱钱。但我不想重复那种卑鄙的套话，像人们通常解释这种行为时说的：我是为赌博而赌博，是为了找感觉，为了体验冒险、狂热等等，而绝不是为了赢钱。不，我非常需要钱，尽管赌博不是我的正道，不是“我的思想”，但不管怎么样，当时我还是决定通过赌博这条路试试，作为一种试验。这里有个迷人的想法一直在促使我偏离正道：“既然你已经断定，只要具有相当坚强的性格，你就一定能成为百万富豪，既然你对自己的性格已经做过多次测试，那你不妨在这儿也显显身手：难道跟实现你的思想相比，玩轮

盘赌反倒需要更坚强的性格?”——我就这样反复对自己说。可是正因为我至今还坚信，在狂热的赌博中只要做到充分的沉着坚定，保持头脑清醒和计算精确，就一定能克服轻举妄动，一定能赢，所以，当我发现自己在赌博中竟然片刻都沉不住气，入迷得完全像一个孩子时，不用说，我就必然越来越生自己的气。“我，一个能忍饥挨饿的人，竟然不能在这样的蠢事上管住自己!”——这一点使我恼火。再加上我始终认为，不管我看似多么可笑和卑微，但我身上蕴藏着一股宝贵的力量，这股力量总有一天会迫使所有的人对我刮目相看，这种意识几乎从我受尽屈辱的童年时代就已产生，当时是我唯一的生命源泉，是我的光明、我的尊严、我的武器和我的慰藉，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也许我在儿时就会自杀。正因为如此，当我看到自己在赌桌上竟会变成这样一个可怜虫时，我怎么能不气我自己呢?这也就是我无法放弃赌博的原因：这一切现在我已看得分明。除开这个主要原因之外，还因为无谓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输钱这件事使我在公爵面前、在韦尔西洛夫面前（虽然他一句话也没说)、在全家人甚至塔季扬娜面前出尽了丑，——我想是这样，我感觉到是这样。最后，我还要承认一件事：当时我已经习惯了奢侈，我已经很难放弃餐馆里七道菜的饭①，很难不雇用马特维、不去英国商店购物、不采纳我的化妆师的建议，总之，我已经很难放弃这一切。当时我就意识到了这些，但只是挥挥手没有当回事。可是现在我却一边写一边感到脸红。

① 俄国的普通饭食，一般只有三道菜。

三

我单独一人赶到那儿，冷不丁就走进了那群陌生人之中。起初我在赌桌上的一角占了个位子，开始下很小的赌注，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了两小时光景。在这两个小时里赌得很乏味——输赢不大。我错过了几次极好的机会，但我竭力不发火，竭力想靠冷静和信心取胜。结果我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却既没输也没赢：我带去的三百卢布只输掉了十至十五个卢布。这种没意思的结局使我光火起来，而且还碰上了一桩极不痛快的丑事。我知道这些轮盘赌桌上有时会有贼，我不是指从街上来的小偷，而是直指某些著名的赌徒。比方说，我就坚信著名赌徒阿费尔多夫是个贼，直到现在他还在城里到处出没：前不久我还遇见过他，别看他当时坐着一辆英国矮马拉的自备双套车，但他是个贼，他偷过我的钱。但这事下文再表，这天晚上发生的只不过是前奏而已：这两个小时我一直坐在赌桌的角边，左首紧靠我坐着的，始终是一个瘦瘦弱弱的花花公子，我猜想是个犹太人，不过他加入了某个团体，甚至还经常写点儿东西发表。就在这最后一分钟里，我一下子赢了二十卢布。于是两张红色的钞票放到了我的面前，突然，我看见这个小犹太人伸出手来，非常镇静地把我其中的一张钞票取走。我刚开口阻止他，不料他突然露出一副死皮赖脸相，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声音向我声明说，这是他赢的钱，是他刚才自己下注赢到的，他甚至不屑再跟我搭话，把脸扭了过去。偏偏这个时刻我正呆呆地出神：我想出了一个大主意，所以我啐了一口便霍地起身走开了，甚至不愿跟他争吵就把这张十卢布的红票白送了他。

再说这时也很难再跟这老脸皮厚的小偷争吵了，因为时机已经错过，赌局已经进入了下一轮。这是我当时铸下的大错，它也起了一些副作用：坐在我们旁边的三四个赌徒注意到了我们的争吵，并且看见我这么轻易就放弃了要求，十之八九把我当做是那种人。当时是十二点整，我走进隔壁房间，想了一阵，把新的计划想明白了，于是走了回来，在庄家那儿把我的钞票都兑换成五卢布金币。这样我手头就有了四十多枚。我把这些金币分作十份，决定连续下十次注，都押在 zéro① 上，每次押四枚金币，一注接一注。"赢了——是我走运，输了——更好，从此我再也不赌了。"我要说一下，这整整两小时内一次也没有转到过 zéro，所以最后谁都不敢押 zéro 了。

我站着下注，皱着眉头，咬紧牙关。下到第三注时，泽尔希科夫大声宣布说押 zéro 的赢了，那是整天都没有转到过的。庄家数给我一百四十枚五卢布的金币。我还有七次注没有下，于是我便继续下，但此时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开始转起来、晃起来了。

"您该押这儿！"我隔着整张桌子冲着一个赌徒喊，刚才我就坐在他旁边。此人蓄着灰白的小胡子，红脸膛，穿一身燕尾服，已经一连好几个小时以罕见的耐心下着小注，输了一注又一注，"您该押这儿！这儿运气好！"

"您这是指我？"小胡子从桌子那头吃惊地反问，语气中有几分威胁。

"对，指您！您押那些地方准会输个精光！"

"这不关您的事，请别来烦我！"

可我已经说什么也管不住自己了。隔着桌子正对着我坐着

① 法文：零。

一位上了年纪的军官。他瞧着我面前的一大堆钱，对他的邻座嘟哝道：

“真是怪事：竟会转到 zéro 上。不，我可不敢押 zéro。”

“放胆押吧，上校！”我冲他叫，又下了一注。

“请您也别来烦我，不用您出主意，”他很不客气地说，“您在这儿太吵了。”

“我给您提个好建议：您愿不愿打赌？我赌这一回又会转到 zéro 上，喏，赌十个金币，我敢赌，您怎么说？”

于是我摆出十枚五卢布的金币。

“十个金币，打赌？这我可以赌，”他冷峻地说，“我赌的跟您相反：这一回不会转到 zéro 上。”

“赌十枚金路易①，上校。”

“什么十枚金路易？”

“十枚五卢布金币，上校，文雅的说法就叫金路易。”

“那您直说五卢布金币得啦，请不要戏弄我。”

当然，我并不指望这次打赌能赢：转到 zéro 上的机率只有三十六分之一。可我还是提出了打赌，首先是因为我惯于摆阔，其次是因为我要想法引得大家对我刮目相看。我清楚地看出，不知为什么这地方谁也不喜欢我，而且还特别高兴地处处让我明白这一点。轮盘开始转动了——当小球突然又停在 zéro 上时，大家简直惊奇到了极点！甚至全场响起了一片叫声。这时我完全给赢钱的名声弄得晕晕乎乎了。庄家又数给我一百四十枚五卢布金币。泽尔希科夫问我愿不愿收取部分钞票，可我对他只是哼了一声，因为我简直已经不会冷静而充分地说清自

① 法国的金币，以国王路易十三命名，开始铸造于 1640 年，流通至 1795 年。

己的意思了。我头发晕，腿发软。我突然觉得我马上会铤而走险地赌一把，另外，我还很想采取点儿什么行动，再找人打个赌，或者数出几千卢布给什么人。我不由自主地用手掌把我那一大堆钞票和金币拢到面前，根本没心思去点数。就在这一刻，我猛然发现公爵和达尔赞就在我背后：他俩刚从另一家赌场过来，事后我知道，他们在那儿输了个精光。

"哦，达尔赞，"我朝他喊道，"这儿走运！您押 zéro！"

"我输光了，没钱了。"他冷冷地答道。公爵则好像根本就没注意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

"这儿有钱！"我指着我那堆金币叫道，"您要多少？"

"见鬼！"达尔赞嚷了一声，满脸通红。"好像我并没有向您要过钱。"

"人家在叫您呢。"泽尔希科夫扯了扯我的衣袖。

那位打赌输给我十枚金币[①] 的上校，已经叫了我好几次，几乎在骂了。

"您给我把钱收下！"他叫道，气得满脸通红。"我没有必要跟您交割清楚，可是不交割清楚，您以后会说钱没收着。您把钱点清楚。"

"我相信您，相信您，上校，不用点了，只是请您别对我这么嚷嚷，别生气。"于是我用手把他那一小堆金币拢了过来。

"阁下，我请您用那股高兴劲儿去缠别人吧，别来缠我，"上校声色俱厉地嚷道，"我可没跟您一块儿放过猪！"

"真是怪事，怎么放这种人进来？""他是什么人？""一个无知的小子。"——传来几声窃窃的感叹。

---

① 此处原文是"十枚十卢布金币"，与上文"十枚五卢布金币"有出入。

可我充耳不闻，随随便便又下了一注，不再押 zéro。我把整整一叠面值一百卢布的钞票押在第一个“十八”上。

“我们走，达尔赞。”我听见公爵在背后说。

“你们要回去啦?”我朝他们转过脸去，“请等等我，我们一块儿走，我——这就结束。”

我下的这一注又赢了，这次赢的数目很大。

“到此为止啦!”我叫喊了一声，开始双手发抖地把大堆的钱拢在一起，往各个口袋里装，我既没有点数，而且还有点儿荒唐地用手指去压紧一叠叠钞票，想把它们一股脑儿全都塞到一个侧袋里。这时冷不防有一只戴戒指的胖手伸过来，往我三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上一放并用手掌捂住，这是刚才坐在我右边也下了大注的阿费尔多夫。

“对不起，这——不是您的钱。”他一字一顿清晰而严肃地说，不过声音还算温和。

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前奏，后来，过了几天以后，它产生的严重后果也就在劫难逃了。现在我敢用人格担保，这三张一百卢布的钞票确实是我的，可也是活该我倒霉，当时尽管我有九分把握深信这钱是我的，但还是心存一分怀疑，对一个老实人来说，这一分怀疑就能定局，而我——是个老实人。关键是当时我还没有确知阿费尔多夫是个贼，当时我甚至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在那一刻我才会真的想到可能是自己弄错了，这三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并不归在刚才庄家数给我的那笔钱里头。我始终没有数过我那堆钱，只是双手拢过来而已，而阿费尔多夫面前也一直堆着钱，而且恰好就在我的钱旁边，不过却放得井然有序，是点清了的。再说，这儿大家都认识阿费尔多夫，把他当做富豪，十分敬重他：所有这些对我也起了影响，因而这一次我又没有进行抗争。真是大错特错！坏就主要坏在我当

时乐极忘形了。

“非常抱歉，我记不确切了，但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我的钱。”我气得嘴唇发抖。这话立即招来了一片非议声。

“这种事情应该记确切了再说，可您自己却声明您记不确切。”阿费尔多夫说，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让人受不了。

“这小子是个什么人？”“怎么说这种话？”——传来了几声感叹。

“他干这事可不是头一回，刚才他在那边跟雷贝格为了一张十卢布钞票也闹过事呢。”旁边有个什么人在鄙夷地说。

“好吧，算啦，算啦！”我大声叫道，“我不跟您争，拿去吧！公爵……公爵和达尔赞在哪儿呢？走啦？诸位，你们看见公爵和达尔赞去哪儿了吗？”末了，我抓起我所有的钱，有些金币捏在手里还来不及塞进衣袋，就跑去追赶公爵和达尔赞了。读者大概已经看出，此刻我并没有顾惜自己的脸面，把我当时的丑态原模原样、一点儿不漏地忆写出来，这是为了便于读者明白后来会发生什么事。

公爵和达尔赞已经下了楼梯，根本不理会我的呼唤和喊叫。我已经赶上了他们，但却在看门人面前止了止步，鬼知道为了什么，往他手里塞了三枚五卢布金币，他困惑不解地瞧了我一眼，连声谢谢也没说。可我不在乎，要是这会儿马特维在，那我肯定会慷慨地给他一大把金币，当时我似乎真的想这么做，但我一跑到外面的台阶上，就突然记起我刚才已打发他回家了。这当儿公爵的车夫给雪橇套上了快马，公爵便上了雪橇。

“公爵，我跟您一块儿走，我到您家去！”我叫喊一声，抓

住车毯[1] 掀了开来，正打算登上他的雪橇，不料这时达尔赞却从我旁边抢先跳上了雪橇，车夫夺过我抓住的车毯，盖在两个老爷的腿上。

“见鬼!”我气得狂叫了一声。结果我简直就像个仆人似的，我掀车毯变成了替达尔赞效劳。

“回家!”公爵向车夫吆喝一声。

“停一下!”我吼了起来，一把抓住雪橇，可是那匹马猛地一拉，我就栽倒在雪地里。我甚至还依稀看见他们笑了起来。我一骨碌跳起来，眨眼之间就拦住了最先碰上的出租马车，急急向公爵家驶去，分分秒秒地催赶着我这辆劣马拖的破车。

四

这匹劣马偏偏拖得迥乎寻常地慢，虽说我答应付给车夫整整一个卢布。车夫只是一味地抽鞭子，当然是为了那一个卢布才把马抽了一鞭又一鞭。我感到揪心，于是开始想跟车夫攀谈点儿什么，然而我甚至说不出个道道来，只是咕咕哝哝地瞎扯。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跑进了公爵家。他刚刚回府，顺路把达尔赞送走之后，此刻正一人在家。他脸色苍白、气呼呼地在书房里踱来踱去。我再说一遍：他输得很惨。他困惑不解地瞧了我一眼，有点儿心不在焉的样子。

“您又来了!”他皱着眉头说。

“先生，我是来跟您绝交的!”我气喘吁吁地说，“您有什么权利这样对待我?”

---

① 这是一种由织物或兽皮制成的毯子，在车上做盖腿用。

他露出询问的目光。

“既然您想跟达尔赞同车，那您可以当面告诉我，说您想跟达尔赞一起走哇，可是您却让马猛地一拉，害得我……”

“哦，对啦，好像您跌在雪地里了。”他直视着我的眼睛，笑了起来。

“为这种事人家通常会提出决斗，所以让我们先来了清账目……”

我开始用发抖的手掏出我的钱，一堆一堆、一把一把、一叠一叠地把它们放到长沙发上，放到大理石小桌上，甚至放到一本打开的书上，好几枚金币滚落到了地毯上。

“对啦，您好像赢钱了吧？……瞧您这副德性，这可是明摆着的。”

他从来不曾这样粗鲁地跟我说话。我脸色惨白。

“这些钱……我不知道是多少……应该点点数。我欠您大约三千……究竟欠多少？……是多了还是少了？”

“我好像并没有逼您还钱吧。”

“没有，是我自己要还，您应该清楚为什么。我知道这一叠一百卢布的钞票总共是一千卢布，您瞧着！”我开始双手发抖地点数，但马上又不点了。“算了，反正我知道是一千。您瞧清楚，这一千我留给自己，其余的钱，这一堆堆的钱，您全部拿去抵我的债，我想将近有两千吧，或许还不止两千！”

“可您还是给自己留了一千？”公爵咧嘴笑道。

“这一千您也要？既然这样……我原想……我原以为您不会想要的……不过，既然您要——那就拿去吧……”

“不，我不要。”他鄙夷地扭过脸去不看我，又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鬼知道您为什么想还钱？”他突然朝我转过身来，脸上露

出恶狠狠的挑衅的神气。

"我还钱，是要您给我个说法！"我也恶狠狠地叫道。

"您给我滚出去，别在这里装腔作势，唠叨个没完！"他突然朝我跺跺脚，似乎气得发狂，"我早就想轰走你们，您和您的韦尔西洛夫。"

"您疯啦！"我叫道。他也确实像疯了。

"你们俩尽唱高调，让我受够啦，空话，空话，全是些空话！比方说，谈荣誉的那些话！呸！我早就想绝交了……我高兴、很高兴这个时刻到了。我早就认为自己被捆住了手脚，我为自己不得不接待您……接待你们俩而感到脸红！可现在我认为什么也捆不住我，我不受任何束缚，这一点请您听明白了！您的韦尔西洛夫怂恿我去攻击阿赫马科娃，使她出丑……因此你们就没有资格在我这儿谈什么荣誉。因为你们——不是正派人……你们两个人，两个人都不是。可您还在我这儿拿我的钱，羞不羞？"

我顿时两眼发黑。

"我是以朋友的身份向您拿钱的，"我声音低低地说，"您主动提了出来，我就相信了您的好意……"

"我——不是您的朋友！我给您钱不是为了这个，您自己清楚是为了什么。"

"我拿钱都记在韦尔西洛夫的账上，当然，这样做很荒唐，可我……"

"您没有得到韦尔西洛夫的许可，拿的钱不能记在他账上，我未经他的许可也不能把他的钱给您……我给您的是我自己的钱。您知道了，您知道了才来拿钱的，而我居然在自己家里容忍这种可恶的滑稽戏！"

"我知道了什么？干吗说是滑稽戏？您给我钱到底是为了

什么？”

“Pour vos beaux yeux，mon cousin！[1]”他直视着我的眼睛，哈哈大笑起来。

“见鬼！”我大声吼道，“您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吧，喏，这一千也给您！现在——账清了，明天……”

我把那一叠面值一百卢布的钞票向他扔去，这叠钞票我本想留下做本钱的，这会儿径直打中了他的背坎，噗地一声弹落在地板上，他匆匆跨出三大步，直逼到我的面前。

“您敢不敢说，”他一字一顿地狠狠说道，“您拿我的钱拿了整整一个月，却不知道我让您妹妹怀了孕？”

“什么？竟然是这样！”我大叫起来，突然两腿一软，瘫坐在长沙发上。事后他亲口告诉我说，当时我的脸简直白得跟纸一般。我的神志糊涂起来。我记得，当时我们彼此望着对方的脸，始终一言不发。仿佛有一丝恐惧的神色在他脸上掠过，他突然俯身抓住我的双肩，扶住了我。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那种僵硬的笑容，笑容里含着怀疑和惊奇。是的，他根本没有料到他的话会引起这样的反应，因为他深信我是知道了内情才去要挟他的。

结果我晕了过去，但只有片刻工夫我就醒了，我坐正了身子，望着他反复思量——突然一切真相在我沉睡已久的记忆里变得豁然开朗！要是有人早些把这事告诉我，问我到时我会怎样对付他，我一定会回答说，我要把他撕成碎片。可是事情的结局却完全不同，根本不取决于我的意愿：我突然双手捂住脸，伤心得号啕大哭起来。不由自主就弄成了这么个结局！我这么个年轻人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孩童。这表明当时我的心灵里

---

① 法文：就为了您这双漂亮的眼睛啊，我的大舅子！

还有整整一半童心还未泯灭。我倒在长沙发上不停地抽噎。“丽莎！丽莎！可怜的，不幸的丽莎!”公爵一下子完全相信了我：

“天哪，我太对不起您了!”他沉痛万分地叫道，“哦，我疑心太重，我卑鄙地误解了您……宽恕我吧，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我猛地跳起来想对他说些什么，我站到了他面前，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便跑出了书房，跑出了他的寓所。我踉踉跄跄走到家里，几乎记不得走的是什么路线。我一头栽倒在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在漆黑中想了又想。在这种时刻，根本不可能想得有条有理、前后连贯。我的思路和想象仿佛像断了线一般，记得我当时甚至开始瞎想些毫不相干的事，甚至天知道在想些什么。但是时不时又会突然想起这件不幸的伤心事，让我心痛心酸，这时我又会绞着双手哀叫：“丽莎！丽莎!”——于是又哭了起来。我不记得是怎么睡着的，但睡得很沉、很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１３卷　少年　上
作者＝陈燊主编
页数＝３８９
ＳＳ号＝１２８２５６３５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